

福斯特自傳

[美] 福 斯 特 著
丁 明 盧 吉 茵 邵 新 華 譯

(世界知識叢書之六十三)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2 035 6523 0

書號 921-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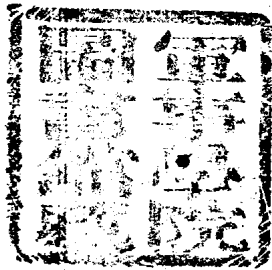
登錄號

1952年 3月 9日入館

世界知識叢書之六十三

福斯特自傳

[美] 福斯特 著
丁明 盧吉茵 邵新華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William Z. Foster:

From Bryan to Stalin

本書根據美國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一九三七年版本譯出

福 斯 特 自 傳

· 世界知識叢書之六十三 ·

著者 [美] 福 斯 特

譯者 丁 明 盧 吉 苗 鄒 新 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十七號

承印者 新華印刷廠第二廠

總經理 新 華 各 處

定價 一萬五千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 0001—6000

編號：0052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607, 85/23



威廉·福斯特畫像

前 言

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的較早階段曾經起過進步的歷史作用。資本主義根據比在它以前的封建主義較為前進的生產方法，曾經提高了文化的水平，並且達到了較高階段的社會。當然，這些前進是以一切國家勞動羣衆受到鉅大剝削爲代價的；可是資本主義在那個時期成爲向較富庶和較充裕生活前進一個一定的步驟。

但是在現在，資本主義早已終止了它的進步作用；它已經不再是促進社會前進的推動力而是成爲妨礙社會前進的障礙了。這個社會制度陷在日益擴大的生產機構與日益縮小的市場之間的無可挽救的矛盾裏，已經落到退化和反動的危急狀態中了。

廣泛而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已成爲痼疾。成千百萬失業和飢餓的工人在各個工業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着，另一方面大工廠却停着工。成百萬的農民窮困化。廣大的中產階級人民被投入破產的境地。資產階級已經不可能再用小的讓步和虛偽的民主來統治革命化的羣衆了，現在是全靠着法西斯的權術和暴力。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民主自由正受到有系統的摧殘。文化的反動日益增長和加深着；科學日益墮落，發明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已經大體上歸於無用，最原始的宗教迷信正被培育着，資本主義的藝術和文學已墮落到歷史上最底的水平。而且，最甚的是帝國主義列強絕望地爲

它們的工業去竭力攫取最後的市場，現在正急忙地準備着一次世界大屠殺。

這是一個在腐朽着的社會制度的情景，這一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會預見到。資本主義已經早已失去了任何有用性。經濟危機，羣衆性的飢餓，法西斯的恐怖，文化的反動和戰爭，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在要求把它廢除掉的歷史環境面前還想苟延殘喘的掙扎的許多徵兆。儘管它想延長資本主義統治的瘋狂企圖使成千百萬人類生命和福利受到威脅，資產階級是決不願放棄它的大批掠奪的。

被現實生活中成百萬件事實所證明的這一切巨大教訓，就是資本主義必須廢除。這是一個歷史所必要的任務。廣大的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的羣衆團結在廣泛的統一戰綫中，在共產黨的鼓舞和領導下，定將推翻這個可怕的制度。組織一個蘇維埃政府，接收大工廠、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以建立一個不以利潤爲目的的生產制度來消除人剝削人的現象。這就是說，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消除經濟危機、失業和戰爭，人類也才能走上上升的道路，走向繁榮、自由、文化與和平。

這種用革命來求得解決的正確性之活的證據就是蘇聯。在這個一億七千萬人口的大國，領土三倍於美國的國度裏，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在這資本主義世界遭受着工業衰敗和社會退化的時候，蘇聯在一切陣綫上大步邁進；無可比擬的工業和農業的擴大，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和日益增長的民主自由，強有力的文化前進等等。蘇聯是新的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開端；它是全球

成千百萬被剝削者的開路先鋒。

作者多年來深信，只有沿着這種革命的道路才能使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的羣衆從被奴役狀態中解放自己；只有這樣，社會才能找到進步的道路。在本書中，我將試圖來說明，是那些力量會促使我，一個美國的工人，達到這些革命的結論，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

本書包括兩個總的時期，前面幾章談到我在工業和勞工運動中的經驗並怎樣使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後面幾章談到我加入共產黨以後的時期，也就是談到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應用到美國的問題。我特別注意到革命的工會運動的問題，我在階級鬥爭中大部分的工作即是致力於此的。

目 錄

前 言

- 第一章 初期……………(一)
- 第二章 布利安運動……………(六)
- 第三章 社會黨……………(三)
- 第四章 工資工人黨……………(三)
- 第五章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三四)
- 第六章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五)
- 第七章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六)
- 第八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屠宰工人運動……………(八四)
- 第九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鋼鐵工人運動……………(一〇四)
- 第十章 赤色工會國際……………(一五)

第十一章	共產國際	(一四)
第十二章	工會教育聯盟	(二六)
第十三章	工會教育聯盟(續)	(二九)
第十四章	工會團結同盟	(三五)
第十五章	工會團結同盟(續)	(三七)
第十六章	共產黨	(四九)
第十七章	前進的道路	(三八)
譯者後記		(三〇)

第一章 初期

我的父親詹姆斯·福斯特生於愛爾蘭的加勞縣一個農家裏。他是一個芬尼黨人，也是一位爭取愛爾蘭獨立的熱情戰士。在他進行的民族主義活動中，他曾被派去參加英軍，從中鼓勵英軍中的很多愛爾蘭士兵起義。當時，他幫助組織一次計劃好了的起義，打算由愛爾蘭士兵突然佔領愛爾蘭，因當時英軍被派至印度，後方正規守備部隊大為削弱。但是，這個可說是拚命的計劃，被一個奸細告密了。結果，我父親同其他很多人不得不立即逃跑。一八六八年，作爲一個政治流亡者他逃到了美國，在波士頓區定居下來。以後，他便從未回過愛爾蘭，雖然維多利亞女王『六十年慶典』時，他同其他很多人都獲得大赦，有機會回國去的。

在美國，我父親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逝世時，是一位工人，他當過擦車人或馬夫。他曾打算不放棄正常工作來開家小店，但結果失敗了。雖然他已成爲美國公民，而且跟其他天主教徒一樣擁護民主黨，但他却很少過問美國的政治。他主要關懷的，還是愛爾蘭的獨立。當我兒童時期，在家裏便受到他戰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治薰陶。一八八七年，我們從波士頓移居到費勒得爾菲亞。一九〇〇年以前我都一直住在這裏。這一時期，我家成了愛爾蘭愛國志士匯集的中心，其中很多人都是摩列·馬加利斯人，他們是遭賓夕凡尼亞無煙煤區煤炭大王的迫害而逃出來的。

我父親是一位很活躍而且身強力壯的人。他說，他年青的時候會得過跳高、跳遠與三級跳遠等三項運動的大英帝國錦標。他是地方上著名的拳擊家，而他特別愛與愛爾蘭警察搏鬥。由於他是一個熱情的運動員，我家又成爲球員、田徑賽員、拳師、競走員、鬥鷄者與鬥狗者等人的集合地。父親逝世時，享年六十歲。

我母親伊利莎伯·麥克勞林，生於英格蘭的加爾里斯。她是英國人與蘇格蘭人的後裔。她的家庭幾代都是紡織工人，她本人便是一位搖紗女工。她經常以她親身的經歷告訴我們，當英國紡織工業中的舊紡織機換了新紡織機時，英國紡織工人（連她的雙親在內）所經歷的像馬克思、恩格斯所生動描寫的那樣可怕的饑餓生活。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我父親雖然也是，但却不大虔誠。我母親儘管身材纖細，但跟父親一樣體格很健全，她養了不下廿三個孩子。大多數孩子都主要由於我家境貧窮很小便死去。現在除我外，只剩下安娜、馬貝爾與勒克拉三位還活着。他們都住在西海岸。

我母親生活很辛苦，終年勞碌，同時由於生孩子太多身體也壞了。雖然她很聰明，但從未參加政治活動。我父親經常告訴我們，他只進了一天學校，而且那天學校還未上課。母親也跟他一樣，受教育很少，或者說就沒受過正規教育。她一生便是與我家經常所過的貧苦日子作長期鬥爭。她於一九〇一年逝世，年僅五十三歲。

我於一八八一年二月廿五日，生於波士頓附近麻州的陶頓。我六歲時，家庭便搬到費勒得爾

菲亞，由於我父親工資很低，又要維持一個大家庭，我們大部份時間都住在貧民窟或半貧民窟裏。從七歲到十歲，我一面賣報，一面進學校唸書。但十歲時，我家收入太少，我不得不輟學而去作工。一八九一年，我第一次工作便是替一位名叫克利奇曼的雕刻家作事。他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藝術家，其中有繪畫、塑造、石刻、木刻，雕刻印模與電鍍等。他曾協助建造現在費城市政府頂上的威廉·賓恩的巨像。

我替克利奇曼工作，是我二十六年工人生活的開始。後來我在很多工業部門中作工，包括化學、木材、五金、肉類包裝、農業、海上運輸、鐵路、建築等，走過了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從佛羅里達到華盛頓的城鄉。這終於使我對工人的生活及其痛苦獲得廣泛的親身體會。我替克利奇曼工作了三年，但他給我的工資太低（頭一年每週一元五角，第三年才每週兩元）。於是，我離開了他。九十年代中期苦難的時代襲擊着我們。我父親與長兄都失了業，我們不得不靠經常到鄰家討點殘湯剩飯過活。無論如何，我必須掙更多的工資。成年人不能找到工作，但却常有人要僱重工；因此，我在本地麥克凱拉開辦的鉛字鑄造廠裏找到一個工作，每週工資三元，我在這裏工作了三年半，對於這一行業相當熟悉。

階級意識的激發

在我當重工的三年中，得不到求學的機會，生活在窮困的家庭裏，我早就感到內心裏充滿着

階級鬥爭的情緒。自然，這時我還不懂得毛病在甚麼地方，也不懂得誰是我的真正敵人，而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有錢人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我深深憤慨我生活的窮困，甚至就憑我這雙童稚的眼睛也能看見：是有很多關係，他們顯然不工作，然而却過着奢侈的生活。

同時，我的父親竭力想使我成爲一個熱情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這得到我母親的幫忙，她盡量設法使我變成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父母的努力都得到某些成功。我虔誠地信仰天主教義，同時我第一個嚴肅的政治反應便是渴望幫助解放愛爾蘭，而且滿懷赤子的熱情，決心在我長大時，獻身於愛爾蘭的解放事業。後來，當我讀了歷史，爲美國的革命與法國的革命所鼓舞，這一決心就更爲加強了。我特別醉心於法國的革命，我十三歲的時候，便讀了六本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我十分渴望參加像那樣的偉大鬥爭，予壓迫者以真正打擊；而且我認爲正確的辦法，便是幫助愛爾蘭從英國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第一次參加罷工

但是，我父親將我培養成一位戰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計劃，終於失敗了。我當工人所過的窮困的生活，替我決定了另一命運。我身受窮困與被剝削的苦痛，又目睹週圍很多工人都表示決心反抗同樣的境遇，我便自然而然地投入美國的階級鬥爭中。我不是認識到而是感覺到：我不用到英國去尋找真正的敵人，在美國就一定會碰着這樣的敵人。因此，我以極大的興趣與同情注

視着這一時期的很多罷工以及其他的工人鬥爭。

我實際參加的第一次罷工，是一八九五年費勒得爾菲亞電車工人的罷工，那時我才十四歲。罷工只堅持了約一個禮拜，但這是一次很激烈的戰鬥，電車全部停駛，工人們都參加了這次反對滅新的鬥爭。公司方面企圖利用專門從事破壞罷工的工賊與警察暴力來推毀罷工。在第十五號街和市場街這些暴徒進攻和平的罷工工人行列，我和其他罷工者和同情罷工的工人會遭騎警的棍打和馬踏。工人們以最堅定的同心協力與高聲戰鬥精神來回答敵人的這種戰術。他們贏得廣大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對舊馬車公司的憎恨，並沒有減弱他們對於當時新辦的電車公司的憤恨。全城發生騷動。我還記得當時第十七號街與南街週圍鄰居的無產階級青年們，怎樣破壞冒險通過該區的每輛車，這種行動一直繼續了好幾天。

我相信，這次罷工最後是以某種妥協方式解決的。參加這次罷工是我受階級鬥爭的洗禮，它對我的整個人生觀有着深遠的影響。到這時，我已經成爲一個工會運動者，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因爲我沒機會參加一個組織。我已取得基本的經驗教訓，懂得工人單獨反抗僱主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將他的力量與其他工人結合起來，他才能在關於他的工資這個切身問題上，起一些作用。自此以後，我以日益增加的熱心，注視工會運動的階級鬥爭的表現而對愛爾蘭的注意却開始退居次要地位了。我的注意力的確集中在美國的階級鬥爭上了。

第二章 布利安運動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當我慢慢長大的這十年，是工人積極鬥爭的年代之一。就鬥爭的激烈的程度來說，那是以後二十五年所不能相比的。這時是勞動協會(Knights of Labor)的全盛時期，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奠基的時期。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些罷工，都是在這時期舉行的。

這也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迅速加强的年代。資本家的殘暴，以主張『公衆活該受罪』的范德比爾爲典型。資本家們加緊掠奪工人與農民，同時他們的漸托萊斯已經打倒了小商人。他們並利用鐵路大肆攫奪政府所有的農田、森林地與礦場。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都露骨腐敗，而且無恥地遵從資本家的命令行事。工人們組織起來，罷工反抗他們所遭遇的苦况的努力，都由資方廣泛使用黑名單、調來軍隊與平克頓的鎗手及僱用職業的破壞罷工的工賊等手段，遭到無情鎮壓。

然而，工人們並未馴服，而且繼續爲改善生活水準而英勇戰鬥，很多激烈的鬥爭都證明了這點。他們的戰鬥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出于階級覺悟而是因爲強烈的階級本能），使他們起而反抗迅速擴張中的資本主義日益增加的壓力。當時像後來熟練工人中那種保守的工人貴族還未充分形成；同時工會的領導尙未完全受資本家的操縱，這對於工人們開展偉大的鬥爭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但是，這一時期有很多勞工騙子，例如勞動協會會長、臭名昭彰的鮑德利、火車司機兄弟會反動的負責人阿瑟，而且名聲狼籍的龔柏斯官僚集團已經樹植了他們的勢力。然而這些工賊還不能對工會起致命影響，不像後來那樣。當時很多工會上層領導人，像馬丁·艾朗斯之類的人物，都是最忠誠的戰士，他們給羣衆以戰鬥性的領導。此外，在現有的工會中工作的革命分子，主要是社會勞工黨與無政府主義團體中人，他們在鼓勵羣衆鬥爭上盡了很大作用。

工人階級戰鬥精神極高的這十年，是從一八八六年芝加哥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偉大罷工運動開始的。這運動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工會，終於使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領導人，如帕遜斯、史派斯、費歇爾、恩格爾與林格遭受私刑。緊接着這次英勇的鬥爭，一八九二年又爆發了幾乎同樣著名的荷姆斯德的罷工，當時鋼鐵工人反對日益強大的製鋼托辣斯，工人在武裝鬥爭中把平克頓的打手趕跑了，並用武裝佔領了本地的鋼廠。但後來戰鬥終於失敗。一八九四年五月，當時正值工業大危機，鐵路工人又展開了由德布斯領導的強有力的罷工。由於聯邦政府施用暴力再加上勞聯與鐵路行業工會人員的叛變，罷工被摧毀了。同時，在洛磯山脈各州，在五金礦工中，由霍烏德領導的西部鑛工聯合會，正發動接連幾次美國勞工史上最輝煌、鬥爭最激烈的罷工，很多罷工都形成工人與公司的打手及州政府軍隊間的武裝衝突。這時期另一次著名的運動，便是柯克西的全國失業業者向華盛頓大進軍。這次運動大大地鼓舞了由於當時的經濟危機而爲失業與大量減薪所苦的工人階級。

布利安白銀自由鑄幣運動

當工人英勇反抗美國資本主義的時候，中西部的小農也是有政治上極大不滿的情緒。他們遭受很多的困難：他們從前自由的住宅與田地都抵押給人了，租佃的土地迅速增加了，政府又對他們課以重稅，結果使他們日益陷於那些魚肉他們的鐵路與各種托辣斯的壓迫下。九十年代經濟大危機的到來，更使他們的景況不堪忍受，農產品的價格急劇下跌。

在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小製造商與小商人中間，也有很大不滿。他們感到日益強大的托辣斯與壟斷資本底摧毀力量。雖然他們在一八九〇年使國會通過了休爾曼反托辣斯法，但制止壟斷資本發展的企圖仍告失敗。他們不安的情緒，由於這時期深刻的工業危機而達到頂點。

一八九六年布利安的民主黨運動，就是在工人、農民與城市中等階級普遍不滿這種總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這一運動起源於農民的人民黨，雖然現在有工人與城市中等階級人士參加，但農民仍是這一運動的骨幹。

布利安運動的綱領表明了：它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性的，是一種不會有效果的企圖阻止托辣斯與財政資本迅速發展，以及維護傳統的自由競爭制度與公民權利的措施。綱領的中心內容便是：以白銀十六盎斯對黃金一盎斯的比率自由鑄幣，這是農民想用建立賤價貨幣來擺脫其日增的債務的一種通貨膨脹計劃，這是農民們依然存在着的一種幻想。布利安運動的其他要點是：要求

政府將鐵路、電話收歸國有，取消國家銀行，祇徵收關稅充作國家歲收，徵收分級所得稅，開辦郵政儲蓄銀行，政府對不動產發行公債，參議員實行民選，人民享有創制權與複決權，實行澳洲無記名投票制度，總統不得連任，實行公務員八小時工作制，廢除偵探機關，限制入境移民，取消勞工糾紛中的禁令。但是整個運動的中心是『自由白銀』，綱領的其餘部份，在競選運動中大都被忽視了。

雖然布利安的很多建議，對勞工說來都很重要，但是廣大的工人羣衆並未因這些建議而團結起來。的確，勞工聯合會曾予布利安充分贊助，而且因美國鐵路工會罷工而馳名的德布斯也公開支持他。然而，大多數的工人，他們缺乏一個有組織的、羣衆性的政黨，他們大部份人感到他們所關懷的是經濟上的利益而不是政治上的利益，這樣，他們便被麥金萊提出的健全貨幣，提高關稅，增加工資及包管吃飽飯等大資本家的口號所哄住了。工業區的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大資本家的聯合力量把布利安打得大敗，這些資本家竟公然宣稱：如果布利安當選，他們便關閉他們的工廠。這樣一來，中等階級退却而壟斷資本勝利前進的大門，就更是洞開了。

我的第一次政治活動

這些偉大事件使我深爲激動。這個時期的艱苦而激烈的罷工，特別使我感興趣，並提高了我的階級覺悟。真的，我只有從年老的工人那裏才知道一八八六年的罷工情形，但是他們中間仍然

保存着偉大的傳統，我渴望吸取這樣的傳統精神。一八九四年美國鐵路工會罷工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密切注意閱讀報紙上報道洛磯山脈五金鑛工激烈的罷工，以及賓夕凡尼亞無煙煤礦區附近煤礦工人鬥爭的消息。我與工人休戚相關之感，不禁油然而生。我以非常興奮的心情注視着柯克西大進軍的活動，我上途中，經常停留在第十三號街與費爾柏街柯克西運動報名處，閱讀關於全國各地柯克西大軍各路進展的公報。當這運動因柯克西擅入國會草場被捕而陷入最低潮時，這對我說來，簡直是像我個人的悲劇一樣。但對喚起我的階級感情起了最大影響的，還是荷姆斯德鋼鐵工人大罷工。那時我才十一歲，但是我還記得我的父親會對派遣費勒得爾菲亞州的警衛隊到匹茲堡去憤懣不平，他聽說一位名叫亨利·伊安姆斯的警衛隊士兵，因三次向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他槍殺了卡內基鋼鐵公司總經理）歡呼，被上級縛住大姆指吊了幾個鐘頭的消息，曾表示抗議，當時我是多麼與他具有同感。

一次一次的罷工迅速地培育了我的無產階級本性。在工人們的鬥爭中，我總是同情他們，而且我很想參加他們的鬥爭。我早期望有一天積極幫助解放愛爾蘭的那種夢想，現在更加消逝了。一八九六年布利安運動爆發時，我才十五歲。但是，我熱烈支持這運動。自然，我還不能判斷布利安綱領的中等階級的政治內容，但就我看來，這綱領彷彿是真正對壓迫一般工農大眾的大托辣斯作戰；所以我盡十五歲孩子所能有的全部力量來支持這運動。我參加政治會議，我聽布利安的演講。我聆聽贊成與反對這運動的論戰，我參加火炬遊行。布利安的失敗，像是給了我一個嚴重的

打擊。我第一次體驗到統治階級手中的政治大權，以及他們無情地使用這種權力的情形。總之，這次運動給我很大的教育。

第三章 社會黨

外界的力量使我天生的無產階級本性，迅速變成真正的階級覺悟。我很快便超脫布利安運動的小資產階級局限性，而踏上走向革命人生觀的道路。

這至少是由於我在工業部門裏工作經驗，不斷豐富起來。一九〇〇年年底，我除了從前作的工作外，還在肥田粉工業中作了三年工人，在賓夕凡尼亞州雷丁城、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城的工廠裏工作，在這些地方我當過熱汽管裝配工人、定置機器工與專長的肥田粉調製工人。我也在佛羅里達州的伐木場作過工，當過二個月的火車煞車工人，當過半年紐約市第三路電車司機。我當電車司機時才第一次參加工會——電車工會。紐約市電車工人的情況是很惡劣的，工人沒有組織起來，工資與工作條件都由公司方面隨意擺佈。我決心改變這種情況。於是我去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組織幹事羅賓遜。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羅賓遜拒絕幫助我們，甚至不願讓我們小組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然而，我們却已在幾個電車場組織了秘密工會，但這事被一個偵探告發了，結果工會領袖（連我在內）都被辭退。剛建立起來的工會便這樣被破壞了。

就我親身的經驗與閱讀書報的結果，使我深深地認識到：僱主們貪求利潤，不惜無情掠奪工人，他們對於工人的痛苦以及工人家庭的痛苦是毫不在意的。這大大激起了我的戰鬥精神，與反

抗這種暴行的決心。這時，過去在學校、教堂、報紙上、工廠中，那樣不斷灌輸給我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迅速地消逝了。因而，使我在學校唸書時對政府的那種概念，大大地動搖了。政府派遣警衛隊到荷姆斯德去；在美國鐵路工會工人罷工中，政府出兵鎮壓；在美西戰爭中的「醜肉」暴行事件（這次戰爭差點把我的兄弟約翰也殺死了，他當時是賓夕凡尼亞警衛隊的士兵）；一八九六年選舉中，馬爾克·漢納對工人們的殘暴進攻；到處兇狠使用軍警對付罷工工人，這些事情摧毀了我年青時候以為政府是公平的那種觀念。我明確地感覺到（雖然我不知道是為什麼）政府是操縱在大亨們的手中，政府是工人的敵人。

同時，我對宗教的信仰（這是我那信奉天主教的母親細心教給我的），也迅速地喪失了。這種信仰的喪失，部份是由於我當工人時身受的苦痛的實際經驗，但主要還是歸功於我特別酷愛讀歷史與科學方面的書籍。我所讀的第一本反宗教的書籍，便是湯姆·潘恩的「理性時代」。這本書動搖了我對聖經的信仰。其次我又讀了洛基（註一）的「歐洲道德史」與吉朋（註二）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些書摧毀了我對教皇制與總教堂那種神聖的信仰。在九十年代後期，我又讀了達爾文的「種的起源」，我以驚奇的心情閱讀這些書，它介紹人類從低等動物進化的理論，完全打破

（註一） 洛基爲愛爾蘭歷史學與政論家（一八三八—一九〇三）

（註二） 吉朋爲英國歷史學家（一七三七—一七九四）

了我對人類不死的信念。接着我又讀了斯賓塞(註一)的「社會學綱要」，這本書闡明了上帝、魔鬼以及整個宗教的起源與演進的理論。這些使我變為一個自覺的無神論者。以後我只需讀馬列主義書籍，便了解了宗教是剝削階級壓迫人的武器，並奠定了唯物的、科學的生死觀底理論基礎。

我成了社會主義者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政府與宗教的幻想消失的整個過程，雖準備了使我轉變為一位社會主義者的基礎，而轉變的發生却是非常突然的。一九〇〇年夏天一個晚上，我在布勞德街與南街散步，看見有一個人在大街上演說，我便站着聽。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顯然是社會勞工黨人，但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這是我第一次偶然接觸到革命運動。從前我對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知識，都是從資產階級報紙之類所登載的不可置信的、歪曲的文章中得來的。我甚至從未看到過一本社會主義的書籍或手冊，雖然我讀了不少書籍。

這個人所講的話使我神往。我記得他尖銳地攻擊布利安主義，但我發現我完全同意他的話。他的論據與分析似乎使我在階級鬥爭中的經驗，有了真正的意義。他建議工人掌管政府與工業，並取消牟利制度，這就我看來似乎是真正解決工人問題的唯一辦法。我後來三十五年的生活經驗

(註一) 斯賓塞為英國哲學家(一八一〇—一九〇三)

只證實了這第一個意見。這位演說的人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我熱心地聽他講話。我離開會場時感到很興奮，後來我發奮閱讀當時能買到的小冊子。雖然我才稍為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偉大世界觀，但此後，我便開始自認為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了。那次街上的集會，的確標誌着我一生的大轉捩點。

現在，我開始熱心地閱讀社會主義書籍與報章雜誌，對革命運動也更加熟悉了。一九〇〇年深秋舉行大選時，我正在雷丁附近賓夕凡尼亞州的懷俄密辛一家肥田粉工廠中工作。德布斯與哈立曼是社會黨候選人。雖然我當時才十九歲，年紀太輕，自己不能參加選舉，但我陪另一位工人，我的姐夫喬治·麥威走了六哩路，『幫助』他投社會黨的票。第二年，我便參加了剛從社會勞工黨分裂出來的社會黨。

一個插曲

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我的革命發展突然遭到中斷。由於我在鉛字鑄造廠當過兩年半童子軍中了不少鉛毒，損害了我的健康。隨後三年在肥田粉工業中工作，也經常是在毫無保護設備的情況下，在濃重的有毒灰塵中工作，這使我的健康更加惡化，以致醫生說我患了肺病。我像在我以前的廣大工人隊伍一樣，千辛萬苦為僱主們謀利潤而自己却很有早進墳墓之虞。

事情雖然這樣，然而，我沒有甚麼家庭負擔。雙親早已去世，兩個姊姊已出嫁。於是，我便

辭去這工作，拚命往西部尋找工作。這時，我口袋裏只有廿塊錢，我搭汽船到德克薩斯州的加爾維斯頓。到了那裏，很快便不名一文了。不過在附近的鐵路建造處當二等廚役掙得一點點錢作路費，於是我就沿南太平洋鐵路綫偷乘火車流浪三千餘哩，經洛杉磯到俄勒岡州的波特蘭。這次旅程是一段很慘的經歷，沿途捱飢受餓，睡眠不足，還躲避市警察與鐵路「警察」，以及乘車的種種困難。我有幾次真是九死一生，親身體驗了工人偷乘火車的危險與困難。其後十二年，在我從事革命鼓動工作的過程中，我又有過六次這樣偷乘火車從東部海岸到西部海岸以及兩次從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這些旅行都是在冬天，祇有一次是例外。我被捕過幾次，有兩次幾乎凍死，有幾十次險些兒被火車壓死。我充分掌握了流浪漢偷乘火車的密訣，我學會偷乘客車、貨車，坐在車內、車外、車頂、車桿、緩衝器等上面，除了俗語所謂不能「坐在司機轆子上」而外，我那些都能爬上去。這些旅行使我深深了解『流浪』的失業者與偷乘火車的罪犯們的苦痛。這是富有教育意義的經驗。

我第一次旅程到達俄勒岡後，在當地船塢與附近的伐木場和鐵路建築工程上作了幾個月的工。後來，一九〇一年冬天一個晴朗的早上，我又搭一艘舊式帆船離開波特蘭。這船名叫彼加蘇斯號，是一艘英國的四桅小帆船，載麥子經合恩角駛往開普敦（南非）。這開始了我作為一個航海水手的時期，這是我作為一個工人最有興趣與難忘的經歷。這時，我環繞世界航行了一週又半。我到過合恩角兩次，好望角一次。在四艘典型的英國商船：即彼加蘇斯號、黑王子號、同盟號與卡迪

幹那號上，我都當『水手』，我已成爲一個很好的水手了。這些航行大多數都在南非、澳洲與南美海岸停泊，共航行約五萬哩，爲時約三年。這使我真正嘗到饑餓、苦痛、工資低微與危險的滋味，這使我遭受最冷酷、最無情的剝削。但這却大大有助於堅強我日益增長的革命信念。

我所工作的最後一艘船卡迪幹那號在英國的北希爾茲解僱了船員，我於是搭汽船回費勒得爾非亞。我在這裏參加了大西洋岸海員工會，想在海岸上當一名海員工人。但是，這時我又懷念着西部，因爲我的一位姊姊到了那裏了。於是，我又僱乘火車流浪到西部，這次是直接從紐約到波特蘭，因爲三年的海上生活自然是實際上並沒有給我掙得這筆旅費。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我到達俄勒岡，正好趕上給德布斯競選總統投了一票。

在這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我的健康却大爲改進。顯然我的肺病是好了，或者停止發展了，三十年後當我在莫斯科醫院時，一位醫生告訴我：X光檢查的結果證明肺病已經痊癒了，我真感到高興。

成了黨的工作者

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我在波特蘭區工作，並開始積極參加社會黨的工作。我在地方支部裏繳納了黨費，開始閱讀黨的文件。我閱讀了魏蘭、沃克及李察遜等人的小冊子，然後又閱讀重要材料，例如：『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以及馬克思

恩格斯的著作。我也急切閱讀那時剛在美國出現的第一卷『資本論』。我幾乎讀完了德·雷翁的一切小冊子與書籍，以及拉法格、普列漢諾夫、考茨基與倍倍爾等人的很多著作，但我從未聽說過或讀到過列寧的著作。

我的活動集中在波特蘭支部，當時這支部由一位名為湯姆·斯拉登的人領導。我積極參加本地的很多討論與活動。我是『訴諸理性』的熱烈支持者，而且是它的著名『大軍』的一員。我們所接到的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一些片斷的消息，大大提高了我的日益增長的革命知識與熱情。我以極大興趣注視着一九〇五年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成立，但我沒有參加，因為我不同意當時已經表現出來的反對議會的傾向。一九〇六年莫耶、霍烏德與彼特波恩的被捕與綁架，使勞工運動大為震動，而促使我們社會黨人作大規模的防衛活動。一九〇七年，在五金礦工與其他覺悟的工人羣衆壓力的直接逼迫下，他們得到釋放，我們歡欣慶賀這一偉大的勝利。這時，我認爲我自己是一位很成熟的社會主義者了，但是事實上還有很多艱苦的革命課程需要我努力學習。

我在太平洋西北岸所特有的很多地方性產業：農業、伐木、鋸木、建築、五金採礦、鐵路建造、火車車上業務等做工的三年當中，已成爲很典型的西部流浪工人。這時進行了三十多年的全國宅地運動，將近結束，但仍在進行中。西部各州仍然還有很多政府未分配的土地，貧瘠的土地，很多工人要求成爲真正的農民，或者撈一點『便宜』錢。於是，我同我姐夫每人要求分三百二十畝土地與森林地。我們的地就在俄勒岡州，加斯加德山麓。這是一塊荒野之地，森林濃密，適於

漁獵，背後就是著名的胡德河蘋果區，離鐵路約十五哩。我們自己造了一所木頭房子，三年間每年夏季有兩三個月時間在這裏掘地，對這很有趣味的墾荒生活，也熟悉起來了。每年其餘的九個或十個月時間，便在俄勒岡各種工業中當工人。最後，我們領到了『官地領用證』，於是我把我的土地賣了幾百元。以後幾年，這地區再不適於種莊稼，而被農民遺棄，又成爲荒蕪之地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總算是有一些財產，以後，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塊土地。

我在俄勒岡鐵路波特蘭—烏馬梯拉段上找到升火的工作。這是一種苦重的工作，火車載得太重，機器又失修，同時我們必須燒劣等煤，我們將這種煤叫做可憐的『不動產』。雖然升火都挑選的是身強力壯的人，但我們這一段的每個升火都因爲太精疲力竭了，在路上總有一次或兩次被迫離開機車。經過六個月這種粗笨而艱苦的工作之後，我便申請加入火車升火與司機兄弟會，決定要作一個司機。但是，一九〇七年嚴重的工業危機到來，使我失掉了工作，並打破了我的計劃。

這次危機的爆發是非常突然的。危機爆發前一週，每種工業都繁榮，到處都招僱工人，而且工資達到創記錄的水平。但是，兩週以後，一切都完全變了；工業減產，失業大軍像幻術似的出現了。所有銀行都關了門，爲了要讓這些銀行關門，州長總每天宣佈次日爲合法假日，這樣連一月之久。沒有現金，一切『現金』交易都使用波特蘭商會所發行的『麥子支票』。在西部其他各州也是同樣情形。這是一種經濟大風暴，是資本主義生產與分配制度不合理的生動例子。

社會黨的內部鬥爭

在這幾年中，我的革命認識與熱情不斷增長。我是社會黨的一個熱忱的擁護者，該黨由於太平洋海岸各州中日益增長着的嚴重內部鬥爭而陷於分裂。爲了便於了解這種鬥爭，必須說明一下它的背景。

上面所說的這十年，是在擴張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猛烈壓力下，工人階級組織與階級覺悟日益增長的年代。也是充滿着很多艱苦而激烈的罷工的時期。一九〇五年芝加哥車夫罷工，遭血腥鎮壓，結果二十一人被殺，四百一十五人受傷，便是一個例子。自一八九八年以來，美國勞工聯合會會員已由二十七萬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五萬人。爭取以產業工會代替行業工會而建立更有效的工人的運動，也正在發展，終於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勞工運動中的革命力量與進步力量對這點極表歡欣。

社會黨也反映了工人階級組織與覺悟的這種高漲。它的黨員在一九〇一年僅幾千人，而一九〇九年已增至約四萬二千人，同時它的選票也相應增加。社會黨主要的無產階級力量是來自國外出生的工人；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美國熟練工人，其中很多人都在工會中擔任職務。社會黨一些最強大的陣地是在下面這些農業州裏；例如俄克拉荷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俄勒岡、華盛頓與內布拉斯加——從前人民黨的據點，這裏被布利安用黨的激進的人民黨殘餘分子，因爲社會黨

有主張收歸國有制及其他當前要求的綱領而參加了社會黨。他們有許多人認為社會黨的綱領是社會主義新詞句所裝飾起來的原來人民黨的主張。

社會黨也吸收了很多激進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深感托辣斯對中產階級的壓力，同時對兩大舊政黨又失去信心。因此，社會黨便聚集了很多律師、醫生、牧師、傳教師等以及很多小製造家與商人，間或也有『百萬富翁』的社會黨人。例如希爾奎特、柏格爾、沃爾克、華林、斯巴爾哥、盧塞爾、麥耶、魏蘭、西蒙、哈立曼、賓遜與斯托克之流。這些言詞激進而有力的非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攫取了社會黨的領導權，並控制了黨的政策，直到現在他們那一流人都還是這樣作。

這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操縱了黨，便判定了使黨採取機會主義的政策。他們對黨的作用的看法，是把黨作為小資產階級反對前進中的大資本家的工具；也就是一種與布利安運動相近似的東西，只是換了一個花樣罷了。他們企圖將工人階級降為祇是給中產階級供給戰鬥部隊。他們的最高綱領，便是將從資本家中買來的工業收歸國有，並稱之為社會主義。他們極力利用他們對黨的鞏固的控制，反對黨內無產階級黨員使社會黨具有革命綱領，並使其成為階級鬥爭中工人的真正領袖的一切努力。社會黨的領袖們拒絕與反動的龔柏斯工會官僚進行鬥爭；他們對於建立產業工會運動的鬥爭實行怠工；他們鎮壓在羣衆中進行革命宣傳鼓動的一切努力；他們有計劃地培植資本主義逐漸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幻想。

黨內革命的工人黨員，對於這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控制與機會主義的統治，深感憤慨。特別嚴重的是，西部各州工人黨員的不滿。由於種種因素，西部各州工人久已成為美國最革命的工人；西部地區是戰鬥的西部礦工聯合會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老家，也是社會黨與美國勞工聯合會最前進的陣地。很多戰鬥的工人唾棄社會黨的機會主義，脫離了黨，而參加工團主義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另外一些人仍留在社會黨內，開始對改良主義的領導進行有組織的鬥爭。這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我在波特蘭工作時，正發展着的整個階級鬥爭在黨內的一種反映。

我積極關心這種派系的鬥爭，並立刻站在黨的左翼方面，這是很自然的。我在階級鬥爭中的一切經驗與所閱讀的書籍，都使我富於戰鬥性。我已經接受了基本的教訓：階級鬥爭的確是一種戰鬥。我深信：實行一連串改革將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這種改良主義的計劃，是無濟於事的，無情的資產階級是不能用講理、投票或收買的辦法來使其放棄政權的；只有勞苦大眾的優越力量才能使他們屈服。所以，我斷然與力圖使社會黨成為革命組織的無產階級分子結合。

第四章 工資工人黨

社會黨的內部鬥爭，終於擴及全國，而且於一九一二年在威廉D·霍烏德與馬西·克爾的『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集團所領導的鬥爭中，達到頂點。但是，在我所說的這些年代裏，鬥爭中最前進的陣地是在太平洋海岸，而其主要中心是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反對派的領袖為梯杜斯，他是地方報紙『西雅圖社會黨人報』的編輯。梯杜斯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有力的作家，富有煽動性的宣傳鼓動家，是當時美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最大的弱點，便是難以救藥的『左傾主義』與強烈的官僚主義獨斷獨行的傾向。梯杜斯集團在整個華盛頓州以及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愛達荷與蒙塔那州的部份地區都擁有很大力量與聯系。

一九〇七年的工業危機使我在波特蘭立不住腳，我不得不到西雅圖尋找工作。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我在這裏大多是當建築工人和在本地的鋸木廠作工。我立刻參加了梯杜斯反對派集團，並積極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本地工會——建築工人工會的工作。

一九〇九年的分裂

當我到達西雅圖時，社會黨的內部鬥爭已很尖銳。該州組織是操在以狡猾的牙科醫生布朗為

首的典型的機會主義知識分子手中，後來幾年布朗因聯合選舉而當選西雅圖市長。但大多數黨員都擁護左翼反對派。

以由無產階級控制黨或由小資產階級控制黨這一主要問題爲中心而進行的鬥爭，發展成爲與許多支派爭奪權力的鬥爭。右翼在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充分支持下，力圖鎮壓黨內一切革命的傾向。他們企圖使黨變爲一種地方公有制聯盟與小的改良運動。他們爲了抓取選票不惜犧牲一切。另一方面，左翼力圖使黨成爲一個戰鬥的組織。它散發馬克思的小冊子，並廣泛宣傳新出版的考茨基著作：『奪取政權之路』。它並支持『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集團的總路綫，只與左翼的演說家合作，並力圖予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其他戰鬥工會的鬥爭以真正的援助。黨內鬥爭愈來愈激烈。雙方開始將屬於對方的黨員從各個支部開除出去。

一九〇九年春黨在華盛頓州伊維利特召開的州代表大會上，鬥爭達到了最高峯。雙方都盡最大努力來選舉代表。左翼主要是獲得木材工人、城市勞動者與半無產階級的「貧苦農民」的支持。右翼有小商人、知識分子、熟練工人與富裕農民的支持。真正得到了大多數選票的無疑是左翼，但當大會召開時，右翼却糾合了大多數代表。

於是，左翼立即理直氣壯地譴責右翼利用對黨機構的控制，包辦這次大會。然而，優良的戰術本應該：左翼暫時屈從這種人爲的多數，然後再利用形勢進一步在地方上與全國組織鬥爭。但是，容易衝動的『左傾主義者』梯杜斯却太性急。在他的領導下，左翼拒絕參加這次代表大會，

撤回其代表，自己召開代表大會，並選舉了州書記。這樣，在華盛頓州便有了兩個社會黨。於是，機會主義控制下的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便立即宣佈左翼代表大會爲非法，批准右翼州書記，左翼分子，須經勝利的布朗和他的同盟者嚴格審查合格之後，才可以個人身份重新入黨。一般說來，左翼人士是拒絕接受這些苛刻條件的。因此，很少有人重返社會黨。結果使社會黨的組織在華盛頓州陷於崩潰，力量大部喪失。

我們既被開除，下一步該怎樣辦呢？最初，我們打算保持我們社會黨的名稱。但是，這種政策是行不通的，人們已很嫌厭再用社會黨這可憎的名稱。因此，我們必須採取新的形式來動員我們的力量。

社會勞工黨

我們之所以考慮參加社會勞工黨，至少是爲了這一個理由。這個組織在當時尙未退化爲像現在這樣一個狹隘的、反革命的宗派，它仍帶有革命的精神，這個組織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完全受德·雷翁控制。他的理論構成了社會勞工黨的綱領。

德·雷翁生於桑內瑞拉，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荷蘭與德國的大學校受過教育。當他懂得革命時，他便是一位虔誠的、不知疲倦的革命戰士。他也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他逝世那年，他在理論上對美國革命運動的影響，比他以前和後來任何其他美國知識分子都

大。

德·雷翁對革命運動最大的貢獻，就是他認真堅持揭露右傾機會主義。他對美國勞工聯合會職員與社會黨小資產階級領袖們的批評，傷害了這些反動派，使他們對他抱不共戴天之仇。但是，除了對改良主義的這種批評，與他進行這種批評時的革命精神而外，在德·雷翁的主張中却很少有價值的東西。當他企圖擬定一個綱領時，他就犯了極大錯誤。他是一位狹隘的、宗派的教條主義者，他的理論中雖然也有政治行動的因素，但却直接導向發展工團主義。事實上，德·雷翁可以被恰當地稱為美國工團主義思想之父。

上面說過，德·雷翁的理論體系承認有政治行動的某些需要。但它的基本傾向是工團主義，因為他一貫過低估計黨在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以後的作用；而過高估計工會的作用。這種工團主義的傾向，本身表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德·雷翁否認利用日常鬥爭取實現部份的、迫切的政治要求。他說：『不是要麵包屑，而是要資產階級無條件投降——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口號。』爭取到的讓步，僅僅是『無產階級腳下的香蕉皮』。這種主張產生了這樣的效果；就是在革命前的時期將黨降為單純說空話的機構；而將只爭取經濟要求的真正日常鬥爭，讓給產業工會去作。

其次，德·雷翁天真地相信：單純經過逐漸教育的過程，使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多數選票，便能發生革命。德·雷翁認為：資本家碰到工人的多數就會被嚇得屈服；假如不幸而他們不屈

服，那麼工人將叫自己的真正戰鬥組織——產業工會出場，工會將『把資本家趕出工廠』，這樣來結果他們；德·雷翁沒有想到資本家在還沒有被戰鬥政黨領導下的革命無產階級利用所有的武器將他們擊敗之前，他們經常進行猛烈而激劇的鬥爭（這已為俄國、德國與西班牙等國的事實所證明）；他也不了解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就是用武力來保衛當權的資產階級的政權。

第三，德·雷翁認為：一旦革命完成，黨便立即自行解散，並將假定為立即天下太平的社會交給產業工會去管理。這是進一步崇拜工會的作用，而將黨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這也表現德·雷翁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一種誤解，這過渡時期其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及與失敗了的階級的殘餘進行尖銳階級鬥爭的時期。德·雷翁典型的工團主義的表現，是他一九〇五年演說時的聲明：『產業工會運動是用以摧毀資本主義堡壘的攻城車，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本身的繼承者。』

與德·雷翁的工團主義主要傾向一致的，是他的臭名昭著的雙重工會論和關於理想的產業工會形式的烏托邦的空論。他把舊有的行業工會，視為資本家與保守的勞工領袖反對工人階級的一種陰謀。由於具有這種宗派觀念，他積極領導幾批革命分子脫離勞聯，並企圖建立烏托邦的雙重工會，其中有一八九五年的社會主義職業勞工協會，一九〇五年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一九〇八年的工人國際產業工會。這三個工會都失敗了，德·雷翁他這種雙重工會運動唯一的實際效果，便是大大削弱勞聯左翼的力量，而使薩克斯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工會。

德·雷翁整個觀點的主要工團主義色彩是很顯明的。在他的理論中，工人階級的基本機構是工會。至於黨，它的作用只是次要的，而不是中心的、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因此，將整個革命鬥爭實際上升為工會的問題。所以，被德·雷翁的理論教養出來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真正工團主義者，如聖約翰、霍馬德、陶特曼之流，只須稍為再退一步，便將德·雷翁稀薄的一點黨的觀念一掃而光，而在理論上只剩下個產業工會，從而建立完全工團主義的體系。德·雷翁曾與那些「直接行動主義者」進行激烈鬥爭，這確是事實，但那是因為他沒有從他自己的前提作邏輯的結論。他的處境有如一隻母鷄孵出了一大羣小鴨子，跟着又看到這些小鴨子在水中游泳起來時，大吃一驚的那種情形。

德·雷翁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它基本上是正在形成中的工團主義。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黨的觀念，毫無共同之處。俄國革命的經驗已光輝地證明了工人的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爭取較小要求的日常鬥爭中，在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領導者、組織者與先鋒隊。

德·雷翁主義並不是走向革命，而是離開革命。它的最後的產物——今天的社會勞工黨，正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是美國宗派主義最惡劣的表現。它是蘇聯及勞工運動中一切重要的與革命的事物底敵人。它是美國工人階級所會產生的最孤立、最軟弱與無用的全國性政黨；它真是真誠而英勇的戰士——德·雷翁的一座可憐的紀念碑。

我們建立一個新黨

由於一九〇九年社會黨在華盛頓州的分裂，我們必須對我們組織工作的下一步驟有所決定。我們中間大多數人正跟那時一般的左翼人士一樣，浸透着德·雷翁半工團主義的理論。但是我們終於決定不參加社會勞工黨。它的濃厚的宗派主義色彩使我們却步；我們雖然不是分析了德·雷翁的教條式的烏托邦主義，但却感性認識了這種主義。因此，我們決心建立一個新黨，而且我們真這樣作了。

經過許多辛勞之後，終於在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西雅圖建立了新黨。畢斯凱被選為書記。新組織取名為工資工人黨。這個組織是短命的；結果它只制訂了雜亂無章的政策公式，並未將現有的和潛在的組織力量真正組織起來，黨員數目的統計也沒有。

工資工人黨是介於社會勞工黨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之間的雜種。它在社會黨內部鬥爭時提出的主要要求，作為它的綱領的中心。那就是說，工資工人黨力圖以只限於工資工人才能成為黨員的辦法，來解決無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控制黨的問題。它自稱為「政治聯盟」，它在入黨的規程中明文規定不讓「資本家、律師、傳教士、醫生、牙科醫生、偵探、士兵、廠主、警察、監工、工頭、教授與店東」參加黨。它禁止「一切有權僱用與辭退的人」加入，但它避免提到農民。

黨綱中最着重的是產業工會運動，當時就是指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它反對成立一個勞工

黨。它那反議會政治傾向是不難看出來的。黨綱並沒有規定迫切的政治要求，也沒有提到黨在爭取這些要求、在保衛工人現在的生活水平以及在教育與組織羣衆執行未來革命任務方面，黨所起的作用。黨綱本身只含糊談到黨將支持工人的一切鬥爭。黨工作的整個重點，是放在產業工會行動，以及關於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宣傳鼓動工作上。

在階級鬥爭中，像工資工人黨這樣的組織是沒有地位的，所以它剛誕生便告夭亡。從它成立到崩潰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它的報紙——工資工人，只出了一期，便宣告死亡。突然的分裂，使我們在俄勒岡、加利福尼亞甚至華盛頓州的力量，陷於混亂。真正支持新黨的比較上爲數很少的工人，也很快退出了黨。領導分子中間幾乎沒有重新參加社會黨，或社會勞工黨的，有些人像奧爾特成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但是大多數人如曼雷（他後來成了我的女婿）、海德、畢斯凱、我自己及其他許多人，都參加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我們所受的德·雷翁主義的教育，引導我們走向邏輯的結論——工團主義。

從前工資工人黨集團的少數殘餘分子，仍團結在梯杜斯週圍，並提倡以縮短工作日作爲取消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很快又分爲兩派，一派要求每天工作四小時，另一派要求每天工作三小時。梯杜斯本人已決心成爲一個無產者。他拋棄了他醫生的職業，而且在以後廿年，他都當升降機司機。其中有幾年，梯杜斯會偷乘火車漫遊全國，對美國勞工聯合會地方組織演講，並向他們誓約在幾年後的某天宣佈總罷工，爭取每天工作四小時。一九三一年他因患癌病死於紐約一家醫

院中。

至於我自己，我上面說過，我投奔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我沒有回社會黨，這也許是我事業中最大的政治錯誤。雖然社會黨整個說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這已很快為戰時與戰後年代中的事件生動地證明了，然而經過它的左翼，它是終於成立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種子底主要傳播者。例如，共產國際也是從第二國際產生的。所以我的脫離社會黨，使我與革命發展的主流——社會黨左翼隔離，結果使我在工團主義貧瘠的沙漠中徘徊了十二年。

工資工人黨的意義

工資工人黨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社會黨左翼最早的組織之一，它是一九一二年大門爭及一九一九年社會黨最後全國分裂的預兆。它是社會黨內部革命分子反對改良主義領導這一世界性鬥爭中的地方性前哨戰。在舊俄，改良主義一九〇三年便已經被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決定性地擊敗了，其後十年也是在他的領導下，全世界反對活力日益減少的改良主義的鬥爭，終於成立了共產國際。

工資工人黨在說明左翼在其現階段發展中的思想發展的情況這一點上，也是有重要意義的。它的綱領是幼稚和極左的。它受了德·雷翁學說的嚴重影響，認為黨只是進行革命宣傳鼓動的組織，而不是工人底領導的、戰鬥的機關；它不提出當前的政治要求，它浸透着反議會政治的傾

向；它充滿了當時流行的對於雙重產業工會運動的作用的過高估計，而且它甚至忽視了工人的有力的同盟軍——貧農。工資工人黨在它的整個觀點中，帶有濃厚的工團主義性質。

特別顯著的是，工資工人黨對於勞動者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問題，作出過左的解決辦法，不讓他們參加黨。因而，它遵循着很多年以前巴枯寧與蒲魯東在第一國際中所採取的錯誤道路，當時他們會不顧列寧的堅決反對而主張採取同樣的政策。在原則上與一切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破裂，是不正確的，這使黨陷入理論上的貧乏之境。對那些企圖利用黨來進行改良主義目的的知識分子野心家，與那些已拋棄原階級而投身無產階級，並正從事發展工人革命理論的基本任務的革命知識分子，必須有所區別。列寧在他著名的小冊子『做什麼』中，曾對這問題說過：

『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工資工人黨對於工人階級中革命分子的看法，也表現了過左的傾向。湯姆·斯拉登在『國際社會主義評論』上發表的以『無產者』為題的一文中，說明了關於這問題當時流行的錯誤觀念。他認為建黨與進行革命的工人，必須是完全無家可歸的工人，失業的人，一文不名的人，不信仰

上帝的人與被剝奪選舉權的人。然而，這種觀念只是簡單地反映了衆所周知的西部流浪工人的觀念，這些流浪工人充滿革命精神，控制了整個西部工人運動，但他們絕不是廣大工人階級底代表。工黨工人黨對革命力量的這種狹隘看法，自然會使黨脫離貧農與小資產階級整個階層，甚至脫離廣大的工人階級本身。

第五章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

我對於建立工資工人黨不大熱心，甚至當其正建立時，我就把我的注意力轉向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一九〇九年秋，我特別從西雅圖到斯波坎城，替梯杜斯的『勞動者報』從前的『西雅圖社會黨人』報報導斯波坎所進行的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斯波坎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所領導的很多這樣鬥爭中最激烈的一次。市當局爲了阻止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人行道上成羣的流浪失業工人接近，而通過了嚴格的取締街頭演說的法令，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打算以羣衆行動來打破這法令，它向全國發出徵募志願軍的號召，於是成百的人到城裏來準備進監獄。警察以殘酷的鞭撻與大批逮捕來對付一切企圖在街上演說的人。在鬥爭的初期，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戰士們，拒絕執行三十四天搬石苦役的判決，因而被禁閉在冰冷的富蘭克林學校裏面，吃的祇是白麵包和水。這是一種恐怖的政制，口糧早晚只有兩盎斯白麵包。結果是發生了嚴重的腸胃病與真正瀕於餓死。甚至三十四天完全絕食的禍害也許沒有這可怕的白麵包那樣壞。有三個人病得非常厲害，被釋放後不久就死了。在鬥爭中約六百人被捕，這鬥爭一直堅持到一九一〇年三月。

我到達斯波坎後便立即積極參加這次鬥爭。我衷心地讚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光輝的戰鬥精神，這與空談的社會黨適成鮮明的對照。我被捕並坐了兩個月牢。我在獄中便參加了工團主義的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後來釋放出來時，我當了與當局談判解決這次鬥爭的工會委員會的主席。談判結果幾乎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完全勝利了，因為可恨的法令被取消了。

美國工團主義的基礎

在進一步談到我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經驗以前，需要說明什麼是工團主義，以及為甚麼在美國工人運動中帶有這樣濃厚的工團主義色彩。現在讓我引證一下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號『共產黨人』雜誌上所寫的一篇文章：

「在基本方面，工團主義或者更恰當的說，無政府——工團主義，可以簡單地下個定義如下：工人運動中有一種傾向，將工人底革命的階級鬥爭局限於經濟範圍中，實際上對國家加以忽視，並將工人階級的整個鬥爭降為單純的工會行動。它的戰鬥組織是工會；它的階級戰爭的基本方法是罷工，以總罷工作為革命的武器；而且它的革命目標，是建立工會「國家」以領導工業或一切其他社會活動。

工團主義的主要弱點是：

(一) 沒有使最先進的革命分子的嚴密組織（這必然是共產黨），成為團結與教育落後羣衆必不可少少的組織；(二) 沒有利用工人反對國家與資本家的日常鬥爭所必需的很多政治鬥爭方法，來最後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三) 沒有建立團結工人與貧農及小資產階級反對資本家的基礎，團結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有效的鬥爭最基本的因素，沒有制定廢除資本主義後工人社會活動的實際計劃。

因此，簡言之，由於阻止建立工人的革命政治組織，妨礙其發展政治鬥爭，疏遠其天然的階級同盟軍以及混淆對將來社會秩序的認識，工團主義在進攻資本家的國家以前，就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的武裝，結果它必然使工人階級在其革命鬥爭中遭受失敗。

美國工人運動久已深為這種反政治的工團主義所苦，事實上，其為害程度較之堪與相比的工業國家——德國或英國都更厲害。在一八八六年每日工作八小時制大運動中已可看見工團主義的開始，當時便有總罷工的理論與反議會鬥爭的傾向。以後廿年中很多變重的產業工會，也表現了加強經濟行動而降低政治行動的同樣傾向。但是，工團主義的傾向在一九〇五年成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幾年以後，又出現了一個較小的組織——北美工團主義同盟。舊的工會對工人階級政治行動的長期敵視，是產生工團主義總傾向的基本力量。

工團主義的傾向，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人士中，也表現得很濃厚，這些人也傾向於反議會鬥爭，崇拜工人運動的作用，而降低黨的作用，以及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後建立工會國家的理論等。社會勞工黨與社會黨左翼共同建立了工團主義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當時三個卓越的革命領袖都帶有強烈的工團主義特色。如我們所看見的，德·雷翁是美國工團主義理論之父；德布斯也帶有很多德·雷翁的工團主義幻想；霍烏德已成為公開的工團主義者。社會黨內工團主義傾向的力量，最顯著的證明便是：一九〇九年該黨分裂時，脫離黨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一九一二年社會黨更大的全國分裂時，情況也一樣。在一九一九年社會黨的大分裂中，誕

生了共產主義運動，左翼仍爲工團主義傾向所苦，如果它沒有退化爲十足的工團主義，那是因爲有正確的影響存在的原故，這點我下面將講到。

持續不斷和廣泛流傳的工團主義傾向，是從美國的基本情況，從長期起作用的整個經濟、政治與社會因素產生的，而歐洲的工團主義的影響只是造成這傾向的很小的原因。阻礙階級意識的成長，阻止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與活動發展的這許多美國因素，勢必使工人的鬥爭局限於經濟範圍，因而造成有利於工團主義發展的客觀條件。

首先，比較順利的經濟情勢，阻礙了美國羣衆底階級覺悟。這一點已爲這些阻礙的因素所證明，如像幾十年中政府擁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傳統上工資與生活水平比較高，巨大保守性的工人貴族與腐化的工會官僚機構底發展，在工業長期迅速擴展中，大量工人上升到小資產階級行列，甚至有很多人上升到大資產階級。這很多經濟因素強力地幫助了模糊階級界綫，在工人中間造成擁有資產階級般的財產的幻想，和羣息羣衆的階級鬥爭，並使他們傾向於工團主義。

然後又必須加上羣衆中間廣泛存在着的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這種幻想之所以產生是由於下述事實：美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給與工人比較高度的形式上的民主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集會自由，組織罷工的權利，有被選至任何職位的權利，以及法律上認可的社會平等的假定等。美國工人很多年以前便贏得這些權利，因而不準備進行尖銳的政治鬥爭的事業。所以，美國工人不像德國、奧國、帝俄等國的工人一樣，他們不感覺猛烈的、切身的政治苦痛，足以作爲

建立羣衆性政黨的基礎的苦痛。工人們所遭受的很多切身苦痛，就他們看來主要是經濟上的——如工資、工時與工作條件等問題。在一定歷史情況中，這說明了爲甚麼美國工人使其鬥爭主要限於經濟範圍，爲甚麼他們不能建立一個羣衆性的社會黨或勞工黨；這形成工團主義的重要基礎。

其他很多重要因素，也有助於阻礙美國工人作爲一個階級的政治活動，而鼓勵了工團主義的發展，這些因素便是：美國政府的非中央集權性質，這分散了工人底政治努力；存在着廣大被剝奪公民權的移民與主要只注意經濟問題並帶有濃厚非政治與反政治的心情的流浪工人；工人階級的複雜性——工人來自很多國家、民族、宗教、傳統等——這難於使工人階級團結一致，休戚相關；臭名遠揚的腐敗的美國政治，使得很多工人一般地厭惡政治行動；美國勞工聯合會內極端反動的統治，將革命的工人逐出舊的工會；最後，但並不是不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當權與該黨的改良主義政策，使很多工人（連我在內）脫離黨而轉向工團主義，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二年社會黨分裂時的情形已說明了這一點。

上面所說的這些因素，成爲美國工人運動一貫的偏向——工團主義生長的天然的沃土。但是，這些因素本身只提供了工團主義發展的客觀可能性。美國工團主義真正發展成爲一種體系，是直接由於另外一種因素，主觀的因素造成的：即左翼在理論上的脆弱。這就是帶歷史性的『左傾』宗派傾向，不與那些反政治的力量作鬥爭，反而使其本身適應於這些力量，並將其革命鬥爭限於經

濟範圍。美國沒有列寧這樣的人，他能够不顧很多反政治的行動的因素，而制定出一個革命的政
策；美國的左翼甚至還不知道列寧的著作。我們前邊已經說過，三十年當中左翼最卓越的領
袖——德·雷翁、德布斯與霍烏德——都無法使自身不陷於工團主義泥潭中。

在前一章談到社會勞工黨時，我已經談到了左翼在理論上的容易助長工團主義的主要錯誤，
這些錯誤簡單說來就是；（一）過低估計黨的作用，特別是德·雷翁，這使霍烏德及其他真正工
團主義者直接否定黨的作用；（二）誇大工會的作用，產生了以爲建立空想的雙重工會就會發生
革命的工團主義空論；（三）對於國家，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的錯誤概念，特別是造出一
種通過工會國家來管理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工團主義觀念。

雖然工團主義的傾向在美國很強烈，而且持續了很久，但最後終於降爲很小的因素。這是因
爲工團主義發展的基礎——理論上的混亂，已大部份澄清了。俄國革命的經驗與後來列寧的著作
經共產國際的介紹而廣泛流傳，實際證明了黨的革命作用、工會的附屬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性
質等，這樣便駁倒了舊時美國工團主義的謬論。在日常鬥爭中，在奪取政權中以及在蘇聯建設社
會主義中所學得的這些基本真理，已爲戰後德國、奧國、匈牙利與中國等國的革命高潮所證實。
美國真正的革命力量，是能够吸取這些經驗教訓的。因此，由於一九一九年共產黨的建立，將這
些基本的政治教訓列入它的綱領中，便使美國的工團主義遭到致命的打擊。社會黨、社會勞工
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中最優秀的革命分子、無政府主義者等，都團結在

共產黨週圍。反政治鬥爭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開始衰敗。大大有助於這種理論上的澄清，加進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衰敗的其他因素爲：它的雙重工會運動主義、過高估計工人的自發性、過低估計組織的作用、非集中的形式、過份強調反宗教的宣傳、不去發揮工會的作用，而成爲宣傳機關與爭取言論自由的戰士的傾向、在罷工中提出不可能實現的要求、策略上的不靈活、宗派主義的傾向、不願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以及它對蘇聯採取反革命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最革命的工人遠離了它。隨着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衰敗，整個工團主義傾向也迅速衰亡。從那時以來，美國的客觀情勢便大大改變了：整個階級鬥爭更富有政治性，這些便利了工人階級進行有組織的階級的政治行動，而阻止工團主義的傾向。關於這些下章將更詳細地談到。

一個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會員考察歐洲工運

現在讓我談談我個人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經驗。我主要是由於厭惡社會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與政策而參加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弱點，我當時並未認識到。於是，我很容易便從社會黨無用的改良主義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整個說來，政治行動是無效果的，工人階級解放的道路應經過戰鬥的工會行動，最後在總罷工中來完成。這種結論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把這種政治行動與社會黨的機會主義混淆起來了，而拋棄了工人階級的政治武器。我費了很多年工夫才糾正了這個基本錯誤。

由於戰鬥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影響與法國總工會獲得特殊勝利的結果，也積極驅使我接受工團主義的觀點。這個工團主義的組織，當時進行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與全國性總罷工，這些罷工鼓舞了每個國家的工人。它關於戰鬥行動、怠工、總罷工的理論，以及由工會來管理新社會的理論，就我看來，都是革命政策的定論。於是，我決定到法國去親身研究法國的工團主義。一九一〇年初，我袋裏裝了一百塊錢，便流浪到紐約，很快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國住了半年，用心研究法國的工人運動，偶然粗略的瞭解了法國情況。總工會的領袖們都歡迎我，工會的每個大門對我都都是開放着的，我廣泛閱讀了彼魯底哀、格利佛爾、克利茲基、龐遮、赫爾夫、索列爾、柏格森及其他很多工團主義作家的著作。我天天與像石屋、伊非託（Yvetot）、蒙納特（Monatte）、梅爾里姆（Merlim）這些領袖們接觸，他們當時彼此都競相急進，但後來差不多都全變成戰爭侵略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了。我積極參加了一九一〇年的鐵路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被前社會黨總理白里安派軍隊鎮壓下去了。我並參加了總工會在土魯斯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我醉心於當時工會正有效應用着的怠工與總罷工的法國工團主義理論。我衷心贊成總工會戰士們反對社會黨與一般政治行動的苦戰。流行的崇拜自發性行動與不要集中的工人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就我看來，是糾正反動派對工會的官僚主義領導的辦法。總之，我已成爲一個十足的工團主義者了。

我對法國工團主義的基本特點，印象很深，這種特點對我說來是很新穎的，而且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政策完全相反。這是一種打入內部的策略，戰鬥的工人加入保守的工會，而不是企圖在外面建立新的理想的產業工會的政策。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方法，在九十年代開始了他們對工會著名的『襲擊』，後來並擊敗了改良主義的社會黨人，幾乎奪取了整個法國工人運動。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已改變了他們自己與工會。他們不再施用原來個人行動的無政府主義政策，他們採取了工會與羣衆行動的政策；他們獲得一些階級鬥爭的概念，然而都是混亂模糊的；他們參加工人的日常鬥爭；他們崇拜怠工，期望以總罷工來結束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獲得關於以工會爲基礎的未來社會的理論。一言以蔽之，工團主義，或者更正確地說，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是誕生了。

法國總工會打入內部的政策，是以建立戰鬥少數派的理論爲基礎的。根據這種概念，羣衆中最革命的分員——工人天然的領袖們，在廣大的工會中將他們自己組織成明確的核心小組。這些集團使他們能够在制定政策與實施政策中作爲一個單位而起作用。革命的工團主義者通過這種有組織的戰鬥少數派來控制法國工會。

就我看來，打入內部的策略與建立戰鬥少數派的理論，是高度明智的，而且遠優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建立雙重產業工會的政策，也遠勝過它那認爲組織中不需要領袖，一切人都是領袖的幼稚理論。所以，當我回到美國時，便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堅決提出這兩個問題來，後來的

事實也表明：這兩個問題在我將來的工人活動中起了很大作用。

我從法國又到了德國，在那裏我也住了半年，專心研究德國的工人運動，間或也學習德文。我住在德國工團主義聯盟主席佛利茲·凱特爾家裏。我不斷閱讀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綱領、代表大會報告等文件。我經常參加羣衆大會、罷工大會與代表大會，並熟識了很多卓越的黨的領袖與工會領袖，其中包括後來的叛徒考茨基與最後成爲革命英雄的李卜克內西。

在一九一一年初，當時社會民主黨因爲用議會方法替羣衆爭取選舉權的鬥爭已走不通，正考慮過總罷工來獲得選舉權的可能性。在一九〇五年東方俄國革命總罷工與西方法國工團主義黨人的總罷工的強大影響下，進行這樣一個罷工的羣衆壓力是很大的。在這問題上，黨內發生了尖銳鬥爭，同時在這次鬥爭中，被伯恩斯坦學說所鼓舞而受勒琴領導的改良主義分子，他們控制着黨與工會，終於完全勝利，他們甚至禁止工會討論總罷工的問題。

事情的發展過程，使我深信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其一切附屬組織，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政黨，都是革命道路中確定的障礙，我給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報紙寫文章時也發表這樣意見。我對這方面的意見，只過了幾年便爲這些黨的支持戰爭與極力鎮壓戰後的革命運動高潮所證實。由於對社會民主黨持有這樣的意見，我錯誤地評價了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所領導的左翼的政策，批評他們不擴充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及不發動法國式的工團主義運動。

我在德國的經驗，更鞏固了我的工團主義意見。顯然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保守的工會及其

控制下的合作社，都使我更加確信有建立一個革命的工團主義政策的必要。而且，德國工團主義聯盟宗派主義的孤立，使我深信根據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計劃，從舊工會中撤退，只是將擊業性的工會交給勒琴而受他緊緊的控制，至於良好的策略，則須要利用打入內部的辦法。於是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雙重工會運動的政策，不僅在德國而且在美國也是錯誤的。

我完成了在德國停留半年的計劃後，便接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總書記維辛特·聖·約翰的電報，要我代表該組織參加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匈京布達佩斯舉行的國際職工書記處會議（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前身），當時我正倉忙地零零星星地學習閱讀意大利與西班牙文，準備在意大利與西班牙兩國各住半年。當我出發時，我必須從紐倫堡到德勒斯登（德境）。步行一百五十哩。在德勒斯登我參加了德國工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並且親眼看見勒琴的嚴厲的官僚主義。

美國勞工聯合會也派了副主席鄧肯為代表出席布達佩斯會議，上級指示我對他的委派提出責難，根據是：勞聯不是一個革命組織，鄧肯本人是全國公民聯合會的會員，並指示我要求由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來代表美國的工會。勒琴是這次會議的主席，他力圖禁止討論我的頗左的提議，但是，我把問題提到大家面前，隨即進行一整天的激辯，最後我的提議終於被否決了，只有法國總工會的兩位代表石屋與伊菲託支持我的動議。

那天晚上，我因沒有吃飯住旅館的錢，睡在布達佩斯郊外一輛載貨汽車上，結果被捕了。然

而，我終於擺脫這樣的窘境，因為我說我是把盤貨丟了的。法國代表硬要借給我一些錢。一兩天之後，我便接到聖·約翰的電報，要我立即回國出席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我便回國了。

打入內部的問題

我決心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提出打入舊的工會與放棄傳統的雙重工會運動的左翼的政策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困難問題，因為那時人們這樣的觀念是很深的：認為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不可能作甚麼革命工作，建立革命工會的唯一道路，便是建立獨立的新組織。約自一八九五年德·雷翁建立雙重工會社會主義同業工人同盟以來，左翼各派——左翼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都以最積極的信念墨守雙重工會這種理論。右翼社會黨人，雖然有很多都在舊的工會中工作，也具有同樣的思想，甚至開明的知識分子也反映出有這種思想。

現在當打入內部的政策是一般所接受的左翼政策時，是很難理解錯誤的雙重工會運動理論對革命分子的可怕的影響的。這問題簡直是一個成了定論而不可討論的問題；甚至有人提出這一問題，便被認為墮落的機會主義者。三位偉大的左翼領袖——德·雷翁、德布斯與霍烏德，繼續以不適當的詞句嚴厲批評舊的工會，而且認為走向戰鬥的革命的工會道路就是成立獨立的產業工會，認為這是具有巨大革命戰略的事情。

但是，顯然地，階級鬥爭的經驗，並未證明對舊的工會的這種悲觀，或左翼對理想的產業工會的那種無限信仰（在這問題上，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就是一個卓越的例子）是正確的。一方面，這種經驗清楚地教訓我們：不管舊的工會的領袖們如何腐敗，只要在舊的工會中作認真的努力，工人便會響應。例如，一八八六年每日八小時工作制的偉大運動，就是按鼓動與建立舊工會的原則進行工作的少數革命分子組織起來的。德布斯本人在一八九三年未離開鐵路行業工會與走上雙重工會運動方向以前，他在這些工會中也是一個真實的力量。德·雷翁儘管有左傾的雙重論傾向，但他在九十年代仍對美國勞動協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起了強大影響。霍烏德也經過了幾年時間，才沒有遇到很大困難，成爲戰鬥的西部礦工聯合會的真正領袖。甚至在我所寫的這一時期，社會黨儘管帶有濃厚的雙重工會運動傾向，也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有了重大進展。然而，這大都是社會黨機會主義右翼所做的工作，這些人只注重在官位與抓取選票。社會黨人已經獲得對這些工會，如釀酒工人工會、麵包工人工會、機械工人工會、縫紉工人工會的控制權，戰鬥的美國統一礦工工人工會的副主席，也是一位社會黨人。在一九一二年美國勞工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社會黨候選人獲五、〇七三票，奧柏斯派的人獲得一一、九七四票。美國這種經驗，着重指出在舊的工會中工作的正確性，這種經驗並進一步爲法國、英國、德國與俄羅斯等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所證實。

無疑地，缺乏明確的以爭取滿足工人的日常要求爲基礎的，打入內部的政策，阻礙了社會

黨在戰後取得工會的領導權。關於這點的充分證明是：雖然強大的左翼是處於雙重工會運動的反對派地位；甚至右翼本身也懷疑能否真正「奪取」美國勞工聯合會，而且社會黨經常爲黨內兩翼互相衝突的政策所癱瘓，但機會主義的右翼社會黨人仍在這方面有了重大進展。妨礙社會黨在工會中建立領導權的另一大錯誤，便是社會黨人拒絕提出以工會爲基礎建立勞工黨的口號，以及他們抱宗派觀念，堅持贊成社會黨本身就是職工會的政黨。

由於多次企圖建立的雙重產業工會都不能發展成爲羣衆組織，使人們更加不相信雙重論者的理論了。德·雷翁、德布斯與霍烏德及其他左翼領袖們，一再宣佈舊的工會正在死亡，或甚至已經死亡；鑒於舊的工會的領袖與政策都是反動的，行會的形式，入會會費與每月會費都很高，不讓非熟練工人參加，而且工會本身一般地不適用於應付現代化的、托辣斯化的工業，這些人是很容易得出這樣結論的。但是，工人們雖然準備支持在舊的工會中發展的激進主義，由於他們的傳統與實際利益，他們仍頑強地拒絕拋棄這些組織，他們並不響應建立「完善的」、革命的雙重產業工會的誘人的呼籲。所以，德·雷翁的社會主義同盟業工人同盟遭受悲慘失敗；德布斯的美國鐵路工會也毀滅了；西部勞工聯盟及其後繼者——美國勞工聯盟也失敗了，各工業中的其他很多獨立的產業工會也死亡了，儘管虔誠的左翼人士英勇的努力給這些工會注入生命的活力。在上述這一時期中，不管如何努力，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會員已由一九〇五年的五萬五千人，逐漸減至一九一一年的一萬六千人左右了。一九〇八年它陷於分裂（德·雷翁派建立新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

顯然它正循着革命的雙重工會運動的通常道路，走向失敗。

這種雙重工會政策，二十五年來都被教條主義的左翼人士奉爲真理，而其總的效果便是將富於戰鬥性的、最積極的工人拖出羣衆性的工會，而將他們孤立於無用的雙重工會宗派中。由於使行業工會失去了最優良的戰鬥血液，結果便使龔柏斯反動集團無可抗衡地控制着這些工會，並絞殺這些組織中的進步力量。這種愚蠢的左翼政策，是一個害處極大的錯誤，它大大阻礙了美國一般激進主義的發展，而使其降爲宗派主義。

雙重工會顯然在理論上比舊的行業工會具有更正確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工會組織結構與更優越的領導。所以，雙重工會運動者經常很迷惑不解，爲甚麼羣衆不大批參加他們理想的工會，而死抱着陳腐而保守的舊的行業工會及其腐敗的領導不放。然而，原因是很清楚的。比較重要的原因可簡單概括如下：（一）政治上落後的工人羣衆，充滿着對資本家的幻想，並不準備團結在雙重工會革命的口號下；（二）僱主們欲對保守的工會妥協，因而極力與革命的工會鬥爭使其陷於停滯不前；（三）政府對工會的敵視不像對激進的雙重工會那樣厲害；（四）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我國傳統的工人運動中，享有很大的威信；（五）羣衆在勞工團結一致的基本意識鼓舞下，被吸引到羣衆性的大組織，而不傾向雙重論的小集團；（六）最後但並不是不重要的一點是：舊的工會在宗教、愛國主義及整個美國傳統方面，與廣大羣衆抱共通的見解，這是極大有利條件；而雙重工會運動的革命分子，却常常是反宗教、反愛國甚至蔑視整個美國傳統的。

作爲一種方法來說，打入內部去比雙重工會運動具有的基本好處，便是由於富於戰鬥性的分子既然打進了舊的工會裏面，就使上述幾種強烈的羣衆意見與偏愛的不利影響不復存在，並大大修正其餘的影響；總的結果是使富於戰鬥性的分子能更好地接近工人，因而使他們能夠將廣大的、甚至起決定作用的工人羣衆爭取到他們方面來，擁護階級鬥爭的政策。

戰鬥開始了

我按時到達芝加哥參加一九一一年九月舉行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第六屆代表大會，而且我立刻提出爭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採取打入內部的政策這一問題。後來我把我的建議印了出來，原文這樣寫着：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將放棄它建立一個新工人運動的企圖，而將使本身成爲一個宣傳機關，成爲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其方法是在舊的工會中建立比我們的反動派敵人所掌握的更好的戰鬥機器，來使這些工會革命化。」

我開始積極活動，擁護在政策上作這種根本改變，同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當時的情況，有利於我的鼓動。一九〇五年代表大會熱誠的希望並未實現。該組織在會員與影響上都逐漸縮小。大會只有三十一位代表參加。在思想上，該組織已狹隘到成爲一個頑固的反政治、反宗教的宗派主義小集團了。當該組織拒絕政治行動時，德·雷翁與德布斯都說離該組織。於是，組織中充滿

着悲觀情緒，同時大家都談論着『爲甚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不發展？』的問題。

我立刻爭取到約翰斯東、伊爾·福特及其他兩三位代表贊成我的意見。佛蘭克·李特爾（他後來在比爾·鄧恩領導的二萬七千人罷工中，因反對戰爭而在布特城遭私刑）也對我的計劃表示同情。但是，最上層領袖如聖·約翰、伊托爾、湯普遜、陶特曼等，我都與他們一一談過話，他們都反對我的計劃。若干時候以後，霍烏德『原則上』同意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應從其雙重工會網領中去掉某些工業，但在實際運用上我們不能達到一致意見。我建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應以解散其在礦業、建築業、五金業、出版業與鐵路中的雙重工會，並到這些工業中的舊的工會裏去工作，作爲走向一個正確政策的開始，但是鄧恩只答應解散建築業與出版業工會。

我們認爲：事先無準備，就用這樣簡短的話句以決議案的形式將我們的建議提到代表大會上，是不合適的，這樣，一定會遭到失敗，而使人們對這建議發生惡感。我們要先在會員中進行宣傳鼓動的工作。當『不主張集中制』的西方派提名用複決投票的方式選我當斯波坎城『產業工人』的編輯時，我們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機會便到來了。

我依照我的綱領召集了一次關於『打入內部』政策的討論。把我從布達佩斯回來的領導集團，現在把所有的槍口都轉過來對我開火了。這次討論激動了整個組織。但是從正式的投票記錄却看得出我只以少數幾票之差而失敗。後來我才知道支持領導集團的人曾假造了許多票，以取得足夠的多數來擊敗我。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事件，這個事件有效地扼殺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正在萌芽的『打入內部』的鼓動。這就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一九二二年正月發動的有名的勞倫斯二萬三千紡織工人大罷工。這是一場鬥爭得很激烈，領導得很好的罷工，結果是工人贏得了真正的勝利。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威信馬上又到處增高起來，而且力量迅速發展。在此以後很短的一個時期，該會在派特遜、亞克琅、小瀑布、里頓等地、米薩巴鐵礦區與華盛頓木材區發動了一連串的罷工。

這個突如其來的罷工浪潮，給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造成了布立森登所稱『權力的頂點』。悲觀消失了，該會的鬥士們都興高采烈。聖·約翰熱情地宣佈：『勞倫斯工廠中的勝利乃是一個開端，它只能以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而告終。』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關於爲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不壯大起來？』的問題就完全無人注意了。整個左翼的一切派別都充滿了一種新的雙重工會運動的情緒。只有我們中間的少數人把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這種盛況正確地看成只是偶然的『火光一閃』。打入內部的問題從開頭就受到了一個着實的打擊。但，這並不是鬥爭的終結，我們還是大體上把它在左翼內部繼續了十年，一直到它最後取得橫掃一切的勝利。

第六章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

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代表大會期間，我們會開過好幾次會，並決定要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內部展開一個廣泛的運動，把它爭取到『打入內部』的政策方面來。我們選定芝加哥作爲我們當然的中心，而以我爲行將組成的有戰鬥性的少數集團的全國書記。

爲求實現這一目標，我在隆冬，作了一次橫貫西部的六千哩偷乘火車的旅行，對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地方組織講話。我凍壞了臉和手，而且有好幾次，差一點被車輪碾死。然而終於在好些地方把一些重要的富有戰鬥性的份子爭取了過來，而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內部組成了工團主義者的地方小組。

但是，正在我這次旅行中間，勞倫斯大罷工發生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熱情因此重新高漲。從此以後，我們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內部的鼓動就變成完全白費心思。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內雙重工會運動的復活使我們的策略不得有所改變。我們新成立的許多小組，就開始脫離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參加到美國勞工聯合會裏去工作。首先這樣做的是英屬加拿大納爾遜地方約翰斯東所組織的第一地方工團主義小組。很短時間以後，我們就在堪薩斯城、奧馬哈、芝加哥、明尼阿波里斯、英屬加拿大的溫哥華、聖路易斯、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大科馬、丹佛爾、以

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好些其他城市中組成了類似的團體。

至於我自己，我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向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繳納了最後一次內會費。我當時是在做鐵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內我這一行的工會——美國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

這個新的運動所賴以開始的少數力量，如前面所已談到的，幾乎完全是從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來的。我們實際上與充滿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那種雙重工會運動情緒的社會黨左翼毫無聯繫。但是，我們却從當時在沒落着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無產階級分子那裏得到若干十分重要的生力軍，其中包括：福克斯、曼雷、漢默斯馬克等等。福克斯把他的報紙『鼓動者』一起帶來。他從海麥蓋特的時代起就是芝加哥勞工界的老戰士。至於小資產階級的，流浪漢的哥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它注意於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襲取』工會的經驗，曾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工團主義同盟，希圖以此阻礙我們的前進，但是這種企圖並沒有得到結果。

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我們的運動，就是阿伯拉莫維茲 (Esther Abramowitz)，她在一九二二年成了我的妻子。她是在舊俄的科夫諾省出生的，在幼年時就到了美國，長期在一個工廠裏，在報酬低、工時長的條件下工作。她在她全部成年的生命中都一直是一個最熱情的革命家。她是那樣的一種人，工人的鬥爭對她是生命。在與我結婚以前，她已結過一次婚，生了三個孩子：利蒂嘉、雪爾維亞、與大衛。她在一九二一年參加了共產黨。作爲一個聰明與忠誠的同

志，她是我的永久的伴侶，和我這麼多年來的一切勞工活動中的得力的助手。

我們的新的運動要召集一個全國代表會議或全國代表大會力量還不够。因此，在外地各小組的同意下，芝加哥的地方同盟，就作為全國性機構而活動。它選擇了一個執行委員會，並選舉我為全國書記。這個團體正式稱為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所以起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名稱，是因為同盟包括了加拿大的團體，而且還希望把它的活動擴展到墨西哥去。這樣，美國第一個革命者打入工會內部的固定組織就誕生了。

同盟成立了一個機構，打算在舊的工會的內部把有戰鬥性的少數派組織起來。它在各個工業中心都成立了地方總支部。這些支部都是按個別入盟的原則建立的，盟員都按照各自工會的組織，分編入各產業或行業的小組中。依照我們分散經營的理論，這些地方小組都是高度自治的。各小組募集它們認為適當的基金。發行它們自己的刊物，並制定它們的地方政策。全國總部並不收會費，而是靠銷售它的刊物、小冊子、與募捐等等來充作收入。我也不支薪水，我還是幹我火車檢車員的行業，一天幹十二個鐘頭，一星期幹七天。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綱領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綱領的正式聲明包括在兩個文件中：第一個是芝加哥同盟通過的一個簡要原則與章程，另一個是由福特和我寫的一本名為『工團主義』的小冊子。這個綱領後來在傳布甚

廣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報刊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這些報刊有：在芝加哥出版的、由福克斯主編的『工團主義者』半月刊；在堪薩斯城出版的『勞動者』月刊，在聖路易斯出版的『工會運動者』週刊，在聖地牙哥出版的『國際』月刊，與在奧馬哈出版的『工會運動者』。除這些報刊而外，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戰士還廣泛利用了工會刊物的篇幅來發表宣傳文章。

大體上，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奉行着法國工團主義的總路線。它一方面以推翻資產階級與沒收工業為目標，一方面也盡力爭取資本主義方面一切目前可能的讓步。它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而鬥爭。它主張六小時工作制。為了贏得其當前迫切要求，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不僅依靠局部罷工，而且也十分注重一切方式的怠工破壞，從消極抵抗與放慢策略到積極的毀損成品與破壞工業。在那時候，工團主義者中間，一般都把怠工看作一個最有力的武器，而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機關刊物還特為開了一個專欄，名為『社會紀要』專門供給工人以如何在罷工期間對各該行業與產業進行怠工的詳細知識。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綱領中最主要的武器是總罷工。它主張以總罷工來直接從僱主與政府那裏逼取部份的讓步，來結束戰爭，它視總罷工為最後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手段。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帶有強烈的反議會鬥爭色彩。它反對參加選舉與參加政府。議會行動被認為是對工人力量的一種浪費與濫用。為了贏得它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的要求，它僅僅依靠經由罷工、怠工等等而表現出來的工人的經濟力量。它以進攻的態度反對社會黨以及一切其他的工人

政黨。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主張按產業分別組織工會，但是，他沒有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那樣着重這種組織形式，而後者對工會組織機構的問題是抱着盲目崇拜態度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更加着重提高工人的戰鬥性。他們當時由於自發性的力量，常常會不願他們工會的組織形式，和工會領導幹部的保守性，而起來一致行動。北美工團主義同盟贊成工會分散經營的組織方式，建議以合併有關的行業工會，廢除高額會費與入會費，組織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去除保守的領導，與對下層工人進行革命教育，來實現革命的產業工會。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是以打入保守的羣衆性工會內部進行工作的戰略爲基礎的。它的會員僅限於這一類工會中的會員。它堅決地與雙重工會政策作戰，這個政策主張把有鬥爭性的工人從羣衆性的保守的工會中撤退出來，而使他們在『純粹的』、只剩了骨頭架子的、宗派主義的雙重產業工會中孤立起來。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工作原則是組織少數有戰鬥性的工人，它力圖在一切工會中最自覺的革命份子中成立有組織的團體。它宣佈：『有鬥爭性的少數乃是整個工人階級當中思想與行動的部份。它製定戰鬥的綱領，並帶頭使其實現。』有組織的有戰鬥性的工人乃是使整個麵包發酵的一點酵母。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上述這些原則，總的說來是與法國工團主義者一致的，但是，我們在

個很重要的方面與法國人不同。這就是關於工會在新社會中作用的問題。法國的公式（它是大體上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公式相符合的），有一條是『今天作戰的工會就是明天生產的機構。』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對於這一點曾經有過重大的爭論，認為工會並不適於領導工業。我們堅稱，工業有它自己特殊的組織，諸如結合起來的工人、工程師等等，我們稱之為『生產組織』。我們認為：『作為一種生產力而言，生產組織要比工會優越是一目瞭然的。生產組織是專門用來進行生產的……而工會却是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建立的。工會實質上是作戰的機構。』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工業所自發地發展起來的，由技術人員們、工人們等組成的生產組織，將在革命中生存下來，成為新社會工業機構的基礎。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綱領表示，這個組織，除了從法國來的影響之外，還從無政府主義者那裏接受了許多概念。事實上，我們把工團主義認為是『切實可行的無政府主義』。同盟自覺地把自己認為是由帕遜斯、史派斯等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的一八八六年大門爭的傳統的繼承人，而且我們也與這個英勇鬥爭中的許多老英雄保持經常接觸，其中包括露西·帕遜斯，我們經常在她家裏開會，而且把那裏作為同盟的地址。至於我自己，在這個時期內，正深深地迷醉在無政府主義與半無政府主義的著作中。我一方面仍然接受，或者說相信自己仍然接受馬克思的革命的經濟學，階級鬥爭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方面却丟開了他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戰略，組織制度與主張。對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我想應該在諸如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尼采、斯蒂納、雷斯

特·瓦爾德這類作家的主要作品中去（所有這些作品我都讀過）。我的思想發展確實有一種朝向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實際上，我成了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活動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存在了兩年，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四年。這是一個在普遍的工業危機日益迫近的情況下，工人鬥爭日益增長的時期。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迅速成長，而且發動了幾次重要的罷工，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得到了發展與鬥爭的全盛時代；社會黨的黨員從一九〇九年的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人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十一萬八千零四十五人。在一九二二年，它得到的票數是它歷史上最多的。儘管老羅斯福用他的進步黨運動，來打擊勞動羣衆的士氣，但這一切還是照樣發生了。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最強的據點是在堪薩斯城。它在那裏確實控制了廚役、理髮匠、寫字間工人與其他工會。那裏屬於這個同盟的有戰鬥性的工人領導了好幾次非常成功的罷工，表現了充分的戰鬥性。他們的威信大大提高，很快就在實際上控制了中央勞工理事會。他們又進行了一個廣泛的組織運動，一個『工人前進』運動，吸收了大批工會會員，建立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好幾個地方工會，在他們反對工賊的鬥爭中，他們領導的一個審計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報告，竟迫使工會分會的頭子，奸險的龔柏斯分子納爾遜連夜跑掉。

在聖路易斯城，同盟的領導者是拉比爾。它領導了幾次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出租汽車夫、侍者以及其他工人的英勇的罷工。在奧馬哈，同盟在麥卡佛萊和顧茨領導下，成爲當地工人運動中的一股力量，但是，並沒有取得控制權。在英屬加拿大的納爾遜，同盟在約翰斯東領導下，實際上控制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地方工會。在芝加哥，同盟在諸如鐵路車務工人、漆匠、理髮匠、零售店員等許多工會中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而且培養了一批有戰鬥性的工人，這批人在芝加哥美國勞工聯合會中好多年來都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在許多太平洋岸的城市中，同盟都有它的力量，而在西雅圖，它有許多有戰鬥性的工人在幾年後的總罷工中成了領導分子。

就全國而言，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積極地參加了伊利諾斯中央哈里曼鐵路工廠行業工會三萬八千工人的大罷工。這個從芝加哥一直蔓延到墨西哥灣及太平洋沿岸的大罷工，是靠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少數堅強的下層工人所發動，而由卡爾培遜斯和霍佛所領導。它是一個極其艱苦的鬥爭。從一九一一年九月開始，直到四年後在一九一五年六月才宣告結束。而在結束時，伊利諾斯中央哈里曼鐵道公司芝加哥各工廠的週圍還佈設着糾察隊。爲了爭取將行業工會組成聯合會的權利的這一次罷工是失敗了，但是從後來的事實看來組織聯合會的權利在鐵路上一概還是爭取到了的。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勇敢地挺身保衛了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一日因爲爆破洛杉磯時報大樓而被捕的麥克那馬拉兄弟們 (Mc Namara boys)。這些忠貞的戰士們爲了挽救其工會免受攻擊以及許多

工會領袖免於被控，誤信他們的朋友們、親戚們、律師們以及工會幹部們的話，進行這一有勇無謀的犯罪行爲。這件事乃是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最悲慘的故事之一。今天，在二十五年以後，工人階級所會產生的最勇敢與最忠誠的戰士之一，麥克那馬拉（同他在一起的還有勇敢的施密特）仍然在福爾生感化院陰森的高牆裏面虛度他的生命。難道現在不正是工人爭取釋放這些不屈的戰士們的時機嗎？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在翻砂工人中領導了一個會員羣衆的運動。我們的領袖是湯姆·蒙尼，他當時還是一個年青的有戰鬥性的工人，後來因爲橫遭誣陷而成爲出名的受難的政治犯。蒙尼和我一起參加了一九二二年密爾窩基的翻砂工人代表大會。他是大會代表之一，在會上提出了同盟關於通過組織機器翻砂工人與合併五金業各行業工會來組織產業工會的綱領。就在大會期間，蒙尼組織了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全國翻砂工人部，後來又製定了地方組織的章程，印發了會費收據等等。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重要活動之一是湯姆·蒙在一九一三年所作的全國旅行。那是一個極大的成功。湯姆·蒙是從當時英國礦工、碼頭工人與鐵路工人大罷工中新產生出來的人物。他是被社會黨的左翼請到美國來的，但是，當他們見到他支持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打入內部』綱領時，他們就把他冷淡地拋掉了，爲此，我們的同盟就給他組織了一次旅行，湯姆·蒙與德布爾斯、霍烏德等人討論了雙重工會運動問題。從此以後，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就與以他爲首的英國產業工團主義同盟取得了密切聯繫，我們並且派了一個代表到倫敦去參加國際工團主義者會議，

但是這次會議並未開成。

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國際木材工人工會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發動了一個總罷工運動，要求自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起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這個工會裏，我們同盟的力量是很強的；我們全國機關刊的總編輯就是這個工會的副主席，我自己在一九一四年夏天也有幾個月成爲這個工會的組織者。我當時正在週期的鼓勵旅行途中，就被邀到林場與鋸木廠中去幫助推進這一個我們的盟員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來激發的八小時工作制運動。工作進行得很好，但是，這個有前途的運動却在原定日期以前幾個月爲華盛頓州右翼社會黨人的陰謀所破壞了。正當幾千幾千的工人潮湧般地參加工會，準備在五月一日舉行總罷工時，社會黨在州議會提出了一個八小時工作制的法案。然後工會裏的社會黨人就發動了一個複決投票，支持那個法案而拒絕總罷工。理由是，木材工人既然能够在議會中簡單地靠投票來獲得八小時工作制，就不用不着以罷工來爭取它。地方工會一個接着一個宣佈擁護這個法案而反對罷工。這時，工會幹部們，不去採取既支持總罷工，又支持八小時工作制法案這種必要的程序，却召集了一個特別會議，否決了總罷工。這有很大害處，不僅因爲罷工被絞殺了，而且結果，那個八小時工作制的法案後來也在州議會中爲壓倒多數所擊敗了。最後，木材工人的戰鬥意志渙散了，工會也在後來被破壞了。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會參加過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一九一四年六月布特礦工起來反對西部礦工聯合會莫耶的反動官僚主義統治。礦工們奪取了布特的地方工會，趕走了受公司操縱的工會幹

部，並着手成立一個新的工會。我當時正好路過布特，會與麥克唐納、湯普遜以及其他底層的領袖們舉行了一個會議。我提出既然具有關鍵性的布特地方工會現在是在他們手裏，他們就可以很容易地以參加西部礦工聯合會的手段來把整個聯合會爭取過來。但是他們腦子裏塞滿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雙重工會主義思想，並不肯聽我的意見。他們搞起了新的工會，不可避免地，兩個工會間自相殘殺的鬥爭發生了，而久已成爲工會運動的堡壘的布特，竟馬上就成了一個自由僱用制（按指僱主僱用工人可不必以工會會員爲限，工會對僱主之僱用無權過問。——譯者註）的大本營。這真是雙重工會主義一個可悲的例子。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始終對根深蒂固的雙重工會運動的幻想進行不停的鬥爭。這種幻想使整個左翼陷于癱瘓，而且不容置辯的，使工會變成龔柏斯的機關。把有戰鬥性的工人從羣衆性的工會中撤退出來，而把他們放在『純粹的』、只剩下骨頭架子的、宗派主義的雙重產業工會裏。這種政策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我在這一點上經常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社會黨的左翼僵持不下。我們主要的論爭之一是與德布斯進行的，他是一個熱忱的雙重工會主義者。雖然，他在不多幾個月以前還會支持過『底特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這時却忽然改變了他對那個組織的態度，然而，他仍然提出了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實行總分裂的另一計劃（這個計劃是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在『礦工雜誌』上他寫道：

「談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是沒有用處的：芝加哥的一派，現在已看得很明白，似乎是主張無政府。

既然如此，就讓那些反對政治行動而愛好怠工與無政府主義綱領的全去參加這一派好了。底特律（德·雷翁）的一派，爲了不必在這裏討論的理由，絕不會比它今天所做的更進一步。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組織，由礦工們，各主要的產業團體，領導這一運動。」

儘管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活動很多，它却没有能成爲一個羣衆性組織。同樣，它也從沒有能打入工業化的東部，而幾乎只是完全處於芝加哥以西的地區——傳統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據點。它主要由熟練工人組成，其中大多數是美國出生的。現在已沒有什麼精確的統計留下來，但是，它的有戰鬥性的工人盟員實數不會超過兩千人，雖則這些盟員所領導的工會的人數至少也等於這些盟員的十倍到二十倍。同盟的影響，特別從它比較大的刊物來看，遠比它小小的盟員數字所表示的爲大。在存在兩年之後，北美工團主義同盟逐漸落落了。在一九一四年夏天，它的全國中心解散了，這個運動分散爲一個個不相連屬的有戰鬥性的盟員小組，在各地工會運動中工作。

對於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綱領的批判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綱領表現了一般工團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這就是：它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大大地把工人革命的問題過分簡單化了。工團主義的過分簡單化表現爲企圖忽視資產階級國家。它無視工人對於革命政黨與政治行動的需要，而企圖把工人階級的全部組織與鬥爭限制在工會行動的範圍之內。因此工人的階級鬥爭的戰綫就狹小了，使工人在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保

險等等的鬥爭方面成爲癱瘓無力；他們被取消了從事議會選舉鬥爭、利用政府立法機構爲對羣衆說話的講壇、及以在總政治鬥爭中使工人收到思想澄清影響等利益；他們不能與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被壓迫的黑人中可能的同盟軍成立同盟。總之，工團主義在政治上使工人解除武裝，而且關割了他們對資產階級敵人進行的鬥爭。很多經驗指出它實際上不是在公開鬥爭中走向失敗，就是通過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而投降。

工團主義者（包括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內）把工人革命問題過度簡單化的一個根本方面，可以從它的總罷工理論中看出來：它幻想工人們可以以『叉起雙手』的罷工來停止一個戰爭，或實現革命，因此，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綱領中說：『工人控制工業的權力，乃是現代社會中最大的力量。工人們只要整個階級暫時停止工作，就可以推翻作爲主人的資產階級而使他們自己獲得自由。』但是，俄國的、德國的與其他各國的革命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早就指明了一個事實——而最近的法西斯主義更給了它以佐證——就是除非工人與其他勞動人民有着優勢的力量，資產階級就決不能在最後被擊敗。總罷工能够而且必須有效地應用於戰爭和革命的情況中，但是，它本身決不能產生革命。『叉起雙手』的總罷工的工團主義的與改良主義的社會黨理論，只能使工人走向投降，或被殘殺。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關於組織的非集中制與工人自發行動的理論同樣是錯誤的，而且是對於發展鞏固的組織與堅持的鬥爭是一種障礙。此外，它對怠工破壞活動的過分注重，會使挑撥分子進

入工會，並勢必把少數人的勇敢的個人的行動來代替廣泛的羣衆行動。同樣，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左派對工人的民族主義的情感以及他們的宗教信仰所作的攻擊，也是毫不必要地見外於深受這些糊塗觀念影響的工人羣衆，而且造成了宗派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同盟關於戰鬥性少數派的理論是有健康的中心內容的，而且是當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概念的一大進步。但是，工團主義的戰鬥性少數派却被『直接行動』的理論、組織與實踐的限制所阻碍，因而不可避免地只能成爲工人階級的真正先鋒——共產黨的脆弱的先驅者，後者有廣泛的政治綱領，有不僅存在於工會中，而且也存在於作坊、農場、軍隊、學校、政府等等中間的有組織的戰士。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關於『打入內部』的政策是基本上正確的，而且大大優越於當時流行的左翼雙重工會運動的幻想。但是，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有時把它應用得太狹窄了，而沒有能在當時業已存在的這種雙重工會中有系統地工作。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關於在新社會中將由生產機構管理工業的理論，對於當時的工團主義者認爲未來工業將由工會管理的觀點說來，也是一個進步。在今天的蘇聯，工業是由在國家指導下的經濟機構管理的這多少類似我們的『生產組織』，工會雖然也直接與工業生產進程有關，却只是在生產中起附屬的作用。在革命初期，工團主義者所主張的工會管理工業的理論已證明是無用的。

雖然我們關於『生產組織』的理論包含着一些真理，但是在同盟的觀點中仍有兩方面的錯誤。這就是：（一）未能了解黨與蘇維埃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作用，（二）天真地把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抗拒估計過低，同盟之假定資本主義經濟機構只要作小小的改變，即能在新社會裏沿用，就可以明證這一點。事實是，如蘇聯現在所明白顯示的那樣，整個經濟機構必須重新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與農業機構，必須造就新的技術人員，必須對資產階級工程師的怠工作鬥爭……這些組成了革命最重大的任務。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意義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在綱領上的缺點，是阻得它成爲一個能在階級鬥爭中起永久作用的羣衆性組織的基本因素。這些缺點都勢必使同盟的活動範圍縮小，使它在羣衆中孤立，使它陷於當時毒害左翼的宗派主義。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之失敗及其解放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於它不能吸收足夠的有戰鬥性的工人，因爲它們固執于雙重工會主義的理論。正像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在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時代，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是在上昇中，以其眩目的產業工會烏托邦的光彩，催眠着整個左翼，包括社會黨內的有戰鬥性的黨員在內。

那時，社會黨內正發展着一個很大的左翼鬥爭，它是我們在一九〇九年在社會黨內的鬥爭的

延續與加強，是由霍烏德與「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集團領導的。這個鬥爭在環繞着雙重產業工會與怠工這兩個工會主義的問題而進行的爭論上達到了頂點。左翼在兩個問題上都失敗了。在產業工會的問題上，一九二二年的社會黨大會在牧師與律師的控制下，通過了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的決議。它在原則上支持了產業工會，但未解釋如何來建立它，是修改造舊的工會呢，還是另創一個新的工會呢。這樣，社會黨實際上就沒有政策，這就是說，左翼可以繼續奉行他們通常的雙重工會主義，而右翼也可以繼續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追逐選票與獵取地位。在怠工的問題上，左翼慘敗，霍烏德被迫退出了全國執行委員會，連黨章都被修改，規定贊成怠工的主張竟要受到開除出黨的處分。

左翼這個歷史性的失敗，造成了大量的退黨與雙重工會主義變本加厲的發展。成千的社會黨員在霍烏德親自領導下，退出了黨。這些有戰鬥性的黨員中的大部份，在思想上都有深厚的工會主義色彩。他們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有的作為會員，有的作為同情者。他們對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並不重視，而且對它「打入內部」的政策表示輕蔑，他們認為這個政策是最嚴重的機會主義與對工人階級的出賣。然而，他們却並沒有特別受到同盟的宗派主義的排斥，因為他們自己和他們加入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所受美國左翼傳統病症的毒害還要深些。左翼在這個時期內的整個的趨勢是反對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和它的綱領的。

不管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生命如何短促，它終究在左翼留下了它的印記，而且它定然要在美

國革命史上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革命工人把工會的領導權從它們的反動工會領袖那裏奪取過來的第一次有組織的努力。它在這方面代表了比當時左翼所固執的、粗糙的雙重工會運動前進了大大一步。革命分子前此爲在工會中爭取領導權而作的僅有的嚴重努力，是史派斯等人在一八八六年與革命先進分子們在社會勞工黨早期所作的鬥爭。但是，這是在左翼染上了它雙重工會運動的痼疾以前的事。而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就領導了對於這個癱瘓性政策的第一次嚴重的進攻。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也應該以它『打入內部』的政策而在工人運動史上佔據地位，因爲這個政策對美國左翼全都犯有的罪過——宗派主義，進行了自覺的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老早就指出了美國的這個弱點，甚至直到我現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左翼仍然還在爲脫除這個弱點而鬥爭。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在使有戰鬥性的工人脫出孤立狀態而參加羣衆性的工會這一點上，會切中要害地打擊了這個致命的宗派主義的痼疾。

的確，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沒有能克服它從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社會黨左翼所繼承來的總的工團主義觀點，但是，雖然如此它却在它打入舊工會的綱領中包含着正確的革命政策的種子，這一個政策，我們以後可以看得出來，美國革命工人終於最廣泛的加以接受，而且它是與世界工人的經驗一致的。

第七章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之未能使它自己在工人運動中建立成爲永久性組織，乃是對我們這個小小的工團主義者團體的一大打擊。然而，它並沒有動搖我們相信「打入內部」政策的正確的信心。因此，當我們又開始進行另一個新的全國性組織時，很難說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是崩潰了。這個努力表現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舉行的一個會議上，出席的有從芝加哥、聖路易、奧馬哈與堪薩斯城來的十二位代表。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國際工會教育同盟。芝加哥被選爲全國總部所在地，又選出了由我們四個主要據點來的代表組成的一個小小的全國委員會，以我爲書記。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組織結構與「打入內部」政策，都是追隨着舊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總路線的。全國委員會只是一個諮詢機關，地方組織自行決定其組織形式與政策。沒有全國性的會費制度，這些做法主要是爲了避免被指責是雙重工會主義。工團主義的分散經營與自主自動的原則，完全由這個同盟繼承了。國際工會教育同盟也把它的組織擴展到加拿大去。

在這個時候，舊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刊物，奧馬哈的「工會運動者」，和聖地牙哥的「國際」仍然存在。但是，同盟決定在芝加哥創辦一個新的全國性的機關報。它終於以芝加哥「勞動新聞」的形式出現，由原來堪薩斯城一個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領袖狄慈特爾主編。

會議暫時同意把舊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小冊子——「工團主義」作為它的綱領。但是，我們的意見那時正發生急驟的改變，而我就受託把我們的新思想編入另外一個文件中去，我最後把它寫進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工會運動：到自由之路。」這是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發表過的唯一的正式文件。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綱領

雖然，像我的小冊子所表明的那樣，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綱領基本上是工團主義的，但是，它却因為大大地離開了正統的工團主義理論而具有重要性。這種脫離的開端在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綱領裏就可以找得出來。這些新觀念中最重要的是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對工人階級覺悟的重要性沒有那樣重視。我們採取的立場是，工會運動不管是否獲得革命理論的激勵，本質上就是向着革命的目的前進的。我們認為在一切工會運動中，保守的與激進的一樣都是在一個兩方面的進程上前進的，一方面增強他們的力量，一方面相應地提高他們的要求，而這個繼續不斷造成更大的力量與更高的要求的進程，就不可避免地要推動工會，不論它願意不願意，前進到把資本主義推翻為止。這確實是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左的宗派主義大不相同的，而它也造成了轉向右傾機會主義的偏向。

這個理論是要由我負責的，我的結論主要是根據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英國運輸工人、鐵路工

人與礦工罷工的教訓得來的。但是，我們在美國工人運動中也發生着同樣的過程，不過步調比較緩慢。我這種理論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工會，能够自發地發展足以推翻資本主義的力量。我的小冊子這樣解釋道：

「四半年以前，龐大的運輸工人聯合會把它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並宣布在英國全國實行總罷工。這個巨大的罷工使全英國的資本主義都發抖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雇主聯合會，而且是在英國航海業方面多年來絕對的獨裁者——航運聯合會在兩天之內就因爲這一勞工巨人的攻擊而崩潰。連英國政府本身也驚惶失措。一種深刻的恐懼攫住了統治階級。

「這種恐懼到鐵路工人參加這一總罷工時變成了慌亂。他們看到必須有所舉動，而且要趕快，否則覺醒的工人們就會迅速起來掌握全部局勢。因此，鐵路工人很快受到了招撫，而不久以後，運輸工人也恢復了工作，獲得了世界上任何地方勞工從來沒有贏得的重大勝利。

「這些大罷工還沒有過去，英國就又受到了一個甚至更可怕的打擊。這就是一百萬煤礦工人的總罷工。這次巨大的罷工使英國社會癱瘓到這種程度，可以說英國自從被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時到今，從沒有碰到過這樣危急的情勢。這個罷工竟以氣焰赫赫的英國政府被迫按照煤礦工會的吩咐行事而告終。

「但是，連這些震撼全社會的運動也還絲毫沒有把工會運動的潛力發揮無遺。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英國運輸工人、鐵路工人與礦工的工會已聯合組成了龐大的攻守同盟。這個包括一百五十萬以上工人的大團體，已以「三角同盟」著稱。

「現在，問題就來了：如果這個三角同盟中的一個工會，單獨舉行罷工，就能予資本主義的心臟以

如此的恐嚇，而證明其本身極與政府相抗衡，那麼，如果三個罷工合併舉行，又會發生什麼呢？可能的結果是，如果三角同盟舉行罷工，（而它只是在等待一個有利的機會來這樣做，）它就會證明它自己是英國社會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工會最後會佔上風。但是，如果情形不如此，工人階級中有潛力組織一個甚至較這個龐然大物更為巨大的聯盟，而且只要等待局勢發展就可組織起來。」

因此，由於一切工會自然會發生的過程，工會會繼續建立愈來愈大的工會聯盟與罷工，直到最後，它們就會發現由於它們永遠擴大而不可戰勝的力量，它們自己已成爲社會的支配者。然後——這裏又有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理論的第二個原則——一旦它們在一個總罷工中間，覺得自己是局勢的主宰時，它們就不可避免地會勇往直前消滅資產階級，而對全社會發號施令。他們定會這樣做，雖則他們總罷工的要求原是次要的。因爲，我認爲，工會的基本政策，不管它外表看起來是『保守的』還是『激進的』，終究是按照它們的力量來提出要求，而隨着它們力量的增長來擴大其要求的。我的小冊子說明：

「實際上工會運動總是按照儘量利用其力量來逼迫僱主對它作讓步的革命政策而行動。它的方法是盡其所能，儘量爭得多，而且它常常是超出了它所能爭得到的限度，正如許多失敗的罷工所證明的那樣。

「罷工會會停留不前而滿足於任何不能使工人得到完全解放的東西，那是廢話。因爲它們正同任何所謂最革命同盟一樣是不會滿足的。它們的力量增加到什麼程度，它們的要求也就增加到什麼程度。它們已經把工資提高到二、三、四、五、六、七、八美元一天，把工時減低到了十二、十一、十、九、八、

七、六個鐘頭一天，而且還有各種別的權利。現在它們的要求比歷來都更激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遠滿足的工會將是世界土第八個奇蹟，而使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在趣味上相形見拙。這是不可能的。有組織的工人將以其日益增長的力量繼續使得資本家愈來愈大的讓步，不管這些讓步有多麼深刻的意義。說工會會阻碍工資制度之推翻乃是純粹的假想。」

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這一類工會運動有自發革命性質的理論，儘管它有着明白的保守觀念。最後，我們取消了美國勞工聯合會這種保守的口號：諸如「一天公平的工作應有一天公平的報酬」；以及「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一致」等，認為這些口號只是模糊工會運動基本上革命的趨勢的保護性的偽裝。在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看來，少數有戰鬥性的工人的任務，不是通過教育工作來使工會革命化，他們所能做的頂多只是加速它們自然的革命性的發展，我四年後在『鋼鐵大罷工及其教訓』一書中會說明過同樣的理論：

「工會並不是因為其會員之接受某種觀點或由於採納某種綱領而成爲反資本主義的。它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的組織與方法。我們所能做的頂多就是闡明它們爭取自由的目標，並促進它們爭取自由的努力。」

我從這一論點，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革命主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羣衆性的工會。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是從屬的。革命宣傳的問題是一個第二義的問題，隨着羣衆性工會的發展，工人自會或多或少地自發地走向革命。當然，他們會犯許多錯誤，而且他們會多次地被保守的領袖所

出賣；但是，工會運動的基本趨勢（一）建立更大的，最後是不可抵抗的工會聯盟與罷工，（二）從僱主那裏奪取它們能够奪取得到的一切，是一定會不顧一切障礙，把甚至保守的工人都導以革命方法推翻資本主義的。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綱領的錯誤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這個理論，也應受到前幾章對工團主義所作的同樣批評。它同樣有着伯恩施坦主義的遺跡，它錯誤地認為工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遠能够改進工人的景況，這個理論已經被近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完全推翻了。但是，它的基本弱點是它有着工團主義那種把革命問題過分簡單化的特點，它假定單靠工會的行動就能够把資本主義推翻。而且，它還因為縮小了革命的階級覺悟與革命的理論的必要性，而使這種過分簡單化更壞。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關於自動的工會革命的理論，大體上與工團主義同樣嚴重地低估了資產階級用來抵抗革命的暴力。它所預測的那種多少是和平革命的總罷工，實際上是毫無根據的。第一次世界戰後資本主義的全部經驗——多次的革命鬥爭，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等等——已經清楚地顯示，正如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指出過的一樣：資產階級將以其國家權力和別的力量，拚命與新興的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軍戰鬥，只有革命羣衆的優勢力量才能把它擊敗。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也沒有能在天生的階級本能與經過教育的階級覺悟之間作重要的區分，前

者能使未覺悟的工人進行要求資本家讓步的工會鬥爭來減輕資本主義的暴虐，而後者乃是肅清迷惑工人的幻想，並領導他們走向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所必需的。清醒的階級覺悟對於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革命先鋒隊尤其不可缺少，他們身上負着領導比較落後的羣衆走向革命的任務，如果沒有他們，羣衆就會無望地迷失在資本主義的叢林中。

列寧本世紀初在其反對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鬥爭中（雖則我們當時對此毫無所知），清楚地指出了低估革命覺悟性的危險。他宣佈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他指出了這樣的工會並不能打破資產階級的包圍。他說：『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底資產階級政治。』（見列寧著：『做什麼』一書。）列寧也說明對革命認識的低估造成了對革命的障礙，他宣稱：『對於「覺悟成分」作用，即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不管輕視者願意與否——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同書。）俄國革命與其他革命的經驗深刻地證實了列寧的分析而顯示了組織在共產黨內的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理論也低估了反動工會與社會黨官僚的反革命作用。這個理論，一方面承認這些官僚們破壞罷工的作用，一方面却又相信他們不能阻止工會基本上向前推進。這樣一種結論的錯誤，以後會在許多國家中顯示出來，尤其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國，當時反動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領袖，因為他們在組織上與思想上控制了工會羣衆，竟能在連資本主義的武裝部隊都辦

不到的情形下，打败了革命。

生活終於要粉碎謬誤的理論，尤其痛苦的是，我親眼見到，它打破了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理論。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圍繞着英國的運輸工人、礦工與鐵路工人的三角同盟而發展起我們自發的工會革命的理論來的。（且把我們的故事說得遠一點）一九二二年我剛好在倫敦，當時，我寄以極大希望的三角同盟正面臨着偉大的罷工考驗。戰後的危機在持續，僱主們削減着工人的工資。煤礦工人在全國到處都罷了工，他們就召與他們聯盟的運輸與鐵路工人跟他們一道罷工。這是工團主義者久已嚮望的偉大的運動；巨大的三角同盟將要發動毀滅性打擊了。但是，資本家們並沒有把他們的時間花在哭泣他們的命運上；相反，他們忙碌地通過他們的工人僕從，麥克唐納、克林斯、霍奇斯、湯瑪斯等人進行布置，而使這些人們出賣了工人的鬥爭。這些叛變的領袖阻止了鐵路工人與運輸工人的罷工。礦工們於是只好單獨地聽憑命運擺佈，英國工運史上於是發生了『黑暗的星期五』。結果是三角同盟完全崩潰，而且立刻解散了，工人們遭到他們歷史上最的一次失敗。

接着，好像是爲了要使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工團主義理論的不中用顯得更清楚些似的，生活又進而粉碎那些『龐大的保守工會的聯盟』，這個我們已經在三角同盟不能以其總罷工來結束資本主義的事件中預見到了。這樣，又來了一九二六年英國巨大的總罷工，參加的工人達四百萬人。當然，如果我們那種以爲部分的要求而進行罷工的所謂保守工會將會粉碎資本主義的理論有點什

麼道理的話，現在就是它表現自己的最好的機會了。但是，資產階級處置這麼一個大工會的罷工並沒有多大的困難。雖然他們會動員了他們的武裝力量準備對工人施用暴力，但他們並沒有動用它。他們的工人僕從，改良主義的工會與社會黨的領袖們，又一次勝利地幹出了他們破壞罷工的勾當。他們使用了每一種手段來防止工人們把罷工發展成爲一個真正的戰鬥，而最後他們索性完全中止罷工。結果是：又一次的悲劇，甚至比一九二一年的『黑暗的星期五』的後果還要慘痛。

顯然，要使英國的三角同盟與總罷工獲勝，一定要有一個强有力的共產黨，要有一個能把鬥爭的領導權從工黨的錯誤領導者的控制中奪取過來，並使之發展成爲真正的政治鬥爭的羣衆性的工會反對派；但是，英國共產黨與少數派運動力量還太弱，不能這樣做。總起來說，兩種情況都是工團主義理論不中用的生動說明，它過高估計了工會運動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而忽視了革命覺悟與有組織的工人革命先鋒隊，即共產黨的根本作用。

爲了要批判國際工會教育同盟關於自發的工會革命的理論，我多少預先作了這些敘說。當然，在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時代，我是完全不知道對我們綱領的這種分析，以及上述英國的慘痛經驗的。讓我再說一遍，對於我們說來，最大的事情就是建立工會。然後，工人們以其不斷發展的組織以及越來越大的要求，即使沒有革命的理論，也會多多少少自動地從事推翻資本主義。少數有戰鬥性的工人所能做的，只是去加速工會運動的這個基本的革命趨勢。這個錯誤的概念，一

種對於保守的工會運動的極大的誇張，支配着我以後好幾年的活動。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它一方面也引導着我完成了若干我從來沒有做過的最有效的組織工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錯誤之一。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工作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不到幾個月中產生的，這時適當一九一四—一五年的工業危機之中，而正在戰時大繁榮的前夕。這是一個生活費用急速高漲，工人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的時期。工人們處在戰鬥的心情中，但是他們的組織却不給他們以戰鬥的領導，而鬥爭也很少。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在工業危機中毫無活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兩年前，盛極一時以後沒落了，社會黨也仍然因為一九二年的大分裂而未能恢復。

客觀上，這種局勢是有利於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它把它自己主要的努力轉向於組織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但是，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從來沒有能發展成爲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我在西部作了一次七千哩的宣傳鼓動旅行，在冬天也跟平常一樣到處走動，想把這個運動開展起來。各地的有戰鬥性的工人力圖在各處建立組織，然而却没有成效。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在全國範圍內甚至還沒有北美工團主義同盟那樣散佈得廣。它最後竟慢慢降到實在只好算是芝加哥的一個地方同盟的地步，然而，它還是一個必須在整個工人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組織。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未能成長的原因是正好與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情形一樣的。它有着工團主義通常的弱點。當時有着傳統的左翼反對『打入內部』政策。雖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是在不景氣中，雙重工會主義却仍然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社會勞工黨與社會黨左翼，不容詰難與不可置辯的真理。雙重工會的理論當時因為對美國勞工聯合會所產生的憤懣而得到了支持。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腐敗已愈來愈厲害，並在托辣斯化的工業中毫無作用了，這種理論也因從聯合成衣工人工會分裂出來的獨立工會，統一服裝工人工會之成立而得到支持。另一個使國際工會教育同盟與左翼力量隔離的因素，是我們所加以發展了的工團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這與當時一般流行於左翼方面的左翼的宗派主義觀點發生了猛烈的衝突，而且傾向於使我們的力量與總的革命運動進一步脫離。

芝加哥同盟

芝加哥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組織很值得提一提，因為它在發動許多戰鬥性的運動中起着關鍵的作用，而且，它在最後把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建成為美國最進步的工會委員會，在這上面它是一個主要的因素，這是由於它在發動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屠宰與鋼鐵工會的組織運動方面的創議，由於它在勞工黨運動中的活動，由於它對蒙尼——比林冤獄的支持等等的結果。它在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時代並不是一個大的團體；也許全部可以馬馬虎虎算作『盟員』的還不超過一百

人。但是，它的盟員却十分英勇而有影響，其中包括約翰斯東、曼雷、狄茲特爾、瓊斯、賴斯等人。它的主要基礎是在油漆工人、鐵路車務工人、木器工人、機器工人、理髮師、零售店員、成衣工人、女裝成衣工人、金屬打磨工人，與翻砂工人中。它的許多盟員都是當地工會的幹部。就拿我自己來說，當一九一五年下半年在屠宰場區斯威夫特公司車廠中工作時就被芝加哥區鐵路車務工人委員會所屬十三個地方工會的複決投票選為業務代表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就是這個委員會的組織員。在這個職位上，我學到了許多如何做一個組織者的寶貴經驗。

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我們是致力於在芝加哥勞工聯合會中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代表團。我們的政策是要在許多問題上與費茲巴特立克的領導集團成立一個非正式的統一戰線。雖然我們認為費茲巴特立克對於階級鬥爭的任何理論知識毫無所知，我們却把他看作一個正直與勇敢的人，他能盡其所能為工人作最好的鬥爭。幾年以前，進步的費茲巴特立克——諾克爾斯——杜爾德派擊敗了劣跡昭彰的建築業的馬頓騙子集團，並且從他們那裏奪取到了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控制權。這次鬥爭，繼之以費茲巴特立克對於鬥爭得極為艱苦的，被宣布為『非法』的芝加哥印刷業罷工的支持，以及在此以前會由之產生了聯合成衣工人工會的成衣工人的激烈鬥爭的支持，使費茲巴特立克的領導與龔柏斯的全國機構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結果竟使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分會兩度被吊銷執照。

這個對龔柏斯的鬥爭正合我們的心意，我們要把它推廣到一切戰線上去。我們也支持了費茲

巴特立克漫無目標的反對社會黨的鬥爭，而且也希望使它尖銳化。然而，我們也對費茲巴特立克的政治劃下了一條界綫，這種政略是勞聯的一個特徵，就是在兩個老政黨的候選人方面，不偏不倚地支持所謂工人之『友』。我們反對這一切的政治活動，而把我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經濟鬥爭上。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芝加哥組織，有力地參加了這個時期當地的所有罷工，特別是在有關地方工會的『教育』或怠工委員會中工作。我們對日益嚴重的流氓把持工會行爲大爲不滿，與墨菲、奧唐尼爾之流以及其他暗淡的阿爾·加邦時代的前輩成了死敵。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也把它的宣傳鼓動散播到了全國，我們送了許多文章到各工會的刊物上去，說明我們的觀點，我們還把我們的小冊子『工會主義：到自由之路』散發到好幾千個地方工會。

芝加哥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有一個極重要的行動，就是使芝加哥勞工聯合會通過一個建議，建立一個由所有鐵路工會的地方工會組成的芝加哥鐵路工會委員會。鐵路行業工會的頭子們把這看作一個危險的工會員羣衆運動而加以反對。但是，在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死亡很久以後，這個運動逐漸地扎下了根，特別是在車廠的各業工會中。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在霍佛爾（他是我們在一九一年的罷工以後就一直與之密切工作的）領導下，它竟成爲一次有二十萬工人參加的『非法的』車廠工人全國大罷工。

在一九一六年，社會黨提出了一個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法案。我們芝加哥的組織對此進

行了拚到最後的鬥爭，主張以實行總罷工來贏得八小時工作制。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內被擊敗了，費茲巴特立克支持八小時工作制。他不大相信罷工可以作爲一個武器，我還記得，他取笑我們直接行動的意見。例如，他曾說，對於那些貧困的，受盡壓迫的，爲托辣斯的支配而鬥志消沉的屠宰工人，除了立法以外，有什麼可能得到八小時工作制呢？然而，奇怪的是，僅僅兩年之後，費茲巴特立克和我，就站在二十萬屠宰工人的全國大罷工的前列，以工會的行動不只是爲了芝加哥，而且是在美國全部屠宰工業內建立了八小時工作制。

芝加哥的組織最後在與費茲巴特立克共同工作的問題上發生了分裂。我們『勞工新聞』的主編狄茲特爾，逐漸與建築工人、公寓看守工人、電影放映工人等工會的腐化官僚們成立同盟，他愈來愈採取了反對費茲巴特立克的立場。最後，他的這種方針發展成爲我們與他之間的決裂。『勞工新聞』繼續轉向右傾，而腐化也就愈來愈深。到美國參戰的時候，它已蛻化爲一時典型的狹隘愛國主義的、反共的、爲龔柏斯所接收的報紙了。狄茲特爾積存大量金錢，在他死的前一年，甚至吹噓結清了五萬美元的賬。每天早晨，爲了他個人一天的消耗，他要替自己開一百美元的支票。他最後是在一夜荒淫之後，在一輛黃色出租汽車裏發生事故而死掉的。他的報紙還拖了好幾年，成爲工人身上的一個寄生蟲。

客觀的條件不允許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建立在一個羣衆性的基礎上；它本身的政策是有缺陷的，而左翼一般還是完全充滿了雙重工會主義。芝加哥『勞工新聞』（我們會希望它成爲能把我們

的影響推廣到全國工人運動中去的一個工具)的喪失，對於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是最後一個打擊，我們的組織的瓦解因此而加速了；這樣，到一九一七年，芝加哥的組織就取消了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名稱，從那時以後，它只包含了一批鬆散的、有影響的鬥士，只是偶或當他們在工會內工作時，彼此接觸而已。國際工會教育同盟，作爲一個正式的組織，在存在兩年半之後，又步它的前身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後塵而消失爲歷史的陳迹了，雖然它先前的盟員馬上就又在芝加哥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爲美國革命運動建立『打入內部』政策的長期鬥爭中的第二個插曲，就這樣告終了。

第八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屠宰工人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兩年半，美國資產階級處於極其有利的地位，看着他的國際敵手逐漸地彼此殘殺，而它則賣給它們以必需的軍火，佔據了它們的市場，並且跳上了世界首席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然而，到一九一七年初左右，德國可能贏得戰爭的危險出現了。對於美國說來，除了害怕喪失它戰時的借款以外，還需要像英國那樣迫切地去粉碎正在興起的德帝國主義勢力。因此，威爾遜總統就把他在大選時和平主義的口號棄若敝屣，很巧妙地找到了參戰的藉口，而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也就參加了這場大屠殺。

廣大的工人羣衆是不主張戰爭的。他們中絕大多數拒絕參加志願軍就是明證，這迫使政府幾乎馬上就實行了強迫徵兵。很自然地，作爲資本家忠實僕從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踴躍地充當政府的徵兵員。甚至在參戰以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們就對威爾遜保證予以支持，聲明工會『茲特保證，不論在戰爭與和平中，在危急與風暴中，都毫無保留地支持我們人民的自由與安全的標準，以及制度與理想的保存。』接着，隨着戰爭的發展，這些領袖全心全意

地參加了戰爭活動的各個領域的工作（祇有戰場除外）。他們又決定自己不去領導罷工，也不在工人還沒有組織起來的工業中組織工人。

一般說來，革命團體採取了反對美國參戰的立場，雖然它的反對很大一部分採取了非戰主義的形式。社會黨在其左翼的壓力下，也通過了一個反戰的決議。但是，機會主義的美國社會黨領袖們，正如他們歐洲的兄弟們一樣，是贊成參戰的。當像德布斯與魯騰堡這樣的戰士們因為反戰活動而入獄的時候，希爾奎茨、奧尼爾這些人就忙於破壞黨的反戰政策，而他們中間的另一個大集團，如華林、斯巴爾哥、盧塞爾等人，就索性退出黨，而參加威爾遜與龔柏斯的主戰運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霍烏德領導下作了最好的反戰鬥爭。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迅速擴大的情形下，在各個工業中都實行着一種攻勢的罷工政策，它只是因為沒有力量才未能號召一個反對戰爭的總罷工。它的有戰鬥性的工人受到了任何組織中都從來沒有受到過的最嚴厲的戰時迫害。

至於我自己的態度，我當然是反對世界大戰，也反對美國參戰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與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兩者都一般地譴責資產階級戰爭，而尤其譴責世界大戰。我們抱有工團主義的論點，就是如果歐洲工人會以舉行總罷工來對付戰爭，戰爭就可以被迫停止。我們正確地斥責社會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們。他們在情感上與利害上與本國資產階級打成一片，乃是應負破壞工人反戰鬥爭責任的人，應負引導工人們為資本家的利潤而被殺戮責任的人。

在美國參戰時，我除了我的工會，鐵路車務工人工會以外，不屬於任何組織。國際工會教育

同盟已經解散了。至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社會黨的左翼，我同它們和它們的反戰活動完全沒有關係，因為我同它們兩者幾年前在政治行動與『打入內部』的問題上意見不和。而且，我對於戰爭形勢和革命運動當前的主要任務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的意見可以歸納如下：

我深信資本主義要在戰爭中把自己打得粉碎。我確認它已把自己削弱到了這種程度，可能在戰爭結束以前，或者在戰爭結束以後不久，就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推翻。我慶賀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公曆三月）革命，（以及其後同年的十月革命），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滅亡的開端。但是我懷疑俄國是否已足夠工業化能把它的革命直接走向社會主義；因此我寧肯期望工業化程度更高的國家，特別是德國與英國領頭實行社會主義。

什麼組織會發動歐洲的革命呢？我肯定社會黨不會這麼作，而且我的判斷並不錯，我的觀點是從舊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理論中得來的，我一直堅持這個觀點，把工會看作革命的主力。因此，工會即使在哲學方面還並不是明顯地革命，它也會貫徹推翻資本主義的行動的。在所有的工業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當時的工會成長得很迅速，而且很快就遠超過歷史上的最高峯。我深信那急速擴張着的工會將强大到足以推翻老朽的資本主義機構，而接管社會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

我從這種概念，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戰爭時期的首要的革命的任務，即建立工會運動，組織千千萬萬無組織的工人的運動。其他一切都要服從這個中心目的，為它的成功而犧牲。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必須建立起工會這一資本主義的最後的破壞者來，而我的計劃就是充分利用戰時對

於勞動力的巨大需要，通過組織運動和罷工來擴大工會。這樣，配合着英、德、法等國正在發生的一切情勢，工人們就可以把他們的工會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革命武器，由於這個武器的力量和要求日見增加，他們就會利用工會摧毀資本主義。

依我看來，非戰主義的要求結束戰爭的呼號顯得既不够勁，又無實效。應該作的事情當中最主要的，就是勇敢地利用戰爭局勢來創造唯一能結束資本主義的力量——工會。而且，按照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對階級覺悟在鬥爭中的作用的錯誤觀念看來，這些工會即使是屬於所謂保守派的，也是足以發動最後的革命的。在美國，不管威爾遜政府對於工會運動如何『寬容』，大工業中羣衆性的工會也只有鬥爭中建立。而這種罷工鬥爭政策，據我了解，是與政府要有效地繼續進行戰爭一事抵觸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在大戰時期，我竟然領導了兩個主要的戰爭工業中的組織運動和罷工——以『食物使戰爭得勝』爲口號的屠宰工業和一切軍火工業的心臟：鋼鐵工業。而且在這兩種工業裏，不管有政府和大托辣斯的不斷威嚇，不管有反動的工人領袖的出賣，我還是盡可能地貫徹上述積極組織的政策，那是以保衛工人要求和反對政府的戰爭利益舉行的英勇的罷工爲基礎的政策。

除去我心目中的革命的目的而外，我全部的戰時政策大體上是不正確的。當然其中有一定的反對戰爭的成分，而且也與龔柏斯的不罷工，不進行組織運動的『社會和平』政策（一種確實妨礙了在戰時把數百萬工人組織起來的綱領）有着尖銳的對立。但是，基本上它還是錯誤的，它的錯

誤之處就在於我對於單純的組織工會運動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有一種工團主義式的過高估計。工人爲成立工會而犧牲得太多了。這就忽略了當時全體工人階級的活動根本必須集中在反對戰爭的直接鼓動和英勇的政治鬥爭上。當然，建立工會並進行英勇的罷工，必然是反對戰爭的有效行動所必須的基本因素，但是這只在一種條件下才會如此，那就是這種工作只是一個更廣泛的政治鬥爭中有限的一部分，這種政治鬥爭的目的，如列寧所明確指出的，是要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戰爭。但是，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工會方面，希望他們終久特能實行革命。不管我的願望如何好，它實際上包含了一種機會主義的對戰爭妥協的政策，而且任何這種妥協都不可避免地有利於資本主義戰爭製造者。

開始屠宰場的組織運動

我有一個理論，即戰時是組織工人的大好時機而且也是迫切的需要。然而理論是一件事，這個理論的實踐又是迥然不同的另一件事。我還不至於天真到認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老爺們能够組織羣衆。那麼應當怎麼辦呢？

當美國參戰的時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蘇」鐵路綫，(So Line)上作檢車員；因爲在我作鐵路車務工人工會的業務代表的一年任期屆滿以後，我拒絕了我們十三個地方工會要我連任一年的提名，而回到鐵路上工作去了。當我在檢查貨車的時候，我對於應該怎樣開始一些真正的組織

工作是有些茫然的。老實說，我感到毫無辦法。我們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已經不存在了。我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一禮拜工作七天，由於工作時間太長，連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會議都不能參加，雖然我還是代表。但是，最後有一天，當我步行去上班的時候，我清楚記得那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我忽然想到也許我可以從組織芝加哥屠宰場的工人來開展一個運動。在好幾年間美國勞工聯合會完全忽視了他們。除了車運工人以外，他們是完全沒有組織的，他們的工作條件簡直駭人，而當時對工人的需要又很大——這正是發動組織運動的絕妙時機。也許還可以設法取得進步的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支持呢！

想到就作。當天晚上我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芝加哥區鐵路車務工人工會委員會。我們這一行在屠宰場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因為我們所造的冷藏車，是這個工業的基礎。於是委員會馬上贊成我的建議。在十三日，我以我們委員會委員之一的身分參加了已垮台的屠宰夫工會所屬半死不活的第八十七地方工會的會議。我們得到了它的勉強的同意，在十五日，兩個工會就向芝加哥勞工聯合會提出決議案，號召在當地屠宰工業的各行業中發動一個聯合組織運動。芝加哥勞工聯合會一致通過了我們的決議案。於是，只在計劃誕生後四天，把大屠宰托辣斯裏的工人組織起來的運動就開始進行了。

在七月廿三日，我們組成了屠宰場勞工理事會，下面有十二個地方工會，分別管轄屠宰夫、鐵路車務工人、機器匠、電氣匠、雜桶匠、木匠、職員、汽管裝配匠、技師、救火隊員等各行業的工人。

我當選爲書記，摩爾菲（一個普通屠宰工人）爲主席。我們的工作計劃是要組織一個聯合會。我們拒絕了發動一個新的『單一的大產業工會』傳統的左翼政策，因爲這種雙重工會會分散我們的力量，而且在一開頭就使我們的運動破壞掉。我們決定成立一個產業聯合會，把所屬各種行業工會緊密地在一個理事會，一個執行委員會，一組業務代表之下連結起來，在整個工業中成立一個堅固的陣線，以此走向產業工會運動。工人們毫不躊躇地接受了這個產業計劃，因爲他們在一九〇四年的大罷工就是由於幾個行業工會不團結和有些工會擅自上工而完全失敗，而這些工會就是組織在兩個分立的、互相吵爭的理事會裏面的。我們以產業工會運動的精神灌注於我們的全部運動中。

在屠宰場勞工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們就決定了，我們的運動首先要依靠非熟練工人羣衆，那就是，佔工人中大多數的外國出生者和黑人。在六萬名芝加哥屠宰工人中間，有一萬二千黑人，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無論我們費盡氣力，許多技術性的行業的工會都抵制他們，只有主要的屠宰工人工會許可他們參加。使事情更加複雜的是我們還遭受着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種族歧視所激怒的黑人知識分子的公開仇視。當我們開始組織工作時，首先從把黑人編入大的羣衆性的屠宰工工會各地方工會裏去的政策着手，我們認爲這樣就解決問題了。但是，馬上黑人領袖就大叫說我們把黑人編進白人的工會裏去了，而他們在那裏面是無能爲力的少數，並提出要求成立一個單獨的黑人工會。我們很天真地同意了這個要求，於是，幾乎在一夜之間，「種族隔離」的聲浪就傳遍了斯戴特大街。但是我們終久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叫做睦鄰政策，就是在黑人區和白人

萬都成立羣衆性的工會，但對黑人、白人都同等接受。這就消滅了「種族隔離」的爭執，而迫使黑人知識分子中的腐化分子，屠宰商的代理人，不得不公開露面來反對我們的組織運動，並主張破壞工會的政策。這種意見是不難擊破的，結果我們就爭取到了黑人的多數，並成立了在美國都市內黑人會員最多的工會。

但是，讓我回過頭來說一說我這個故事的本末吧。我們這個運動的組織人員和費用是從那裏來的呢？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全國總會連一個銅板都沒有給我們，而它的當地總組織幹事佛樂德是無恥的和膽不起人的。超等反動的屠宰夫工會的幹部們，和他們半死不活的工會，視我們爲暴發戶和危險的敵手，除了敵視而外什麼也不給我們。初步工作主要是靠約翰斯東、我自己、和以前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幾個有戰鬥性的盟員自動來完成的。芝加哥勞工聯合會是對我們友善的，但是，它初期的財政的援助只是支付我們第一次羣衆大會的費用。在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和鐵路車務工人理事會的推薦之下，美國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的主席，里安才極其不痛快地派我作九十天的組織幹事。在我們進行得還不錯，而我們的運動也頗有希望時，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又派了賈克·約翰斯東來做有薪水的組織幹事。最後伊利諾斯州勞工聯合會也給了我們兩個黑人組織幹事，而我們也不時得到屠宰夫工會及其他行業工會的業務代表的幫忙。此外，工會運動本身也可以自籌經費，並提出自己的組織員。

芝加哥勞工聯合會主席約翰·費茲巴特立克，一直是同情我們的運動的，但對其結果却表示

懷疑，他也是受了當時工會圈子中流行的悲觀主義的毒害，認為屠宰工人是無法組織的。但等到我們的運動開始有成效時，他就積極參加了，而且後來成了全國運動的主席。特別是在打擊反動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的分裂戰術，以及與屠宰商和政府進行談判的時候，他的貢獻是特別有價值的。

一個攻勢的運動

我們勇敢地進行我們的組織運動，並把力量放在芝加哥的牛肉托辣斯中最大的屠宰商的五個大工場中。工人們大批地來旁聽我們的會議，但是，由於對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長期出賣和無能所產生的懷疑，他們加入工會的很少。在六星期的緊張工作之後，我們只不過吸收到了五百個會員。費茲巴特立克認為結果良好，因為自從十三年前生死交關的罷工以後，還不會有過這種現象。但在我看來，我們的進展是絕難令人滿意的，一個一個來的辦法決不能在龐大的屠宰業中組織工人。我們必須想個辦法大批把工人們發動到工會裏來。

我們小小的有戰鬥性的分子的領導集體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把工人組織起來，我們準備為此目的而使用激烈的手段。我們根據一個英勇的罷工政策行事，這政策與露柏斯的戰時「不罷工」的綱領毫無共同之點。我們深信工人們是充滿了「罷工情緒」的，而且只要他們認識到罷工行動能支持我們所宣傳的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組織工會權等）前途時，就會響應我們的行動。

於是，我就向我們小小的領導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詳細的計劃，使我們的五百個會員，在充分準備以後，在其他工業中的有戰鬥性的工人有組織援助的配合下，可以用來使六萬工人羣衆罷工。

這是一個冒險的提議，但我仍堅信只要我們努力就可能成功。組織幹事們都同意我的建議，但在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却幸運地又找到了一個更保險的方法，利用罷工運動使工人羣衆行動起來。那就是：在受到我們芝加哥的工會運動的影響和一般條件有利的情況下，在西部的幾處屠宰業中心，地方性的組織運動和罷工正在醞釀。於是，我就提出一個策略：召集全國性的屠宰工人會議來討論準備向屠宰商提出的要求。屠宰夫工會的領袖們是十足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動派，他們預感到可能的罷工，就堅決反對這個提案，甚至於粗暴地譴責我們整個英勇鬥爭的路線。但是，他們又怕彼方與未艾的羣衆運動所攆掉，最後還是怨言噴噴地同意了。於是我們就不管他們的抗議，而向新聞界說明會議的趨向最後可能造成一個全國屠宰業的大罷工。

在戰時，美國政府竭盡全力供應各盟國千百萬飢餓的軍民，因此，這是個了不起的消息。不出我所料，第二天芝加哥的報紙都以通欄標題登載『罷工在迅速發展中』。在其他屠宰中心也是如此。整個屠宰業都爲行將到來的罷工而沸騰起來。

這對於那些心懷不滿的工人羣衆的影響是非常強烈的。他們終於看見了他們所需要的行動，看見了一個回擊他們的剝削者的機會了。他們於是爭先恐後地大批大批加入了芝加哥的工會。弱小的屠宰場工會不斷地壯大。例如，奄奄一息的屠宰夫工會八十七號地方工會，在報紙宣布了要罷

工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就吸收了一千四百個會員。同樣，在蘇市、聖路易、聖路易、烏茲堡、奧馬哈、堪薩斯城、聖約瑟、聖保羅、奧克拉荷馬城、丹佛爾以及其他西部的大屠宰業中心，運動也像月桂樹一樣飛速成長。成千上萬的工人湧進了勞工聯合會的地方工會。我們的戰略甚至比我們預料的還要成功得多。我們已經大大打開了多年來被工會方面人士認為絕對沒有希望的組織全國屠宰工人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把十幾個合作社性質的屠宰工會合併進來成爲一個鬆散的全國性的委員會，由費茲巴特立克當主席，我當書記。

但是，屠宰商也並不是一無作爲。開頭，他們除了把大量奸細打進我們的運動以外，還沒有什麼敵對行爲，顯然他們認爲我們的運動和過去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很多『運動』一樣，會自然壽終正寢的。但當他們一旦認識到我們的工作進行順利時，他們就大爲驚慌，並以通常用來解僱工會積極分子的自由僱用權（按指僱主可以任意僱用工會會員與非工會會員的權利，區別於工人要求僱能僱用工會會員的權利——譯者註）的武器來報復。這種解僱運動傳播甚遠，而到斯威夫特公司的一個分公司「利比、麥克奈爾和利比」公司解僱了約莫五十個芝加哥工人時，達到了最高峯。

我們英勇的組織者的政策就是要向一個全國屠宰工人大罷工的方向前進。我們估計只有用這種罷工才能使工人完全獲得他們的要求，建立起他們的工會來。我們鑑於對食物的強烈需要也深信屠宰商與政府在戰時決受不住一個大規模的屠宰工人大罷工。所以，屠宰商的挑釁行動正適合我們的戰略，於是我們就馬上以舉行全國性的罷工投票來作爲對「利比、麥克奈爾和利比」公司

的回答，投票的結果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贊成罷工。這樣我們就忙碌地籌備罷工了；但是就在這時，美國勞工聯合會插腳進來，並把整個運動引上了政府仲裁的出賣工人的道路。

政府援救雇宰商

必須記得，威爾遜政府，有一種戰時在政府與工人間訂立協定的政策，來使許多罷工運動轉向，並阻擋工會擴張到自由僱用的工業裏面去。它的聯邦仲裁委員會就是按照這種原則而週遊全國，解決罷工糾紛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自然是與這種反工會的政策完全協調的。

約翰斯東、我本人和其他屠宰場的有戰鬥性分子是反對政府的這種干涉的。費茲巴特立克也反對政府的干預，但是，他對罷工沒有信心，因此，約翰斯東和我的戰略的根據就是必須來一個罷工，用直接的壓力來迫使屠宰商簽訂工會合同。

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不管我們的反對，還是把政府引進來了。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我們像平常一樣，正式把我們的罷工表決情況通知勞聯的總部，而他們連通知我們一聲都沒有就立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政府，我們立刻就受到了聯邦仲裁委員會人員的騷擾。以後，當我向龔柏斯抗議他引政府來壓迫我們時，他只好無以自辯地說，我們的電報送到時，他不在辦公室，而他的秘書勒嘉德小姐把這當作一件當然需要仲裁的事情，報告給勞工部了——這正好說明了美國勞工聯合會戰時不罷工的主張。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這一行動完全推翻了我們的罷工戰略。現在該怎麼辦呢？我們能否不理會政府的仲裁人，而仍然罷工呢？一切情勢都不利於這樣做。那些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都會一致反對，因此，參加我們共同行動的一打工會的全體全國委員們也會一樣。我們芝加哥屠宰場勞工理事會的最大弱點始終是：雖然給予全國運動以全部的動力和英勇的領導，但有關的國際工會的實際的控制權却操在反動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會幹部手裏，而且不幸的是我們也沒有有組織有戰鬥性的少數派可使我們與其他屠宰業中心的工人們保持聯繫。

約在此十八個月之後，在一九一九年組織鋼鐵工人的運動中，我也遇到差不多類似的情形。我們的委員會面對着山威爾遜總統、魏柏斯主席和二十四個鋼鐵工會的大多數領袖所提出的要求，說我們應當避免正在發展中的罷工運動，信任政府的調度。但是，我們的組織，那時堅固得足以不理睬這個要求，繼續進行全國大罷工的準備。而在屠宰場的情況下，以我們的工會還年青與缺乏全國性的控制權來說，這種路線是愚蠢的。所以，我們只能對優勢讓步，遠心地參加了政府的調解，並且依靠我們運動的日益壯大的力量和戰鬥性來取得調解勝利，不管它有什麼樣的敵人：屠宰商、政府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高級領袖們。

屠宰工業組織起來了

經過許多次的周旋之後，我們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和聯邦仲裁委員會成立了合同。這個

合同規定了工人有組織工會、成立工廠委員會、提出申訴、參加工會會議等等權利；合同裏也答應了增加工資百分之十，承認按年資優先僱用的原則，取消『信仰、膚色或國籍』的歧視，公佈計件工資表，取消擅自解僱，取消強迫性的福利團體，建設合適的更衣室、飯堂和洗衣房等等。我們另外還有六大要求被提到聯邦法官阿爾茲丘勒那裏去仲裁決定。

一九一八年初在芝加哥舉行的全國屠宰業仲裁的程序是非常動人的。梅耶和康頓二位律師代表了阿摩爾、斯威夫特、摩理斯、柯達海和威爾遜五大屠宰商，工人們則由華爾希和費茲巴特立克代表。整整三個半星期，我們在證人席上列出了許多見證人——工人、經濟學家、勞工領袖（包括龔柏斯）——揭示了屠宰工人們可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屠宰商所賺的豐厚利潤，阿摩爾本人就承認在一九一七年得到了四千萬美金的戰時利潤。我應該說我對於屠宰商的這種揭露以及他們的狼狽狀態，感到雙重的快意，因為我會親身吃這一個行業的苦頭，一九一五年，我曾在斯威夫特公司的車廠裏爲了微不足道的工資，工作了一冬天，而還是窮得連買一件大衣在嚴冬禦寒都辦不到。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阿爾茲丘勒法官發下他的仲裁判決。他看到我們的英勇行動，而且也看到假若判決不能令人滿意的話，全國性的屠宰場罷工是不可避免的，就對工會的六大要求答應了百分之八十五。他的仲裁判決規定另外增加工資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基本上是八小時的工作付十小時工資，逾時工作算額外時間，男女同工同酬，在淡月中保證每星期有五天工作，在八小

時輪班制中吃飯時的休息不扣工資。這仲裁判決是有追溯效力的，所以五大屠宰公司的十二萬五千名工人共收到了六百萬美元追加工資，或者說平均每人收到四十美元。

屠宰工人們以熱烈的情緒來歡迎這些條件，認為是極大的勝利。他們湧進了全國各地工會，並且在每一工廠裏成立堅固的組織。我們進一步給屠宰商打擊的工作現在開始了，我們使幾百個小屠宰商在阿爾茲丘勒的仲裁判決上簽字，隨即把組織運動貫徹到這個工業例如零售肉店這樣的許多附屬部門去，以及許多獨立的肥皂、洗濯粉、膠料、罐頭、人造牛酪、肥田粉、造桶工廠等。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工業，如機器工廠、造車工廠的工人也受到了影響，而組織起來了。

在芝加哥，我們舉行了幾十次罷工來繼續這一運動。最嚴重的鬥爭是和聯合養畜場與轉運公司的鬥爭。這個強大的康采恩是大屠宰商所有的，每天要收進、飼養和分發成萬頭牲畜到芝加哥各屠宰場去。是當地屠宰業的神經中樞。它那大權獨攬的領袖，一位叫做里昂納德先生，拒絕在阿爾茲丘勒的仲裁判決上簽字，因此，我們向他的三千個工人發出了一小時後罷工的通知。一切牛、羊、豬的轉運都立刻停止了。屠宰商們慌亂地向整個西部打電報停止運牲畜來。約翰斯東、墨菲和我被召至市內的司法部辦事處，克雷保以妨礙戰爭為名用監禁來威脅我們。但是，我們站穩立場，並堅持聯合養畜場與轉運公司應該同意工會的條件。巨大的屠宰場因為牲口供給來源斷絕逐漸地停工了。巨大的屠宰業罷工的威脅隱隱出現。幾天之後，聯合養畜場與轉運公司軟化了，並在合同上簽了字。這是個真正的勝利，被壓迫的屠宰場工人大喜欲狂。

巨大的屠宰場工人的組織運動現在已達到了主要的目標。這一工業已在全國範圍從上到下都組織起來了。有廿萬以上的工人已編入了一打聯合起來的工會中。這些工人包括了熟練的和非熟練的，外來的和本地的，而且有整整二萬五千新會員是黑人。很多職員也加入了組織，甚至養畜場的警察，也成立了工會。最後，獨斷專橫的屠宰商們也被迫不得不與工人接頭，並且與他們談問題了。對於和約翰斯東及我的談判，他們尤其感到不舒服。

屠宰場的勝利標誌着美國工人組織的新的最高階段。這是被工會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大規模生產的、托辣斯化了的工業。如果就它是由堅決政策和使用產業工會原則來完成的這點而論，這一勝利就有更大的意義。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動官僚們自然不會從這裏面得到積極的經驗教訓。

對於我們這些舊的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有戰鬥性的分子說來，這次運動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是我們的『打入內部』政策的光輝說明，而且也說明了我們英勇地利用戰時情況來組織千百萬沒有組織的工人的理論，能做出些什麼來。

屠宰工業組織運動的餘波

事實是在阿爾茲丘勒法官判決後不久，我就離開了屠宰業而進行鋼鐵工業中的組織工作去了。但我還不能講到這些，除非我說完屠宰工人優秀組織怎樣在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的『得力』

的協助之下終於被屠宰商破壞掉。那真是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可恥的背叛事件之一。

從一九一七年初起，屠宰夫工會中龔柏斯派的幹部們，以當地某屠宰公司的一個股東丹尼斯·勒恩爲首，就盡一切可能來破壞組織運動。他們的目的就是破壞屠宰場勞工理事會，破壞它不起的團結和英勇的領導。他們打算消滅它的產業工會的傾向，而重新建立那陳腐的、聲名狼藉的行業工會制度。於是，他們就努力於取消從地方工會來的每人繳納的會費；他們要求每一地方工會都設立自己的業務代表，以代替我們的集中制；他們堅持必須成立第二個理事會，就是限於屠宰夫工會地方工會的屠宰業理事會。這就是予一九一四年的罷工致命破壞的雙重理事會制，那是我們在屠宰場組織運動的開頭就發誓再也不用了的。他們派出了『組織幹事』，充斥芝加哥地方工會。那些組織幹事在全體屠宰商的奸細和工賊的支持下，爲這一分裂的綱領而奮鬥。我們是在面對着這種分裂陰謀的情況下來繼續進行我們的組織工作的。

這一鬥爭變得非常尖銳了。最後，勒恩的一幫，與臭名昭著的奧唐尼爾的一幫建築業的打手暴徒們朋比爲奸，決定以暴力手段接收屠宰場勞工理事會。他們企圖強迫我們給他們的打手們以一個代表席位，作爲硬打進來的一個楔子。我們拒絕了，而且爲了這個我還被列入『幹掉』的人名單，臭名遠揚的鎗手外號人稱『大墨菲』的，還會公開地威嚇我。但是，我們也並不是毫無辦法，我們把它公開，以備萬一出了一什麼兇事，就知道去找誰，和怎樣去找。勒恩——奧唐尼爾的計劃失敗了，我們仍然掌握着全權。

在我離開屠宰業後的第一年，鬥爭更加尖銳了。有兩個組織幹事逃竄。繼我當屠宰場勞工理事會書記的約翰斯東，有一次會成功地持槍擊退了勒恩手下的一幫企圖以武力奪取總部的武裝暴徒。

操縱着芝加哥以外（那些地方一直是我們的弱點）的官辦屠宰夫工會機構的勒恩，終於組織了一個芝加哥屠宰業理事會。只有大約二千人加入。不久他就把他工會裏的四萬個仍然是屬於屠宰場勞工理事會的工人開除了。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對這種無理行動提出抗議，但是，龔柏斯警告它不要過問。於是屠宰業內其他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會幹部們也就着手協助勒恩來分裂屠宰場工人和破壞一直是組織運動勝利之關鍵的產業內部的團結。結果竟出現了三個理事會：屠宰業理事會、機器業理事會和屠宰場勞工理事會。此外，還有幾個不加入上述三個理事會的地方工會和大批沒有組織的工人，都被勞聯的出賣弄得意志消沉。同樣的分裂手段也會用於其他各屠宰業中心。

在我們一九一八的大勝利之後兩年半之久這種情況一直未變。到一九二〇年秋季，一度十分出色的組織大為削弱了，於是屠宰商配合着戰後反對有組織工人的『自由僱用』大攻勢，成立了公司工會，削減了工資，並且與工會斷絕了一切關係。工人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五日舉行全國性屠宰場工人大罷工，作為回答。但是，雖然他們鬥爭得很英勇，還是吃了敗仗，而且他們的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了。這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動政策的災難。假如今天的格林與霍奇遜之輩要希望知道為什麼許多基本工業裏的工人們一點都不想要行業工會，而要求產業組織的原因，那就讓他們去看看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屠宰業工會運動的悲劇吧。

從屠宰工業到鋼鐵工業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談談一九一八年的大事吧！從我的理論看來，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成百萬的工人組織到工會裏來，而且應不惜付出一切代價利用戰時迫切需要工人的情況，來達到這個目的。爲此，我自然要用屠宰業中的大勝利來作爲一個新的組織運動的出發點。我絲毫沒有安居下來作屠宰業工會幹部的意思。在考慮之後，我決定在鋼鐵工業中試驗一下。工會已經征服了第一個托辣斯化的工業——屠宰工業，而我還深信，只要它們稍微努力一下，在最大的托辣斯化的鋼鐵工業中也一樣可以得勝。

因此，甚至在阿爾茲丘勒法官批下仲裁決定之前，我就確信他一定會答應我們的大部分要求。因此，我寫了一個提案，使芝加哥勞工聯合會要求美國勞工聯合會基本上按照已經在屠宰業證明成功的路線，在鋼鐵工業中發動一個全國性的組織運動。但是，爲了一個奇怪的原因，我有兩個星期沒有向芝加哥勞工聯合會提出這個提案。在我們的仲裁期間，屠宰商的律師康頓，會很戲劇性地宣布，假如阿爾茲丘勒答應我們的要求，那麼在各工業的工人中就會全面地引起極大的高潮，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就會排隊走到老闖那裏提出同樣的要求來。甚至當他說這種話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就放着預備提出的組織鋼鐵工人的提案，我爲了擔心把它提到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去會對阿爾茲丘勒顯得康頓的預言太像真的一樣，以致會影響他的裁判對工人不利，竟不得不把它保留

到法官的仲裁判決以後。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在阿爾茲丘勒判決以後一星期，我就把這個由鐵路車務工人會和一打其他的五金工會聯署的提案提到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去。提案號召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個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鋼鐵工業工人的工會的共同行動。它是以廣泛的產業性運動為基礎的，從整個工業中的煤礦工人、鐵礦工人和湖泊運輸工人起，一直到鋼鐵工業的裝配部門中作最後一步工作的工人，和把最後成品運到鐵路幹線上去的工人為止。這樣一種聯合行動，正和屠宰工業裏面一樣，是建立必需的產業形式的組織最實際的辦法。芝加哥勞工聯合會一致通過了這個提案，而組織鋼鐵工業工人的大運動也就開始了。

第九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鋼鐵工人運動

在本章無法綜述鋼鐵工業的組織運動和一九一八—二〇年的大罷工的主要事件。這些我已在我所著『鋼鐵工人大罷工及其教訓』一書和『把鋼鐵業工會化』及『在鋼鐵工業中組織工會的方法』兩本小冊子裏寫過了。在這裏我只能說一說在這些書裏未能充分發揮的這個鬥爭的幾個方面。我尤其希望更詳盡地談談美國勞工聯合會官僚們的反動態度。鑑於這些官僚們在一九三六年產業組織委員會組織鋼鐵工人的偉大運動中（就在我寫本書的時候）的破壞活動，現在這樣寫是更合時宜的。

把勞聯的老爺們套進來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按照他們『社會和平』的戰時政策，不努力在時機爛熟的基本工業中組織工人。老實說，他們實際上是妨害了這個工作。充分證明這一點的事實是：我，一個普通的在業工人，不得不發起全國性的屠宰工人組織運動，而自始至終我們都遭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對。該會領袖們對於組織鋼鐵工人更加不感興趣。這一回又是最重要的工作非我自己動手不可，而我當時不過是次要的幹部；同樣，突破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破壞又成爲組織工人的主要問題。美國

勞工聯合會在組織屠宰業和鋼鐵業工人方面的反動態度，是它在一切工業裏的政策之典型特徵。工會在戰時的無論什麼進展都大半是自發的，是普通有戰鬥性的工人的功績。

在芝加哥提案一通過之後，美國勞工聯合會馬上就開始破壞鋼鐵工業的組織運動了。我們的提案要求勞工聯合會來領導這個工作。但龔柏斯却想把芝加哥提案交給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即將舉行的年會，來隨便把這件事了結，他當然也可以像這個公司御用工會的幹部一樣，把它送給『美國鋼鐵公司』去。自然，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年會規避了這整個事情。但我還不是這樣容易被轉移目標的，我就把這個提案再度提交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在那裏又通過了一次，我也以芝加哥勞工聯合會代表身分被派去參加一九一八年六月在聖保羅舉行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年會，爭取通過這一提案。

在年會上發生的正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方法的典型。龔柏斯使提案毫無修改和反對就通過了，因為這類的提案對於普通工人是很冠冕堂皇的讀物。而且除了直接否決以外，還有更巧妙的辦法來閃開令人討厭的提案。我提出的提案要求鋼鐵工人代表在大會期間開一個會來發動運動，所以在等了幾天之後還不見召開會議，我就感到詫異。詢問書記毛立森之後，我才知道會議大概『在六星期左右』可以召開。時間是我的組織計劃中最要緊的東西，拖延就會招致失敗：要它成功，我們必須利用戰爭情況，而戰爭很可能很快結束了。我於是就向毛立森抗議這種拖延是會造成災難，而且是與提案違反的，提案中特別規定了在大會期內舉行會議。然而，結果却發

生了下面的事情。

一兩天之後，突如其來地，而且連我也沒有通知，正在大會中午休會前，含含糊糊地宣布鋼鐵會議要在午飯休息時舉行。想想吧！要組織全國五十萬鋼鐵工人的一個會議要擠午飯的時間來開，代表們還要趕着在下午會議以前出去吃飯。很明顯地這是一個蓄意消滅這個運動的陰謀。儘管我富有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官僚們打交道的經驗，我還是大為震驚。我可以預見鋼鐵工人的組織運動從一起頭就趨向覆沒了。

在大會廳內指定的角落，有幾個代表在出去吃飯的時候，主要地出於好奇心，停下來看看是什麼一會事。龔柏斯或毛立森都不在，而且沒有一個人主持。我連忙叫遵守開會秩序，而組織幹事湯姆·富林就站到桌上，開始發表組織鋼鐵工人之必要的演說。我一看時間迫促，這種會議進行方式要糟糕，於是就把富林的演說打斷，並建議只進行下列事項，就是：把所有在場者的名字記下來，而且決定在第二天晚上召開會議，而且我們必須請龔柏斯主持。隨後，我們的飯間鋼鐵組織會議就休會了。

現在怎樣把龔柏斯搞來參加我們的會的問題來了。當天下午，我把開會經過告訴他。這位大官僚以厭煩的態度聽着，到我請他參加要開的會議時，他就冒起火來，而且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顯而易見，他已經膩透了這個討厭而不肯罷休的鋼鐵組織運動。於是我就把我的錦囊妙計掏了出來。我把參加鋼鐵「會議」的人的名單給他看（這是我們的一羣好奇者），我並且告訴他是他們

請他參加的。馬上，他的聲調改了，而且嘟囔着說他『也許』可以參加。

於是龔柏斯總算被套進了這個會議，現在就是怎樣去套其他必要的工會領袖了。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就問龔柏斯，他能否向大會宣布召開計劃中的鋼鐵會議。『不行，你來吧！』他幾乎是向我咆哮了。於是，當天下午，我就冒險向大會說明，在龔柏斯先生的請求下，我奉命邀請所有有關者來參加鋼鐵會議，龔柏斯先生自己也將出席。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可以看到龔柏斯的臉都漲紫了。我們有不少的羣衆被龔柏斯的名字吸引住了。這樣我的小小的策略就成功了，一面我用『好奇者』的名字來套住龔柏斯，另外又用龔柏斯的名字來吸引一些別的人進來。由於這種手法，我果真名符其實地把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騙進了這個重要的組織運動。但是，在使用這個妙計之後，我感覺得像在陰溝里游泳一樣，工作的前途也似乎極不樂觀。

我們鋼鐵會議所作的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六個星期之後召開一個正式的會議。這是時間的可怕的浪費。美國工人組織運動所從來沒有的絕好時機，因爲戰爭接近結束而急速地溜走了。從我在四月七日最初提出這個提案起，到第一次正式會議在八月舉行止，整整四個月白白糟蹋了。這種遲誤只能說是有意的破壞。然而，經過我一番努力，在聖保羅年會上，我設法使得計劃中的會議定在芝加哥召開。我這樣作是希望在那裏費茲巴特立克（他沒有來聖保羅）可以以美國勞工聯合會駐芝加哥組織幹事的身分來參加這個工作，因而可以有助於保護才萌芽的運動免受那些充滿敵意的反動官僚們迫害。

芝加哥會議

芝加哥鋼鐵會議是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新莫利生飯店舉行的。有十五個國際工會的代表參加。當會議談到正題的時候，主席龔柏斯轉身向我說道：『喂，福斯特老兄，你已經把我們都召集在一起；現在你有什麼建議呢？』這就是『偉大的』龔柏斯對組織鋼鐵工業工人的態度；他連什麼建議都沒有。於是我就來談我的計劃的梗概，大要如下：

應該立刻在所有重要的鋼鐵業中心同時發動一個旋風式的組織運動，這個運動應由一切管轄鋼鐵工業的各工會聯合進行。應該以大的羣衆大會、名演說家、軍樂隊、遊行、整版的報紙廣告等等方法來使羣衆行動起來。至於經濟來源，我建議每一工會向每個會員徵收二角五分錢；並開始建立一個組織人員的班子，每個工會都應該派出三個或更多的組織幹事。爲了進行這個工作，所有的工會都要在由一個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爲首的全國委員會之下，緊密地聯合起來。各工會應該設立一筆小小的統一的開辦費。我估計以這種大規模的運動，我們可以在六星期左右把大部份鋼鐵工人團聚在我們的領導之下；這就是以三星期的時間來集中經費和組織幹事，再以三星期的時間來在每個城市進行一連三次羣衆大會。我估計這些大會可以使我們把工人羣衆掌握到能立刻派我們的委員會向鋼鐵托辣斯去談判的程度，假如他們不接受要求的話，就可以以全國性鋼鐵罷工的暗示相威脅，這種威脅是我們可以作得到的。

這個在一切鋼鐵業中心來進行大規模的、迅速的、同時併發的組織運動的計劃是現實的，而且是可以實行的。它符合實際的形勢和工會的實力。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來喚起鋼鐵工人的熱情，並戰勝僱主們不可避免的對策。工人們處在一種戰鬥的情緒裏，而且運動一定會以有決定性的羣衆行動來響應。

我的六星期計劃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屠宰業裏也只用了九個多星期就把廣大羣衆爭取到我們的領導之下，並使罷工威脅成功；而且，由於我們更加成熟的經驗，提得更高的威信和更加豐富的人力、物力，我們在鋼鐵工業中的工作可以進行得更快一些。這可以使我們的運動趁戰爭還在進行時就有個頭緒，而政府與鋼鐵托辣斯經不起在這個大軍火工業中發生一個戰時罷工。假如我的提議通過了的話，我們就會輕而易舉地贏得勝利，並且一定能在鋼鐵工業裏成立起工會來。

把工會聯合起來的計劃也是一樣切實可行的，這在當時是走向產業工會運動和成立單一的鋼鐵工人組織的一個合理步驟。因爲在那時候，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裏面沒有一點對產業工會運動的積極情緒，而也絕不可能使很多行業工會放棄其管轄權而歸屬於小小的，半死不活的，領導上腐敗之至的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產業聯合會的制度在鐵路方面成功了，而我們又剛剛在屠宰業裏取得一個大勝利。這是一種要就是各行業共同行動，要就是根本不要任何運動的情形。自然，我是打算，假使我們的運動成功的話，就把各行業工會合併入一個最後的總的鋼鐵聯合會去的。

我的收費計劃是同樣切實可行的。一切大一點的工會都因戰時基金和會費的激增而大爲寬裕

(例如，我自己所屬的鐵路車務工人會的庫存就有差不多三百萬美元)。每一個工會都能毫不困難地從它的基金裏拿出那二角五分錢的。因為在最後要加入我們的鋼鐵組織運動的二十四個工會裏，約有二百萬名工人，這就會給我們幾十萬塊錢。我估計五萬塊錢大概就足夠支持我們計劃中的大規模運動六星期之用了。

但是芝加哥會議把這整個現實的計劃作了大大的刪改。等到那些不熱心的官僚們改完之後，全部剩下來的就只有聯合行動的原則了。會議成立了組織鋼鐵工人的全國委員會，它後來包括了鐵礦工人、煤礦工人、風鑄手、黏土匠、採石匠、海員、鍊鋼工人、蒸氣機匠、救火隊員、小工、機匠、鐵路車務工人、鐵匠、箍桶匠、電機匠、鍋爐匠、製坯匠、泥瓦匠、鑄模匠、冶金工人、翻砂工人、銅板工人、氣管裝配匠與轉轍手等二十四個工會。這個運動因此包括了整個工業，從生產原料的工人起到把成品運上鐵路的工人為止，但是其中竟沒有一個工會在這個龐大的沒有組織起來的鋼鐵工業中說得上有幾個會員。龔柏斯擔任全國委員會的主席，我被選為書記。(這和屠宰場勞工理事會書記的職位一樣，是沒有薪水的，我是從鐵路車務工人工會領取正式組織幹事的薪水的)。我要在一切鋼鐵城市同時立即進行巨大的全國性運動的建議也被勾消。當我說明這樣一個全國性運動定然會產生的勝利時，與會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官僚們以毫不掩飾的輕蔑，瞪着眼睛來聽。也有幾個人發言，把我的計劃當作完全是幻想，荒謬絕倫地提議把工作集中在一兩個區域，甚至於一個鋼鐵工廠中，說是『好讓工人們看看我們能作些什麼，以取得他們的信任。』

當我提出每人徵費二角五分的提議時，龔柏斯聽得十分不耐煩，連討論都不討論它，別的人也是這樣。他們乾脆就不加理會。於是最重要的徵費建議就此完結。與會的十五個工會拒絕了必不可少的起碼的五萬元而決定每個工會給全國委員會一百美元；我認爲迫切需要的一百或一百以上的組織人員也不願派出，僅派六個人參加工作。至於美國勞工聯合會，則連一塊錢也沒給，或者答應給。

在會議的第二天，在我的提議受到迎頭痛擊之後，龔柏斯就退出會場，在附近的飯店裏去找他的以酒食相徵逐的建築業裏的密友去了。他指定費茲巴特立克，高級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駐芝加哥組織幹事，在他缺席時來主持會議。這還不錯，至少，我想把費茲巴特立克弄進運動來的計劃算成功了。

我深爲芝加哥會議的結果餒氣，它把我組織鋼鐵工業的實際可行計劃粉碎了。十分明顯，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對組織鋼鐵工人並不感興趣。誰要看看我們全國委員會的人力物力，誰就會認爲我們不過是計劃去組織一批花生攤，而不是到鋼鐵工業（美國金融資本的主要的自由僱用制的據點）中去組織幾乎全無組織的五十萬工人。就是諸如此類的反動政策，才使得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戰時失去了五百萬到一千萬完全可能得到的會員。鋼鐵工人在十六個月後的最後失敗，其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芝加哥會議在龔柏斯領導下，拒絕了我的計劃這件事情上面去。

組織運動

我敢說在芝加哥會議休會的時候，沒有一個與會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們會想到那惹人討厭的鋼鐵運動還會有下文。但是，我們還是照舊進行。不過，我們不能同時在全國五十個到七十五個鋼鐵城市中以大會、遊行等等來開始一個巨大的、席捲一切的『全國鋼鐵工人運動週』運動了，而不得不把我們的活動局限在芝加哥（凱魯末特）區。我們馬上在蓋利、南芝加哥、約里埃和印第安那港開始工作。我們盡可能地把我們想用於全國的方法都使用上。自然，這些地方性的活動只能是我們計劃中的全國大運動的小小模仿行動而已。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獲得了當時的重大的勝利。我們在蓋利第一次會議上，有一萬五千鋼鐵工人參加了，而且在同一星期內在其他三個鋼鐵城市裏，也有數量差不多的羣衆參加。數以千計的鋼鐵工人湧進我們的工會裏來。在一個月終了時，如果有必要，我們已經能够輕而易舉地在所有一切芝加哥區的大鋼鐵托辣斯工廠發動罷工了。

這是對我原來計劃正確性的一個絕好的說明。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我們在芝加哥區所做到的，在全國各重要鋼鐵城市同時完成（假如工會領袖有此願望的話）。而且經驗表明，我們可以在此我預計還短的時間內，得到羣衆的擁護。我們在芝加哥區的成功說明，假如龔柏斯會以必要的人力財力（兩者他們都很富裕）來支持我的計劃的話，在我規定的六個星期之內，我們就能去敲

格利法官的大門，拿全國性罷工來威脅他了。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這樣的罷工行動，結果必然是鋼鐵工人勝利，不通過我原來的計劃就等於拒絕把鋼鐵工業組織起來。

但是，現在我們着手進行組織工人時，前途是何等不同啊。我們在芝加哥的一些勝利已大大驚動了以前並不比龔柏斯更把我們當作一回事的鋼鐵托萊斯的頭子們（雖然那些勝利在引起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機構的熱心方面是完全失敗的），這樣，他們就開始無情地和我們鬥爭了。

在以後幾個月裏，在缺少人力和組織人員的情況下，我們艱苦地把我們的運動推行到其他地區。我們遇到鋼鐵僱主們的最巧妙和最兇猛的抵抗。爲了攔阻我們，他們連續四次在全國增加工資，最後更答應了基本上的八小時工作制。在芝加哥勝利後一月，大戰結束了，全國陷于工業不景氣狀態。這種情況減弱了我們的攻勢，使我們失去出奇制勝的有利條件，而僱主們對我們的反攻却同時大大加強了。當我們現在緩緩地一個一個地攻進鋼鐵工業堡壘的時候，我們遭遇到鋼鐵城市中對集會自由的全面鎮壓，我們的組織工作者受到痛毆，並且被捕，其中有一個，芬尼·色林斯，竟被暗殺。很多公司工會成立起來，來抵制我們，三萬名工人因爲是工會會員而被解僱，三K黨的運動受到扶植，周密的特務制度專門用來對付我們，總而言之，我們面對着大鋼鐵托萊斯的全付武器的進攻。

自然，如果採納了我的計劃，所有這些難以抵擋的困難，都可以避免。我們現在的工作要困難好多倍。但是，在我們多種多樣的困難中，最嚴重的還是從我們自己隊伍裏，從工會領袖們的

不斷破壞方面來的。他們有系統地把鋼鐵工人無恥地出賣到鋼鐵托辣斯手裏。對於工人階級有極大意義的組織鋼鐵工人這件事，雖然引起資本家們的強烈反抗，却受到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機構的全然的冷淡。

美國勞工聯合會這種破壞，最厲害的方式之一，就是高級領袖們很少例外地都避開全國委員會的會議，而派毫無實權的地方業務代表爲代表。他們藉此逃脫對於運動的支持，同時在表面上却裝作隨着運動並進。其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苦於缺少人力物力和一致行動。

在這方面，龔柏斯本人是最可惡的罪人。他是我們的全國委員會真正的主席，但他在整個運動中從來沒有在鋼鐵工人的會上發過一次言，也沒有幫助我們募過一塊錢，或者組織一批組織人員。而且我唯一能使他來開我們的會的辦法，就是在他面前，在華盛頓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屋子裏召集臨時會議。就是這樣，他還有時要逃開。龔柏斯老是辯解說他沒有時間。但是，他却有充分時間在歐洲用好幾個月來幫忙趕製那臭名遠播的凡爾賽條約；他也有時間私自以公款到墨西哥城去建立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汎美勞工聯合會。但是，對於爲成立工會而拚死鬥爭的鋼鐵工人，他就沒有時間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特別需要經費、組織人員和各工會一致行動的一個關頭，我起草了一封非常強硬的信，要求各會員工會的首腦來參加我們下一屆全國委員會的會議。接着，我們的組織總幹事布朗就到華盛頓去找龔柏斯和我一起聯署。他很不爽快地簽了字。但結果是，各鋼鐵工會

領袖們在收到龔柏斯和我聯署的信以後，紛紛造訪龔柏斯，並且問這封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否事情真正如此急迫等等？於是龔柏斯就向他們說：「這沒有什麼，不過是個常會」。結果：還是照舊舉行老一套的會議，幾乎全部能起作用的領袖們都未出席。就是龔柏斯自己也沒有來。在龔柏斯這種帶頭作用之下，各工會頭子們關於他們對鋼鐵工人組織運動的經常忽視和出賣，也就頗爲心安理得了。

龔柏斯在我們的全國委員會上掛了一個主席的名，通常都是委託費茲巴特立克來代替他。但是，在我們大罷工的前夕，他終於離職以避免負責，並且明白地指定費茲巴特立克爲主席。

在我的總結報告裏，關於運動的財務數字明確地揭露了加入全國委員會二十四個工會的高級官僚們如何破壞鋼鐵工人組織運動，這是決無反駁餘地的。二十四個工會向全國委員會繳納的全部款項，總共只有十萬一千零四十七美元。我們在幾個月的時期內辛辛苦苦從他們那裏擠出來的這一筆吃不飽穿不暖的錢，竟要作十四個月的全國規模的組織運動的經費，來供應、或者接濟三十六萬五千個鋼鐵工人三個半月的罷工之用。實際上，像我所敘述的那樣，一切事情都證明，鋼鐵工人們是以他們繳付的入會費與會費來充他們自己的運動的經費的。而且甚至於這筆十萬一千零四十七美元的款項，加上二十四個工會自己爲每個工會平均派出的三個組織幹事所花的錢算在一起，也遠不能抵銷我們交給它們的及由它們代收的鋼鐵工人的入會費和會費的大筆款項，這筆款子決不會少於五十萬元。在當時，各工會都很有錢，只要他們能有足夠的關心，幾乎它們中間

的任何一個都能單獨給我們的罷工運動以比它們全體拿出來的還要多的錢。有事爲證：三個完全不屬於鋼鐵工業之內的急進的小工會，聯合成衣工人工會、女裝成衣工人工會與毛皮業工會，就捐獻了十八萬美元作我們的罷工救濟基金，換句話說，也幾乎是二十四個鋼鐵工業工會全體在整整十六個月的鬥爭中所拿出來的款項的兩倍。

這種從財務上破壞的醜行在特別反動的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事件上達到最高峯了。這個鋼鐵工業中的基本工會，確是從組織工人的運動中賺了一筆錢。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從這個工會那裏一共只收到了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一元八角一分錢，連罷工救濟金都包括在內，可是，我們却交給它十五萬以上的人會費，而它又從鋼鐵工人那裏直接收到了大概兩倍此數的入會費和會費。這個工會的庫存盈餘就有二十萬零六千美元之多。在罷工之後，反動的鐵格和其他領袖們就拿這筆錢在匹茲堡買了一所工會總部大樓。

至於美國勞工聯合會本身，根本沒有給組織運動募過一個錢。當罷工開始時，實際上我們強迫它發出了一個募捐基金的一般號召。這樣募集了四十一萬八千一百四十一元一角四分，但大多數是我們鋼鐵工業中的組織幹事募集來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們並未出過力。這就是我們從美國勞工聯合會那裏收到的僅有的一點點錢，而且是在運動開始以後十四個月，在三十六萬五千個罷工者已經罷工了六個星期之後才收到的。

然而，不願鋼鐵托辣斯的一切阻碍——如特務制度，大批地解僱工人，工資上的讓步，公司

工會，恐怖政策，和壓制公民權利等等，不願高級工會領袖的致命的怠工，在十四個月的鬥爭過程中，我們終能堅決地在各主要鋼鐵區各鋼鐵托辣斯的主要工廠裏把工會成立起來。我的財務總結報告表明：至少有二十五萬工人組織起來了。可能比這還多得多。我們的忠實的組織幹部很可無愧色地吹一吹我們完成了『不可能』的業績——組織了鋼鐵工業中的大批工人。美國勞工聯合會二十五年來所辦不到的，我們却辦成功了。工人運動終於逐步攻上一切自由僱用制的堡壘中最大的一個堡壘的壁壘。

一九一九年的鋼鐵大罷工

接着就來了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的鋼鐵大罷工。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將我們的要求送交『美國鋼鐵公司』的頭子格利法官，但是他拒絕見我們。當時，整個工業中，有一個摧毀我們的工會的大攻勢，我們有三萬以上的會員已經因為從事工會活動被解僱而失業了。這已到了不是戰鬥就是死亡的地步。我們選擇了戰鬥。

三十六萬五千鋼鐵工人響應了我們的罷工號召，在十個州內的五十個城市裏舉行了罷工。

（勞工部的數字說是三十六萬七千。——作者註）

幾乎『美國鋼鐵公司』和大的附屬工業的主要工廠都陷入了癱瘓狀態。鋼鐵工人們給了他們巨大的敵人以下毀滅性的打擊。無論是在此以前或以後，鋼鐵工業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次罷工，

能有這樣巨大的規模和有力的影響。

用不着我再重複說了，罷工受到了鋼鐵公司拚命的回擊。英勇的罷工者不得不面對大批工賊、私人槍手、縣治安官員、警察和軍隊所造成的恐怖統治。在很多鋼鐵中心區，公民權完全受到壓制；全國各地都在進行着反對罷工的兇猛宣傳。但最糟糕的還是我們自己隊伍內部的怠工。高級領導機構一貫地出賣工人的行動，現在常常達到破壞罷工的程度。例如：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企圖出賣整個運動來縮訂單獨合同。定置機器工人工會要他們那一行業繼續工作；在所有這一切中最痛心的是：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竟拒絕號召它屬下在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聯接鋼鐵工廠與鐵路幹綫的短鐵路綫上工作的會員們（他們是有組織的，但是沒有工會合同）罷工；以及美國勞工聯合會全國總部未能集中整個工人運動力量來支持罷工等等。

鋼鐵工人的英勇還不足以對抗所有這些敵對力量。二十二個人被殺死了，成百的人遭到痛毆和槍擊，幾千人被逮捕，還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餓着肚子在掙扎。但這次的大罷工，雖然最後取消了十二小時的工作日，還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改善，却並未達到組織工會的主要目標。在一九二〇年的一月八日，我們無條件地停止了罷工。大約有十萬人還堅持罷工，但這個罷工已失去作用了。三個半月艱苦的罷工已遭到失敗，而在這種難以盡述的困難下建立起來的鋼鐵工人的新工會也被打垮了。

失敗能够避免嗎？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紐約的『世界報』上，龔柏斯拿下面的話來譴責我應負一九一九年鋼鐵罷工失敗的責任：

『這就是那個福斯特，他在已經有確切的情報告訴他美國鋼鐵公司已經嚴陣以待，而且就希望我們在 一九一九年罷工的時候，在美國總統已請求至少把罷工延遲一些的時候，他還是堅持那個惹起災禍的鬥爭。』

像龔柏斯那樣對罷工怠工的人竟來譴責我破壞了這個運動，是需要很厚的臉皮的。但除此而外，容我在這裏說，我以接受鋼鐵工人罷工的全部責任自豪，雖然它是失敗了。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罷工是比這次更必要，更有價值的。如果接受了龔柏斯所說到的延期罷工的建議，就會造成對鋼鐵工人的最惡毒的背叛。他的『延期』與他從罷工一開始就實行的怠工政策，是一個東西。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在九月十一日，恰好是我們預定罷工日期的前一天，威爾遜總統向報界發表一個消息，要求把罷工延期到十月六日舉行的全國工業會議之後。這個會議據說是要在美國工業的勞資雙方之間建立起和平來。龔柏斯，甚至沒有和我們商量，就立刻發出公開的聲明，贊成威爾遜把罷工延期的要求。隨着，爲了要證明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高級領袖中間確實行動一致，支持威爾遜和龔

柏斯的立場的電報，就由組成我們全國委員會的多數工會主席那裏雪片飛來。這裏只要舉幾個就足以說明他們的意向了。

我願聲明我贊成總統的要求。

國際機匠協會主席瓊斯頓

機匠們將遵守威爾遜總統要我們把行動延期到華盛頓勞動會議以後的建議。

蒸汽機匠工會主席——斯奈靈斯

砌磚匠、石匠、泥水匠國際工會的執行部切盼鋼鐵罷工的行動延至華盛頓工業會議之後。

主席包溫

我們認為除非在十月會議之後不應通令罷工。

鉛管及氣管裝配匠工會主席阿爾賓

此刻就罷工是非常不合時的。

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主席里安

把通令罷工延期到十月六日威爾遜總統的會議之後更為合適。

鍋爐匠工會代理主席亞金生

除非在威爾遜總統召開的工業會議休會之後，我們反對在鋼鐵工業中舉行罷工。

鑄模匠工會主席韋耳森

很多別的工會主席都有類似的通電；特別反動的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的官僚們，不敢公開贊成延期，就躲閃這個問題。堅決反對暫停罷工的，只有鐵匠和採礦冶鍊工會的主席。

這一切給我們造成了一個真正的危機。鋼鐵托辣斯兇猛地攻擊我們的工會，我們就面臨着政府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腦們在我們全國委員會多數支持下，要我們取消罷工的要求。更糟的是這個要求是裝得如此狡猾，看起來它好像只不過是要求延遲到『工人之友』威爾遜總統可以圓滿地調整整個問題為止。

至於我本人，我馬上就認識到罷工的任何延期都是致命的。我對威爾遜總統和他的勞方、資方、公衆三角會議能爲鋼鐵工人謀福利一事，毫無信心。延期罷工只能不可避免地破壞工人對我們的運動的信心，讓工會聽憑萬惡的鋼鐵托辣斯處置，而在一團混亂和一個未經批准的罷工中把全部組織毀掉。因此，我們二十五萬以上的有組織的鋼鐵工人來趁機鬥爭要有利得多。不論什麼情況，取得工業會議的重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大罷工。

但是，我應當怎樣堅持罷工的日期呢？召開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就等於自殺，因爲其中大多數是反對罷工的。時間的短促也不容許舉行任何正式的工人投票，或是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於是，我自己作主，就以電報或電話通知我們的各地組織人員請表示他們當地的鋼鐵工人委員會的態度。他們中間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實可靠，而且是全心全意要把鋼鐵工人組織起來的。馬上我就收到一大批電報，表明絕大多數的羣衆要求進行罷工。有幾封電報說：

除非你在星期五上午以前下令罷工，不然我們就不得不自己作主了。

蓋利與南芝加哥鋼鐵工人委員會聯席會議

伯利恆全體工會的總委員會一致票決要求你的委員會採取罷工行動。

組織幹事威廉士

假若罷工延期，我們將無法贖付憤慨的工人。他們將認我們爲叛徒。

彌士敦區的組織幹事同啓

不使罷工延期至爲緊要，因其結果將使我們的力量喪失鬥志，而且會造成絕對危險的局面。

彌士敦、朗金、布拉多克、荷姆斯德、勃特勒、匹茲堡、約

翰敦、灰令、斯梯賓維爾、布法羅等區的組織書記同啓

費茲巴特立克雖然一般地對罷工毫無信心，卻也同意各地組織人員和我的意見，以爲把罷工延期是要壞事的。於是我們就起草一封電報給龔柏斯（我們委員會裏的第三位委員混合鋼鐵工人協會的反動分子鐵格是不敢不簽字的），說明：『延期就等於絕對使鬥志喪失和完全破壞我們的運動』，並要求罷工如期進行。

這樣，我們就面臨着鋼鐵工人的英勇羣衆，和有美國總統撐腰的反動的高級工會領導之間的正面衝突。但由於龔柏斯一幫的支持，衝突沒有發生。他們之所以支持，只是因爲不敢負公開破壞我們的運動，和打消鋼鐵工人們唯一可能勝利的機會這個責任。於是大罷工得以如期在九月二

十二日舉行；但是，用不着說，它勝利的機會已經受到了威爾遜——龔柏斯輩『延期』陰謀的嚴重損害，這個陰謀轉移了輿論對我們的同情。

威爾遜的全國工業會議的結果，表明我們不把鋼鐵工人的命運交付給它是很正確的。當時大僱主們都加入了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大的自由僱用運動中，這是戰後對工人們最兇猛的攻勢，它想剝奪他們在戰時得到的較多的工資、較短的工時和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工會組織。威爾遜的會議在最大的資本家的利益控制下，反映了這個發展中的攻勢，而且這一會議竟反動到不久就在勞方要求給與工人們以組織工會的基本權利這個建議上形成分裂。甚至於反動的龔柏斯派領袖們也不得不退出會議。

此後十四年，鋼鐵工人們會再度發動一次大運動，而且在一九三四年的全國復興法時代高漲的罷工鬥爭和工會運動的浪潮中有所發展，這是在鋼鐵工業中發動勝利罷工從來未有的好機會。但他們很不明智地附從了羅斯福總統（是和威爾遜一樣的『工人之友』）和格林的呼籲，『延期』了他們前途遠大的罷工運動，把工人的事業託付給政府部門加以仁愛的照顧。結果是工人們完全失敗。他們的工會，混合鋼鐵錫工人協會也歸於解體與信用掃地。這種情形和一九一九年我們碰到的一樣，不過情況更糟。我們在進行罷工時，還維護了工人的鬥爭機會，而且要是沒有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各種破壞罷工的計策，我們就會贏得罷工。若是採取了威爾遜——龔柏斯的『延期』，就等於一場大難，和美國工人運動中前所未聞的破壞罷工的最大恥辱。

假如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要尋究鋼鐵罷工失敗的責任所在，那他們就不必遠出他們自己的總部去找。失敗的真正原因就在於他們自始至終對於鋼鐵工人組織運動所持的冷淡，怠工和破壞罷工的反動態度。如果他們在芝加哥會議上採納了我的原定計劃，我們至多以一次短暫的戰時罷工就能得手了。但是，他們不肯給運動以必需的組織人員和款項，這就殘害了整個運動，而且他們還把它擠到下一時期：這時戰爭已經結束，對軍火的強烈需求已經完結，工業不景氣已經在望，政府已放棄了妥協的態度，僱主們的大攻勢也已開始了。就是鋼鐵工人以他們在艱苦的組織運動和英勇的罷工運動中所有的勇氣和犧牲，也還不足以克服這些困難。這些主要都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動領袖們的怠工政策所造成的。

鋼鐵工人大罷工的戰略

自然，組織鋼鐵工人運動的勝利，會給予一切工業部門中組織工人的工作以巨大的動力。以我對工會運動的重要性的高度估價，我很體會到這種勝利會造成的種種可能性，而我就以此作為我總的戰略的基礎。當我們在屠宰業中成功後，我會很快地利用它給工人們的刺激，把運動擴展到鋼鐵工業去；而且，要是在鋼鐵工業中成功了的話，我還準備把這種作法重複用到更為雄心勃勃的計劃上去。

如果工會自由僱用的各工業中佔領了鋼鐵工業這樣一個主要的堡壘，就會使其他工業的組

織運動輕而易舉。我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這種情況，使美國勞工聯合會同時也在各主要的沒有組織的工業中發動一個組織工會大運動。具體地說，我計劃建議仿照我們的鋼鐵工業委員會成立一個大的全國委員會，來監督每一工業所屬委員會的組織工作。我估計，假如我們能够打敗鋼鐵托辣斯，我們就能因此使美國勞工聯合會參加這一偉大的組織運動，並且不顧其上層領導分子的一切怠工而勝利地把它進行到底。我們就能因此名副其實地組織起成百萬的工人，並能在真正把全體工人階級組織入工會這方面獲得進展。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但是只要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能容許鋼鐵工會運動取得勝利的話，這是能够實現的。

我很自覺地認識到，這樣大批湧入的會員，會深刻地改變工會的性質。可以斷定的基本變化會有：（一）把重心由熟練工人轉移到非熟練工人身上；（二）把舊的行業工會制度破壞，並奠定產業工會的基礎；（三）給工會以更具階級鬥爭性質的政策，並擴大他們的社會觀；（四）培養更忠實和進步的領導機構。總之，我認爲這樣的一種大運動會向實現我們幾年培養的『打入內部』計劃——革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計劃——前進一大步。

上面所說的革新的趨向，在屠宰業與鋼鐵業的工會運動中已顯然有了明證，這兩個運動都是主要以非熟練工人羣衆爲基礎的，二者都純然是產業工會運動的，二者都有一個戰鬥的政策，而且二者都產生了新的反龐柏斯的領導機構。

在這些運動裏，我曾特別積極地推動了費茲巴特立克，我把他認爲是一個忠實而勇敢的戰士。

我從不放過提高他的威信和加強他的地位的機會。他之成爲我們鋼鐵委員會的主席，我是直接起了作用的。而且我把我心目中的大組織運動寄託在他作主席這件事上。我看到了他在一旦取襲柏斯而代之時，可能表現的一切進步。但我不能把全部這些計劃和打算告知這個只能慢慢進步的費茲巴特立克。他必須一步一步地前進。因此，當我發動組織屠宰工人的運動時，他起初還是懷疑的，而當我後來又建議組織鋼鐵工人時，他竟說我在發瘋，但是，在運動發動以後，他就替這些運動打氣，並給以全力協助。我認爲他在我們運動中即將到來的更高階段，也會同樣作的。

要說明上述各項在鋼鐵工業中勝利的的主要成績，不需要什麼了不起的才智——那成績就是：它把幾百萬工人們組織了起來，和把美國勞工聯合會改變了樣子——而且格利的狡猾的顧問和他有勢力的銀行家朋友們是很知道這種成績的。他們無疑地認識到如果我們贏得了鋼鐵大罷工，他們就會碰到一個捲土重來而更加強大的工人運動，因爲如果鋼鐵工業都被征服了，那還有什麼工業能抵抗得住組織工會運動呢？這就是他們爲什麼要以如此無情的暴怒來擊敗罷工的原因。

精明的老狐狸襲柏斯也知道鋼鐵工業中的勝利對他會有着何等樣不利的涵義，這就是爲什麼他也要阻撓我們的罷工的原因。他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在屠宰工業與鋼鐵工業的運動中，發展着的產業工會的趨勢，他不能自禁地感到它們是對他的整個統治的一種威脅。至於成立一個新的反襲柏斯的領導機構的問題，這實際上已成爲公開而且成爲一個現實的問題了。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韋斯特到我們匹茲堡的辦公處來。我們過去是很要好的，我就粗心大

意地把鋼鐵工業工會運動的真正意義透露了出來。不料韋斯特一點也不告訴我，就突然把它當作一條獨家新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的『民族』雜誌上刊登了出來。他戲劇性地刻劃了正在興起的費茲巴特立克—福斯特集團對於式微中的龔柏斯—毛立森集團的威脅，以及使美國勞工聯合會革命化的作用。龔柏斯爲此勃然大怒，並要求費茲巴特立克給他一個解答。後者就把我叫到芝加哥去。我們當時正在搞組織運動，如果來一個公開的鬥爭就一定會毀了它。這樣我和費茲巴特立克決定同意對韋斯特所說的事，置之不理，聽其自然發展。但是，幾天後，費茲巴特立克給我來的一封信却使我驚奇失望，他在這封信裏附來了一份他給龔柏斯的覆信的副本，荒唐地對作者在屠宰工業與鋼鐵工業工會運動中的成就備致讚揚。這是一個很壞的撤退，而且它預示四年以後費茲巴特立克將在那時的艱苦鬥爭中對龔柏斯最後投降。

但是，龔柏斯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其他領袖們並不能從費茲巴特立克軟弱的、謝罪的信中重新得到安全保證。他們只有當罷工與其激進的領導，以及對於他們說起來是可怖的各種可能性受到擊敗的時候，方才感到安全。如果說這些領袖們，除了少數的幾個例外而外，是從頭到尾都在阻撓這個運動的話，那是因爲他們有一種既得利益處在危險中，例如格利就是如此。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把鋼鐵與其他基本工業的工人組織起來，乃是工人運動中進步人士的任務，而且一定要冒反動的工人領袖的反對才能完成。這在進步的產業工會聯合會在一九三六年組織鋼鐵工人的運動中和一九一九年鋼鐵工業工會運動中都證明是如此的。

組織鋼鐵工人的工作是美國工會運動所會到達過的最遠的一點。工會已經深深地突入自由僱用制的最大工業中。一九一九年鋼鐵工人大罷工對於美國工會運動的成敗關係，大於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罷工。這一次鬥爭的勝利，（這是工會的領導本來能够取得的）就會把整個工會運動提高到一個在力量上與發展上遠遠比過去爲高的水平。同樣，它的失敗也就是加緊此後僱主大力的進攻與加深後來幾年中工會內部反動趨向的一個巨大因素。

關於某些批評

我在屠宰工業與鋼鐵工業工會運動中的活動，並不是沒有受到尖銳的批評。那些從僱主方面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官方來的批評，並不需要答覆，我也就置之不理。但是，有些『左翼的』分子也一樣大叫大嚷地批評我，認爲我在這一時期會放棄了我的革命的觀點而成爲露柏斯機構的一部份。他們也會嚴厲地斥責我對戰爭的態度。這種批評主要是從我在美國參議院調查鋼鐵工人大罷工的委員會上作證而來的。

參議院委員會的事件是這樣的：在鋼鐵工人大罷工開始的那一天，參議院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個糾紛。罷工形勢是極端緊張的。全國正處於政治上極反動的戰後時期，戰爭歇斯底里的浪潮猶未消退，司法部長巴爾墨正在『搜捕赤色分子』，美國退伍軍人團與三K黨的到處橫行，資產階級對逼近的工人階級高潮充滿恐懼。鋼鐵工人全國大罷工之發動加緊了所有這些恐

懼與歇斯底里。報紙肆意叫囂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罷工，而是一個革命的爆發，一個『赤色的』陰謀，想推翻政府而在美國建立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

在這種尖銳的激動下，我被召到華盛頓向反動的參議院委員會作證。鑒于我過去曾參加過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北美工團主義者同盟，我會被大大戲劇性地描繪為『赤黨』首要分子，正在利用鋼鐵工人大罷工來開始革命。十分清楚，參議院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從我嘴裏套出一篇革命的演說來，好用它煽起已經存在的恐怖，並從而使反動力量得以真正把鋼鐵工人大罷工撕成粉碎。

在這種時候，我應該怎麼做呢？正如我老早已說明的那樣，我把贏取鋼鐵工人大罷工的勝利認為有最深遠的重要性。我從它的勝利中不僅看到了一百五十萬以上男子、婦女與兒童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還看到了它會打開在其他工業中把數百萬工人組織進工會的大門；它會促成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機構上、政策上與領導上的徹底改組，會把強有力的革命武器放在工人階級的手裏。我因此準備去做一切，去犧牲一切來贏得這次罷工的勝利。而且，我也完全認識到在當前的反共歇斯底里的環境中，我如果在參議院委員會的作證席上把我的觀點作一個坦白的聲明，就會給資產階級敵人以它所正需要用來破壞罷工的武器。我也知道龔柏斯的官僚機構會抓住這樣一個機會把罷工扼殺。此外我害怕，這樣的一篇演說，在歇斯底里的報紙的竄改與歪曲之下，會使鋼鐵工人自己也莫名其妙而喪失鬥志，他們還遠沒有革命化，而且也沒有準備應付這樣一種發

展。後面這種危險特別大，因為並沒有有一個強大的革命政黨支持這個罷工。共產黨還只是剛剛誕生，而社會黨却又十分不可靠。

因此，我事前就決意不去把我的觀點作一次坦白的暴露，而是，不惜以一切代價來掩護罷工。我認為保障鋼鐵大罷工使之免受進一步的打擊，要比大聲宣揚我的革命道理重要得不可比擬。不管發生什麼，我總是決心不讓政府利用我來破壞罷工的。

在作證席上，我想把問題限制在工人的經濟要求方面，而避免涉及在這一點以外我個人的意見。但是，這證明是不可能，因為這使我處於難以自圓其說的境地。因此，我提議如果能摒除報紙記者旁聽，就可以把我的觀點充分發揮。但是，這也被敵意的參議院委員會拒絕了，我於是就面臨了發表演說的必要。在感到自己被強迫，而且處於某種警察設造的陷阱內的情形下，我發表了使我為之受到很尖銳的批評的演說。總之，我把我關於工會的革命性的概念弄得十分模糊，並且不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與我自己間劃出一條尖銳的政治上的界綫，而且說我會支持過戰爭。這個在上述種種情形下從我身上逼出來的證言，並不表明我真正的認識。它並不符合於我過去的態度，我在戰時的工作以及我以後的活動。讓我詳細說明吧：

首先，關於所謂我已放棄我的革命主張的譴責方面：我確實能對參議院委員會說，在我寫了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小冊子「工團主義」（這本小冊子是在整個局勢中起了極大作用的）以後，已經大大改變了我的觀點。但是，這只是意味着我已改變了我對革命前量的看法，而並不是放棄了

它。正如我在前面論述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幾章中所說到的那樣，我發展了這樣一種理論（工團主義的一種），即儘管工會的眼界是保守的，但由於它們的力量與要求不斷增加，它們就在直接造成資本主義的傾覆。因此，我確切地感到我在戰時領導屠宰與鋼鐵工業中的五十六萬五千的組織工人工作，並打開了組織數百萬更多的工人的道路，是在做着真正的革命工作。一切工團主義的理論，我的也同別人的一樣，都是機會主義的、非革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在發展我的特種工團主義時，已放棄了我的革命目標。與此相反，我深深地認為由於我在戰時的組織工作，我是在沿着一條最快與最短的道路，事實上是唯一的一條道路，走向革命。

現在，再說到所謂我已變成龔柏斯機構之一部份的指責；從我上面所說的可以明白，這是全然的胡說。雖然我在組織屠宰業與鋼鐵業工會的運動中很少對龔柏斯派的領袖們作公開的批評是事實，而且，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但是，如果因此而假定我已向這些反動派投降，就絕對不正確了。與此相反，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粉碎龔柏斯的全部統治為目的。我是以下述自覺的認識進行我的組織工作的：第一、它只有擊敗美國勞工聯合會上層領袖才能成功；第二、在鋼鐵工人勝利之後，我心目中的工會運動之成功將完全擊敗龔柏斯機構，並改變整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機構、領導與觀點。因此，我總的綱領中有一部份便是培養一個新的領導機構，而我們的運動的一般趨勢便是要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建立一個强有力的左翼集團。我用來與龔柏斯份子作戰的方法是側翼進攻。這就是說，不是正面的抗擊，因為這在當時我並沒有有組織的後援的環境下，會

造成一種公開的破裂，而使我的組織工作成爲不可能。我竭力要以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所不能擊敗的巨大的組織運動來對付他們。這樣，最後就會有以激進的、進步的領袖爲領導的廣大的非熟練與半熟練工人羣衆被動員起來反對他們而結束全部的龔柏斯統治。這個計劃是與我反對腐敗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的鬥爭一致的。

最後，關於我對戰爭的態度，在這點上我應受最尖銳的批評，因爲不可否認地，我的立場是高度機會主義的。但是，像我已說過的那樣，我在參議院委員會上的證言並沒有表達我真正的感情。我戰時立場的錯誤導源於我的錯誤的工團主義的概念，即認爲決定性的革命任務就是建立工會，而爲了達成這一目標，一切其他的活動就都應該置於從屬地位，或者予以取消，其中甚至也包括直接的反戰宣傳在內。正確的政策應該是把反戰的鬥爭置於第一位，而使其他的一切鬥爭輔助這個中心任務。我在反對世界大戰與美國參戰這一點上是對的；而在一旦美國參戰以後，我却錯誤地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這一件事情上了。我說過，我把利用戰時對工人的巨大需求來推進組織工會運動與英勇的罷工，作爲中心政策，認爲這樣做就是在以可能最快的方式創造着能把資本主義送終的工具——羣衆性的工會。這個機會主義的政策，倒並沒有使我真的去參加擁護戰爭的活動（目前關於我兜售戰爭公債的故事是無根據的），但是，我無疑地不曾反對過這種活動，而這種活動却大大地纏住了所有我周圍的工會。我只是把組織工會當作我的主要任務去做。而我在這些托辣斯化的、供應軍需的基本工業中發動的這種進攻性的組織

運動與罷工，是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及政府的『社會和平』政策，『不罷工』政策尖銳地對抗的。

鋼鐵工人繼續前進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個新的組織鋼鐵工人的運動又在開始了，這次是受以聯合礦工工會主席路易斯爲首的產業組織委員會領導的。不過，現在的工作是在遠較一九一九年爲有利的環境下進行的：（一）鋼鐵工業的經濟情形是處在上升中，而一九一九年時，鋼鐵工業却是在走入蕭條之中；（二）政治形勢也要好一點——而一九一九年的工會運動却是在『搜捕赤色分子』與反動加緊的氣氛中進行的，目前的運動是處在一個大選以前的年頭，兩黨都要爭奪工人的選票，而政府則不大反對這個運動；（三）工人們現在感覺到羣衆中間總的高潮，因而處於攻勢——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他們面對着僱主發動的巨大的、全國性的攻勢；（四）目前的運動有着二百二十五萬工人堅固的後援，此外在工人運動中一般地得到廣大支持，而我們當時却很少這種支持；（五）在一九一九年，我們只有一千四百萬元來發動我們的運動，而現在產業組織委員會却有五十萬美元，而且隨時可以募得到一百萬、二百萬甚至更多的錢；（六）現在一九三六年的運動是以一個產業工會爲基礎的，而一九一九年却有二十四個互相爭吵的行會；（七）公司工會現在已經相當徹底地聲名掃地，而在一九一九年時，它們却是十分時髦而且籠罩着許多幻想；（八）不會說英語的工人們的重大的語言問題在一九一九年是十分尖銳的，而現在却已大

大減少了；（九）一九三六年的組織者面前已有了從一九一九年鬥爭中學來的一系列重要教訓，可以爲他們的指針；（十）這些組織者還具有一種由於鋼鐵工會確實在一九一九年組織起來過這一事實所產生的信心來工作，而我們的組織者却會必須面對那組織鋼鐵工人工會是否有可能性的重大悲觀與普遍不信任；（十一）無線電廣播現在已使鋼鐵工人能大大解除他們在一九一九年時所感到的恐怖，因爲它使工人可以在家裏得到工會的信息；（十二）最後，現在在可以求援的戰場上，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共產黨，這是一個我們在一九一九年時根本就沒有的強大力量。

所有這些一九三六年的運動優於一九一九年的運動的好處預示：儘管有鋼鐵托萊斯的反對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破壞，鋼鐵工人都可以順利地組織起來。決定性的問題是繫於贏得那在鋼鐵托萊斯肯與工會打交道以前幾乎一定要發生的罷工上。而這一個可能是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罷工，是能够取得勝利的。但是，它必須有一個工人力量的強大的動員。也許有許多工業會被捲進去。特別重要的是要有鋼鐵工業地區的礦工與鐵路工人堅實的支持。

鋼鐵工人組織運動的勝利將爲工人運動開闢巨大的前途，正如它的失敗將成爲一大慘劇一樣。勝利將使數百萬工人有可能順利地組織起來。我們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並依照此種情況計劃工作。可是，現在的前途比一九一九年時甚至還要廣闊。把數百萬新工人組織到工會裏來，把美國勞工聯合會改組，並使之新生；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政黨——這些就是一個成功的組織鋼鐵工人的運動所應有的若干主要意義。

第十章 赤色工會國際

一九一九年鋼鐵工人罷工的失敗，打亂了我的整個戰略。我原來想利用這次鬥爭來作爲一個跳板，以便在一切產業部門中開始一個總的組織工會運動，但這計劃破產了。我企圖把未經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推翻羅斯福機構的希望也破滅了。但是，從我們在屠宰與鋼鐵工人罷工運動的經驗中，除了取得了急需成立產業工會等的重大教訓外，對我們戰鬥者說來，還有兩個重要的經驗教訓，也是明確的，我們並着手根據這兩個經驗教訓來行事。

第一個經驗教訓便是，我們的『打入內部』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工團主義分子中極少數人曾在美國這兩個高度托辣斯化的產業中，協助着發動與領導組織了五十萬以上工人——本國工人與外籍工人、白種工人與黑種工人、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女工與青工——的運動。而且，我們曾將這些運動引導到基本工業部門中去，而整個工作都是在不自願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方面的極端無能、冷淡與完全怠工的情況下完成的。

在屠宰與鋼鐵工人罷工中一再對我們着重指出的第二個特殊教訓就是，爲了要實行『打入內部』政策，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左翼集團，一個有組織的、富有戰鬥性的少數集團。我們與進步人士建立的鬆弛的統一戰綫，是不夠的。在這兩個運動中，缺乏強大的左翼組織，成了我們害處

很大的障礙，因爲正式的工會機構本來就是操在反動的高級工會領導人手中。在屠宰工業中，由於缺乏一個有組織的左翼運動來支持我們，我們遭到嚴重困難。在鋼鐵工人罷工中，由於有約一百五十個組織者在我們的領導下，其中約一半是社會黨人、進步人士、農工黨人及其他工會戰士，並包括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老戰士，如曼雷與漢默斯馬克，我們所處的情況便不像在屠宰工人罷工時那樣惡劣。就是有了這批人，我們才能够極力反抗威爾遜與韋伯斯所提出的鋼鐵罷工『延期』舉行的要求，延期實際上就是要取消罷工。然而，這個組織也是很不夠的。

顯然，我們必須建立另一個打進去工作的組織。舊有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及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確都已彌補，但也許下次我們將獲得更大成功。由於有了這個總的思想，因而於一九二〇年一月當罷工結束時，我便辭去了美國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的組織者及瀕於死亡的全國鋼鐵委員會書記的職位。我決心再回到鐵路上去工作，以一個小兵的身份再試圖在工會中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左翼運動。花費幾個月時期寫鋼鐵工人罷工的書籍後，我力圖在鐵路上找到一個工作；但我發現我的名字已被列入芝加哥鐵路工人黑名單中。我會短期替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官方報紙撰寫文章，但後來又放棄了這種工作，於是又告失業。

當時約翰斯東、曼雷和我以及芝加哥其他若干戰鬥分子都會準備了建立我們新的左翼工會組織的道路。最後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我們成立了這個組織——就是芝加哥的二十四個人，我們將這個組織名爲工會教育聯盟。我又被選爲書記。

老毛病——雙重工會主義

新成立的工會教育聯盟立刻又碰到碰沉它的兩個前身（即北美工團主義同盟與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同一岩礁——那就是革命分子們普遍持有的雙重工會主義。這種情形似乎較前更厲害。在屠宰業與鋼鐵業組織工會運動中，雙重工會的幻想曾給我們極大阻碍。我們簡直不能勸說左翼富有戰鬥性的分子積極參加兩大組織運動，由波蘭、俄羅斯、立陶宛及其他地方移居到美國來的廣大工人羣衆中，就有很多這樣富有戰鬥性的左翼分子。在屠宰業中約翰斯東會對左翼社會黨人講話，並極力請求他們幫助他與勒恩的反動領導作鬥爭。但完全落空，美國勞工聯合會對他們簡直是毒藥，而他們一點也不要它。

在鋼鐵業組織工會運動中，情況也差不多一樣。主張雙重工會的社會黨左翼（共產黨就是從社會黨左翼中間產生的）除了個別地方而外，對我們的運動表示冷淡與很不同情的態度，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與社會勞工黨用最尖銳的詞句來責備我們的運動。在陽士敦城，我們與德布斯發生衝突時，便可看出那時雙重工會情緒的力量。一九一九年，在這大鋼鐵中心，美國勞工聯合會因爲出賣了罷工，威信掃地，我們要經過一個極端困難的時期才能把工人組織起來。那時，正是德布斯因在坎吞城發表反戰演說將入獄的前夕，他在那裏舉行大會，用典型的雙重工會主義論據尖銳攻擊我們的運動。這增加了我們的困難，激怒了我們的組織者，我作爲三人委員會的一員去

訪問德布斯，要求他停止他的攻擊，否則我們將公開反對他。最後，他同意這樣作，但是，我們並不能勸導他去告訴參加他的大會的鋼鐵工人們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然而，後來發生大罷工時，德布斯衷心贊成罷工。並從亞特蘭大城反省院寫信給我說，假如他獲自由，他將與我們並肩作戰以爭取罷工的勝利。

至一九二〇年，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雙重工會主義者的傳統希望——經過戰時的大發展後已大大衰弱，並大大退化成爲一個營救它的很多政治犯的組織了。但是，雙重工會情緒感染了——一些獨立的產業工會，這些工會都很弱，有的甚至工作毫無成果，其中包括混合食品工人工會與統一勞工委員會等。這種工會中主要的一個工會就是加拿大的「一大工會」(One Big Union)。這工會在美國有很大影響。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加拿大的激烈分子便不像美國左翼分子那樣深受雙重工會主義的影響，他們若干年後便贏得對西部整個工會的控制權，並迅速取得對加拿大整個工會運動的領導權。但是雙重工會的幻想最後還是控制他們，他們所預期的情勢，也由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加爾加利成立了一個苦命的「一大工會」而被破壞了。「一大工會」由於照常把富有戰鬥性的分子從舊工會中拖出來，結果將整個控制權交給了反動分子。

儘管老不成功，但雙重工會主義理論仍對幾乎整個美國左翼人士起着催眠術般的影響。狂熱的雙重工會主義者——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甚至根本不討論在工會中工作的問題，社會勞工黨與一九一九年分裂後仍留在社會黨內的左翼人士也都不討論這一問題。萌芽的共產主義運動（這

種運動是以兩個共產黨的形態從社會黨中產生出來的），也同樣主張雙重工會並贊助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甚至參加工會與沒有參加工會的自由主義分子與進步分子，都深切明白在舊工會中不能作甚麼工作。我還記得一九二〇年參加紐約這樣一些自由主義分子所舉行的會議的情形，當我發表關於鋼鐵工人罷工運動的演說後，他們都嘲笑我的建議，我當時是建議革命分子應當放棄他們建立雙重工會的愚蠢政策，而應集中力量在保守的工會裏面進行工作。

意外的援軍

由於左翼幾乎一致敵視『打入內部』政策，新生的脆弱的工會教育聯盟面臨最無希望的生存鬥爭。似乎這個組織很快也遭到與它不幸的前身同樣的命運。但是，忽然意外地獲得非常有力的幫助。這種極端需要的幫助就是從俄國革命偉大的領袖列寧那裏來的。

這事發生在工會教育聯盟成立後不久，我發現了列寧著名的小冊子，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一書。這書使我感到非常高興與驚異，我發現書裏面比我們以前更明確而有力地斥責了革命的雙重工會主義，而贊成『打入內部』政策。列寧在攻擊雙重工會主義中會說道：

「……而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上層分子反動和反革命爲理由，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蠢舉，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

通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底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的影響之下……無疑地，覬相斯、亨德遜、石屋與勒琴一流先生們，是很感謝這練「左傾」的革命者的……」

工會教育聯盟中富有戰鬥性的分子當然在左翼人士中有效地運用了列寧這本小冊子。接着又從莫斯科帶來了令人興奮的消息。原來共產國際在第一屆代表大會上，在美國代表團的壓力下，在全神貫注初步動員其力量的重大任務的情況下，曾贊助了雙重工會主義，因會上曾要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率先努力建立基礎，以便將帶有階級自覺性，接受階級鬥爭的一切工會，例如工人國際產業聯盟與「一大工會」以及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的某些反叛工會，都統一成一個組織。」但是，一九二〇年初，共產國際舉行第二屆代表大會，雖然美國代表團反對，仍能對這問題予以更加密切注意，並明白宣佈反對雙重工會主義而贊成在保守的工會中進行工作。

我們這些早就主張執行「打入內部」政策的人，對這些影響深遠的突然的情勢，不僅是高興而已。這表明了我們十年來力爭在保守的工會中工作的鬥爭，終於走向勝利。我們並無錯誤。列寧的著作與共產國際的行動，第一次引起人們認真討論雙重工會主義的問題。這種結果是必然的。雙重工會的神話被揭穿了。很快兩個共產黨（當時尚未合併起來）便贊成共產國際的政策，這樣便使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雙重工會主義遭到致命的打擊。美國的革命運動走上新的轉折點。

赤色工會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

正當此時，我被邀請參加一九二一年春在莫斯科舉行的赤色工會國際第一屆代表大會。我們芝加哥集團的人同意我以工會教育聯盟的代表之一的身份出席。工會教育聯盟代表團也包括白勞德和布魯爾。此外，還有以霍烏德爲首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代表團。威爾斯與伯蒂是從底特律與西雅圖中央勞工委員會分別選出來的代表。紐約獨立的革命工會也選派了少數代表。

赤色工會國際第一屆代表大會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這是舊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是該協會的政治領袖）時代以後展開的第一個革命工會的國際運動。這個運動的組織是由於阿姆斯特丹勞工國際及其社會黨控制下的工會聯合會多年來叛變的結果。新成立的赤色工會國際是由下列組織組成的：蘇聯工會，很多國家的左翼社會主義工會與工團主義工會以及很多國度中社會民主黨工會中有組織的少數集團。

然而我不準備詳細評論赤色工會國際第一屆大會的工作。這裏我將只談談與美國情況最直接有關連的一些問題。而這方面主要的問題就是打入保守工會去工作的問題。圍繞着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提出贊成雙重工會主義的要求，展開了鬥爭，這要求獲得紐約革命工會的支持。接着發生了尖銳的鬥爭。但是代表大會根據關於工會問題的總政策方針，基本上宣佈贊成在美國實行打入保守工會中工作的政策。大會決定稱：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應參加他們各自的工會，在這些工會中展開他們的宣傳工作，解釋工人階級的種種問題。他們本身脫離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時間愈久，他們將遭受的困難就愈大，提高沒有組

織的工人的過程也就愈艱苦。……」

決定繼而指出：

「因此，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獨立工會中建立革命的核心與小組，至關重要。除了領導在工會中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外，我們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爭取美國的勞動大眾。」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們，因大會拒絕了他們崇拜的雙重工會主義，大為生氣。而這決定的確也使他們感到聊可告慰，因為決定中規定：已經存在羣衆性獨立工會的地方，便不應肅清他們，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對於下面這事感到極大暴怒：新的革命國際拒絕了他們想成爲美國唯一的真正工人運動的要求。其他國家的工團主義者，其中大多數都是雙重工會主義者，也跟他們一樣感到不滿。

爭論熱烈與分歧很多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政治行動的問題。代表大會明確宣佈贊成採取政治行動，贊成與共產國際進行兄弟般的合作。至於我自己，我是準備接受這一決定的，因爲在屠宰與鋼鐵工人罷工期中，我舊有的工團主義反對政治的主張已開始崩潰。正因爲如此，到一九二〇年初，我已開始成爲勞工黨中的活躍分子，而那時勞工黨人集中在芝加哥。但對於其他工團主義者（包括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及從西班牙、意大利、法蘭西、德國等國來的一些集團與小工會）說來，政治行動的整個思想是該咒詛與禁止的。他們猛烈反對這種思想。

我們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及其他工團主義者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也發生衝突。他們實

質上是要取消蘇維埃國家而將工業交給工會去管。至於我，由於我已知蘇聯的情況，認為這種建議簡直是狂妄。這十分清楚地說明了：當革命就擺在工團主義者們的眼前時，他們還是不知道革命的道路，也不認識革命。工團主義者們在代表大會上的反蘇態度，竟發展到公開批評鎮壓幾個月前才發生的危險的克羅斯塔德叛變。在後一問題上，他們接受了哥德曼與柏克曼的領導，他們在大廳中跑來跑去，組織反對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鬥爭。

由於對工會工作方針，政治行動與無產階級專政等基本問題，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很多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參加新成立的赤色工會國際，是不足為奇的。事實上，他們預見到要發生分裂，不久前便在柏林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並決定成立一個他們自己的國際。對他們說來，赤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只是他們組織他們自己的國際的一個有利的跳板而已。他們的脫離最後組成了短命的宗派主義的所謂柏林工團主義國際。

當他回到美國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代表團的威廉士，作了一個非常敵視的反革命報告，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領袖們並贊成不承認赤色工會國際及其一切工作。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們宣佈：『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領導機關建議該組織不參加赤色工會國際』。他們繼而大肆詆毀赤色工會國際、共產國際、共產黨與蘇聯政府。從此以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便堅持反蘇誹謗，甚至連美國勞工聯合會、赫斯特系報紙與公民聯合會的攻擊都比不上它。

然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少數派，如霍烏德、哈第、喬治、史密斯、明克等還是擁護赤色

工會國際。霍烏德當時生病，又因面臨進行反戰活動而遭判處二十年徒刑，會後便留在莫斯科，再也沒回美國了。這樣，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兒子之一便退出美國舞臺，霍烏德是一位戰士，一位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他是西部礦工聯合會創造最光榮的鬥爭傳統時的領袖；他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正充滿偉大戰鬥性並獲得很大勝利時的領袖，那時該會領導了很多大罷工，並培養了像聖約翰、李特與富林等戰士；一九二二年他在社會黨富有歷史性的鬥爭中領導了左翼，而且在他的領導下，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進行了美國一切團體中最卓越的反戰鬥爭。德布斯是美國革命運動中最偉大的宣傳鼓動家，霍烏德却是這運動中最出色的戰士。霍烏德由於確切的無產階級天性，知道他的階級敵人是誰，並與他們作戰，既不乞求也不饒恕，無論他們是與罷工糾察隊為敵的打手暴徒也好，資產階級戰爭販子或控制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知識分子集團也好。他唯一的嚴重政治錯誤，是陷入美國特有的雙重工會主義與工團主義的偏向。霍烏德這位卓越的戰士終於參加戰鬥性的組織——共產黨，這並不是偶然的。他於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逝世，他的一部分骨灰現在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英勇的革命先烈的墓傍，其餘的骨灰葬在芝加哥的海馬克特烈士的墓傍。

赤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對於打入保守工會內部去工作表示同意，這種行動因為赤色工會國際批准工會教育聯盟成爲赤色工會國際的美國分會而更加有力。我們的代表團對這感到興奮鼓舞。我們確信終於在美國奠定了健全的革命工會政策的基礎，而且我們相信可以獲得很大勝利。後來的事實發展完全證明了：我們這樣的樂觀是正確的。

第十一章 共產國際

緊接着赤色工會國際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共產國際便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數百名代表中，有偉大的列寧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很多重要的革命戰士。我參加了大會的各種會議，並非常注意會上的討論。這次大會使我感到極大興趣的問題，即打入保守工會內部去工作與工團主義的問題，它自然跟赤色工會國際採取同樣的路綫。但我不準備詳細評述大會的工作，只是一般地談談共產國際發展的情形，以及對這些發展的主要分析，這些分析使我成爲一個共產黨人。

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而共產國際的起源開始於戰時在基色爾與齊墨瓦德舉行的革命者會議，甚至開始於戰前世界各國社會黨中正形成的左翼集團。共產國際的最後建立及其構成要素共產黨之所以成爲歷史的必需，是由於第二國際社會改良主義的社會黨破產的結果，這種破產由於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擁護本國的資產階級，並保衛資本主義避免威脅着的無產階級革命而達到頂點。

社會改良主義的破產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地的革命工人羣衆（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少數人除外）都將他們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寄託在社會黨身上。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虛妄的希望。苦痛的經驗證明了：社會主義國際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大威脅，而是資本主義的支柱與救星。

至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與恩格斯已根據革命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運動。這兩位領袖在共產黨宣言中已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如何引起羣衆遭受資本家的高度剝削與貧困，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引起工人與其他勞動者中革命階級意識的覺醒，這些人最後將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開始建立社會主義作為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

但是，在資本主義戰前長時期相對和平的發展與擴張中，各國的社會黨都落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保守的工會官僚們的手中。這些機會主義的領袖們逐漸拒絕與擯棄革命的馬克思見解。而他們發展了修正主義、改良主義的理論，主張在資本主義下面不斷改進羣衆的生活水平，增加羣衆的公民權利，主張資本主義經由收購工業使之國有化的漸變過程，與通過在國會中建立社會黨人多數派而達到控制政府的辦法，毫無苦痛地進入社會主義。

從這些改良主義理論中得出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個結論就是：不僅完全不相信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而且完全不相信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改良主義的社會黨領袖們從不疲倦

於堅稱革命就是混亂，缺乏經驗的工人們絕不能掌握與運用複雜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機構，工人們必須在很多年過程中一點一滴取得這種控制權，並學習如何指導社會。為第一個結論所需要的第二個總的結論就是：爲了要使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根本必須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完好無損，使其免除來自工人方面的革命襲擊，以及免除資本主義自己內部力量有助於破壞與分裂其本身的行動與影響。所以，整個改良主義思想的結果，是完全使社會黨的利益與各國資本家的利益結爲一體。這樣，他們便幫助了僱主們反對正在發展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並幫助他們實行種種劇烈的措施，使各國資本主義制度走上帝國主義的擴張，使資本主義免於崩潰。

社會改良主義在一九一四年遭到第一次不可避免的瓦解。當資本主義列強強調他們急需從事帝國主義擴張而發動了世界大戰時，其本身利益已與資產階級結爲一體的、機會主義領導下的各國社會黨，在其資產階級主子的領導下，幾乎毫無例外地進入戰爭，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改良主義社會黨領袖們這種叛變行動，宣佈了社會改良主義的破產與第二國際的分裂；其必然的結果是建立由列寧領導下的革命的共產國際。社會改良主義及帶有社會改良主義傾向的第二國際，迅速衰亡。所以，當大戰結束時，偉大的革命浪潮席捲了歐洲幾個國家，擊敗這一浪潮的正是社會黨領袖們。由於他們控制了工人大衆，由於這些領袖們不相信革命，且堅決不惜以一切代價來保存資本主義作爲一個基地，以便由此發展爲社會主義，所以，他們一再違背建立社會主義運動所根據的基本原則，幫助資本家擊退偉大的革命浪潮，並保持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好無

損。

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時，工人們由於自發的革命高潮推翻了威廉皇帝，給資產階級重大打擊，並循着勝利的俄國勞動者的道路，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蘇維埃。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如反動的毫無革命性的厄拍特、諾斯克、謝德曼等，竟能够制止德國的革命，並阻止革命勝利的鞏固。他們應對摧毀蘇維埃、建立威瑪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及最後將政權交還資產階級負責。在這一進程中他們槍殺了成百的革命工作者，其中包括英勇的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因為這些人反抗社會民主黨人出賣革命的這種罪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這樣公開無恥地拯救被擊傷的德國資本主義行爲，只有政治上的盲人才看不見。資本家們承認這事，社會黨領袖也吹噓他們拯救資本主義的功勞。德國全國製造商協會（德國的摩根、杜邦與洛克非勒）在給大資本家們的信中，會坦白說道：

「在戰後資產階級政權重新鞏固的第一個紀元中，……金融資本家之所以可能維持其統治，僅僅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工人階級所致。感謝它的原來是一個帶有社會性的工人政黨的性格，社會民主黨在那個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使那個制度重新鞏固；它除了它的純粹政治力量外，還有更可貴而持久的力量，就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同時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力，將其牢牢鎖在資產階級國家上。」

假如說在一九三六年，人類遭受到法西斯主義與恐怖的新世界大戰危險的可怕威脅，造成這一形勢的主要責任應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負。在一九一八年，社會民主黨是有機會在德國結束資

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的，這對整個歐洲開始走向社會主義會有決定性影響。但是，社會黨領袖們拒絕了那個革命機會，他們反而拯救了資本主義制度。現在，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出賣行為所造成的最嚴重危害：就是目前全世界法西斯主義恐怖與戰爭的威脅。

在意大利，在一九二〇年戰後革命浪潮中，工人與農民以進行一連串的大罷工，而發動了革命的進攻，使資產階級感到束手無策，但又是改良主義社會黨人摧毀了整個運動，而這次是以拍賣革命來換取一些小小讓步。這一行動保存了意大利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由於無產階級隨後產生的精神頹喪，墨索里尼得以展開他的攻勢，並建立起法西斯國家。社會黨領袖們已不像馬克思談到工人階級的作用時所說的，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成爲它在幾個國家裏的救星了。他們未能拯救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是由於他們沒有控制住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的羣衆是跟隨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領導的。

在戰後長時期中，即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受了致命傷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各國的改良主義社會黨領袖們中找到最好的看護士，這些人在很多國家裏的資產階級政府中都佔有重要職位。資本家們爲了挽救其衰亡的制度而採取的每一步驟，都獲得這些虛偽的領袖們的擁護。他們利用他們的威信與權力引誘或強迫工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低微工資與失業苦痛；他們取消罷工及工人的其他尖銳鬥爭；他們贊助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趕快制度或工業合理化運動，並對工人們說這是走向繁榮的大道；他們擁護日益增加的備戰預算；他們用最難聽的名詞誹謗蘇聯；在印度，英

國工黨政府槍殺反抗的工人與農民等。總而言之，各地的社會黨領袖都成了被打傷了的資本主義的志願援救人，他們正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進行他們的一切反革命勾當。

、社會黨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破產，在希特勒當權時才達到頂點。當被無法解決的種種困難包圍下的德國金融資本家，開始轉向法西斯欺騙宣傳與恐怖主義方向，以便保存其受威脅的社會制度時，社會黨改良主義領袖們忠於他們充當資本主義保護人的角色，也開始使他們自己走同一方向。他們當時有數百萬工人作後盾，握有粉碎法西斯主義的力量，但他們不願與法西斯主義作戰。他們拒絕與共產黨結成一陣綫，拒絕反對日益增長着的法西斯威脅，而參加搜捕進步分子；他們擁護白魯寧政府，這政府替希特勒攫取政權鋪平道路；他們犧牲工人的公民權利；他們號召工人投票擁護與登堡，他被選上後就迅速將政權移交給希特勒。而且，爲了完成出賣工人階級的行爲，社會民主黨領袖們與工會頭子們都擁護希特勒政府。正是這些工人騙子替法西斯主義鋪平了道路，所以共產黨把這些人稱爲社會法西斯分子，是很恰當的。

機會主義的社會黨領袖們以爲他們在法西斯新政權中可以找到充當資本家忠實僕奴的一席之地；但當他們知道下面這事時，也感到驚異與狼狽：利用法西斯分子爲其工具的大資本家們，決心鎮壓一切不是完全法西斯化的東西，不僅鎮壓共產黨，也鎮壓改良主義社會黨人，甚至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與天主教徒也在內。於是，社會黨領袖們便馴服地讓他們的龐大的黨、工會、合作社等，不經絲毫鬥爭而被完全消滅掉，頑強地拒絕與共產黨結成反希特勒的統一陣綫。

假如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一道參加總罷工，將會改變歐洲的面貌：希特勒將被摧毀，法西斯主義將遭到決定性的敗北，現在日益接近的世界大戰（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也將避免。他們不接受共產黨的統一陣綫建議，給社會改良主義長久的、災難性的惡跡又加上一個大悲劇。這是他們出賣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後的適當繼續。

社會黨的社會改良主義在這樣投降希特勒主義中，達到必然的完全崩潰。甚至跟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樣應遭譴責的社會黨第二國際，也不能不說出下面的話來：

『這是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永遠不能抹去的事實：參加德國國會的六十五位社會民主黨議員中，就有四十八位決定對希特勒投信任票。』

這一戰時與戰後年代，也暴露了工團主義的破產，（工團主義歸根結蒂也是社會改良主義的一種形式）並完全說明了它並不是能够摧毀資本主義的一種革命力量。甚至在戰前，法國工團主義便已喪失戰鬥力與戰鬥精神（法國的工團主義曾經一度吸引人們極大注意，喚起很多革命的希望）。它拋棄總罷工，放棄怠工行動，而大大降落到單純的工會的社會改良主義水平。當戰爭到來時，法國工團主義的領袖們除少數例外，都完全支持法帝國主義的目的。當戰爭結束時，鬥爭熱情會一度很高的法國總工會（C.G.T.）官僚們，也跟社會民主黨工會同流合污，政治領袖們堅持努力拯救資本主義，極力誹謗蘇聯與阻止有爆發之勢的普遍共產黨革命。法國總工會的反動方針最後於十二年前，造成分裂，成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法國統一總工會（C.G.T.U.）。意大利的工團主

議戰後也步它的後塵而墮落成社會改良主義；工團主義工會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狂進以前就最後崩潰，它的很多領袖都變成墨索里尼欺騙性工會的官僚。在西班牙，工團主義在這一時期也同樣走上社會改良主義的道路。我們已經看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儘管在戰時採取英勇的立場，後來又怎樣退化成爲一個狹隘的反蘇宗派組織。

工團主義的工人是革命的，但他們的傳統綱領是不革命的。一九三六年表現了工團主義的破產，那時西班牙的工人，儘管相信反議會政治鬥爭的理論，但在鐵定的客觀需要的壓力下，首先投統一陣綫候選人的票，然後又英勇地拿起武器保衛人民陣綫政府。而且，他們迫於同樣嚴重的客觀需要，可惜要以嚴重的失敗爲代價，終於消除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拋棄關於在社會主義下面工會管理工業的幼稚幻想，拋棄他們關於地方分權與自發性的錯誤觀念，他們對工人進行政治組織的抗拒以及他們對中央集權政府與有紀律的軍隊的反對等。同時西班牙的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工人，由於有蘇聯工人階級及其偉大共產黨的革命經驗作指導，將容易記取這些基本的經驗教訓。

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因爲機會主義控制下的社會民主黨與工會在戰爭爆發前很久業已開始陷入社會改良主義的泥淖中，覺悟程度很高的革命分子逐漸形成了反對放棄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目標。這種反抗於廿世

紀初在蘇聯表現得最尖銳，很快在德國及其他國家也發生這種反抗。美國社會黨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二年分裂，就是全世界日益高漲中的反對社會改良主義鬥爭的一部份。這種運動在社會黨內部一直進行到該黨領袖擁護世界大戰的行動造成最後分裂為止。至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誕生了，由左翼社會黨人、革命工團主義者與個別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共產黨也誕生了，這幾乎包括了從英國到中國與從加拿大到智利的每個國家。甚至當我寫這書時，即一九三六年時，第二國際內部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規模更宏大而有力了，這是由於改良主義的領袖們已顯然破產，及在法西斯主義進攻的面前急切需要建立統一陣綫與戰鬥性政策的結果。美國社會黨內反對『老衛士』的鬥爭，只不過是第二國際中新的世界性革命精神復活的一個方面而已。我將在下面幾章中再加以評述。

在反對工人運動中社會改良主義的革命鬥爭中，不僅就蘇聯來說，而且就全世界來說，列寧是卓越的領袖。列寧是馬克思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與實際領袖。他的觀點是以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為根據的。斯大林闡明列寧主義的定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見『列寧主義問題基礎』）。曼努斯基在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上，對於斯大林的定義解釋如下：

『列寧進一步發展了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分析了壟斷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作用諸問題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期

中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列寧超越任何其他人，制訂了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他進而領導這運動贏得最偉大的實際勝利——俄國革命。洛佐夫斯基談到他在黨內的作用時說：「他是黨的理論家、黨的實行家、鼓動家、宣傳家、組織家與領袖。他是一位士兵同時也是一位將軍，他是一位導師同時也是一位學生。」（見『列寧，階級鬥爭的偉大戰略家』。）

但這裏不準備詳述列寧的作用或共產主義的原則。在我的『走向蘇維埃美國』（此書已絕版——譯者）一書中，我會力圖概述共產主義運動的方法與目標。現在，我只能提到列寧在他反對社會改良主義與擁護革命運動這一鬥爭中，他所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

社會改良主義者在伯恩施坦的領導下，背叛了馬克思的學說，而發展了這樣的理論：資本主義逐漸克服其內在矛盾，而走向一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制度，羣衆的生活水平將不斷提高。資本主義經由零星的改革將會產生進步的、必然的進化，到達社會主義。列寧曾以猛烈的火力攻擊這種機會主義的不革命理論。他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作了精確的分析，指出事情發展正與改良主義社會黨領袖們的說法相反，資本主義正日益接近自由擴張時代的告終，而正進入衰亡與沒落的帝國主義時期。他進一步指出：這一帝國主義必然產生較前更深刻的工業危機，使勞苦大眾更加貧困；它使一切階級矛盾更尖銳化，並挑起國家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他並證明帝國主義是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分析為以後的整個形勢發展光輝地證明了。

列寧也粉碎了改良主義者的謬論，他們說甚麼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工人可以用選舉的方式把這種國家和平地奪取過來，然後利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他用有力的邏輯力量證明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已證明過的真理：資本主義國家祇是稍加偽裝的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專政；歷史上從未有過不經激烈鬥爭統治階級就放棄它的統治的事情，結果，革命工人必須與農民結成同盟，用公開鬥爭來摧毀資本主義國家，而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蘇維埃政府，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列寧也仔細地分析了新無產階級國家的形成與作用。我們只要看看德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的法西斯恐怖，就會了解列寧的整個分析的正確性，就會了解社會改良主義者們經由只是合法的議會鬥爭而達到社會主義的計劃，是多麼無濟於事。

列寧並不反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爭取經濟與政治的改革。相反地，他充分了解：爭取滿足較小要求的日常鬥爭，必然是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起點。但是，這種改革絕不是像社會改良主義者們所了解的，是運動的最終目的。這種改革祇是革命鬥爭的『副產物』，是保衛工人的旗幟，是教育、組織與訓練工人階級準備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最後一擊的一種方法。

改良主義社會黨領袖們，依靠的是熟練工人與小資產階級，他們一貫不照顧非熟練工人與農民，而且像真正的帝國主義者一樣，他們讓殖民地國家中被壓迫的羣衆，遭受『宗主國』帝國主義國家中資本家主子們的無情剝削。列寧爲了反對這些狹隘的機會主義政策，發展了一切受壓迫人民的廣泛統一陣線。他使非熟練工人與熟練工人結合起來，組織工人與貧苦農民及小資產階級

之間的同盟，並使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與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

在反對戰爭中，列寧嘲笑改良主義者的謬論，他們說帝國主義戰爭是可以以非戰主義的宣傳來制止的。列寧也嘲笑了工團主義者認為戰爭是可以用一個『叉起雙手』總罷工來擊敗的理論。列寧主張一方面應運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來阻止戰爭與使戰爭更加困難，包括反戰宣傳與總罷工等，但反戰鬥爭必須基本上從下述政策出發：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變為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

爲了實行這個革命的綱領，列寧制訂了共產黨的主要基礎。黨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原則爲基礎的。共產黨不像社會黨那樣黨員是無定形的，它只包括工人階級中最先進最優秀的、有戰鬥性的分子。它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的，並具有強烈的紀律性。就組織結構說來，它的基層組織是由從事各種工作的每個機關：如工廠、農場、學校、政府、陸軍、海軍等機關中的革命分子組成。列寧認爲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够是真正革命的黨，它比改良主義社會黨好得無可比擬，配得上領導一切領域中滿足工人政治、經濟與文化要求的鬥爭，並領導工人最後推翻資本主義與建設社會主義。

當資本主義制度進入世界大戰與總沒落時，歷史對共產主義運動與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提出嚴重的考驗。我們已經看到社會改良主義的結局多麼悲慘，雖然它擁有那麼些選舉人，控制了許多政府，有千百萬工會會員與合作社社員等，但是最後仍然支持世界大戰，使無產階級革命遭

到失敗，使工人階級情緒沮喪，使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

但是，萌芽的共產主義運動勝利地通過了這一生死交關的考驗。正如列寧所預言的，在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成統一戰線同盟的工農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粉碎了資本主義制度，並用蘇維埃政府的形式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使世界資本主義壘壘打開了一個大缺口。從而，在任何現代國家從未遭受過的最嚴重的阻礙與困難情況下——經濟封鎖、武裝干涉、內戰、饑饉、疫病、經濟崩潰、怠工破壞、工農業停滯等——他們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從事建設社會主義。

由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德、意與奧地利的革命都暫時遭到失敗，全世界又面臨法西斯主義與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同時，由於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不革命性質，西班牙的革命鬥爭遭到危險的威脅，只有首先為蘇聯所示範的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才證明了勞苦大眾的勝利，與達到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

當社會改良主義陷於衰亡與危機中時，而共產主義的蘇聯却有了現在為斯大林所領導的偉大共產黨，用創記錄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工業，使中世紀的農業制度深刻的革命化了，並迅速提高蘇聯廣大羣衆的經濟與文化水平。共產主義運動取得第一個大勝利的蘇聯，現在已成爲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希望，成爲全世界一切進步與革命的力量領袖與鼓舞者。它是社會主義新世紀元的開始。

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參加共產國際的、日益壯大的共產黨，正努力在統一陣綫的鬥爭中，教育、組織與領導工廠與田莊中受剝削的勞苦大眾；他們已因第二國際改良主義政策的破產而感沮喪，已被法西斯主義狂亂的欺騙宣傳與沒落中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反動弄得頭昏眼花了。參加共產國際的共產黨是世界任何角落發生的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切真正鬥爭的心臟與領導者；中國、德國、法國、奧地利、西班牙、巴爾幹國家及其他很多國家中工人與農民進行的英勇鬥爭，雄辯地證明了這點。但我這裏不可能評論這些鬥爭；我現在必須回頭來談談我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的情形。

我成爲一個共產黨人

我在莫斯科住了約三個月，我專心致志地研究了各種派別的共產主義運動，革命的歷史與組織，共產國際與赤色工會國際的歷屆會議。我廣泛閱讀共產黨的政治文獻。由於密切觀察與閱讀的結果，我宣佈我自己是一位共產黨人。

工團主義者們，由於他們具有反對國家與反對政治行動的理論，在了解與接受共產主義上，經常有很大困難。但是，我從事革命運動多年來的整個經驗，使我能欣然成爲一位共產黨人。使我接受共產主義觀點立場的一個特別有力的因素，就是列寧與共產國際其他領袖處理到保守工會中工作這一問題時的高度英明方法，這個問題使美國帶反抗性的領袖們約三十年來碰破頭皮，也不能解決。但更帶決定性的因素，還是我認識俄國革命本身的結果。很顯然地，共產黨不僅是要革

命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實際促使一個革命發生的人。拿他們的成就與其他工人運動的成就比較，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在一九二一年，俄國革命處於非常困難的情況中。內戰剛勝利結束，但國家經過七年的戰爭與革命（在這一時期中，它通過了成千的困難）已衰弱不堪。工業生產降到只有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十，農業生產也大大下降。國家又因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封鎖而遭受可怕的苦難。到處發生饑荒，平常一個人的每日配給量只有約半磅左右的黑麵包。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很多人在嚴冬只有用他們自己房裏的傢俱與碎木塊當燃料燒。很多城市裏整個地區都沒有水電供應。成千成萬的人從饑餓的城市逃到情況稍好一點的鄉間去。鄉村中的反革命暴動與城市裏的罷工與破壞，乃是常事。傷寒霍亂很猖獗，醫藥治療幾乎是沒有。伏爾加地區可怕的饑荒，剛剛才開始。這的確是非常淒慘的情景。被擊敗的資本家與地主們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幫助下，只替在建立中的社會主義，留下了一團殘破。但是，在這混亂與破壞中，姑立着英勇的俄國工人階級，它在以偉大的列寧為首的牢不可破的共產黨的領導下，勝利地克服了無數敵人，準備在這落後而被毀壞的國家裏，開始十倍『不可能的』社會主義重建的任務。

在我到達莫斯科以前，我必須承認：我對俄國革命的結果甚表懷疑。由於自己埋葬在屠宰業與鋼鐵業工人大罷工中，找不到機會使自己擺脫當時流行的機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只有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才可能產生。但是直接接觸到革命時，這種錯誤意見就幾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

我就一目了然，在蘇俄發生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正是我整個成年生活所奮力以求的革命。情況困難又有甚麼關係呢？我的階級正在進行拚命的革命鬥爭，我處的地位是參加它的隊伍盡力幫助這一鬥爭。我必須與戎裝的俄國工人們肩並肩地走向勝利、失敗或撤退。儘管革命不斷遭到困難，但我詳細研究了情況之後，仍然相信：工人們將最後贏得了勝利。在我回國後立即出版的『論俄國革命』一書中，我會這樣寫道：

「革命是艱苦的鬥爭，但我對革命的結果並不感到沮喪失禮。俄國工人們由於他們在過去已獲得英勇而驚人的成就，對他們的未來充滿了信心。雖然全世界都說：這是不可能作到的，但他們仍在極大劣勢中解決了組織與管理政府的政治問題，用建立大軍擊退很多敵人的辦法解決了軍事問題。他們也將解決巨大的經濟問題。就我判斷，俄國革命將會執行並完成其建立世界上第一個自由國家的任務的。」

我寫了上面這些話後十五年來，雖然革命的問題間或的確是極端困難，但我的樂觀主義反而加強了。在這一時期中，我到蘇聯去了很多次（這樣使我对複雜的俄國語言有些了解），而且我可以觀察革命在每個階段中的情形。我目睹列寧偉大的新經濟政策的勝利，而各地的資本家與社會黨領袖們歡呼以爲這是標誌着共產主義的結束。我親眼看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完成了改造舊工業的任務，並開始建設新工業體系。我看見斯大林所領導的反對布哈林所建議的會造成大害的機會主義綱領的鬥爭，獲得光輝的勝利。我看見最後墮落爲叛徒與暗殺者的托洛茨基與齊諾維耶夫被擊敗。在蘇聯各地旅行中，我親眼看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與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工

業迅速建立起來，農業大大集體化，武裝防禦力量也加強了，廣大羣衆的文化與經濟水平也已提高。總而言之，我從各個不同方面觀察到：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迅速建設中，這個國家給全世界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指出了他們從資本主義地獄中解放出來必經的道路。

雖然我在一九二一年已深信：俄國工人已找到在蘇聯走向社會主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但僅僅這一事實並不使我深信：達到社會主義的共產黨綱領是其他國家所必需的最好綱領，特別是就美國說來。相反地，我是就美國的情況及我自己參加階級鬥爭的長期經驗，來衡量這一綱領的各個方面。而最後的結果是，我在列寧主義中找到了對每個重大革命問題的解答。

一開始時，我還未在原則上相信必須進行革命鬥爭才能推翻資本主義。再早十二年，我已認識到社會黨企圖經過零星的改革使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政策，是徒勞無益的，而我的整個工團主義思想（甚至連最帶機會主義色彩的那些思想也在內），是基於這樣的命題：就是用工人的優勢力暈來摧毀資本家的權力。我在與冷酷無情的、專橫獨裁的美國托辣斯進行階級鬥爭的整個經驗，使我充分認識到，當權的資產階級永遠不會經過談判、收買或投票而放棄它的政權的，它將不惜施用一切暴力來維持它的統治。但共產主義給我上了很多重要課程，關於進行這一革命鬥爭的方法與方式，其中包括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戰爭，革命的宣傳鼓動及鬥爭與工人爭取滿足迫切要求的日常鬥爭相結合，工人與農民的統一陣綫的政策，這些政策在俄國革命中都光輝地加以運用了，這些政策在適當的情況下，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可行而必

不可少的。

至於革命政治行動的問題，雖然我十二年來都是一位工團主義者，但我覺得我接受這一思想並沒有甚麼困難。在後來若干年中，由於我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在屠宰業與鋼鐵業工人罷工運動中，我已逐漸感到有政治行動的需要，並且愈來愈感到力圖使工人的鬥爭祇局限於經濟要求，是不聰明的政策。的確，如我前面所說的，由於我對政治行動的觀點大大改變了，所以，一九二〇年在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勞工黨運動中，我已經是一位積極分子。當我以疑慮的心情觀察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國家工團主義的削弱時，我更深信有進行政治行動的必要；此外，在經由倫敦赴莫斯科的途中，難道我還沒看見我們工團主義者如此期待着的礦工、鐵路員工與運輸工人的三角同盟，遭到可恥的崩潰嗎？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難道俄國革命本身還沒完全揭穿工團主義的無用嗎？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在赤色工會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反對英勇的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時的不革命行動（這還是溫和的說法），使我對反政治鬥爭的工團主義的幻想完全破滅了。這些事實更使我深信：政治行動對工人說來是基本必需的，不參加政治行動，勝利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

很多工團主義者與其他真誠的工人，在了解蘇維埃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的作用中，也有很多困難。這是因為：他們抱有幻想，以為國家的性質與社會的條件，可以由資本主義輕易一躍就進到完美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他們忽視過渡時期的整個問題。然而，我沒作

很多觀察就了解：在蘇聯，嚴格執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意志的強大國家，是維持工人的統治與建設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而且它是達到最後沒有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步階段。

假如俄國工人愚蠢到力圖根據社會黨人的計劃，用一般的、一切階級的民主政府來建立新社會，或者像工團主義者所建議的，通過工會接管的制度來建立新社會，抑或按照無政府主義者單純依靠羣衆自發性活動的思想來建設新社會，那麼革命很快就會被國內外的很多階級敵人破壞與摧毀了。這些敵對分子，經常從事陰謀詭計、破壞與騷動，必須加以鎮壓，而且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確被鎮壓下去了。鎮壓這些敵對分子，是工農勝利的第一個條件。

我也十分相信，當美國發生革命時，工人及其同盟軍將同樣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當革命的工人階級領導擊敗資產階級時，在從前的統治階級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基礎未被完全摧毀以前，它將永不能保持政權或建設新社會，除非它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組織，足以鎮壓強大的資產階級分子與僕從（這些人那時將是或多或少瘋狂的法西斯分子與好戰的革命分子）。而這樣一個革命國家可能最好的形式，就是蘇維埃：這是一個以由工廠、礦山、鐵路、農莊、軍隊等直接選出來的代表為基礎的政體，這政體在勞苦大眾中建立了最廣泛的民主，並建立了反階級敵人的最堅固的戰鬥陣綫。

俄國共產黨的高度紀律性，在工人中間，特別是在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中間，也引起了很多問題。但是，這些顧慮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種表現而已。

就我本人說來，甚至一九二一年我初步觀察俄國革命後，便完全消除了這種顧慮。由於我有機會研究俄國革命，只有政治上最幼稚的人才會不了解，沒有這樣一個有紀律的政黨，首先就不能够有布爾什維克革命，工人們就是一旦取得了政權也不能保存他們的政權。我仔細研究了俄國共產黨，它的集中制是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它的基本核心是建立在工廠、農莊、學校、軍隊裏面的，它的黨員都是工人階級與貧農中最優秀的富有戰鬥性的分子，它在超人的困難中創造了勝利的記錄，經過研究後我必然得出這樣結論（當時我表示過這意見）：俄國共產黨是人類所創造的最高級的組織形式。我無需乎再怎樣想就認識到：美國工人在與強大的美國資產階級作戰中，除了記着他們自己的特殊情況外，最好是根據蘇聯偉大共產黨的基本路綫來建立他們的黨。

我也毫無困難地接受了共產黨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的政策。很顯明地，這樣一個組織是與世界資本主義作戰所必需的，而共產國際本身的活動也表明了它能够指導世界革命運動。共產國際的領袖們是各地馬克思主義者無比優秀的部分，他們掌握了各國的情況，他們有很多親身經驗，特別是俄國領袖們，其中很多人都在很多國家中居住過，而且親身參加了祖國的三次革命。這樣一個中心，比任何社會黨團體、資產階級政府或經濟組織都更消息靈通，並且遵行一貫的革命政策，它比自治的、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無比優越，配領導世界革命運動。

我不僅了解了俄國的革命，特別考慮到俄國革命的綱領適用於美國的問題，只有經過這樣來

考慮共產主義以後，我才宣佈我是一個共產黨人。我從前參加社會黨九年，參加工團主義運動（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北美工團主義同盟與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十二年，及為各種工會會員二十年的時間，獲得相當廣泛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根據這些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我作出了這一決定。因此，我看清楚了，共產黨綱領是表示在一切國家中資本主義註定死亡，建設社會新秩序——社會主義的一種綱領。所以，在一九二一年中期，當我回國時，我便參加了共產黨，並在革命的共產國際隊伍中站在我適當的地位上。以後十五年的過程中，蘇聯仍繼續前進，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社會改良主義破產，法西斯主義增長，這些只證明了我一九二一年的決定是對的，使我相信共產黨綱領是正確的。

第十二章 工會教育聯盟

一九二二年秋，我們代表團自莫斯科返國之後，我們便開始了積極建立工會教育聯盟的運動。我會說過，這個聯盟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間組成的，我們在芝加哥創辦了『勞工先驅』，由白勞德任編輯，我們在許多城市建立了小組。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工會教育聯盟在芝加哥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到會的共有二十六個城市的四十五位代表，其中有加拿大代表四人。工會教育聯盟小組的組織是鬆懈的，這些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數目，無從作任何精確的統計。

工會教育聯盟的綱領

工會教育聯盟的綱領主要表现在若干文件中，其中包括（一）首次原則聲明（見一九二二年三月份的『勞工先驅』）；（二）『美國工人運動的破產』（這是我所寫的小冊子），（三）工會教育聯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決議案。這裏祇能着重指出這個綱領的中心點。首次聲明這樣說明了工會教育聯盟的總目標：

「工會教育聯盟建議將工會由目前這種過了時的和死氣沉沉的狀態發展成爲能够勝利地進行反資本

鬥爭的強大的現代工人組織。爲此目的，本聯盟致力於澈底整頓和改造工會的理論、策略、機構和領導。本聯盟不主張目前流行的關於勞資利益協調那種可耻的沮喪志氣的謬論，而是宣傳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工人共和國這種振奮鬥志的目標，從而激發工人的想像，啓發他們的理想。」

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案，概述工會教育聯盟的綱領如下：（一）斷然反對雙重工會運動。（二）擴充美國勞工聯合會底階級合作政策，採取階級鬥爭的原則。（三）贊成將現存的工會合併起來成爲產業工會。（四）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五）主張失業保險。（六）成立勞工黨。（七）實行工會車間代表制。（八）美國工人運動加入赤色工會國際。（九）衷心擁護俄國革命。（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共和國。

爲達成這些目的，工會教育聯盟建議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綫：

「工會教育聯盟的實際工作理論，就是建立工會中一切革命與進步分子的左翼進步集團，以抵制反對官僚集團的獨裁機構。（見『美國工人運動的破產』一書）」

工會教育聯盟的綱領特別強調用工會合併的辦法來發展產業工會運動。在我的『美國工人運動的破產』這本小冊子中，論述了產業工會運動乃是工會成長和發展底正常的頂點的理論，其中有如下說明：

「當工人們感到需要更加統一的行動時，他們就建立工會並擴大舊有的工會，然後和兄弟組織取得較來密密切的聯系，……各個產業和各個國家的工會都遲早會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說這些工會將建

業在產業的而不是行業的基礎上。要達到這一發展階段，通常要經過或長或短的三個不同階段的發展過程。我把這三個階段稱爲：（一）孤立階段，（二）聯合會階段，（三）合併階段。

在組織方面，工會教育聯盟遵循着與以前的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和國際工會教育同盟採取相同的方針。工會教育聯盟的盟員只包括工會的會員。沒有會費，經費的籌募依靠發行報章、印刷品和在集會上進行募捐等等，還有每年繳一塊錢的志願維持費基金。地方產業的、一般的小組是和地方工會，工會的區委員會以及中心勞工委員會相並行的。各地方產業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結成十四個全國產業部，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名稱、書記、報紙、基金、綱領等等（註一）。表面上它們都是獨立的團體，只有一個，即成衣業工會才被正式稱爲工會教育聯盟的一個支部。一共有四個區域性的支部，即加拿大，東部各州，中部各州和太平洋海岸。工會教育聯盟全國委員會正式由各個全國產業部的書記組成，然而臨時的則是由全國代表會議選舉出來的一個小型委員會，一俟各產業部組成，它們的書記就參加到這小型委員會裏面去。工會教育聯盟不屬於任何革命政黨，但終於根據與其他工人組織相同的原則，參加了聯合農工黨。工會教育聯盟是赤色工會國際正式的美國分會。

（註一） 後來又有兩個組織參加，一個是由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工會教育聯盟少數派所組成的「參加赤色國際委員會」，另一個是「赤色國際委員會」，總部設在紐約，這個委員會把赤色工會國際的獨立工會和工會教育聯盟在雙方平等代表權的基礎上聯結在一起。

鬥爭的前景

工會教育聯盟發現在戰鬥的革命的工人中，情況十分有利於它的工作。雙重工會運動這一傳統的難題，已被共產國際和赤色工會國際的明確的議決案所最後解決了。現在，我們這一批素來主張打入保守工會裏面去工作的人們，得到了各方面底同情。地下共產黨（當時正在從事統一的時期）極力贊同工會教育聯盟，並把建立這個組織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共產黨的合法組織工人黨也是那樣，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左派也贊成工會教育聯盟，而且加入了這一聯盟。一九一九—二一年，共產黨人分裂出來之後，社會黨內部已很少左派分子，但是德布斯還是給『勞工先驅』寫了文章，贊成工會教育聯盟的總路線，無產者黨（Proletarian Party）雖然多所猶豫，也總是對工會教育聯盟表示贊同。在紐約，赤色工會國際底小的獨立工會是支持工會教育聯盟的。共產黨分裂出去的一派，『勞動者聯合會』也贊成工會教育聯盟。唯有鬧宗派的社會勞工黨才繼續保持其傳統的雙重工會主張。

這樣一來，得到的支持似乎是不少了，但究其實，由於長期的雙重工會活動，這些革命分子很少是工會的會員，在工會裏的影響就小得多了。除了這些左派團體之外，工會教育聯盟又發展了與農民勞工黨的合作關係。這個團體的領導人是費茲巴特立克。這是我們在一九一七—二〇年，屠宰業和鋼鐵業的運動中共同行動的結果。農民勞工黨的全國書記，以前鋼鐵工人的組織者

布期成了工會教育聯盟的盟員。農民勞工黨的全國委員會和費茲巴特立克對於我們的運動都採取友好態度。

除了這種切實的支持之外，當時大規模的接連不斷的罷工，也是工會教育聯盟進行鬥爭的良好基礎。那是一九一九—二一年僱主在戰後發動實行自由僱用制的巨大攻勢的末期，僱主企圖藉此粉碎工會，取消工人在歐戰期間取得的八小時工作制，比較高的工資，比較好的工作條件。僱主這種總攻勢的一部分就是一九一九—二〇年橫暴的司法部長巴爾墨向新生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他逮捕了共產黨人數千人，把兩個共產黨打入地下，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底。（註：共產黨會先後採用這些名稱：工人黨，工人（共產主義）黨和共產黨）。

這一時期的工業危機及政府極力使用法庭、警察、軍隊等等來對付工人，助長了僱主的攻勢。但是，工人們英勇地予以還擊。他們進行了美國工人史上最偉大、連續不斷的罷工。罷工總人數在八百萬以上（註一），幾乎每一重要產業——鋼鐵、屠宰、煤、海運、採礦、紡織、成衣、建築、

（註一）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數字，罷工人數為：

一九一九——四、一六〇、三四八

一九二〇——一、四六三、〇五四

一九二一——一、〇九九、二四七

一九二二——一、六二二、五五二

木材、鐵路、汽車、印刷等等——都已捲入其中，幾乎每一個工會都不得不為生存而鬥爭。工人們的鬥爭是勇敢的，祇是由於領導者無恥的破壞和出賣，幾乎所有這些罷工都失敗了。這些領導者仍抱着戰時的『階級和平』的夢想。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工會之間的行業區別，工會領導人總是在同一產業中這一工會罷工時，讓別的工會繼續工作，因而使得所有的工會同歸失敗。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獨立工會的會員減少了一百萬人，在若干產業，工會竟被消滅。這是美國工人運動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工會教育聯盟進入戰鬥

一九二二年初，工會教育聯盟沒有來得及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便投身於激烈的階級鬥爭中了。雖然祇是一個新成立的不為人所知的團體，但還是博得了戰鬥中的工人們的注意，並在自由僱用制巨大攻勢的末期，在若干偉大罷工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這些鬥爭中，共產黨給了工會教育聯盟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工會教育聯盟的第一個成功是一九二二年的煤礦大罷工。礦工們當時正在拚死作全國性的鬥爭以反對鎮壓工會，而就在這個時候，美國礦工聯合會伊利諾斯州的主席佛蘭克·法靈頓（後來事實證明他是畢巴第煤礦公司收買的走狗），却突如其來地企圖簽訂單獨的一州的合同以破壞罷工。工會教育聯盟這時已在伊利諾斯州南部爭取到了一九一九年七萬礦工『非法』大罷工的領袖

斯林格、柯比什萊、湯普遜等人的支持，和他們共同動員礦工舉行了巨大的羣衆大會，打敗了法靈頓的出賣行爲。這件事無疑地挽救了全國總罷工，甚至還挽救了美國勞工聯合會本身。

一九二二年春，芝加哥的建築工人爲了反對實行自由僱用制的蘭蒂斯合同而進行激烈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工會教育聯盟也起了偉大作用。在工人與僱主、政府和背叛工人的工會領袖進行鬥爭當中，工會教育聯盟的戰士克南賓、約翰斯東、克查爾等人在堅定工人鬥志上是强有力的力量。工會教育聯盟小組的迅速形成，在加強這一時期紐約若干次縫紉業大罷工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自由僱用制大攻勢，於一九二二年四十萬鐵路修車廠工人的全國總罷工當中達到最高峯。這次罷工，工會教育聯盟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派出了幾個演講員，我是其中之一，到罷工工人中進行工作（註一）。在奧馬哈中心勞工委員會上工會教育聯盟的鬥士們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號召一切工人舉行全國總罷工，以擊潰專門對付鐵路工人罷工的陶福蒂聯邦禁令，其他二百個勞工中心組織對這一決議，紛紛響應，以致龔柏斯也說他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一個總罷工的要求。在這次罷工中，工會教育聯盟運動終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在芝加哥召開了有四百名代表參加的規模很大的『全國合併會議』。對鐵路工人的工作，很多都是經過明尼蘇達州車間工匠立法委員會去進行的。委員會的領導人是萬格林。這個委員會後來成了工會教育聯盟的全國鐵路工會部。

工會教育聯盟又曾幫助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綫運動，去保衛一九二二年八月密執安州勃里治曼

地方舉行共產黨秘密會議時被捕的共產黨員。聯邦政府爲了要麻痺共產黨的增長不已的影響，會突然襲擊這次會議，逮捕與會代表三十二人，其後又另外檢舉了四十人。兩天之後，又襲擊在芝加哥舉行的工會教育聯盟第一次代表會議，逮捕代表十一人。在共產黨會議上和工會教育聯盟會議上被捕的工會教育聯盟的領袖有白勞德、鄧恩、約翰斯東、克蘭賓、艾隆堡和我自己。工會方面廣泛聲援這些被告。我第一個受審，陪審團是一個互相傾軋意見不一的陪審團。其次受審的是共產黨書記魯騰堡，他橫遭誣陷並被判罪，罪名爲瀾犯該州的「犯罪的工團主義者法」。但在上訴未決期間，他遽爾逝世。這項案件遷延了十一年之久，直到一九三三年纔最後撤消。

在上面說到的這個時期，工會教育聯盟爲了使工會加入赤色工會國際而進行了積極的活動。聯合成衣工會決議加入爲兄弟會員，丁布克所領導的加拿大工會教育聯盟則爭取到美國礦工聯合會所屬加拿大諾瓦科西亞省的礦工們直接加入了赤色工會國際，這是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團體絕

(註一) 在這次演說旅行中，我被惡名昭彰的罕姆洛克所指揮的科羅拉多州底騎警從丹佛爾城的牛

津旅社綁架而去。在勃萊頓獄中嚴密禁閉一夜之後被押到懷俄明州的徹燕地方，交給當地治安官。這個治安官又在二個助手協助下用汽車把我送出懷俄明州，丟下在距內布拉斯加州托靈頓城十英里的公路上。

在當年秋季選舉時，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斯威特把這件綁架案作爲中心論題，因而當選。在他任期內，州騎警隊由于州議會沒有批准經費而解散。

無僅有的事情。工會教育聯盟此外還進行了援救蒙尼與比林、薩柯與范塞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被捕下獄的會員和階級戰爭中其他受難者的大規模的運動。

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承認蘇聯的運動

在這暴風雨的日子裏，工會教育聯盟曾在多次鬥爭中發揮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它的最迅速而最偉大的成功却是在爭取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和爭取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三大運動中取得的。它以全部力量在這三個問題上展開了全國規模的攻勢。整個工人運動都爲這一運動所震撼。工會的廣大羣衆團結在工會教育聯盟的口號週圍。工會會員有半數以上都公開擁護這三個中心要求的全部或一項。短短幾個月之內，工會教育聯盟便使得這三個問題成爲擺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工人兄弟會面前的主要問題。

工會教育聯盟這些口號得到了廣泛的響應，證明羣衆中存在着激進化的浪潮。工人們認識到工會合併成爲產業工會的運動，是走向真正團結與真正有力量的道路，是把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消滅同一產業中這批工人罷工那批工人作工的慘痛現象的道路。這一慘痛現象的破壞作用極大，這已爲不久以前的鐵路、建築、印刷大罷工和其他罷工所證明，而且這種現象正是屠宰業工人和鋼鐵業工人罷工的顯著弱點。工人們認爲勞工黨是一個有效的回答，一方面可以回答達反諾言的行爲和政府鎮壓罷工的軍隊、法庭和警察；另一方面，可以回答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底

有致命害處的政治上無黨無派的政策。工人們廣泛要求承認蘇維埃俄羅斯，這表明他們對於新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具有天生的無產階級的休戚與共的心理。工人們把整個工會教育聯盟看作是開闢一個更真誠、更有力、更有效的工人運動的道路。

支持工會教育聯盟運動的有組織的力量，其形式是左派和進步分子底廣泛的統一戰線。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是起推動作用的左派力量，而進步分子，主要是費茲巴特立克—諾克爾斯的農民勞工黨集團，則以同情的態度進行合作。推動與堅持屠宰業和鋼鐵業的罷工運動的，實質上就是這一種結合底保持與發展。芝加哥是運動的中心，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芝加哥勞工聯合會通過了工會教育聯盟所提出的一項議案，這推動了全國的工會合併運動。這一決議案在引述了各行業不團結的慘痛之後，作出如下的結論：

「我們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例會決議：要求美國勞工聯合會採取必要步驟，以實現有組織工人所必需的團結；第一個步驟就是召集各個國際工會舉行會議，以便佈置將各個產業的一切工會合併爲單一的組織，每一個組織都將整個產業包括在內。」

由副主席納遜遜領頭的反動分子，曾反對這一議案，但爲一一四對三七票所擊敗。接着工會教育聯盟發動了全國性的大運動，口號是『不聯合就只有滅亡』。在其後的十八個月中間，芝加哥決議案得到了廣泛的擁護。這一團結運動，具體表現爲各種各樣的要求聯合的趨向。鐵路職員工會、鐵路養路工人工會、翻砂工會、屠宰工會、排字工會、麵包工人工會、鑄字工會、釀酒工

人工會、聯合成衣工會、皮毛人工會、混合食品人工會、裝訂工會、金屬打磨工會、消防工會、紡織工會、製鞋工會等十六個國際工會決定立即實行合併；女裝成衣人工會、鐵路車務工人工會、鐵路司爐工人工會和若干其他國際工會則決定成立聯合會或實行局部的合併。十七個州的勞工聯合會，其中包括這樣重要的團體如賓夕凡尼亞、俄亥俄、印第安那、密執安、威斯康辛、明尼蘇達、俄勒岡、內布拉斯加、華盛頓、南達科他、猶他、科羅拉多等州的勞工聯合會，也都通過實行合併的決議案。除此之外，還有幾十個中心勞工委員會和幾千個地方工會採取諸如此類的行動。我們當時宣告有二百萬人，即有組織工人的半數響應工會教育聯盟號召工會合併的口號，這一估計是完全合乎事實的。

加拿大方面，據丁布克報告：「加拿大各地幾乎每一種工會都通過了贊成工會合併的決議案，阿爾塔塔勞工聯合會和七個最大的勞工聯合會也通過了這種決議，換句話說，總計佔加拿大工會大會所屬會員百分之五十以上。

成立勞工黨的運動也很有成效。一九一八—二〇年間，成立勞工黨的運動已在許多地方自發地發展起來，尤其是在明尼蘇達、紐約和芝加哥，但是一九二〇年選舉的失利，使得新成立的農民勞工黨癱瘓不靈。勞工黨在費茲巴特立克與諾克斯所領導的芝加哥勞工聯合會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苟延殘喘。當時工人黨（共產黨的合法形式）和工會教育聯盟與費茲巴特立克取得了協議，開始着手推動成立勞工黨的問題。結果是掀起了比工會合併運動更要壯闊得多的高潮。許多

國際工會、州的勞工聯合會、中心勞工委員會和地方工會都贊成勞工黨。在這一運動中，工會教育聯盟將勞工黨問題提請三萬五千個地方工會進行全國性的表決，會收到七千多個地方工會的贊成票。贊成成立勞工黨的地方工會無疑地比這數目要多得多，不過是沒有通知我們罷了。勞工黨運動發展的最高潮就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的芝加哥代表大會。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談。

爭取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鬥爭，也是規模壯闊的。這個時候，正值蘇俄伏爾加區域一九二一年饑荒。因此，蘇俄之友會和工會救濟俄國饑荒全國委員會便把承認的問題和募集救濟金的事情結合起來。蘇俄之友會是維根尼特所領導的，而工會救濟俄國饑荒全國委員會的領導者則是曼雷、瓊斯頓、希利等分子也參加，承認蘇聯的主張得到了許多國際工會的支持，如教師、礦工、火車司爐工人、火車司機、機械工人、印刷工人工會等等，而且還得到許許多多州的勞工聯合會、中心組織和地方工會的擁護。

翼柏斯的官僚集團退居守勢

自然不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方面作正面的衝突，工會教育聯盟就不會在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和承認蘇聯的問題上獲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些反動分子們憎恨而又害怕這三個問題。他們懂得這一運動很快就會由宣傳鼓動發展為決定性的行動，除非迅速把它撲滅。在他們看來，工會合併運動就是終歸喪失掉成千上萬的肥缺，就是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宣告終結；在他們看來，成

立勞工黨就是斬斷他們與兩個資產階級政黨間的腐敗聯盟；承認蘇維埃俄羅斯就是他們底勁敵共產黨人沉重地給了他們一拳。他們清楚地了解，我們運動的勝利將是他們反動統治從此告終和工會新的進步時期從此開始的標誌。他們以前是嚐試過工會教育聯盟綱領和它底力量的真滋味的，那是在鐵路養路工人工會底特律城大會上的事情，當時出席大會的一千五百名代表通過了工會教育聯盟的整個當前綱領，接着把工會的二十一個高級人員撤換了十九個，他們的主席格勒勃也在被撤換之列，因為在一九二二年鐵路罷工中，不願工會決議參加罷工，而強使他的工會復工，從而出賣了那次罷工的就是他。

自那時以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們就猛烈地反對我們。他們在工會裏面，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到處叫嚷，說工會教育聯盟是變重工會，說赤色分子力圖摧毀美國勞工聯合會，說我們從莫斯科得到大筆款項來資助我們的工作。美國政府也協同製造後一種捏造的罪名（註一）。但是，這些荒唐的誹謗，大都為工人所不齒。工會教育聯盟的進展繼續不衰。工會一個接着一個地

（註一）貝克納（Carl R. Becker）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的政治經濟雜誌上著文評論工會教育聯盟，

曾引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文件說：「美國國務院已獲得該院視為可靠的情報，福斯特自莫斯科帶回四萬美元，而一九二三年四月，工會教育聯盟另外又收到九萬美元。」他並且說赤色工會國際的領導人洛佐夫斯基（他一生從未到過美國）又帶給我們三萬五千元交給共產黨的勃里格曼會議。所有這一切都祇是連篇的謊言而已。

宣告贊成它的三大口號。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已經因為他們在戰後僱主發動的鉅大攻勢中實行破壞罷工的詭謀而喪失聲譽，工人們正在把局勢掌握在自己手裏。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領們被迫退處守勢，並開始表現出衆叛親離的跡象。例如，一九二二年十分重要的俄亥俄州勞工聯合會大會上，曼雷是毫無準備地去參加會議的，但是，儘管該聯合會的上層人員多方阻撓，却仍是幾乎全體一致地贊成我們主張工會合併的提案，這一事實說明他們的地位已經削弱了。在芝加哥，我們在工會合併問題上贏得了第一次勝利之後，反動分子會在報紙上大事宣傳，說他們將全體出動參加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下屆會議，並否決我們的提案。但是，結果適得其反，他們失敗得更慘，以一〇三對一四票被擊敗。

龔柏斯這老奸巨猾的人對於所有這些情形深爲苦惱，因爲他深知其中的重要意義。於是，在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第二次表決之後三天，他來到芝加哥。因爲沒有胆量參加視他爲敵的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會議，他便另在摩理遜旅社召集了一千五百名工會工作人員開會，這些人員都是他一手挑選的。他責成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把芝加哥勞工聯合會從赤色分子手上奪取過來。這就是號召他們使用暴力。可是，就連這樣一個仔細挑選的人員的會議，還是同情工會合併運動。當時我也在場，並出而維護我們的主張。龔柏斯在忿激之中竟向我挑戰，要我和他就整個問題進行公開的辯論。我立即接受這一挑戰，相約在會議上和『勞工先驅』上進行辯論。但是，他把他的挑戰重加仔細考慮之後，便把整個事情都若無其事地不管了。他責成反動分子以武力劫奪芝加哥勞工

聯合會的號召，也沒有了下文（我們當時已準備打退他們的攻擊），無疑地，他們感覺到他們自己力量太薄弱，是不能勝任這種却奪勾當的。

進步分子的投降

翼柏斯手下那批領導人底處境是危險的，如果繼續下去，必然會使得他們垮台。他們在戰後罷工鬥爭中破壞罷工的種種行動，使他們的信譽掃地。在這一時期，他們的隊伍由於大規模的進步政治行動會議運動的形成而陷於分裂；現在他們更面對着革命分子所領導的正在覺醒着的基層羣衆，而這些革命分子所運用的又是新的山內部進行工作的政策。翼柏斯的小集團在他們的歷史上第一次遭逢真正嚴重的威脅。進步政治行動會議派的右翼（由機械工人工會的主席威廉·瓊斯頓領導）的確已經在公開計劃趁此時機奪取翼柏斯的寶座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甚至在工會教育聯盟運動向前發展的時候，逆流也在發展着，這股逆流迅速地使保守的領導人物躲開一切危險，使他們比以往更牢固地控制着工會運動。全新的形勢正在發展中，這個形勢突然阻止了工會教育聯盟運動底暴風疾雨般的前進，而給廣大的工會運動帶來了新的招致深重災難的政策。

造成這一巨變的基本事物就是：大致在一九二三年元旦，開始了長久的所謂柯立芝繁榮時期。這很快就使整個形勢爲之一變。在經濟蕭條漸趨和緩的時候，僱主們放棄了他們的打垮工

會，減低工資的策略，而改爲加重工人的工作從而加緊了對工人的剝削。在後來的幾年中，他們發動了大規模的趕快制度和工業合理化的運動，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產量，爲廠主贏得巨額的利潤。這一運動很快的普及於整個工業界，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後果。這一大運動的情形，下一章再詳爲論述，在這裏我僅簡單地提一下：工會的領袖們當時立即把與資方合作，減低生產成本，增加對工人的剝削作爲他們的政策的基礎。他們本着這一政策，極力在羣衆中間製造繁榮的幻想，極力摧殘我們那被他們視爲危險的、爲階級鬥爭綱領而奮鬥的羣衆運動。

進步陣線的變化，助長了反動工會領袖的這一反動的路線。這些動搖分子把鬥爭的外表，拋棄淨盡，完全投合僱主加強階級合作和趕快工作的新政策，確實是成了他們底最熱誠的擁護者。首先豎降旗的進步分子是右翼份子。這些人，團聚在鐵路工會週圍，組織在進步政治行動會議之中，其領導人物爲瓊斯頓，史通和希爾曼之流。這個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包容了約三百萬個有組織的工人和農民。這些羣衆明白地要求成立一個勞工黨，但是他們的『進步』領袖却在鬥爭最尖銳的時期激進地清談了勞工黨一番之後，因爲感覺到時勢往階級合作方面作新的轉變，便把整個運動引導到絕路上去了。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在克里夫蘭舉行的會議上，他們擯棄了成立勞工黨的計劃，而贊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無黨無派政策，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完全和平相處，他們很快就共同造成了一九二四年拉福萊特的大失敗。右翼進步分子然後不響地拋棄了他們將鐵路收歸政府所有的普蘭勃計劃，取消了他們的工會團結協定，很快就成爲

正在發燃着的加強階級合作運動的領導人物，從而澈底地投降。

我們與費茲巴特立克派分裂

和工會教育聯盟及工人黨（共產黨）合作的進步分子左派，費茲巴特立克的農民勞工黨集團，在反對工人運動中的新保守傾向中，多堅持了幾個月，但也終於轉向右傾。費茲巴特立克會斥責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克里夫蘭決議案為出賣工人運動，並會正式同意與工人黨共同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在芝加哥舉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假如有五十萬以上工人的代表參加這次大會的話，便在這次大會上把新的勞工黨成立起來。工人黨在接到參加這一大會的正式請柬之後，立即表示接受，而社會黨却表示拒絕，因為它是遵從右翼進步分子的路線，投奔拉福萊特陣營，加強階級合作去了。這在一九二三年這一大會的前幾個月，工會教育聯盟和工人黨所進行的成立勞工黨的運動，成了最廣泛的羣衆性的運動。

這期間，龔柏斯手下的工會領導人，由於繁榮浪潮的上漲，階級合作政策的增長，工人鬥爭精神的下降，勞動者中間繁榮幻想的散佈，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崩潰等等原因，實力加強了，覺得他們可以對費茲巴特立克—諾克爾斯集團施用壓力了。因此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把給予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的每月津貼削減了一半，並威脅該勞工聯合會，要他們斷絕與共產黨員聯盟、停止鼓吹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和承認蘇聯的運動，否則將加以改組。這一恫嚇居然奏效，芝加哥

勞工聯合會底領袖們，顯然開始對將要召開的勞工黨大會漸漸不感興趣了。

七月三日，大會開幕。出席代表六百人，代表六十萬有組織的工人和農民，除此而外，還有幾個重要的工會（聯合成衣工會等）派代表列席。自始就很明顯，費茲巴特立克集團是打算和工人黨斷絕關係的，儘管大會召開之前不久，他們曾邀請工人黨參加。他們吞吞吐吐地用各種手段去實現這一目的，直到大會最後一天，他們終於提出一項議案，藉口工人黨主張推翻政府而要求開除工人黨，要求工人黨以外的全體代表參加費茲巴特立克所領導的舊的垂死的農民勞工黨。出席大會的代表（其中僅有很少數是共產黨人）羣情激昂，反對這一路線，並以五百票對四十票決定按原計劃成立聯合農民勞工黨。曼雷當選為書記。

費茲巴特立克和屈指可數的很少幾個代表於是中途退席。連一向擁護他的人，如霍瓦、鄧肯、麥克唐納、瓊斯等元老，在這次大會上幾乎全都贊成工人黨的路線。在他們看來，費茲巴特立克的行動是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僅在兩個月之前，費茲巴特立克還因為進步政治行動會議開除工人黨而痛加斥責，因為它不願成立勞工黨而斥之為工賊，然而在這次大會上，却突然轉向，實質上也是採取了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相同的那種方針。雖然祇有很少幾個代表支持費茲巴特立克，但是他的退席却演成了真正的分裂。資產階級的報章在全國各地以上千的大標題大叫其『分裂』，對這次事件也起了決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一分裂，加上美國勞工聯合會和有組織農民對拉福萊特當候選人的一般傾向，阻礙了新成

立的聯合農民勞工黨底成長，它勉強維持了十二個月便夭亡了。費茲巴特立克的農民勞工黨很快就歸於消滅，而它的領導人物漸漸地後退到美國勞工聯合會底政治上無黨無派的政策去了。

自那時以後，費茲巴特立克曾多次猛烈攻擊共產黨造成七月三日的分裂。這種攻擊是抹煞事實的。其實正是他自己應負造成分裂的主要責任。我們不過是堅持要實現我們在大會之前已與費茲巴特立克明確協議的、關於成立新聯合政黨的計劃罷了。直接造成了分裂的是他自己；他一心想與共產黨人破裂，好去投合當時工會運動中發展着的強烈的保守傾向。

要公平地責備我們的話，尤其量只能責備我們在策略上犯了錯誤。我會指出過，費茲巴特立克和他那一夥，當時因為感覺到繁榮上漲，階級合作增長，正在翼柏斯的火力下趕忙退向右傾。他們的這種傾向，後來表現得很明白，因為費茲巴特立克完全放棄了勞工黨的運動，而回到美國勞工聯合會底無黨無派政策去；他放棄了工會合併運動；他變成了蘇聯底死敵。他並且熱烈擁護後來美國勞工聯合會一切階級合作的方案。我們的失敗在於：我們原應更清楚認識這種趨向右傾的整個情況，不勉強要求費茲巴特立克遵守大會前夕所達成的協議，而在可能時作最大的讓步以避免那種公開的尖銳的分裂。

其後幾年的全部歷史說明：在進步分子普遍很右傾而且成了階級合作運動領導人的情況下，主張階級鬥爭政策的工人黨和工會教育聯盟要和他們進行共同鬥爭，都勢必有極大困難。不過，儘管如此，我們本來還是應該更技巧地反對分裂的。可惜當時的情形，分裂却是在最壞的方式

下，富於戲劇性的，而且是環繞着像勞工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發展的。後來的情況說明：芝加哥的分裂曾使得工人黨失去了農民勞工黨的全國各地許多重要的戰鬥分子的聯繫。這次分裂打破了統一戰線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在屠宰業和鋼鐵業工人罷工運動中，在工會合併運動中，在成立勞工黨和其他運動中，都曾作了有成效的工作，而且有着將來活動的遠大前途。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攻

共產黨人和左派進步分子的統一戰綫在芝加哥的分裂，在感到威脅的奧柏斯工會的領導人看來，有如天賜良機，他們認為這是對工會教育聯盟、共產黨和進步分子發動大規模總攻勢的信號。第一次嚴重的衝突發生在伊利諾斯州勞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上，這次大會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舉行於狄克特爾，當時我也是代表之一。據說這是美國所舉行的州勞工聯合會大會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美國勞工聯合會動員了全部力量，企圖打敗我們。奧柏斯會發出一封信責難我們，並指定烏爾領導這場鬥爭。戰鬥的中心是工會合併問題，鬥爭確實激烈。費茲巴特立克的農民勞工黨代表們，由於芝加哥那次分裂，對我們十分懷恨，他們公開投向烏爾，在他底譴責工會合併運動的聲明上簽了字，並幫同烏爾否決了他們自己的芝加哥勞工聯合會關於工會合併的提案，結果，工會合併案以四對一的票數被否決，而在三個月前，同一代表本來是可以絕大多數通過這一議案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底領袖們，能在州的勞工聯合會大會上打敗工會合併的主張，這還是第

一次，他們的無限高興是很自然的。

就在這一緊要關頭，就在真柏斯的那一套機構能夠向我們進行攻勢的時候，社會黨的縫紉工會領袖們却又把對付戰鬥工會運動的一套新花樣傳授給了右翼反動派。在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我們的力量是很堅強的，於是社會黨的工會領袖們便在芝加哥、紐約和其他地方發動了開除工會教育聯盟盟員的運動。他們並且壓制工會內的言論自由，利用流氓搗亂，藉以支持這一運動（註一）。社會黨元老們，席格曼本人，都是在美國首先敢於實行把政見不同的工人開除出工會和解除工作這種反動政策的人，他們真是可恥得很，（這種政策是他們從他們的鼻祖阿姆斯特丹職工國際抄襲來的）。他們荒謬地責難工會教育聯盟為雙重工會，企圖以此作為開除的藉口。

這種兇惡的進攻，原因在於社會黨和共產黨進行着世界規模的鬥爭，社會黨人和我們矛盾極

（註一）在芝加哥，曾在卡爾曼大廳舉行抗議大會，反對橫蠻無理的開除，我在這次會上發言時，有一個

劣跡昭彰的暴徒突然在避火梯上出現，朝着我的方向對會場開了三槍，幾乎釀成大亂。我們曾請德布斯抗議這一暴行，並反對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的整個開除政策。德布斯竟聲言他無能為力，拒絕與反動的社會黨元老進行鬥爭。後來他反而退出工會教育聯盟並公開抨擊它的政策，因此德布斯再次表現出他的最嚴重的政治弱點，即是說，在他的一生，他是一貫拒絕堅定地與左派共同進行反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鬥爭的。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二，一九一九—二二年社會黨黨內鬥爭中，他的立場都足為證明，一九二三年這次鬥爭又表明了這一點。

大，他們和龔柏斯的官僚集團沈澁一氣，遵從他們底整個階級合作政策。

龔柏斯很快就效法老社會黨工會領袖底辦法，普遍實行開除政策。他們決心肅清基層羣衆中間反對招致毀滅的階級合作政策的分子。美國勞工聯合會一九二三年波特蘭城大會上，他們把這種開除政策生動地表演了一番，他們鳴鐘、燃燭，像煞有介事地把工會教育聯盟全國委員會的委員，經常當選爲蒙塔納州銀弓城（Silver Bow）工會委員會代表的鄧恩開除出大會。工會教育聯盟竟被正式宣佈爲雙重工會；對工會中的共產黨人宣戰的號召也發表了。儘管有組織的工人大多數都會投票贊成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和承認蘇聯，而且大多數組織也會明白贊成這三個問題或其中之一，然而反動的工會領袖們却幾乎一致地全部否決了這些問題。例如，勞工黨的問題便以二五、〇六六對一、八九五票遭否決。這次大會是最爲反動的大會，但它所作的反動活動還不限於這一步，最後竟又通過了所謂勞工『建設性綱領』的階級合作新方案。這個方案在其後六年間，把工會摧殘殆盡，這一點待以後幾章再談。

像美國勞工聯合會波特蘭大會的行動那樣公然破壞工會民主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這次會議是極反動的龔柏斯生前最後參加的一次會議，反動工人領袖曾發出通告說，從此以後將進行肉搏戰以反對工會教育聯盟，反對共產黨人，不許工人運動表現出任何的戰鬥性；事實也確是這樣。波特蘭大會之後，依恃流氓式的把持與壓制工會的民主，開除與解僱成了工會當局對付富有戰鬥性的反對派的手段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要求克里夫蘭、明尼亞波利斯、底特律、西雅圖

等地的中心勞工聯合會不惜違反章程開除所有的共產黨人和工會教育聯盟盟員。後來，其他各國際工會大都採用了這種政策，社會黨所把持的縫紉業工會在這一反動運動上比起別的工會來真是有過之無不及。縫紉業工會大批開除會員，在某些場合達數萬人之多（註一）。

在這種開除運動的初期，工會教育聯盟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在芝加哥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出席代表一百四十三人，來自九十個城市，其中有三個代表來自加拿大，一個來自墨西哥。這次會議通過了促進三大運動的步驟，制訂了在最重要的產業中將工會局部或全部合併的計劃，並號召被開除的工人羣衆要求恢復工會會籍，以與逐漸增多的開除事件作鬥爭。但是，這次會議沒有有效辦法來鞏固渙散的羣衆運動，以對付龐柏斯工會官僚集團的正在發展着的攻勢。

在工會上層領袖猛烈攻擊的壓力下，而這些攻擊又是常常得到僱主與警察的協助的，同時，在日漸增大的『繁榮』與階級合作的影響之下，工會教育聯盟在工會中的力量很快就不得不實行

（註一）在實行開除政策的幾年當中，英勇的鬥士被開除了不少，我亦是其中之一。通常的開除，很少或沒有什麼手續。在我被開除那一次美國鐵路車務工人兄弟會的領袖們却是使用了『外交手腕』的。事情經過如下：我按通例把會費郵寄給我所屬的地方工會（當時我在紐約），後來接到通知說，奉全國辦事處指示，我應請求退會。我當予拒絕。接着毫不說明理由地把我寄去的會費退了回來。我再次寄回去，並要求發給會費收條，但沒有得到答覆。直到三個月之後，我才接到通知說我已因不繳會費而被開除了。這樣他們便把我十六年來的工會會籍一筆勾銷了。

退却。它的最優秀的戰鬥員，有好幾百人失去了工會中的重要職務，失去了在工業中的職業。反動與專制到處橫行，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和承認蘇聯的三大運動嚴重低落。這個時候，工人的鬥志大大消沉了，工會教育聯盟的活動普遍逐漸下降，遭到重大的損失；它的戰士們大都和有組織的工人失却聯繫。從此，工會教育聯盟進入了局部地或相對地脫離羣衆的時期，這種形勢存在的時間，或多或少和柯立芝『繁榮』時期相合。

第十三章 工會教育聯盟（續）

柯立芝繁榮時期

現在讓我們稍爲仔細檢討一下這一時期工會中廣泛的階級合作運動和反對工會教育聯盟的鬥爭，因爲工會教育聯盟和居於統治地位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底階級合作政策是相敵對的。

柯立芝的『好時光』，包括胡佛時期的幾個月在內，由一九二三年年中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危機爆發，其間僅有短暫的間斷。對於工會教育聯盟來說，這是艱苦鬥爭和相對脫離羣衆的時期。這是美國勞工運動史上工人階級鬥爭意志最消沉、鬥爭次數最少的時期。工會領導人空前地最腐敗、最專橫的時期。工會教育聯盟自然是在與羣衆失去聯繫和羣衆運動遭受失敗上面，深深地感覺到繁榮幻想，開除異己，恐怖活動底影響。

工人鬥爭遭受這次大挫折，基本原因在於這個時期美國帝國主義大大向上發展了。美國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在國際影響上都有了巨大的進展，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種種因素結合起來，造成了美國的巨大工業發展，從而提高了它的政治力量。這些因素包括：戰時和戰後廿億美元貸款的資本輸出，這大大刺激了美國底生產和輸出；從遭受戰爭摧殘的歐洲列強手上奪

得了世界市場；大規模實行趕快制度或工業的『合理化』；大量的分期付款購買制度發展；汽車及各種奢侈品工業底擴充；美國南部工業化等等。這些因素匯合起來，形成了美國僱主牟取巨利的樂園。美國僱主們成了全世界資產階級妬羨的對象。

在這時期，政府是極爲反動的政府。從以下事例不難看出這個政府的總精神，這些事例就是：軍備和軍事宣傳大大增長，幾次武裝侵略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各國，利用道威斯和楊格計劃有系統地奴役德國，極端仇視蘇聯，處死薩柯和范塞蒂，繼續監禁蒙尼和比林，南部地區肆行私刑，提揆多姆地方的大舞弊案，斯科普斯的進化論審判等等。

工業合理化

這一瘋狂謀取利潤和反動的時期，在美國資本家的回憶中是一個黃金時代。在這時期，僱主們的中心目標無非是極緊張地趕快工人的工作，讓他們能吞食更多的利潤。他們大事改善工業技術；爲了勾引工人上他們的趕快制度的圈套起見，他們發明了一整套的巧妙的制度，如新式的獎金和計件工資計劃，苦心籌劃的『福利』制度，虛偽的養老金，僱工購股等等（註一）。

所有這些都是憑藉浩瀚的甘言蜜語的宣傳去完成的，他們利用資本主義的每一種宣傳工具去說服工人，要工人們相信工人的利益在於與僱主合作，增加生產，盡量減低成本。這種放毒的宣傳，裝扮成種種新奇之點。他們妄自斷言，『大批生產而提高工資』這一魔術似的公式，不僅

可以在眼前改善工人的生活標準，而且可以使工人脫離資本主義而得到最後解放。有整個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竟把趕快制度的宣傳發展成爲體系，我在當時稱之爲「資本家的效率社會主義」（註二）。例如，卡佛爾主張工人有了高的工資就可以逐漸收買和控制工業，季勒特滔滔不絕地聲言這是走向合作的社會，柴斯刻意繪畫合理化資本家企業所將實現的社會奇蹟，佛斯特爾和克清思則發表「增強購買人財力」的謬論，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切都可愛，享福的日子已經在望了。一句話，無產階級革命是用不着的了。美國資本主義已經治好了內部的矛盾。不會再有工業危機，也不會有大批的失業了。福特代替了馬克思。全世界的資本家都對這種奇蹟驚嘆不置，頌揚美國的「新」資本主義，打算在自己國內也來仿效實行。

然而，這些年來工業合理化所創造的大量新財富，其實却是落在資本家的不知鑿足的腰包裏了。工人所得到的，微乎其微。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九年的工業產量，平均每個工人增加了不下百分之廿九（註三），利潤也增了一倍或二倍，但據可靠的材料，平均實際工資增加不到百分之

（註一）在組成公司工會配合於這一總計劃的時期內，它們也多少處於停滯狀態中的。這些工會是在歐戰時組織起來阻止工會運動的擴張的，在一九一九—二二年大失敗之後，工會運動的力量下降，這些公司工會也就停滯發展，到一九三三年工會運動的新高潮時期，這種公司工會才又重新活動起來。

（註二）見一九二八年三月「共產黨人」。

（註三）全國經濟調查局。

四·五（註四）。而且工資的這種增加大都增加給有組織的技術工人，尤其是靠加班，經常有工作等原因增加的。這些工人的生活標準是有相當的提高。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所稱爲工人貴族『資產階級化』的現象是普遍的。至於非技術工人羣衆，雖然物質上不見得比過去好些，由於當時流行的強烈的合理化宣傳的毒害，思想上也是相當資產階級化。這個時期，是勞動羣衆中間資本主義繁榮的幻想最爲廣泛的時期。

工會官僚集團的新方向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集團立即自行參加資產階級的整頓趕快和工作合理化計劃，事實上，他們把工會變爲資本家生產計劃的工具。他們宣傳爲減低成本而努力生產，他們犧牲了艱苦贏得的工會權利，他們推銷合理化的吹噓者所製造的種種幻想，而且，自己也在製造幻想。在他們看來減低生產成本成了爲工人階級謀福利的符籙和唯一的道路。

工會教育聯盟把這整個發展稱爲『工會官僚集團加強階級合作的新方向』和『工會的化爲資本家的御用工會』。這是把美國勞工聯合會底傳統的階級合作政策加以發展、理論化、加以改造以適應僱主們底最新的需要。工會被按照福特主義的原則而加以改組。我在前一章曾經指出，這

（註四）見道格拉斯著：『美國的實際工資』。

一運動是在柯立芝繁榮時期開始的時候便已產生的，首先在鐵路方面以所謂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形式出現。這一計劃是與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分別求得解決而最後打破一九二二年鐵路修車廠工人罷工的一種手段，這一計劃的正式名稱爲「工會與經理部合作」計劃，機械工人工会主席，瓊斯頓曾說過以下這樣一段話：

「我們爲巴爾的摩和俄亥俄公司服務的觀念，可以和一些大供應公司在工程上爲鐵路公司服務的觀念相比，這些供應公司是與這些鐵路公司訂立合同，例如說，負責供給超高熱爐、火爐或潤滑油的。」

(註1)

巴爾的摩計劃大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所稱賞，他們傾全力加以擁護。一九二三年的反動的波特蘭大會批准這一計劃，並把這一計劃的原則確定爲美國勞工聯合會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心政策。他們立即開始編造一套關於這一新制度將帶來種種幸福的稀奇古怪的預測。史通、烏爾、佛萊、格林等人的這種理論，不久就產生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底臭名昭彰的「新工資政策」和「勞工高級戰略」。

這些堂皇的名詞，無非是把工會整個出賣給資本家的貪婪的剝削，爲工會官僚換得向工人征收會費的權利這一黑暗勾當的騙人名稱而已。工人們只要把工做得快而又快，那麼由於某種法

(註二)「工人(共產)黨與美國工會」第十一頁施奈德所引用。

術，他們就會無須乎鬥爭，自然而然地得到更高的工資和安定的工作，而這種法術究竟是怎麼回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却從未加以說明。工業危機和失業將成爲過去的事情了。罷工已不再需要了，罷工充其量只是工人運動黑暗時代的殘餘。工會已不再需要執行其作爲戰鬥組織的基本任務了。工會已被改變爲廠主的生產工具。過了時的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現在工人階級繁榮的關鍵就是與僱主進行工業合作。這其實是胡佛的『家家戶戶鍋裏都有兩隻雞』的理論穿上了工人的外衣罷了。隨着柯立芝時期的進展，階級合作運動也逐漸擴大和加深（註二）。

在這種反動的加快工作計劃的基礎上，許多工會僱用講求效率的工程師，他們的領袖們則向工業的老闆們請准他們幫助老闆更殘酷地剝削工人，藉此換得老闆們對工會的承認。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新主席格林，竟真的這樣向老闆們呼籲道：有了『新的工資政策』的工會比『過了時』的公會更爲有利。其實，工會的奴隸性比之公司工會有過之無不及。有許多僱主，尤其是鐵路方面的，傾聽了這種卑屈的請求便和他們訂立了『合作合同』，但是，托辣斯化的工業大都滿足於自己的效率工程師和無組織工人的制度，而不聽這一套。不過，美國勞工聯合會階級合作運動的影響却不僅限於有組織的工人，而且也毒害了無組織的工人。塔格威爾在其『工業成長』一書

（註二）工會教育聯盟這一時期的種種出版物中，我所寫作的有『勞工騙子』一書及小冊子『打破勞工銀行』、『罷工戰略』、『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華生——派克法』，以及作爲小冊子發表的工會教育聯盟總綱的若干文件。這些出版物對於盛行一時的趕快制度和階級合作運動有詳細的敘述。

中，把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政策列爲柯立芝時期工業效率大爲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階級合作的新工資政策所賴以成功的基本必要條件，就是無情鎮壓工會內部一切具有戰鬥性的反對派。凡是不願接受趕快制度的工人，都被逼非接受不可。美國勞工聯合會一九二三年波特蘭大會既批准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同時又向共產黨、工會教育聯盟和它們的階級鬥爭政策發動巨大攻勢和發動開除他們的運動，並不是偶然的，從此之後，在整個柯立芝時期，開除異己，流氓壓制，操縱選舉，把持會議等等成了整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常規。工會民主降低到工人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工會領袖越來越緊密地與美國退伍軍人團、商會、共和黨、民主黨及其他資本家的團體結成聯盟。

進步分子和社會黨人擁護階級合作

進步分子立即投入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和僱主們底漸的階級合作運動的行列中。事實上，他們成了這一運動的最巧妙和最熱心的領導人，他們成了真柏斯——格林官僚集團在這一方面的指導人。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創議人正是進步分子瓊斯頓和貝耶爾。瓊斯頓、史通和希爾曼都是從事於腐敗的和渙散人心的勞工銀行運動的出色人物。我把這一運動稱爲『工會資本主義』這一運動是與整個階級合作運動密切結合的。史通和希爾曼都是『勞工高級戰略』的主要理論家，希爾曼曾在聯合成衣工人工會的費城大會上這樣說明他的理論：

「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但幸而其中有許多是無須使用罷工的武器去解決的。在我們的工業中，我們已經從野蠻時代進入與僱主文明交往的時代。」

社會黨人同樣熱心擁護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擁護勞工銀行運動和階級合作運動。有許多社會黨人把這些稱頌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阿貝·卡翰狂妄地斥馬克思主義為已經過時；社會黨竟把入黨申請書上所有提到階級鬥爭的地方都一律刪去。他們加倍努力攻擊蘇聯。在國際上，社會黨人同樣熱中於階級合作的發展。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事實上是整個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職工國際，都在歡呼讚頌資本家的合理化運動和「新資本主義」。他們編造了許多詭譎的理論，說它可以發展成『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超帝國主義』，然後直接進化為社會主義。福特成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救主。

美國社會黨人所領導的工會，大都是縫紉業工會，實際上與普通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成了一丘之貉，無所差別。他們以種種新的方式加緊實行階級合作，他們大都成了流氓，實際上不知民主為何物，他們推行開除左派分子的運動，比其他美國任何工會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領導人物甚至於放棄了傳統的社會黨反對派的最後一點痕跡而變成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動統治集團的組成部分。關於這方面，且讓與他們友好的見證人來證明一下吧：

「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黨所主張的從內部進行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完全顛倒過來了。……相反地，他們意圖取得把持工會的工人領袖們底信任和善意。社會黨人與工會行政當局間的新的政治結合，就是他

們在工人運動中不成其爲反對派領袖的標誌。」（註一）

「社會黨人放棄了戰鬥的、從內部進行工作的政策，而去設法求得美國勞工聯合會行政方面的信任。」（註二）

頹廢與腐朽

「新」資本主義當然僅只是「老」資本主義穿上了新的僞裝，大事吹噓的工業合理化運動醫治不了，也並沒有醫治了資本主義制度巨大的內在矛盾，勞動者底迅速增長着的生產力與他們底遲滯不前的購買力之間的矛盾，是工業危機一再出現的基本原因。相反地，合理化祇是加深了這一致命的矛盾。在這一時期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大大促使整個制度更快走向一九二九年毀滅性的國際危機。只要稍爲瀏覽一下馬克思的著作，就揭示了這一不可避免的結果。整個合理化運動就是資本主義「自殺經濟」底典型例子。

曾大事宣傳的工人天堂從未實現。我們已經說到過，在柯立芝時期，工人作爲一個階級來，從他們所生產的大大增加了的財富中得到的東西很少，而他們底效率本身也驅使他們在後來

（註一）見沙波斯：「左翼工會運動」第三十七—三十九頁。

（註二）見施奈德：「工人（共產）黨與美國工會」第廿一頁。

落入失業與大批人挨餓的地獄。在柯立芝時期，工人所真正得到的東西，就是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頹廢渙散。爲上層技術工人的資產階級化所迷惑，他們的戰鬥精神大爲沮喪。在工人運動史上，罷工從未如此之少，工會的意志從未如此之消沉。

工會在繁榮時期沒有得到發展，這還是自有工會以來的破天荒第一次。相反地，工會的會員其實是越來越少了（註一）。由於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良好，本應該不難把大批的工人組織起來。但是，由於合理化運動以及相隨而來的趕快制度、沒有罷工、工會權利的取消、對民主的壓制，流氓把持，開除英勇戰鬥工人和資本主義『繁榮』的宣傳等，所有這些把工會的生命力摧殘淨盡了。

滲透了階級合作精神的社會黨，影響日衰，黨員日減，到一九二七年，黨員僅得七、四二五人。農民勞工黨運動實際上也是煙消雲散，僅明尼蘇達州爲例外，因爲在那裏黨已經建立起來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和聯合食品工人工會之類的獨立工會，莫不充滿了柯立芝繁榮的幻想而失却以前的戰鬥性，會員人數和影響都已大大減少了。

（註一）按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報告，從一九二三到二九年，會員人數幾乎停滯不變。但這個統計是虛而不實的，因爲在這期間，許多工會會員大減，尤其是聯合礦工工會，不過，這些工會依然按照原來人數報繳會費，以此保持它們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上的表決權。

在美國工人階級歷史上，柯立芝時期是最混亂最頹廢的時期。階級合作的毒素完全腐蝕了工人階級的心臟。工人階級麻痺癱瘓的這一景象，在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們看來，自然是而且事實上也是的確滿意。就美國而論，他們無須担心工業危機和罷工，更不用担心革命了。他們酣醉於權力與繁榮。他們的大敵，無產階級，似乎已經絕望地陷於無知無覺的地步，被它的官方領導人物把手和脚都綑綁起來了。但是，他們其實是生活在愚人自欺的天堂裏的，以後幾年的事實便說明了這一點。

工會教育聯盟的鬥爭

在國際上，共產國際對這種新形式的社會改良主義，對終於使德國社會黨領袖投降法西斯主義的招致災難的政策，進行了堅決的爭鬥。而在美國，識破資產階級合理化運動的幻想與虛偽性而且與之進行鬥爭的唯一的工人組織，就是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它們指出企圖用這種方法去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徒勞無功的，它們預先警告不可避免地會有工業崩潰；它們堅決反對階級合作運動的任何方面，反對階級合作運動的一切主張者，由卡佛爾和格林以至湯瑪斯和穆斯特；它們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實行階級鬥爭的政策。在柯立芝時期，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在共產國際和赤色工會國際的領導下，真正表現出它們底革命的本質。

但是，工會教育聯盟不能完全避免工人階級所受到的悲觀與消沉的浪潮的影響。技術工人的

資產階級化，階級合作宣傳的毒害，進步分子的右傾和我們與他們分裂，橫蠻的開除政策，流氓的把持工會，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確定地削弱了工會教育聯盟在支持其三大問題——工會合併，成立勞工黨、承認蘇聯——上的攻勢，使它無從由宣傳階段進入具體行動和收穫果實的階段。工會教育聯盟的工作，和它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的大規模的廣泛的運動比較起來，不能不是比較具有地方性和局部性了。

工會教育聯盟在這一時期會因為過分與共產黨密切一致而使得相對脫離羣衆的現象更加嚴重。工會教育聯盟實際上採用了黨的整個綱領，在許多場合，聯盟的小組全部都是共產黨員。它的機關刊『勞工先驅』也併入『工人月刊』，成爲工會教育聯盟與共產黨共同的刊物。由於工人情緒消極，由於工會中一般的形勢，這一宗派性的政策更使工會教育聯盟由包羅各種政治主張的工人的、廣大羣衆的反對派運動縮小爲僅僅是革命的宣傳組織。

儘管如此，工會教育聯盟在柯立芝時期還是進行了一些廣泛統一戰綫的鬥爭。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次就是羅生與克查爾所領導進行的木匠工會的鬥爭。這一工會的領導集團是腐敗而專橫的，所執行的政策是通常那種加強階級合作的政策，爲了支持這一政策起見，他們在芝加哥、紐約、洛杉磯等地開除了許多有戰鬥性的會員，在有些場合，還是憑藉警察的協助而開除了的。一九二五年工會選舉時，工會教育聯盟的鬥爭達到了高潮，即使是根據工會當局偽造的選舉統計，當時公開的共產黨人羅生得票九、〇一四張，而其對手霍奇遜（Hutchison）的票數亦僅得七七、九

比這更有成效的是工會教育聯盟在機械工會內的鬥爭，這是由奧佛加德所領導的。這個工會的首領瓊斯頓是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首創者。這一組織有的是階級合作的新方式。基層會員對於工會情況的惡劣，極爲不滿。瓊斯頓便打算開除奧佛加德，開除在托倫多、芝加哥等地的其他許多英勇戰鬥的會員，藉此把不滿情緒鎮壓下去。由於工會教育聯盟進行鬥爭反對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反對開除等等，在國際機械工人聯合會一九二四年底特律城大會上，左派得四十四票，工會當局方面得一〇七票。一九二五年工會選舉時，工會教育聯盟與進步的安德生集團結成一戰綫，共同反對工會領導方面的開除政策和階級合作政策。根據正式的選舉結果，很明顯是統一戰綫的候選人獲得了勝利的，但是，所謂『進步分子』的瓊斯頓，按照工會官僚中一般流行的作法，是不發表詳細數目來自找麻煩的。他使用暗中作弊的辦法，祇是宣佈了經他篡改的數字：瓊斯頓一八、〇二一票，安德生一七、〇七六票。

在柯立芝時期，工會教育聯盟並在一些國際工會、地方工會、中心工會中進行了許多其他的反對階級合作的鬥爭。但主要的鬥爭是在採礦、紡織和縫紉業方面。在這三種工業中，具有着特別條件。第一、這些工業都因生產過剩而大大蕭條，隨之而來的是失業，工資低微，工會情況惡劣；這些工業預示美國工業終必發生總危機。第二、這些工業的工人特別富於戰鬥的傳統，因而很容易響應工會教育聯盟的領導。

工會教育聯盟在採礦業中

幾乎整個柯立芝時期，煤礦工業都是蕭條的。這是世界煤業危機的一部份，其原因是：戰時的生產過剩，競爭激烈，開採的機械化，石油、水力發電和煤的其他代用品的利用等等。結果是：長期的大批失業，工資與工作條件逐漸惡化，甚至在一九二九年總危機之前幾年便已經這樣了。美國聯合礦工工會路易斯的領導機關在這些年間是執行着典型的保守路線的，事實證明，這一機關並不能減輕這些惡劣的條件，這樣一來，礦工的處境就更加惡劣。結果是礦工深為不滿而很願意傾聽工會教育聯盟的綱領。

工會教育聯盟在礦工中間自始就得到堅強的擁護。前面曾經談過，它曾在伊利諾斯州打敗過法靈頓破壞一九二二年全國大罷工的企圖。在反對開除堪薩斯州礦工底英勇的主席霍瓦的鬥爭中，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這次鬥爭中，路易斯在會議上以八六六票對九七七票遭受失敗。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三日，工會教育聯盟的礦工們在匹茲堡開會，成立了美國聯合礦工工會進步國際委員會，參加的代表二十五人，霍瓦亦在其內。邁爾斯柯任書記。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綱領，主張：煤礦國有、成立勞工黨、工會合併、組織無組織的工人、承認蘇聯、礦工與鐵路工人聯盟、六小時工作日、僅訂立全國協議、反對雙重工會主義、主張工會民主等等。在這次會議上，關於工會教育聯盟如何防止了四萬煙煤礦工的分裂，曾提出報告。路易斯對這次會議的答

覆却是把加入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作爲應予開除的罪名，後來又有系統地開除了幾百名富有戰鬥性的會員。

與路易斯機構的第一次大衝突，是在一九二四年工會選舉時爆發的。美國聯合礦工工會進步委員會，以匹茲堡的綱領爲基礎，提出了一位共產黨員的礦工伏賽（伊利諾斯州人）爲競選主席的候選人，雖然他並不是出名的人物，可是大批的礦工羣衆却投票選舉他。工會當局的最後統計，路易斯得一三六、〇〇〇票，沃伊奇得六六、〇〇〇票。我們指斥他們舞弊，並肯定聲明真正當選了的是伏賽。

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情形越來越惡劣。煤業危機加深了，礦主們在一切方面向工人加倍進攻，工會當局大肆開除富有戰鬥性的會員。當時，路易斯本人已是共和黨的要人，他手下的組織者和各分區工會主席有許多是與礦主的團體和各種保守組織有關係的。工會滲透了盛行一時的、起破壞作用的勞資合作主張。結果是工會垮台，在許多地區完全崩潰，如在賓夕凡尼亞州中部、西佛吉尼亞、馬利蘭、依阿華、密蘇里、堪薩斯、奧克拉荷馬、阿拉巴馬諸州和加拿大等等。一九二五年，資力雄厚的匹茲堡煤礦公司廢棄了傑克遜維爾協議，自由僱用非工會會員，向美國聯合礦工工會挑戰。

在這一嚴重的危機中，工會教育聯盟提出了『挽救工會』的口號。他們要求在南方及其他未組織起來的地區發動有力的組織工作，要求煙煤工人與無煙煤工人聯合起來，在今後的決死鬥爭

中一致行動。工會教育聯盟與非共產黨人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全國挽救工會委員會，並在許多地方設立了分會。在這次運動中，我有五個月的時間來往各地進行組織工作。在後來的一次工會選舉中，這一委員會提出了挽救工會統一戰綫的候選名單，爲首的是第二區工會的前任主席勃羅菲。路易斯猛烈反對這一運動，辦法就是更多的開除工人，更加鎮壓工會的民主。選舉的結果是：路易斯得票一七三、三二三，勃羅菲得票六〇、六六一。我們對這數字提出抗議，指出有許多個區的票數都是純然偽造的，肯定聲明勃羅菲的票數被舞弊減少了十萬張（即減少勃羅菲的票數，補充路易斯的票數），因此選舉只是一場騙局。

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次一屆大會舉行於一九二六年底，當時的情景是很悲慘的。這時，傑克遜維爾協議即將滿期，工會面臨着決死的鬥爭，但卻沒有真正的準備。工會中對於路易斯的領導普遍不滿。可是，工會教育聯盟在這次大會上又不能有所作爲。路易斯結實地控制了這次大會，主要是依靠有組織地區派來大批由工會職員担任的代表。左派進步分子也責難了這一點，指斥有幾百名代表是從許多未組織地區『空頭』地方工會派來的，這些地區的臨時領導機關都是由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委員會所指定的。路易斯強硬地把持了這次大會，反對派的任何一件提案都通不過。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情形十分壞，而且有發生大災禍之虞，是很明顯的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傑克遜維爾協議滿期，一切有工會組織的地方烟煤礦山的工會都不得罷工，其實亦即是礦主關礦。工人們英勇地進行鬥爭；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以全力參加了這

一決死的鬥爭。我們組織了羣衆性的罷工糾察，成立了救濟組織，由維根尼特領導。至於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官僚集團，則好像完全麻木和解體了似的。在華盛頓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上層領袖也是這樣奇突，還在做他們的依靠趕快制度和階級合作來求得繁榮的大夢，對於這次決定性鬥爭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意義茫然無知，僅僅爲礦工們籌募了只足維持一個禮拜的罷工救濟金。

有組織的左派進步聯盟，曾做了許多工作去鞏固礦工的隊伍。罷工工人的鬥爭十分英勇，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亦即罷工罷了一整年之後，仍然不顧極端的飢餓，所受的輕蔑和警察的恐怖，在所有重要的工會地區都屹然毫不動搖。在四月一日這一天，挽救工會運動在匹茲堡舉行全國代表會議，出席代表一、二五人，代表全國各地礦工約十萬人。這次會議決定加強罷工鬥爭，辦法爲：嚴緊罷工糾察線，擴大鬥爭，首先擴大到重要的賓夕凡尼亞州西部和西佛吉尼亞州的煤礦去，最後再擴大到無烟煤地區去。這樣一來，糾察線恢復起來了，在菲萊特和西莫爾爾兩縣附近很快就未參加工會組織的礦工在工會教育聯盟領導下參加了罷工。

可是，在這個時候，罷工已經被打敗了，我們是無從挽救的了。因爲工會已在伊利諾斯州簽訂了單獨的協議，罷工於是告正式結束，其他地區的礦工能找到工作的也在陸續復工。這場偉大的鬥爭是失敗了。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在賓夕凡尼亞州西部，西佛吉尼亞州北部和俄亥俄州所剩下的據點，這一下幾乎被一掃而光了。烟煤煤礦大都實行了自由僱用制。在這一次打擊之下，礦工們完全喪失了費三十年之力才爭取得來的工資、工作條件和工會。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已不再是

烟煤地區的真正力量。這也是一般有組織勞工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失敗。在這次損失慘重的罷工之後，左派在煤礦工業中的發展情形，等到下一章再說。

工會教育聯盟在紡織工業中

紡織工業和煤礦工業一樣，早在一九二九年危機之前幾年，便一直因生產過剩而處於蕭條狀態。和煤礦業一樣，它的惡劣情況也是全世界紡織業危機的一部分。失業、工資低微、過分趕快工作，這就是被壓迫的貧困不堪的紡織工人的命運。一百萬紡織工人中，僅百分之五是有組織的，而這些工人又完全在北方，南方是完全無組織的。主要的工會為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美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和絲織工人聯合會，後二者是獨立工會。所有這些工會的領導機關都是浸透了當時流行的趕快工作和階級合作的主張，勤勤懇懇為僱主效力，加緊對工人的剝削。這三個工會都是死氣沉沉、麻木不仁，僅對廠方有價值，因為可以幫助廠方步步驅使工人趕快生產。

紡織工人是有良好的戰鬥傳統的，他們的情緒動盪不安，工會教育聯盟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就在其中進行工作。教育聯盟的總綱領是反對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主義和公司工會運動，要求實行戰鬥的政策、忠誠的領導、工會合併、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教育聯盟提議：在未合併之前，相互傾軋的工會應組成統一戰綫。它在工會中成立地方小組，在工廠裏成立統一戰綫的工廠委員會，由各種工會和非工會工人的代表組織而成。工會教育聯盟的紡織工業部舉行了二次全

國的若干次地方的代表會議。它進行了許多地方性的組織工作，隨時揭露階級合作的虛妄。

工會教育聯盟在紡織工人中第一次大規模的羣衆運動是一九二六年紐澤西州巴塞克城的罷工。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實行減低工資百分之十以後，工會教育聯盟便隨即以紡織工人統一戰綫委員會的名義在巴塞克進行活動。這時，在巴塞克並無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和其他紡織工會的組織，所以紡織工人統一戰綫委員會便開始徵募會員成立工會，打算以後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很快就有了會員一千人。一九二六年一月廿五日，統一戰綫委員會向波坦尼工廠提出要求，要求該廠取消減低工資的規定，逾時工作工資加半，不得歧視工會會員。工廠方面竟開除統一戰綫委員會全體委員四十五人作爲報復。波坦尼工廠的五千工人隨即罷工，並將鬥爭擴大到其他工廠，很快就波及工人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人，使巴塞克城的整個紡織工業全部停頓。

在這次罷工中，雙方都頑強鬥爭。罷工歷時十一個月。廠方使用了警察、法庭、公民和平委員會和種種鎮壓罷工的辦法和恐怖手段；而工人則報以英勇的團結和堅忍不拔。這次罷工的特點之一就是巨大的全國救濟運動。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以全力進行了這一個運動。這次罷工的正式領導者是魏斯波，一位優秀的羣衆演說家，但却是一個平庸的戰略家。真正領導了這次罷工的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幾乎全是共產黨人，他們積極參加各個高級的委員會，其中有這些戰士們，如：韋英斯通、鄧恩、富林、狄克、巴蘭、維根尼特、激連科、席思金等等。

窮困的紡織工人這次十分英勇和可歌可泣的罷工，博得了全國各地廣大工人羣衆的同情，而

深中階級合作之毒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集團却對這次罷工抱着明顯的敵意。參議員、州長、市長、律師、慈善家之流的各種人物都會插手試圖解決這一場激烈的鬥爭。

廠主見恐怖手段和種種欺騙技術都無法打破這次罷工，於是在六個月之後，即於七月間決定採用另一種陰謀來打敗工人，他們宣佈：倘若工人撤消共產黨人的領導，加入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則願與工人談判。撤調羣衆的領袖，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困難的條件，可是當時罷工正處於艱苦的情況中，因此，爲使共產主義的問題不致於妨害罷工的得到解決起見，我們一面揭穿廠方的恫嚇，一面將魏斯波調開，而且讓工人參加聯合紡織工人工會。我們深信，有着上述那些真正領導着罷工的領導人，我們仍可以堅定地保持對工人的領導。我們這一個行動方針，後來受到赤色工會國際的嚴厲批評。

僱主們因爲未能實現陰謀，於是聲明對於美國勞工聯合會也不願談判。結果是罷工繼續，鬥爭劇烈（鬥爭是在我們領導之下進行的，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無所動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巨大的波坦尼工廠終於向工會投降，恢復了被削減的工資，答應不歧視工會會員，承認勞資糾紛委員會。其他工廠不久亦相繼降服。歷時幾乎一年的罷工於是宣告結束。這次罷工雖是局部的勝利，總是艱苦贏得的，但在組織方面卻沒有產生很大結果。工會由於長時間的鬥爭而削弱了，又爲聯合紡織工人工會保守派麥克馬洪的領導機關所忽視，因此在這次罷工之後，不能接着進行有力的組織工作和反對黑名單的運動。

巴塞克的罷工是十分重要的。它像一座燈塔一樣屹立在瀰漫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階級合作的迷霧中。這次罷工也是我國由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羣衆性罷工。它加強了全國紡織工人的反抗，推動了整個革命運動。不過，最爲重要的或許是這次罷工在改變美國革命工會運動的政策上所發生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

工會教育聯盟在縫紉業中

在柯立芝『繁榮』的年份，縫紉業和煤礦、紡織業一樣，遭受生產過剩和極劇烈的競爭，而處於困難和蕭條的情況中。大批失業，越發成了長期的痼疾，營業的旺月越來越短促，正如其他工業一樣，廠主們加緊施行其合理化計劃，用種種方法來加速工人的工作。

在這一工業的工會中担任高級領導的是社會黨人。他們底所作所爲就是力求使他們的政策適合廠方趕快工作計劃的要求。在縫紉業中，『工會與經理部合作』的階級合作極爲發展，超過美國其他任何工業。這些社會黨人工會領袖們與資本家的技術人員携起手來，實行一整套的『最低生產標準』、計件工資制、減低工資等措施。有些場合，他們使他們自己的效率專家，實際上掌管了趕快工作制的技術管理。在另外的一些場合，他們甚至於用他們勞工銀行中的工人儲蓄去資助破產的僱主，他們推行趕快工作制，甚於其他任何工會；他們取消工會民主，運用開除、上黑名单及流氓手段等技術來壓迫反對派至於極點，比任何人都更爲厲害。

縫紉業工人是美國工業中最富於革命性的，他們大規模地起來反對這種錯誤領導所造成的工會情況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他們接納工人教育聯盟把它的縫紉業部擴充為強大的統一戰線運動。有一個時期，在它直接領導下的工人達十萬人，在它影響下的工人比這更多，這種羣衆性的反抗在各地都有發展，尤其是在這一工業的主要中心紐約。工會教育聯盟的政策要點是：反對階級合作，主張階級鬥爭的政策；反對流氓手段和腐化，主張工會民主，主張所有的縫紉業工會實行合併，成立一個以車間代表制為基礎的產業工會，主張成立勞工黨，承認蘇聯，加入赤色工會國際，釋放政治犯等等。除了這些一般的要求之外，工會教育聯盟小組又爲這一工業中的每一個工會提出了具體的綱領。

激烈的鬥爭，很帶有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間的政治鬥爭的色彩。一方面是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擁護他們的是感到不滿的廣大工人羣衆；另一方面是社會黨和工會官僚集團，支持他們的主要是技術工人，同時還得到廠主、美國勞工聯合會、資產階級報紙、塔曼尼大廳（民主黨在紐約的機關——譯者）政客們，甚至常常還得到警察的支持。美國的任何工會從來沒有過這種廣泛而殘酷的內部鬥爭。

鬥爭在國際毛皮工人工會和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達到了最尖銳的地步。在聯合成衣工人工會中，情況和其他工會同樣惡劣，因爲這一工會的高級人員都是全國聞名的擁護階級合作的人物。工會教育聯盟進行了鬥爭，使這一聯合工會實行階級鬥爭的政策這方面，獲得了某些成績；

但是，我們的運動並沒有像在國際毛皮工人工會和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那樣具有持久的羣衆性，這主要是因爲領導薄弱的緣故。在帽業工人國際工會(Cloth Hat, Cap and Millinery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中，沙查爾和季貝爾等人所領導的左派也發展了強大的運動，對工會的生活有一定影響，但還不能夠爭取到這一組織及其重大罷工的控制權，使其脫離階級合作的領導。

要詳述工會教育聯盟在縫紉業中長期複雜鬥爭的情形，當非本書的篇幅所容許。請讀者參看哈第所著『成衣工人』(國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出版)一書，可以知其大概。現在我只能略爲談到毛皮工人工會和女裝成衣工人工會這兩個工會中鬥爭最高潮的情形，在這兩個工會裏面，鬥爭是最尖銳不過的了。

在國際毛皮工人工會，考夫曼官僚集團是反動而專制的，這一集團很快就仿效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的方法來打破對趕快制度的反對，他們採用的辦法是：開除戰鬥分子出工會，把他們列入工廠黑名單，以流氓手段統制工會。在工會會議上，表示異議的分子便遭毒毆痛打，工會教育聯盟毛皮工人領袖哥爾德和葛羅斯便會被刺重傷。工會教育聯盟被斥爲雙重組織，聯盟的盟員被宣佈應予開除。雖然如此，羣衆的反對運動却在增長，因爲工會當局的不當措施使得工人的情況每況愈下。一九二五年五月選舉，鬥爭達於高潮，這時，工會教育聯盟與索爾金·溫尼克的『中間』集團結成統一戰綫，贏得了毛皮工人工會紐約聯合委員會的控制權，這個委員會管轄整個國際工會的大部份。哥爾德成爲這一新的地方領導機關的負責人。

一九二六年二月，紐約毛皮工人一萬二千人在哥爾德的領導下進行罷工，中心要求為四十小時工作週。接連十七個星期的鬥爭，是紐約歷史上最艱苦的一次鬥爭。工人不僅要與大批職業的工賊和流氓作戰，而且要與國際工會中無耻地對罷工暗中進行破壞的右派領袖進行鬥爭。在歷盡種種困難而終於勝利在望的時候，這些右派領袖們却把格林請來，和他們一起背着地方領導機關，跟廠方私下簽訂了每週工作四十二小時的協議。他們接着又打算驅使工人復工。但是，工人們堅持不屈，否決了格林的解決辦法，繼續進行罷工數星期之久，終於贏得了四十小時工作週。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這是有效的罷工領導的輝煌榜樣，這是對整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不罷工政策痛加斥責。

右派社會黨勞工領袖，尤其是格林本人，由於這些事件而名譽大損。他們尤其害怕這次輝煌的罷工會刺激整個縫紉業的不滿羣衆。因此，他們對工會的左派領袖加倍地進行攻擊，他們狂叫赤色革命，以濫用工會基金，罷工中使用暴力，賄賂警察，違犯工會章程等等罪名加之於哥爾德。然後，美國勞工聯合會派出了由極端反動分子烏爾、麥格拉第、里安、蘇里文及佛雷恩等人所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在社會黨、廠主、報紙等等的協助之下，改組了紐約聯合委員會，開除了它的委員，『解散』了它所管轄的四個地方工會，另成立新的工會。這一行動把大批毛皮工人趕出美國勞工聯合會之外，這些工人依然在左派領導之下，進行了最激烈的鬥爭，一直到七年之後才得到統一。關於毛皮工會單獨存在的這一段時期，在以後幾章還要談到。

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中的鬥爭同樣是艱苦和長期的。在這裏也是只能略述其梗概。在這個工會中，最出色的左派統一戰綫領袖是鮑羅卓維奇、海曼、沃爾蒂斯、齊默曼、樸特諾伊等人。這一工會受當時流行的『工會與經理部合作』方案、流氓手段、鎮壓民主等等的害處很深。害處特大的是開除異己的政策。工會教育聯盟在所有的成衣中心都進行鬥爭反對這種情況，但鬥爭的焦點却在紐約，在這裏，羣衆是樂於聽從左翼的戰鬥分子領導的。

第一次大衝突發生於一九二五年。經過三年鬥爭之後，工會教育聯盟在第二、第九、第廿二地方工會中建立了左派統一戰綫的領導——它是這一國際工會的骨幹組織，人數約佔紐約聯合委員會的百分之七十。因為這種情形，工會的主席，席格曼於六月十一日荒謬地以共產黨刊物『自由』的編輯奧爾金會在該地方工會五一紀念會上發表演說爲藉口，將三個地方工會所正式選舉的執行委員會的七十七名委員作爲共產黨員而橫加開除，這等於一舉開除了會員三萬五千人。這件事在這一工業中激起了義憤的爆發。被開除的地方工會立即成立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着就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經過十六個禮拜的鬥爭之後，席格曼不得不屈服，將被開除的地方工會和執行委員會恢復原狀。

這是左派的一大勝利，它至少動員了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全體會員的百分之七十五，起來支持工會教育聯盟的英勇戰鬥的盟員。左翼統一戰綫控制了紐約聯合委員會，並選舉海曼爲幹事。左派在芝加哥的聯合委員會和在許多中心地區的地方工會也贏得了相似的勝利。但是，社會

黨『元老』席格曼的領導機關依然控制了該工會，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費城大會，這是由於當時流行的『紙上地方工會』制度和非比例代表制的緣故。席格曼方面代表會員一五、八五二人，有代表一四六人，而反對派代表三四、七六二人，但却只有代表一一四人。由於會議的代表成分如此，席格曼便無情地壓制了左派的提案。這激起了危機，反對派的代表在忿激之下實行集體退席，決定另行成立新工會。祇是因為工會教育聯盟，以鄧恩為代表提出了保持工會團結的勸告，這些代表才重新出席的。其後雖贏得了若干讓步，但席格曼底摧殘一切的把持控制，却仍沒有打破。

這次大會在工會中引起了許多的不滿。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紐約三萬五千名外套工人開始罷工，這次罷工是左派的紐約聯合委員會所領導的。在這一罷工中，保守的工會當局與工會教育聯盟統一戰綫間發生了第二次大鬥爭。和毛皮工人的罷工一樣，右派領導人又是暗中破壞罷工鬥爭。這次也是那樣，正當罷工工人由於長時間的鬥爭而精疲力竭的時候，席格曼就趁機突然於二月十三日斥責這次罷工為非法，儘管他們自罷工開始以來曾經正常地表示贊同並批准這次罷工。他們自行與廠方談判，把整個事件交付仲裁，並下令外套工人復工。這次和毛皮工人的罷工不同，左派不能夠動員疲憊的罷工工人起來打敗這一陰謀，因此罷工失敗，工人的條件被仲裁委員會大加刪削。這是工人和工會教育聯盟的一次大失敗。

席格曼於是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社會黨的支持之下，開除了紐約聯合委員會和紐約的幾個大的地方工會，從而加強了他對工會教育聯盟的攻勢。在芝加哥和左派的其他據點也採取了這類行

動。然後，在廠方以黑名單脅迫工人的情況下，國際女裝成衣工人會的領袖們，進行了一次把被開除的工人重新登記為新的地方工會會員的運動。正如處境相同的其他反動派一樣，國際女裝成衣工人會的領袖們表明了一點，即是他們寧願把工會摧毀，也不願讓工會由左派來領導。

由於席格曼底分裂政策的結果，當時至少有三萬五千工人被開除出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毛皮工人工會和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兩者共計，被開除出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人約有五萬人。因此，這些被開除的工人便團結起來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繼續為恢復會籍和爭取工會的統一而鬥爭，為美國勞工聯合會縫紉業工會的民主化，反對縫紉業工人經濟狀況的迅速惡化而鬥爭。現在，暫且撇開這方面不談，而整個地研究一下工會教育聯盟革命工會運動的總路綫。

獨立工會運動的趨勢

早自一九一二年以來，工會教育聯盟及其前身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和國際工會教育同盟便已進行頑強的鬥爭反對雙重工會運動。但是，現在柯立芝時期的後期——一九二六至二九年——却有種種力量逐漸推動工會教育聯盟走向局部的獨立工會運動政策。在實行大批生產和托辣斯化而美國勞工聯合會又不能和不願去組織工會的工業中，遭受深重的剝削而沒有組織的廣大工人羣衆中間，的確就有了這種工會運動的潛在基礎。不管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工人國際產業工會等等雙重組織，由於具有極端革命的綱領，敵視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人和由於一般宗派的措施，從來

沒有能够在廣大的無組織工人中間在持久的羣衆基礎上建立起任何獨立的工會，然而這樣的基礎却是千真萬確的戰後柯立芝時期的年份，事變發展的總路綫趨向於大大加強這種獨立工會運動的潛在基礎，並終於把成立新工會的問題作爲一個活生生的問題提到革命運動的面前。趨向於產生這一結果的四種一般的力量如下：

(一) 在戰後資方的巨大攻勢中，美國勞工聯合會在許多工業中的基礎變得狹窄了，其中包括：它在製鋼、木材和屠宰工業的工會因爲罷工失敗而被完全消滅了，一九三二年鐵路工會遭受摧毀性的打擊，損失會員數十萬人，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在煙煤礦場上的最後崩潰，除此之外，在建築業、海上運輸、印刷、縫紉、紡織、食品、製鞋等其他各種工業的工會也已嚴重削弱了。由於我國工人史上最慘重的這些罷工失敗的結果，美國勞工聯合會數量上和戰略上的地位都已大大削弱，無組織工人的百分數已大大增加。尤其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已經喪失了廣大的非技術工人羣衆，趨向於逐漸變爲技術工人貴族的組織。

(二) 美國勞工聯合會採取了不罷工、『工會與經理部合作』、『勞工高級戰略』的綱領。這一階級合作政策，把工會的作爲戰鬥組織的基本任務取消了，使工會成爲資本家趕快制度的附屬品，因而窒息了工會的戰鬥精神，使工人運動遭受了禍害慘重的腐蝕。其結果就是：在柯立芝『繁榮』時期，工會不僅不能從戰後大罷工的損失中恢復過來，而是有如我們所看到的，歷史上第一次在力量和影響上都是不斷地下降。美國勞工聯合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力保衛其會員的

利益，更無力去組織無組織工人。

(三) 工會開除了大批富有戰鬥性的革命工人，這一事實使這些組織喪失了最優秀的分子而加速了它們的衰落。由於這些開除的結果，工會教育聯盟的英勇戰鬥的盟員們大部都在工會之外，很難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會的內部進行工作，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又在流氓所把持和民主被剝奪下，這就使得事情變得更壞。

(四) 在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羣衆中間，有着一種新的、增長不已的戰鬥的趨向。一九二六年巴塞克紡織工人罷工，紐約毛皮工人和外套工人罷工，一九二七年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全國罷工，波士頓製鞋工人罷工，新貝德福城紡織工人罷工和一九二九年加斯頓尼亞、伊利薩伯頓及南方許多城市紡織工人大罷工等等，所有這些鬥爭激烈而艱苦的罷工都是明證。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半死不活的工會當中那些奉行不罷工政策的腐化領袖，是不能鼓勵、發展這一正在發展的罷工運動並把它領導到勝利的，相反地，他們往往直接暗中破壞罷工。

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表明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在實力和戰鬥能力上都已確定地下降。它們的會員大減，它們的沮喪鬥志的階級合作政策，它們的大批開除會員，無組織工人中有增無已的組織起來的要求，所有這一切共同準備了獨立工會運動的基礎。尤其是在工會教育聯盟活動的三大方面——煤礦、紡織、縫紉——成立新工會的基礎是確定而且堅強的。

煤礦工業方面，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煙煤部已經垮台，英勇戰鬥的會員被大批開除，礦工

們是有長期的組織經驗的，對於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甚為不滿，確定地準備成立新工會。在一九二七年的損失慘重的罷工之後，在加拿大、科羅拉多（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西佛吉尼亞（基尼地方）、伊利諾斯（美國進步煤礦工人工會——一九三二）、奧克拉荷馬、白煤地區等等，一批批地產生了自發的地方性的雙重組織，這事實反映了這種傾向。新的工會正在普遍產生出來，代替正在崩潰的美國聯合礦工工會。

在紡織業方面，成立獨立工會的趨勢，經過略有不同，但總的方向却是一樣。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和其他紡織工會，會員只有工人的百分之五，而這些工會又因為當時緊張的階級合作的作法而麻木不仁，既不能也不願適應這一工業中心懷不滿的工人的要求，為他們的要求而進行鬥爭。有如我們在巴塞克的罷工中所見到的，結果就是儘管工會教育聯盟抱着努力反對雙重工會的態度，但還是不得成立獨立的工會來組織工人。

在縫紉業方面，趨向於獨立工會的途徑也是不盡相同的，但却同樣的明確。工會領導方面的反動方針，經濟狀況的不斷惡化，幾乎有五萬名富有戰鬥性的工人被開除，所有這些使得這一工業中羣衆對成立新的戰鬥性產業工會的要求有增無已。

但是，工會教育聯盟的傳統的反對雙重工會運動的人們，却堅強反抗羣衆這種成立新工會的要求。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匹茲堡挽救工會會議上——這次會議代表十萬礦工——有一種強烈的成立新工會的傾向，但這種傾向却因為工會教育聯盟和共產黨的反對而失敗了。上面提到

過的標幟工業方面的新工會都是社會黨人和其他非共產黨人所發起的。在巴塞克的紡織工業中，甚至工會教育聯盟已被迫成立了新工會之後，我們還反對這一工會獨立存在，並要它去參加死氣沉沉的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凡是我們在無組織工人中成立了新工會的產業中，我們的確是一律實行這條路綫。在縫紉業中，在國際女裝成衣工人工會的費城大會上勸止分裂，讓被開除的工人採取爭取恢復舊工會會籍的方針，這兩件事都應由工會教育聯盟負責。

在這些演變當中，工會教育聯盟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至四日在紐約舉行第三屆全國代表會議。教育聯盟的總部這時剛自芝加哥遷到紐約。出席會議的代表二九七人，其中一〇七人來自縫紉業。這些代表總計代表三十萬人，約等於整個工會運動的百分之十。這次會議深知美國勞工聯合會在許多工業中垮了台，知道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未能組織無組織的工人，它的不罷工和階級合作的政策，以及它的一般的反動傾向所造成的危險。這次會議聲明在廠主們的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進攻面前，工會正在全面後退，同時宣稱，工會的生存本身已岌岌可危。但是，這次會議却不了解這種情形已為獨立工會運動安放了基礎。正相反，工會教育聯盟第三屆會議的整個方向是向着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它集中一切力量於加強舊工會內部的鬥爭，以反對階級合作，維護工會民主，主張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主張成立勞工黨，主張失業保險，反對工會資本主義（勞工銀行），反對種族歧視，主張世界工會統一等等。這次會議號召許多被開除的工人為恢復舊工會的會籍而鬥爭，它提出的中心口號為：「挽救工會」。

赤色工會國際假以援手

在這個關頭，赤色工會國際對美國的形勢發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見。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開幕的赤色工會國際第四屆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在美國發展成立新工會之需要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是工會教育聯盟的代表團所完全同意的。這決議案說：

「工會教育聯盟當前至為重要的任務就是成爲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領導機關，尤其要集中於煤礦、鋼鐵、石油、汽車、橡膠、紡織、化學、海運、運輸和木材等工業……」

「於必要時，工會教育聯盟可以爲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而奮鬥，但是，這必須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保證階級領導和戰鬥性的綱領。」

這個決議案固然把組織無組織的工人作爲工會教育聯盟的中心任務，但也強調指出必須發展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的工作，決議案說：

「同時，必須充分利用在現存工會內部進行工作並在其中爭取對有組織工人的領導權的可能性。」（見赤色工會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報告英文版第一三六頁。）

隨同這一決議案，赤色工會國際的總書記洛佐夫斯基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共產國際」週刊上著文尖銳批評工會教育聯盟的政策，稱之爲「在美國勞工聯合會週圍跳着四組舞」的小組之一。洛佐夫斯基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基礎越來越狹窄，獨立工會運動的領域越

來做寬廣。他宣稱，工會教育聯盟信賴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奉行工會合法主義和盲目崇拜反雙重工會主義，因而忽視了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他特別強調最近屬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科羅拉多礦工的罷工和我們自己的巴塞克罷工表明有成立新工會的需要。他猛烈譴責我們在巴塞克把新成立的工會交給反動的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的方針。從這一切，他得出結論說，工會教育聯盟必須更加發展獨立的領導作用；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的工作必須繼續進行，而同時工會教育聯盟應該大大地更多注意在沒有舊工會和舊工會所不能活動的產業中真正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成立新的產業工會。

洛佐夫斯基的主要論點說得很中肯。在過去幾年，工會教育聯盟本應該更多注意在基本的、實行大批生產的工業中直接組織無組織的工人，這就意味着在許多場合，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所沒有活動的地方成立（至少是暫時成立）獨立的工會。工會教育聯盟在原則上早已贊成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老朽無力或已停止活動，或者在獨立工會具有羣衆性的地方，支持新工會的 policy，這是確實的。工會教育聯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支持聯合成衣工人工會、聯合食品工人工會、鐵路兄弟會和農業中的世界產業工人工會，而同時又號召這些工會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事實上，工會教育聯盟對雙重工會運動雖有其深固的、極爲正確的對立關係，但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多少靠向後面一些而且無疑地忽視了無組織工人這一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本來是可以成立獨立工會的。

第四屆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和洛佐夫斯基的批評在美國共產黨和工會教育聯盟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動，立即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得到了最後的結論。這次會議全體一致在基本上贊同洛佐夫斯基的總的建議，認為需要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沒有進行活動的工業中成立獨立工會，同時又尖銳地警告不要放棄在舊工會中的工作：

「各個工會總共還有會員約三百萬人。我們不能聽任反動的工會官僚去領導他們。我們必須繼續擴大我們在這些組織內的工作，建立我們的黨，把基層羣衆從反動派的控制下爭取過來。我們黨會有過三十年雙重工會運動的一般的左的傳統。在反動的美國工會中工作是極爲困難的。假如稍爲輕視這一工作，我們的同志們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忽視這一工作或放棄舊工會的傾向。要防止這一點，唯有明確地聲明共產黨人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工作的必要性並規定這一工作的綱領。」（見「共產黨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份）

這是適合時宜的警告，事實證明，如果在其後幾年間，工會教育聯盟和共產黨明確地銘記這一點的話，它們的工作就會做得更好（註一）。但是我們五月決議中所不十分健全的，是它的這樣的論調：對於獨立工會運動的新的強調並沒有基本上改變我們現行的對於新工會的政策，而祇是一個重點問題而已。

（註一）關於這個問題，當時共產黨內部有許多派別分歧。有些人尖銳地警告放棄在舊工會中工

作的危險，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多年來主張從內部進行工作邏輯上所應有的立場。在一年以後成爲反革命托洛斯基分子，也則是共產黨、工會教育聯盟和獨立工會運動的死敵的康農，當時曾尖銳地批評我，說我認爲雙重工會活動有危險，他說我所持的論調，目的是在於「使人們對於無會員的舊工會中的工作放棄，引起驚慌。」

第十四章 工會團結同盟

一九二八年年中，工會教育聯盟開始改變其對獨立工會政策的方針，在它的力量最大的三種工業，即紡織、煤礦和縫紉業中，組織新工會，並在由於大舉開除工人，美國勞工聯合會趨於衰落等原因而條件最成熟的地方，也組織新工會。這些工會當中的第一個是全國礦工聯合會，它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在匹茲堡召開代表大會。由於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大罷工失敗之後，礦工十分渙散，僅有一萬五千工人參加這個新組織。新成立的第二個工會是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一九二八年九月成立於紐約，會員約五千人。然後是縫紉業工人產業工會，成立大會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在紐約舉行，這次大會代表工人二萬二千人。這些會員數目字都祇是一個約數，因為當時的會費制度還組織得不好。

工會教育聯盟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在克里夫蘭城舉行第四次全國會議，或者更確當些說，舉行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十八州的六百九十名代表，其中來自太平洋海岸的代表十五人。這些代表中間，代表新成立的三個產業工會約共會員五萬七千人（或許估計過一些）的代表三百二十二人；各工會左翼集團代表一百五十九人；無工會組織之產業的工人小組代表一百零七名；直接來自美國勞工聯合會地方工會（會員二、八五五人）的代表十八人；工會教

育聯盟全國委員會和四十四個兄弟組織的代表四十人；代表中有六十四名黑人，七十二名婦女，一百五十九名青年，代表們的平均年齡僅爲三十二歲。

這一代表大會改組了工會教育聯盟，改名爲工會團結同盟。這是符合於我們運動的新趨向的，這次大會的代表熱烈地表示擁護這一名稱。這一新章程規定了三種全國性的組織：（一）產業工會，（二）產業同盟和（三）工會少數派小組。

（一）全國產業工會，在形式上是適應於每一產業的情況的，所依據的原則爲『一個工廠，一個產業，一個工會』；這些工會按其產業重要部門的劃分而分作若干部；這些工會有自治權，可以選舉自己的幹部，規定自己的會費和入會費，制訂自己的詳細的綱領和工會章程，各自進行罷工，僅受工會團結同盟總部的領導；重要特色之一是都設有青工部。（二）全國產業同盟是產業工會的胚胎；這些同盟乃是地方工會，車間委員會和個別工人所組織的比較散漫的全國性組織。這些團體還沒有強大到成爲工會，它們的會費由工會團結同盟全國執行局規定，它們的活動由這一執行局監督。（三）全國性工會的少數派小組，它的前身是原來工會教育聯盟在保守派的工會中活動的全國產業部。凡是在一個產業中有美國勞工聯合會和工會團結同盟並存的地方，工會團結同盟便與它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的少數派小組取得聯繫以便行動一致。

在地方上，工會團結同盟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如地方產業工會、地方行業工會、車間委員會、發起組織工會小組、左翼工會小組等等。所有這些連結起來組成全市的工會團結委員會，章

程上並有成立州工會團結委員會的規定，但從來沒有實現。

在全國範圍，工會團結同盟由全國委員會領導，委員五十三人，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國委員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選舉全國執行局，委員十人，每月開會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工會團結同盟全國性的領導幹部如下：總書記福斯特；助理書記兼司庫石米斯；全國組織委員約翰斯東；全國黑人組織委員福德；編輯鄧恩；（註：後來『勞工團結』的編輯為N·賀尼和杜黑）這一總的組織系統，全國的和地方的，在工會團結同盟存在的整個時期始終沒有大變。工會團結同盟的機關刊為『勞工團結』，各個全國工會和全國同盟又各有自己的報刊和會報。

工會團結同盟的綱領

克里夫蘭大會把工會團結同盟組織成了新的工會中心。但是，這次大會並沒有成立普遍的雙重工會的系統。它聲明反對個別的退出美國勞工聯合會或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分裂，它建議祇是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腐朽不堪，或不存在的地方成立新工會。它也一再告誡不要放棄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的工作。它的綱領說：

「新成立的工會團結同盟底主要任務，就是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成立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無關的獨立的產業工會。同時，它把革命的工人和改良主義的工會組織起來。它把失業的工人和在業的工人在政治上、組織上團結起來。」

除了這一些重要的成立新工會的清勢之外，這次大會還繼承了和發展了過去工會教育聯盟的一般政策。它明顯地是一個左派的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當中祇有很少幾個傑出的工會進步分子；這是很平常的，因為在柯立芝景氣達於頂點的當時，進步分子一般都十分熱中於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主張的工會與經理部合作（即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和趕快生產的方法來挽救工人階級，他們拒絕工會團結同盟所主張的戰鬥的階級鬥爭的路線，認為這一路線是幼稚和過了時的。

這次代表大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和僱主們加強階級合作的整個計劃：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勞工高級戰略、新工資政策、勞工銀行等等，進行了正面的衝突。『大會的中心就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合理化運動及其一切惡果，如趕快制度、失業、意外事故增多、職業病、工資低等等』（註：見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的『勞工團結』）。大會主張戰鬥的罷工政策。它的綱領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它的中心口號是『階級反對階級』。大會的主要的決議案概括為下面這些口號：

「建立工會團結同盟，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蘇聯，反對資產階級的合理化運動，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實行七小時工作日；實行五日工作週，實行社會保險，黑人在種族上、社會上、政治上完全平等，組織青年與婦女，打敗工人的反動領袖，世界工會團結起來。」

這次大會很注意產業工會運動、罷工策略、把無組織工人組織起來這幾個問題；它使工會團結同盟更加密切地注意沒有組織工會的基本產業如鋼鐵、汽車、化學、農業等方面，並在南方進行工作；大會詳細討論了在從事大批生產、業已托辣斯化的工業中建立車間委員會的問題，詳細

討論了如何打敗廠主的偵探和黑名单制度的問題；大會制訂了實現統一戰綫的辦法，尤其是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之間，美國勞工聯合會基層工人與工會團結同盟的工會會員之間的統一戰綫；大會強調工人們應與他們的反動的工會幹部相反，有獨立的領導政策。這次大會也很注意黑人工人、青工、女工等專門問題，工會團結同盟在初期是很忽視這些問題的；大會聲明與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被壓迫工人團結一致；大會警告有發生帝國主義戰爭，尤其是反蘇戰爭的危險。大會對於『普遍繁榮』的擴大與持續沒有任何幻想，因此決議要求實行聯邦社會保險，對失業或因疾病、意外事件或老年而無法工作的一切工人，仍按其原有工資發給全數養老金。這次大會並且修正了以前工會教育聯盟對於勞工黨的態度，即：鑑於工會執行人員普遍反動，大會聲明只有在勞工黨真正掌握在工人手中之時，纔參加勞工黨。在一九三二年選舉時，工會團結同盟及其所屬工會擁護共產黨的候選名單，和一九二四—二八年間，工會教育聯盟所做的一樣。

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經濟危機

工會團結同盟代表大會之後不到兩個月，一九二九年世界產業大危機爆發了。美國資本主義底金碧輝煌的金融制度崩潰了。原以為預示着普遍繁榮之曙光的工業及農業上緊張的合理化運動，結果却造成了市場大大過飽的現象，生產大大過剩，這些產品，貧困不堪而被掠奪的羣衆既無力購買，在國外也銷不出去。工業生產迅即跌落了一半，工資受到多方的削減。農產價格跌落

約百分之六十，地價也隨之相應降低。失業大軍由所謂好時光的三百萬人一躍而爲一九三三年的
一千七百萬。全國勞苦羣衆的貧窮、困苦和飢餓大大加深了。統治階級懷着革命的恐懼。會被
大事宣揚的『新資本主義』生動地證明了一樁事實，就是說『新資本主義』終歸祇是舊資本主
義，因此，它絕望地陷於資本主義制度全世界規模的腐朽和衰亡之中。

這一可怖的危機的到來，在工會和社會黨領導人中間引起了一片混亂。他們的『新工資政策』、
『勞工高級戰略』、『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以及他們其他一切趕快制度、階級合作、繁榮幻想
等等黃金美夢在一夜之間全部幻滅了。工人運動在他們領導之下，本來始終是精神沮喪而混亂
的，工人們長時間受到階級合作、不罷工、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等宣傳的毒害而組織渙散；
工會則由於喪失會員，壓制民主和最好的鬥士被開除而削弱了。由於這種起破壞作用的政策的結
果，一旦遭逢危機的沉重打擊，在羣衆方面自然毫無自衛的準備，而他們的工會領袖也是除了倉
皇敗退之外別無其他政策。

其結果就是：在危機開始以後的三年半中間，一直到羅斯福實行新政之前，僱主們殘酷地把
危機的重担推卸給工人和工人的家庭身上，無情地減低工資，普遍地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工人
方面却並沒有任何真正的抵抗。而工會領導人們却反而以其投降政策，在實際上幫助僱主進行這
一野蠻的進攻。在這向工人的生活水準大舉進攻的整個時期，罷工的次數比以往許多年的罷工爲
少。例如，一九三三年的罷工僅及一九二二年危機時期的十分之一。

芝加哥的情形就是美國普遍情況的典型。這一城市的工人有許多戰鬥的傳統，有堅強的工會，可是儘管如此，足有百分之五十的產業工人失業，而在業工人的工資也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然而，在危機時期的前三年竟沒有一次稍為重要的罷工。資本家看見工人階級普遍地精神沮喪而肆無忌憚地自以為不可一世，而工人階級的沮喪却正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底多年來政策造成的必然結果。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假惺惺地宣稱：這表示勞資甚為和協，他們讚美工人們在面對着危機的考驗時還有這種『耐心』和忠誠。在困難處境中的資產階級的確是有效地使用了他們的『勞工助手』——行業工會的領袖。

這個時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政策在整個悲慘歷史上最可耻的時期。僱主們犧牲工人利益以挽救他們自己的任何一個重要措施，事實上都得到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人直接、間接的支持。這些反動的領導人附和資本家的一切減低危機嚴重性和關於繁榮『很快到來』的謊言，並加以宣傳，從而鬆懈了工人的警覺性。危機剛纔開始，總統胡佛便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召集僱主和工會領袖舉行全國工業會議，裝作打算維持工資標準的模樣。這個時候，在工人沒有組織起來，實行大批生產的工業中，已經在削減工資，胡佛這一會議的目的，顯然是打算用騙人的不減工資不罷工協議來束縛工會的行動，先把無組織工人的工資減低之後，就可以比較容易來減低工會工人的工資。在危機爆發之初，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格林和其他領袖不僅不是像工會團結同盟所主張的那樣，以英勇的戰鬥的罷工來抵抗正在發展着的減低工資的浪潮，却反而引導羣衆走上胡佛佈置

好的圈套。

這樣一來，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與胡佛取得協議，便無異於立刻把無組織的工人投給減低工資這一餓狼，聽其任意吞噬。托辣斯化的產業，猛烈地大事減低工資，被出賣和沮喪的工人無力抵抗，而就在這個時候，胡佛和格林竟都厚顏無恥地硬說工資並未減低。最後，在無組織的工人被『緊縮』之後，便必不可免地輪到有組織的工人來減低工資了。在這個時候，工會領袖們又反映着資本家的利益，一變而為熱烈主張減低工資的人物。他們事實上在主張：既然無工會組織的產業已經減低了工資，那末現在有組織的工人也只好減低工資。於是各個工會相繼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工資減低；絲毫不加抵抗。這些工會領袖之熱中於減低工資，可以舉烏爾為例，他竟把鐵路工會不進行罷工而接受減低工資百分之十，讚揚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業成就。在縫紉業方面，社會黨領袖們也是遵循着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總退却政策。在經濟危機當中，美國工人階級是從來沒有這樣馴服地聽任將工資減低的，一八九〇年代和一九二一—二二年的大門爭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勞工助手』們底幫助下，資本家得以把他們的削減工資的大運動貫徹實行，除了弱小的工會團結同盟所組織的抵抗外，他們沒有遭遇到工人階級的抵抗。不過，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人物出賣工人利益最大最深的地方，是在數百萬飢餓的失業工人問題上面，胡佛處理失業問題的計劃（這是金融資本的計劃）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所謂有工大家作（其實是大家同

受窮困)的政策，即是強迫大多數工人僅從事部分時間的工作並相應減低工資；第二是把失業救濟作為地方慈善事業的事情處理而與聯邦政府無關的政策。這是最殘酷的、有組織地使羣衆挨餓的政策。

必須指出，最可恥的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竟又是自行迎合這種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殘酷進攻。他們成爲胡佛所主張的有工大家作這種『輪班作工計劃』的最得力的維護人，他們成了最瘋狂反對失業保險的人物。他們難以置信地無恥和愚蠢，竟詆毀『救濟金』爲『補助懶惰』、『損害美國工人的尊嚴』、『阻碍真正的進步』。他們宣告：失業保險就是工會的毀滅和文明的衰亡。總而言之，他們用流行的大資本家的理由來反對救濟飢餓的羣衆。由於他們這種反動的立場，美國勞工聯合會博得了華爾街美國統治者的褒獎。在一九三〇年波士頓舉行的美國勞工聯合大會上，胡佛、許多將軍、主教、資本家、美國退伍軍人團的軍官們和格林、烏爾、佛萊等人共同詆毀失業保險，並誹謗共產黨人，因爲他們在全國各地爲失業保險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正當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在工人階級敵人的褒揚聲中怡然自得的時候，千百萬失業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却越來越深地沉陷在窮困和真正餓死的境地。

危機時期的工會團結同盟

工業危機的到來，是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意料中的事情。它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

織，早就了解『繁榮』的暫時性，並預見其必然破滅。當工會和社會黨領袖們還在歌頌着柯立芝時期資本家工業合理化的時候，共產黨和過去的工會教育聯盟便一直在警告工人要注意將來會有痛苦的算總賬的一天。在危機發展起來之後，工會團結同盟和共產黨便負起了動員工人的責任，動員他們進行鬥爭，反對資本家降低羣衆生活水平那種愈演愈烈的攻勢。它們進行了許多次罷工，並展開了強大的失業保險和救濟失業的運動，除此之外，還進行了其他許多戰鬥的活動，例如支持農民的鬥爭、退伍軍人補助費運動、學生運動、蒙尼及斯科茨波羅六黑人案等等。在危機期間，一直到新政時期，工人和其他勞動羣衆僅有的一些對廣大羣衆貧困化的嚴重事件，都是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所組織和領導的。這是一樁無可爭辯的事實。

僱主和政府對這種左翼的戰鬥精神，採用了殘酷無情的政策。在大多數產業中，工會團結同盟的盟員一被發覺便立即被開除或列入黑名單。對工會團結同盟所組織的罷工，僱主們殘酷地加以鎮壓。工會團結同盟的罷工委員會會址被搜查，委員被下獄，糾察員被毒毆、被槍擊、受瓦斯的毒害、遭逮捕。法庭發出了數不清的許多禁令，禁止赤色工會（一九三一年工會團結同盟紐約地方會議上，食品工人產業工會展覽了一百一十道禁令，都是對付他們的紐約罷工的）。有幾個州宣佈取締工會團結同盟。在布魯克林，勞工部的特務會恫嚇一些僱主，不許他們和工會團結同盟的工會成立合同。勞工部並在著名的工賊邁克主持下將數百名英勇戰鬥的工人驅逐出境，而且往往驅逐到法西斯國家，被驅逐的人中間有工會團結同盟的工作人員多名。政府對工會團

結同盟所主持的失業工人示威，攻擊尤其惡毒，他們使用的手段包括警棍、手槍、催淚瓦斯、騎警的衝襲和監禁。僱主、警察、流氓等等對於工會團結同盟和其他英勇戰鬥的力量所進行的種種聯合進攻，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社會黨元老工會領袖們都是視若無睹，不去過問。

在工會團結同盟火的洗禮中，被毒毆、被監禁、被驅逐出境的工人達數百人之多。被殺害的也不少。據勞工調查協會的統計，從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工會團結同盟的鬥爭中被殺害的工人是二十三人。其中八人是在罷工中被殺的，如在加斯頓尼亞被殺的維金、在紐約被殺的卡托維思、在肯塔基州被殺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全國礦工工會組織委員席姆士等等。在失業工人示威中被殺的十五人，其中有五位是在著名的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月底特律城福特工廠飢餓遊行中被殺害的，有三位黑種工人是在芝加哥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反對驅逐房客的鬥爭中被殺害的。

失業工人的鬥爭

在本章所敘述的危機時期以至羅斯福總統任期開始時為止，工會團結同盟的主要活動，在於組織和領導正在挨餓的廣大的失業羣衆。它的組織爲全國失業工人委員會，最初由班·甲明領導，後來由安姆特與米爾斯領導。這個組織原來直屬工會團結同盟，但後來成爲獨立的團體，得到共產黨、工會團結同盟、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其他革命團體的充分支持。

工會團結同盟確定這一工作的中心問題爲：要求實行聯邦失業保險，這筆費用由政府 and 廠方

支付，並以在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基準。這個要求是符合工會團結同盟代表大會關於社會保險的決議案的，這些要求終於形成爲一項法案，名爲工人失業保險法案（國會紀錄三二二七號）。工會團結同盟並爲其各種各式的失業救濟辦法進行鬥爭，例如地方救濟費、以工代賑、反對驅逐房客、兒童免費就學等等。它把工人組織起來成立里弄、街鄰、城市 and 全國的委員會和會議，無須繳納會費。它的主要鬥爭方法就是羣衆示威，但也緊張地進行了個別救濟的工作。它無情地揭露這一時期所有種種騙人的慈善計劃，這種計劃絕不能拿來代替有效的失業保險和失業救濟。它的戰略的中心在於把失業工人的鬥爭和在業工人的鬥爭聯繫起來。

工會團結同盟的失業工人工作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徵，就是支持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左派，即魏英斯托所領導的失業保險和救濟委員會。這個基層羣衆的團體在工會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主張失業保險和救濟，反對格林所主張的輪班工作計劃、實行地方慈善救濟、把交不起會費的失業工人開除工會會籍等等反動政策。一九三四年二月政府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調查會上，魏英斯托證實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工會已有三千多個工會贊成失業保險法案。以後，又另有數百個工會表示贊成。美國勞工聯合會在一九三二年代表大會上不得不改變反動態度而至少在口頭上主張失業保險，這一委員會的工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首先爲失業工人的利益而鬥爭的是全國失業工人委員會，它是與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共同進行工作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則公開支持胡佛；社會黨在玩弄資本家的各種各樣虛偽的慈善計劃

(例如湯瑪斯在無線電廣播上對同摩爾根擁護那騙人的「里弄援助制度」，祇在我們在組織失業工人方面做了兩年工作之後他們才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活動。因此，廣大工人羣衆都擁護失業工人委員會的領導。它在「要不餓死便起來鬥爭」，「要工作，要工錢」的口號下組織了許多次全國性的英勇的示威鬥爭。第一次是著名的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示威，參加遊行的工人約一百二十五萬人，其中在紐約十一萬人，在底特律十萬人等等。這次示威把失業保險的問題確定地提高到當前全國性政治問題的水平。在紐約，由於失業的羣衆人數至爲龐大，資產階級驚慌失措，在三月六日之前，形勢十分緊張。在三月六日的前幾天，烏爾公開與警察合作，在報章上大事造謠，誣曠工會團結同盟會自莫斯科收到二百萬美元以佈置這次示威。警察局長惠倫下令禁止示威隊伍前往市政廳，並動員了一萬八千名警察和七千名消防隊員來阻止。『聯合廣場』到處佈滿警察，附近的房屋上密佈機關槍，儘管如此，我們仍是打算遊行，警察於是衝擊羣衆的隊伍，以警棍亂打，將隊形衝散，打傷工人多名。工人委員會的人員，包括邁納、安姆特、雷蒙和我自己在內，全數被捕並被判處在紐約郡反省院監禁三年。我們都是僅受徒刑六個月便假釋出獄，只有雷蒙受十個月的徒刑。其餘我們做的事是宣誓保釋。

除了這次鬥爭之外，失業工人委員會在共產黨、工會團結同盟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等等充分支持之下，另外組織了許多次全國失業工人示威、飢餓遊行、羣衆代表團和代表大會等等。曾舉行三次全國向國會請願運動，在請願書上簽名的每次至少有一百萬人。這些大運動中比較重要的

有一九三〇年七月四日在芝加哥的全國失業工人代表大會，參加的代表一千五百人；一九三一年二月廿五日全國失業保險日，示威者四十萬人；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示威者五十萬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全國飢餓遊行，有一千八百個代表到達華盛頓；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的第二次全國飢餓遊行，有代表三千人，各城市參加者估計一百萬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斯福就職日的全國大示威。工會團結同盟也會積極支持著名的一九三二年向華盛頓進軍的退伍軍人補助費遊行，這次遊行是被胡佛在刺刀的逼迫下趕出了國會的。這次遊行是由列文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工人退伍軍人同盟所發起，不過這次運動却具有極爲廣大的羣衆性，以致大大超出了該同盟所能掌握的程度。

工會團結同盟的失業工人鬥爭，主要戰場却是在各個地方。在這些地方，失業工人委員會進行了無數次城市的和州的飢餓遊行，反驅逐房客鬥爭，失業工人代表大會等等。幾乎每一個工業中心都有這種活動。示威都是極具戰鬥性的，通常總受到警察的狂暴攻擊。這些鬥爭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迫使城市當局不得不救濟飢餓的羣衆。這種例子很多，現在僅舉其中二例：一九三二年秋，聖路易市議會決定對一萬七千個家庭停發救濟金，但是失業工人委員會却組織了一次大規模有戰鬥性的示威，迫使市議會立即撤消了這一野蠻的決議；一九三二年夏，在芝加哥，失業工人委員會和失業公民同盟結成一戰綫，組織了一次巨大的羣衆運動，打敗了擬將救濟金減少百分之五十的計劃。在其他幾十個城市，戰鬥性羣衆鬥爭的政策也獲得了這一類成就。

共產黨、工會團結同盟和失業工人委員會展開了失業工人底偉大鬥爭，他們在美國工人史上寫下了最優秀的鬥爭的一頁。挽救羣衆不致真正餓死和促使聯邦大規模救濟措施的終於成立，這個運動會是一個決定的力量。這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底極爲反動的政策，社會黨底搖搖的、兒戲的態度，適成鮮明的對照。

工會團結同盟在採礦工業方面

在克里夫蘭改組之後，工會團結同盟擴大了它的罷工活動。在危機時期的最初幾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不斷的衰落和腐朽，這在全國各地普遍地在種種工業中擴大了獨立工會運動的基礎，使革命工會的領導責任，担子越來越大。不過，工會團結同盟的最大的鬥爭場所却仍是採礦工業。在危機時期直到羅斯福執政之前，工會團結同盟在這裏進行了幾次大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九三一年夏，全國礦工工會在賓夕凡尼亞州西部，俄亥俄州東部和西佛吉尼亞州北部所進行的罷工。參加這次罷工的礦工四萬二千人；在美國革命工會所領導的罷工當中這是最大的一次。

一九二七—二八年罷工失敗和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在這些地區垮台之後，工資慘跌，由每日七元五角跌爲二元，工作條件十分惡化，到處大批失業，真正飢餓的現象充滿了整個礦區。新成立的全國礦工聯合會就是在這個局勢下產生的，它的領導者都是些善於戰鬥的人物，如書記波理赤、杜黑、邁爾斯柯、湯普遜、斯林格、邁納里奇、卡敏諾維奇等等。他們會進行了廣泛的宣

傳，並勝利地舉行了幾次地方礦山的罷工，這些罷工在屢經失敗和精神沮喪的礦工中間激起了新的希望。在這之後，全國礦工聯合會號召舉行『反飢餓罷工』，向減低工資的新浪潮宣戰。

罷工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廿七日在艾特拉斯堡——麥唐納礦山開始，罷工工人一萬人。它迅速擴大，罷工的熱情傳遍了各種痛受壓迫的礦工。到六月一日，罷工人數達一萬六千人，到六月下半月，達四萬二千人，其中有六千黑人。這次罷工影響到美國許多最大托辣斯所屬的礦山。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派去了一些組織工作者，如鄧恩、約翰斯東、維根尼特和我等人，幫助小而弱的全國礦工聯合會進行工作。可是仍然極端缺乏組織工作者去團結願意參加的礦工和動員他們罷工。要是我們能迅即集中更大的力量，我們無疑地是可以至少組織十萬人罷工而且使罷工贏得勝利的。

這次罷工震撼了全區；鋼鐵工人開始動起來了，失業工人舉行了巨大的示威；罷工所影響的地區正在醞釀着大變。工人的鬥爭精神是驚人的，有二萬五千人參加了全國礦工聯合會，不分男女老幼，都紛紛參加羣衆的糾察隊。統一戰綫的地方的與總的委員會都成立起來了，在美國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大規模運用這種組織方法。

政府、資本家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底領袖拚死反對這次罷工。罷工工人面對着大隊的州警察、副治安官員和礦山警察；勞工部的特務在這一地區嚴密搜索外國出生的英勇戰鬥的工人，把他們驅逐出境；法庭則接二連三地發出嚴厲的禁令；武裝部隊則囚禁、毒毆、槍擊許多罷工工人，

人數簡直無從計算，被殺死的工人二名；公司方面把十萬男子婦女和兒童趕出了住房，全區到處都派有罷工替工者——這些人都是迫於飢餓才不得不到礦山來工作的。但是，罷工所受到的最慘重的打擊却是美國聯合礦工工會所造成的，這一工會在匹茲堡終站煤礦公司的礦山簽訂了地方性的協議，同意減低工資。資本家和政府，自胡佛以下，都在同聲高叫『重建美國聯合礦工工會』，使它成爲抵制革命的全國礦工聯合會的堡壘。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和全國礦工聯合會之間，公開進行鬥爭，而米爾斯科、湯普遜和其他一些英勇戰鬥的工人便會因爲這一鬥爭而被囚禁了二年。

七月十五日，全國礦工聯合會在匹茲堡舉行了統一戰綫的全國礦工會議，以擴大這次罷工。出席的有代表八州二百七十個礦山的六百八十五名代表。這次會議決定設法把鬥爭擴展到其他地區。可是，還沒有動手去做，遭遇重重困難的罷工便已開始趨於減弱，工人們陸續復工了。八月十八日，在匹茲堡的總罷工委員會決定各礦工人應盡可能爭取到最好的條件，這實際上就是宣佈停止罷工（這件事做得稍爲遲了一些）。這次罷工是失敗了。全國礦工聯合會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許多礦工被列入黑名單。不過，礦工狀況的可怕的惡化至少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在羅斯福的新政期間，重新建立美國聯合礦工工會時比較容易得到廠方的承認，就是由於廠主們還生動地記起一九三一年全國礦工聯合會大罷工的原故。

這次大罷工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不久之後，肯塔基州的礦工在全國礦工聯合會領導下舉行罷工。這些礦工以前是由美國聯合礦工工會領導的，過去幾個月來一直在進行着美國煤礦工業史

上最堅決的罷工，鬥爭幾乎成了游擊戰爭，雙方傷亡很大。肯塔基州的礦工們因為痛恨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錯誤領導和受全國礦工聯合會英勇鬥爭的感召，派出了代表團，由斯林格率領參加在匹茲堡城舉行的全國礦工聯合會全國罷工會議，回去之後重新組織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的罷工。他們受到資本家及其僕從們利用宣傳和恐怖手段加以攻擊，資本家們高叫所謂「共產主義的威脅」。肯塔基州的煤田幾乎成了兵營，全國礦工聯合會的整個地方領導機關人員在派恩維爾被捕。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有礦工八千餘人罷工，他們幾乎全部是幾代祖先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不過這次罷工力量並不大，因為在恐怖統治之下準備不充分，所以很快就失敗了。

在伊利諾斯州，全國礦工聯合會也進行了許多活動。一九二九年在他成立之後不久，立刻就

在柯比什萊、湯普遜、伏賽等人的領導下，在南方幾個產煤縣份中反抗伊利諾斯州美國聯合礦工工會腐敗領袖的礦工們組織起來了，人數有好幾千。於是舉行了一次罷工，要求改善礦工的日益惡劣的處境，反對美國聯合礦工工會藉以壓迫工人的資方代扣會費制度。不過這次罷工沒有充分的準備。約計一萬到一萬五千工人罷工，罷了幾天但是沒有成效。這次計劃不週，組織不善的罷工，使全國礦工聯合會在伊利諾斯州全部垮台，使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在這些礦區多年來強大的影響大受破壞。自這次失敗之後，全國礦工聯合會在伊利諾斯州逐漸取消了僅存骨架的地方工會而支持美國聯合礦工工會中逐漸增長起來的反對派活動。這種活動，主要是社會黨人和繆斯特派分子所領導的。此外，在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力量和鬥爭精神都在日趨衰落的時候，

各地煤礦工業都發生許多與此相類似的運動。前一種運動和後一種運動中的一派終於在一九三一年秋與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分裂，另外成立了美國進步礦工聯合會。後來，美國進步礦工聯合會和美國聯合礦工工會之間，爲了爭奪地方工會的控制權，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伊利諾斯州的多次武裝衝突中，有二十三人被殺。後來，在進步礦工聯合會中形成了一個十分反動的領導集團和政策。

在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煙煤區，全國礦工聯合會原擬建立地方工會，但很快就看到在這些已有工會組織的地區這種作法是頗爲不智的，便開始以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左翼反對派的身份進行活動。在礦山裏情況極爲惡劣，工會領導機關對礦主唯命是聽；因此有幾種強有力的反對運動發生，這些運動通常以舉行『非法』的罷工爲頂點，終於產生雙重礦工工會。在這些運動中，工會團結同盟有很大影響，但是沒有能够贏得領導權，領導權總還是在摩爾根、舒斯特等一流人物手中，他們利用這些運動招搖撞騙。

紡織工業方面

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主席是李德（註一）是在一九二八年新貝德福城二萬五千名紡織工人罷工（註二）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鮮明地表明了工會團結同盟的一個特有的弱點——領導人物變動太多，在其存在的五年中間，它曾有過好些全國書記：基勒、魏斯波、米勒、穆爾道克、德萬、魯沙克、柏拉克。

工中誕生的，這次罷工部份地打敗了資方普遍減低工資百分之十的計劃，在這方面，原來的工會教育聯盟會起了決定的作用。在這次罷工之後，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派出組織工作者到南方，很快就在北加羅林納州加斯頓尼亞地方的工廠裏建立了據點。當地的工人原是完全没有組織的，他們十分不滿意極低的工資和殘害工人的『延長工時』或趕快制度，這個地區重工業充斥，到處都是貧窮和可怖的飢餓所造成的疾病——意大利癩病。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有六千人造絲工人在田納西州的伊利薩伯頓城自發地罷工，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由於專門注意加斯頓尼亞正在發展着的鬥爭，未能及時派組織工作者前去該城，罷工的領導便落入美國勞工聯合會手中；他們很快就把罷工結束了。四月二日，業已部分組織起來的加斯頓尼亞工人在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下，在曼維爾——珍克斯的工廠爆發了罷工。這次罷工擴大得很快，最後波及了加斯頓尼亞區的五千工人。廠主自始就拚命地企圖把這次十分英勇的罷工鎮壓下去。

加斯頓尼亞的罷工竟是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在南方紡織工人廣大羣衆中間，廣闊地展開了激烈的罷工方式的反抗運動，反對無可容忍的『延長工時』和工資低微的制度。馬里安、格林維爾、丹維爾和其他許多地方迅速爆發了罷工。美國工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一種無組織工人自發的巨大騷動。可是，工會團結同盟却喪失了領導這整個鬥爭的大好機會。憑着它在加斯頓尼亞的威信，要是把一切可能的外勤組織工作者都派出去並召開一次南方紡織工人代表會議的話，本來是

可以把許多分散的鬥爭團結成一個偉大的協同動作的鬥爭的。但是當時領導着共產黨的洛夫斯頓集團很缺乏組織工作的經驗，批評了擴大這一鬥爭的建議，反而把一切力量集中在加斯頓尼亞。

總的結果就是把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致命地孤立於恐怖統治下的加斯頓尼亞，聽任這種普遍自發運動的領導權由於疏忽的原故而落入美國勞工聯合會手中。美國勞工聯合會因為震駭於在紡織業中的赤色工會運動，突然決定『組織』南方工廠的工人。格林當即派來了一批組織工作者，把南方各地主要的罷工都控制在手上。於是他們遵循其不罷工的政策，窒息了一切英勇戰鬥的行動；根據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與廠主訂立趕快工作協議的原則，結束了一切罷工。可悲的是：工人是反對趕快制度的，而美國勞工聯合會政策的中心却是助長可恨的趕快制度。工人們到處勇敢地與流氓、軍隊和警察鬥爭，有許多工人被害。但是，他們已沒有勝利的希望。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詭譎技倆，穆斯特所領導的進步分子集團的技倆，的確不是他們所能應付得了的。他們的罷工到處遭到打擊，整個偉大運動完全崩潰了。這事件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動領導的另一個可痛心的紀念碑。

就在這個時候，加斯頓尼亞正在進行着一場猛烈的鬥爭。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的罷工工人極端有戰鬥性，而廠主的打手則極為殘暴，維金就是在這裏被暴徒開槍殺害了的。警察和公司的警衛隊屢次使用恐怖手段，企圖打破罷工工人的團結精神，有一次他們武裝襲擊國際工人救濟會所主辦的罷工工人收容營。工人們也手執武器起而自衛。經過一場激戰之後，襲擊者終被擊退，警

長艾德荷特就是在這次鬥爭中喪命的。廠主們在激怒之下，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私刑式的冤獄，有七十個工人被捕並被控犯殺人罪，其中十五位終於被判五年到七年徒刑，被判徒刑的有：麥拉夫林、麥金尼斯、亨德利克斯、米勒、比爾（後來變節）、奈特等人。這次罷工終被鎮壓下去。在這次鬥爭中，在加斯頓尼亞的工會團結同盟大部時間都是由鄧恩領導的。

其後的二年間，工會團結同盟參加了羅德島、麻薩諸塞、新罕姆什爾和康涅狄克州的許多地方性罷工，參加這些罷工的工人有五萬人。這些罷工幾乎全部都是反對減低工資和限制趕快制度上面獲得了全盤的或局部的勝利。一九三一年，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與聯合紡織工人工會和聯合絲織工人工會同時在派特遜舉行罷工。鬥爭大多是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領導進行的，而其他工會却在廠主、報紙等等的協助之下取得了妥協的解決。『用一切辦法打敗赤色工會』，這就是廠主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在紡織工業和其他工業的口號。一九三一年二月，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又在勞倫斯城領導一萬人的罷工獲得勝利，反對了趕快制度，阻止了大批解僱工人，逼迫廠方辭退了效率工程師。這一鬥爭在當地是柏克曼所領導的。這一重大勝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精神，因此，一九三一年十月有二萬三千五百工人舉行罷工，他們大部分是無組織的工人。這是一九二二年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勞倫斯城罷工以來最大的一次地方性罷工。這個時候，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的領袖柏克曼已被勞工部逮捕監禁，打算把他驅逐出境（註二）。這一事實，加上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被禁止自由集會，這兩種情況使得美國勞工聯合會得以控制這次罷工並使這次罷工很快就

歸於失敗。

在上述這些和其他許多英勇戰鬥的罷工中，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在紡織工業中普遍地建立了威信。由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只剩下少數骨幹，而且由於他們的不罷工，主張趕快制度的政策，變得軟弱無能了。工人除了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之外，別無其他保護人。不過，紡織工人聯合會的會員人數還是少，起伏於五千到一萬人之間。它為廠主所痛恨，所畏懼，它的會員被列入黑名单。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紡織工會（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的領導人是不惜以一切辦法來破壞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所組織的罷工的；而社會黨和穆斯特進步勞工行動會議派則到處與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作對。

縫紉業方面

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在危機時期的頭三年雖然關於必須保持工資的話談得不少，其實他們却幫助廠主減低工資，幫助的辦法是第一步接受胡佛的虛偽的不減工資不罷工協議，這便利廠主在無工會組織的產業中大大減低工資；然後第二步，在第一步完成了之後便由

（註二）在這緊張鬥爭時期，勞工部公開勾結廠主攻擊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和工會團結同盟的其他工會，

逮捕了全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先後兩任全國書記穆爾道克和德萬，並把他們驅逐出境。勞工部又

將總任的書記，一位美國出生的女子柏拉克逮捕，判決驅逐出境。

工會『自願地』同意減低工資。縫紉業方面的社會黨工會領袖們也執行這相同的總路線，正如他們以前執行美國勞工聯合會一九二三—二九年的趕快制度和加強階級合作的政策一樣。

在危機時期的早幾年，縫紉業中的確有過幾次大罷工，這些罷工是在與僱主商得同意，在資產階級報章的稱頌聲中本着友好的精神進行的。這些罷工大都歷時僅僅幾天，全都是以大事宣傳的所謂工人『勝利』而結束。唯一實際結果就是減少工資，要工人趕快工作，要無組織的工人加入改良主義的工會，逼迫分散的小僱主加入廠主聯合會。在一九二九年—三二年，這種所謂『成功』的罷工發生了十幾起甚或更多一些，範圍包括每一重要縫紉業中心的大部分縫紉工人，然而縫紉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却急轉直下地惡化。

漸成立的縫紉業工人產業工會，設在紐約，由海曼任主席，哥爾德任書記。這個工會為反對縫紉業工人生活水準的不斷下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它猛烈反對當時美國勞工聯合會底減低工資和計件工資政策。它提出了『把假罷工變為真罷工』的口號，它所實行的政策是：在它所能支配的工廠中組織自己的會員舉行這種罷工；號召美國勞工聯合會和聯合成衣工人工會的工人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與縫紉工人產業工會合作，為工人的真正要求展開英勇的鬥爭。因此，縫紉工人產業工會能以大大加強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縫紉工人的抵抗力，至少部分地保護了他們，使他們不致為減低工資和工作條件普遍惡化的惡浪所捲沒。

除了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罷工之外，縫紉工人產業工會並在自己的旗幟下進行了多次罷

工。次數很多，在這裏不勝枚舉。在胡佛的危機時期，幾次比較重要的罷工是：一九二九年二月，紐約一萬成衣工人罷工；一九二九年六月，紐約二千毛皮工人罷工；一九三二年二月，紐約三千成衣工人罷工；一九三一年七月，紐約四千毛皮工人罷工；一九三二年二月，紐約八千成衣工人罷工；一九三二年七月，紐約七千毛皮工人罷工；一九三二年八月，南河城一千八百成衣工人罷工。在波士頓、費城、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縫紉工人產業工會也舉行了許多次罷工。據勞工研究會的估計，在這幾年中間，僅在紐約一地，在縫紉工人產業工會領導下罷工工人達三萬人。這些罷工當中有許多獲得了局部的勝利。

縫紉工人產業工會的鬥爭是特別困難的，因為這個組織的鬥爭要對付廠主、流氓、警察、法庭、報紙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與社會黨的領袖。雖然如此，工會團結同盟却在這一產業中建立了深固的基礎，尤其是在毛皮業方面，在這裏，會員人數和影響上都大大超過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它在縫紉工人中普遍地有着巨大的威望，它的英勇戰鬥的精神大大堅定了縫紉工人的反抗。對於企圖減低工資的廠主來說，它確是一大障礙。對他們來說，害怕英勇戰鬥的縫紉工人產業工會控制工人的恐懼心理，始終使他們不敢為所欲為。可是，縫紉工人產業工會從來沒有成為大工會。在它存在期間，它的會員人數最少時是一萬五千人，最多曾達三萬人。（作者按：關於縫紉工人產業工會歷史的詳情，請參閱哈第著『成衣工人』一書。）

汽車、鋼鐵、海運業

汽車工業是專業化、機械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高度發展的工業，它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證明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行業工會沒有可能組織從事大批生產的產業。這一工業早就需要獨立的工會運動。在歐戰期間，汽車飛機車輛工人工會曾有過一些活動，這個工會就是一個獨立的工會。但是，在戰後僱主的攻勢中，這個工會被摧毀了。一九二六年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底特律年會會誇下海口，說要把汽車工人組織起來，但當汽車大王拒絕美國勞工聯合會幫助他們使工人趕快工作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的趕快制度很感滿意），會要求給以組織工人的權利的十九個工會便從此悄然放棄了它們的『組織運動』，不再過問了。

在這之後不久，工會教育聯盟爭取到了以前汽車飛機車輛工人工會孤立的底特律地方分會的領導權。一九二九年，這情形擴大到汽車工人工會（屬於工會團結同盟）。這個汽車工人工會設在底特律，領導者為雷蒙、石米斯、哥茲等人。它在汽車工人中進行了積極的活動，並在共產黨和底特律失業工人委員會所組織的失業工人的幾次大門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所進行的第一次重要罷工就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弗林特城費歇車身廠的罷工，參加的有五千工人。這次罷工是失敗了的，原因是這一個廠的領導權落在公司走狗手裏去了。這一工會還進行了許多次小規模的罷工。

在本章所談到的羅斯福上台以前的危機時期，汽車工人工會所領導的最重要的罷工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一二月間。當時廠主正在大事減低工資。汽車工人工會在布里格斯滑鐵盧工廠發動了六百人的罷工，打败了減低工資的企圖。這一勝利是開始蔓延開去的一點星火，很快就發生了連續不斷的罷工，所有的罷工都得到了勝利，終於發展成爲布里格斯工廠的一萬人罷工（布里格斯工廠是爲福特工廠製造車身的工廠）。這次罷工贏得了一些讓步，但最後終又失敗。它會使得福特工廠破天荒第一次因爲罷工而停工幾天。赫得遜汽車工廠三千工人的另一局部罷工也贏得了局部勝利。這些罷工使汽車工人工會的會員大大增加，威信提高不少。這些罷工在掀起全國復興計劃時期的巨大罷工浪潮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汽車工人工會的會員於一九三三年達最高點，共有五千人。

鋼鐵金屬工人產業工會是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在由匹茲堡將原屬於工會教育聯盟的五金工人產業聯盟改組而成的。五金工人產業聯盟原由奧佛加德領導，鋼鐵金屬工人產業工會則由墨爾頓、鮑威爾斯和伊更任書記。鋼鐵金屬工人工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鋼、鐵、錫業工人聯合會，軟弱腐朽，死氣沉沉、充滿反動精神，絲毫不去組織鋼鐵工人。在我們現在所談判的危機時期，直到羅斯福上台時爲止，鋼鐵金屬工人產業工會主要是從事羣衆宣傳並在失業工人中進行工作。它所組織的主要罷工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俄亥俄州瓦倫城共和鋼鐵公司工廠一千五百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勝利地結束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它只有納費會員一千四

百人，但是影響甚為廣泛，這種影響很快就在全國復興計劃時期掀起了十分重要的罷工。

航海運輸工人產業工會（書記為赫得遜）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成立於紐約，會員二千人。它是由原來的航海工人產業聯盟（書記為明克）改組而成的。它是在這一工業中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十幾個軟弱無能互相傾軋的行業工會使得工人精神沮喪的情況中誕生的，這些行業工會中最重要的是極端反動的里安集團所領導的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和也是極反動的富祿塞思—奧蘭德集團所領導的國際海員工會。航海運輸工人產業工會的前身航海工人產業聯盟，曾在費城、加爾維斯頓、新奧爾良、杜路斯、薩克拉孟托等地在海員、碼頭工人、內河船夫中進行許多宣傳工作和進行了幾次小規模的罷工。由於它的工作的發展，終於成立了航海運輸工人產業工會，這個工會在新政時期領導了十年來第一次的航海運輸業的重要罷工，在舊金山的偉大的總罷工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農業、食品 and 製鞋業

在工會團結同盟克里夫蘭大會上，由遠西地區前來的幾個農業工人代表組織了農業工人產業聯盟。這個聯盟後來改組為罐頭和農業工人產業工會。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產生的這個組織，很快就領導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業工人罷工，並成為美國農業工人所會成立的最成功的一個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自然完全忽視了農業工人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整個展開在工會團結同盟面前。

罐頭業和農業工人產業工會（當時還是一個聯盟）不愧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農業工會最優秀戰鬥傳統的繼承人，它於一九三〇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帝國谷』地方領導了二次有戰鬥性的罷工：一次有二千五百人，另一次有四千人。罷工工人大部是墨西哥人、菲律賓人和日本人。罷工是在極為恐慌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罷工的結果是工人獲得了很大果實。由於大事搜查工會會所，有一百工人被捕，有八名工人領袖被判徒刑三年至四十二年而監禁於聖昆田反省院（這八位是斯塔托、斯克拉、艾力遜、伊默利、羅哈斯、奧羅斯科、堀內和赫勒拉）。

罐頭業和農業工人產業工會所進行的另一次十分重要的鬥爭，就是一九三二年春季科羅拉多一萬八千甜茶工人的罷工。這次又是遭受了殘暴的鎮壓，被驅逐出境的有墨西哥工人數千人之多。這次罷工爭得了一些讓步。領導這次罷工的是杜黑和紀恩，主持這次罷工的是一個包括若干兄弟組織的團體：『甜茶工人統一戰綫行動委員會』。

罐頭業工人產業工會的主要據點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和西南地區，不過在其他各州，甚至遠在東面的紐澤西州也有一些地方分會。一九三三年四月，它領導了聖佐斯二千二百摘花生工人罷工；一九三三年六月，東部新墨西哥州有摘棉工人二千人在它的領導下進行罷工；一九三三年九月，加利福尼亞有六千採葡萄工人和數千種蕎麥工人罷工；一九三三年十月，南部加利福尼亞州和阿利桑那州有一萬八千採棉工人罷工等等。下一章我們將說到這一工會的領導人員如何因這些有戰鬥性的勝利的罷工而被捕下獄的情形。罐頭業和農業工人產業工會和夥種農聯合會、南方佃

農聯合會等等貧苦農民的組織合作，共同反對強大的壟殖公司。

奧柏梅耶、勃魯姆菲爾德和魯濱等人所領導的食品工人產業工會是一九三〇年從聯合食品工人工會分裂出來之後成立的。它的總會和最堅強的組織設在紐約。這個工會有這樣的傳統爲其基礎，即是說，工會教育聯盟曾在聯合食品工人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和在無組織的工人中間進行了十幾年的左翼的宣傳工作。食品工人產業工會領導了紐約飯館、咖啡店和食品店的幾百次小規模罷工。它特別需要與罷工禁令的威脅作鬥爭。每次罷工，剛一開始便會立即遭到禁令的制止，這種禁令都是僱主和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所準備好的。爲了執行工會團結同盟以羣衆的行動去打破這種禁令的政策，曾有會員數百人被捕下獄。雖然食品工人產業工會的罷工有許多都得到成功，然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即本章所說這一時期的末了）會員人數總是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不過在這日期之後不久，會員人數一躍而增加了好幾倍。

製鞋及皮革工人產業工會成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領導者爲畢登克普、季貝爾等人，總會設在紐約。其前身爲獨立製鞋工人工會，這主要是布魯克林製鞋工人的組織，再以前則是工會教育聯盟的製鞋與皮革工人聯合委員會。這些組織曾在自己的旗幟下進行了多次罷工，而且在若干獨立的製鞋工人組織和反動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靴鞋工會內部進行了鬥爭。他們的罷工，最重要的有一九二九年紐約獨立製鞋工會四千五百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成功的，另外是一九三二年製鞋與皮革工人產業工會一千四百名工人的罷工，這次却遭到失敗。

工會團結同盟的其他工會與團體

煙草工人產業工會成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總會設在紐約，主要的全國領導者為特拉斯、烏弗爾和拉米列茲。這個工會的地方性很大。在成立之前，工會團結同盟在佛羅里達州淡巴城的雪茄工人七千人曾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舉行罷工。由於該城工會在十一月七日紀念十月革命節，被該城當局逮捕了工會重要會員十五人，工會舉行了三天總罷工，使淡巴城所有的雪茄工廠全部停工。在恐怖的高壓下，工會終於被摧殘，波尼拉、勒沙瑪和麥唐納各被判徒刑十年，艾爾瓦列茲和馬勒羅各被判徒刑三年，被囚於惡名昭彰的佛羅里達苦役營中。煙草工人產業工會曾於一九三二年在紐約舉行工場大罷工，一九三二年八月舉行紐約全市總罷工，兩次參加工人五千人。但在這些罷工中，工會會員增加的人數不多。

木材工人產業工會，書記勃朗，總會設在西雅圖，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是過去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木材工人組織的一部分所組成的。它曾在太平洋西北地區組織許多次小規模的罷工，但在新政開始時，只有會員約三千人。

傢具工人產業工會，書記基斯，一九三四年二月成立於紐約。成立約十四個月之後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傢具業工會合併。在新政時期，這個工會曾舉行一次重要的總罷工。

食品與屠宰工人產業工會，書記魏斯曼，總會設紐約。它進行過幾次罷工，會員人數不多。

除了以上所說過的十三個全國產業工會之外，工會團結同盟還有一些地方性的組織，其中有建築養護工人工會、漁夫與罐頭工人產業工會、理髮工人產業工會、新式皮革工人工會、珠寶工人產業工會、機關工人工會、批發與織品工人工會、印刷工人產業工會、出租汽車工人工會、玩具具工人產業工會、攝影工人產業工會、洗衣工人產業工會等等。

工會團結同盟的最重要的工會團結委員會，即各地方中央組織，是在紐約。至一九三三年末，會員人數達四萬五千人，在一九三三年第四季會領導六萬五千工人的罷工。在它存在的五年期間，書記爲約翰斯東、札克、司徒奔和奧佛加德。

工會團結同盟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各工會和鐵路兄弟會內部有許多左翼小組，主要是在採礦、縫紉、建築、製鞋、五金、印刷和其他已爲行業工會所控制的產業中。在工會團結同盟期間，這些團體在它們所屬組織的生活和鬥爭上面都會起過相當大的作用。這些團體在規模上都是地方性的，僅有的例外就是：鐵路工人產業同盟（書記爲萬格林，總部設在芝加哥）和紐約印刷業產業同盟。

第十五章 工會團結同盟（續）

新政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斯福就任總統時，曾一度向全世界吹噓爲不怕危機的美國資本主義，卻正處於混亂的、皇皇不可終日的境地。它那時正遭遇世界經濟崩潰，而所受的打擊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國家的每一個銀行都關了門，工業癱瘓了，國內和國外貿易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約有一千七百萬工人失了業，幾十萬農民失掉了他們的農莊，成百萬成百萬的銀行小存戶喪失了他們的存款，大批中產階級的人典出的住宅無力贖回了。失望了的和不滿的羣衆在躍躍欲試地動盪着；全國各地的失業者都在舉行戰鬥性的反飢餓示威，退伍軍人在舉行爭取補助金的遊行，農民也舉行罷工。各個方面的羣衆都憤怒地，雖然是惶恐地，談論着不立刻採取措施使他們免於無法忍受的飢餓和他們那種日益貧困的狀況，他們就要採取激烈的行動了。

這種經濟制度垮台和羣衆迅速覺醒的危險局面，使美國的資本家階級感到從所未有的恐懼。他們的作家和發言人用悲觀氣氛、恐懼和悲哀的預測填滿了報紙和無線電廣播。似乎馬上就要到來的不是繁榮，而是革命。財政資本——大銀行家和工業家——了解到，如果他們要繼續保持社

會統治權，就必須有所作爲，來攔住正在崩潰中的資本主義制度，並緩和羣衆中間正在迅速增長的激進思想。顯然，粗糲的殘忍的胡佛政策——用億兆美元來救濟銀行、鐵路公司等等，另一方面，却讓一切其它的人破產和挨餓——正在把資本主義一直驅往災難。必須採取新的辦法，而且要快。財政資本決定要採取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辦法』——就包括在羅斯福的『新政』方案中。

新政的要點，正如它的按字母次序排列起來的幾十條法律和幾十個機關所表達出來的，是大大加強聯邦政府的中央集權以及使該政府循着以下幾個主要方針加緊干預經濟生活：一、政府以億兆美元給予銀行、鐵路公司等，使他們免於破產；二、通過通貨膨脹（美元貶值、發行巨額公債等等），固定價格法規以及有組織地限制農工業生產來提高物價水平；三、延長贖取抵押品的期限，這樣銀行凍結在無力贖取的充作抵押品的農莊和住宅上面的億兆巨款，就可以活動了；四、政府在公共工程上大筆投資，來『使工業開始活動』和緩和工人們的不安；五、用法律來彌補資本主義銀行與信貸制度中最大的破綻，包括對股票交易及外國公債的售賣的監督等等；六、加緊爭奪世界市場的鬥爭——擴大海軍、空軍、陸軍，締結新的關稅協定等等；七、對瀕於成爲餓殍的失業大軍和老年人略施小惠，給他們一筆微不足道的聯邦救濟金和養老金；八、給予工人以組織工會的含糊不明確的權利；九、有組織地津貼農民，讓他們減少生產。

新政靠着巨大的政府開支和對羣衆施以小惠，在實質上，乃是一劑強心針，是要麻醉這個經

濟制度，使它暫時忘掉正在加深的危機。它打算稍稍緩和一下經濟壓力和羣衆壓力，用這樣的辦法來保存資本主義制度。新政的中心『全國復興法』，就是華爾街設計出來的，而且首先是由美國商會宣佈的。許多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都稱讚它是法西斯主義的開端。把新政叫做社會主義的或者共產主義的，都是胡說；它與二者都毫無共同之點。

新政分子驕傲地，而且並不是毫無理由地作豪語說，他們拯救了資本主義制度，至少是暫時地拯救了它。當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寫這書的時候，就是那些在開初熱烈擁護新政的財政資本家們現在又在猛烈地攻擊它，最高法院則在忙於逐一廢除『全國復興法』和農業調整法等等。但是，這些資本家們現在對新政採取了這樣一種敵對態度，那不過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已經渡過了危機的最危險時期，新政對於他們的好處已經完了，一個更反動的漸政策已是必要的了。縱使羅斯福給予日益貧困的工人、農民和下層中產階級大眾的一些讓步，他們都想要以剝奪。

爲了爭取羣衆支持這個資本主義的萬靈藥方『新政』，就必須爲它進行一個美妙的、籠絡人心的宣傳。這樣，就進行了很多很多這種宣傳，並且要遠遠勝過了胡佛的有名的『每一個鍋裏都有雞』的諾言。他們以生動的辭句允諾給予勞動者以較高的工資、穩定的就業、組織工會的權利，並允諾從『兌換商』的掌握中拯救農民和中產階級。羣衆的購買力將予提高，財富的再分配將告實現。羅斯福總統親自參加了這個諾言運動，發表他的『被遺忘的人』的泛論和很多的自由主義辭彙。其他的新政份子則狂熱地遠遠超過了他，把新政叫做一個『革命』，『一個新社

會秩序的誕生』，『富裕的時代的開端』等等。首要的智囊摩利甚至抱怨『同志』這個字被人們玷污得太厲害了，因而新政的贊助者不加以使用。他說：

『我感到遺憾的是，「同志」這個名辭已經被外國的、陌生的和非美國的各派社會革命者和改革者使用過了。惠特曼在用他的偉大的詩來表達所有的人們——不分貧富尊卑，都獻身於建築一個幸福人民的國家的原則的人們——之間的民主團結時，曾使用這兩個字，我所指的同志，就是這種意思。』

(註)

工人運動和新政

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工人兄弟會的領袖們無保留地擁護新政。他們把羅斯福的整個綱領捧作天賜的禮品，把『全國復興法』捧作『工人的新憲章』。『藍鷹』變成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會徽，第七節甲款變成了美國勞聯的聖經。工會的極右翼領袖格林之流，詆譏一切罷工與其它戰鬥性的行動，對於成立勞工黨的議論置若罔聞，並宣傳要完全信賴羅斯福。他們一再重複他的諾言和謬論。羅斯福將為工人解決一切問題：他將使失業者有飯吃，並將為他們找到職業，改善失業者的生活水準，把工會建設起來。這樣，這些領袖們就熱心地參加到全國勞工局和許多製訂法規的機

(註) 紐約時報，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構裏，使自已相信，使工人們相信，這些實際上原是爲了支撐行將崩垮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建立起來的組織，竟是打算爲了工人幹事情的。只有礦工工會、紡織工人工會和縫紉業工人工會（後來成爲產聯的組成部份）採取了鄭重其事的獨立罷工和組織活動。

從了解他們的品質的人們看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資產階級的工人助手們』，對於羅斯福網領的這樣一種投降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難道他們不會搖旗吶喊地追隨威爾遜參加世界大戰，而以後又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僱主對工人實行戰後進攻時讓工人們進行不必要的和災難性的退却嗎？難道他們不會在一九二三—二九年的柯立芝當政時期，把工會降低成爲僅僅是僱主趕快計劃的附屬物嗎？而在沒有人悼念的胡佛政權時代，難道他們又不會像綿羊一樣遵循他的騙人的『不減工資——不罷工』協定和他的殘酷的餓死失業者的政策嗎？因此，這些具有資本家思想的勞工騙子們拒絕領導工人越過羅斯福新政的狹隘圈子，難道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們的錯誤政策不在於他們接受了羅斯福所提議的那些讓步，而在於他們使自已局限於這種微不足道的小惠之中。

社會黨也跟在羅斯福後面跑。社會黨的領袖們熱烈歡迎新政。在某些方面，他們甚至作得比格林之流的工會官僚還要過火，因爲他們把新政叫作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大步。希爾奎特和湯瑪斯都來到華盛頓向羅斯福致敬。沒有一個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幹部比社會黨的縫紉工會領袖們希爾曼、杜賓斯基、查利茨基等更充分地參加到新政的機構裏面。他們全都勸人信賴羅斯福，湯瑪斯

還警告工人們說，現在不是罷工的時候。（註一）

這樣，社會黨的領袖們就暴露了他們的機會主義。僅僅在幾年前，他們還熱情地宣佈，加速生產的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福特計劃）創造了所有人都可富有的條件，從而正在打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現在呢，在經濟學上翻了一個筋斗，他們又聲言，羅斯福的限制生產和讓大批人挨餓的政策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翻這種機會主義的筋斗的並不僅僅是美國社會黨領袖們。英國、法國和其它國家，著名的社會黨人物同樣地盛讚羅斯福，並開始按照他的綱領來擬定他們的綱領，而在幾年前，他們會歡迎過福特，在那以前，歡迎過威爾遜。這些人在過去二十年中一貫是要到美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領袖（最初是威爾遜，其後是福特，後來是羅斯福）那裏去尋找啓示和政策，真是古怪的馬克思主義者。難道還需要什麼更好的證據來證明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破產嗎？

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及社會黨截然相反，一開始就反對羅斯福的政策，正如他們反對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階級合作、胡佛主義等等一樣。他們分析了新政的實質——資本主義以犧牲勞苦大眾為代價來修理其殘破的經濟機構和彌補其減少了的利潤的計劃；他們揭穿了企圖經由有組織的匱乏來製造繁榮在經濟學上的謬誤；他們譴責新政的通貨膨脹的傾

（註一）叛徒洛夫斯頓和托洛茨基派採取了同樣的信賴「全國復興法」的路線。

向和成立公司工會的傾向；他們指明，這不會給工人和農民造成真正的繁榮；他們把越來越繁榮的蘇聯指給人看，指出這證明是勞動者脫出危機的唯一道路；他們指明羅斯福綱領的特點是——儘管它對工人、失業者和農民有少許讓步，這個綱領乃是爲了延續資本主義制度及伴隨而來的飢餓、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

由於這一分析的結果，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不依賴羅斯福政府。他們警告工人和農民，新政不會給予他們以諾許的就業、增加工資、組織工會的權利和繁榮；大資本家控制着製訂法規的機構，工人們只有經過英勇鬥爭才能從政府和僱主那裏得到東西。新政實施至今的結果證明了這一分析。一方面，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參加了工業法規和其他立法的意見聽取會議，並力爭對於工人的可能最好的條件，同時，他們又加倍努力開展積極的羣衆鬥爭以爭取失業救濟金和保險金、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勞動者普遍的較好生活水準。他們宣佈了一個戰鬥性的罷工政策，並號召工人們『在糾察線上寫你們自己的法規』。簡言之，當工人運動的其它部份被羅斯福的諾言麻醉了的時候，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忠於他們的革命品質，發出了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聲音，並喚起羣衆進行鬥爭。

工人羣衆的奮起

工人們相信羅斯福的諾言，並且，正如史塔徹所說：『認真地看待他們有權參加自行選擇

的工會這句話」。因此，在新政開始以後，經過整個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在較小的程度上），他們開展了一個巨大的蓬勃的羣衆組織和罷工運動——美國工人階級歷史上最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一。這是一個巨大的自發狂潮，是無產階級對於迅速增長的生活費用、長期的低微工資、失業、非人性的趕快制度和工業中的專制制度所抱憤怒的爆發。它還暴露了對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越來越差。一九一九—二二年的大罷工是有組織工人在僱主進攻下的防禦行動；但是一九三三—三五年的狂潮，却基本上是無組織的羣衆的一個英勇的和強大的反攻。整個運動的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失業者對於罷工者的團結一致和他們的拒絕充當罷工破壞者。資本家們過去十二年中一直在祝賀自己，以爲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已不似先前，這一次却驚慌失措地注視着偉大的勞動羣衆奮起發動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罷工運動。他們對於整個羅斯福新政時期都感到非常嫌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全國復興法』剛一釐訂的時候，一個逐漸擴大的罷工浪潮正在發展着。這個法律的第一個效果就是暫時停止了這個罷工浪潮，把方興未艾的罷工運動變成一個普遍建設工會的運動，並使工人們依賴着政府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幹部們的諾言來伸張他們的不平。但是，運動很快就超出了這一樸素的希望階段。僱主們正在確定令人不得一飽的最低限度工資的規章，頑強地抗拒工會的擴展，在各工業部門建立公司工會，而政府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政策却只是給工人以美麗的保證。這樣，羣衆正確地認清了局勢，並且了解到他們必須戰鬥；他們就在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發動了一個廣泛的罷工運動來『幫助羅斯福實行全國復興法』——當時的工人們普遍地這樣說。煤、鋼、銅、汽車、紡織、縫紉和許多其他工業部門中都爆發了罷工。美國勞工局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在一九三三年罷工者達八十一萬二千人，在一九三二年則為二十四萬二千八百二十六人。

一九三四年初，罷工運動的規模更大了，那一年的罷工者人數達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六百零八人。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罷工具有更大的戰鬥性和更深的政治意義。這是因為，在新政實行的初期，財政資本即表示，將繼續其反對在自由僱用制的基本工業中組織工會的傳統政策，政府方面很快也表示不堅持工人此種組織工會的權利，雖然表面上是同情組織工會的。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在那些工人們正在開展罷工運動的工業中建立起來的幾個仲裁委員會總是對公司工會投降，而使新的工會蒙受挫折的緣故。在新政實行期間，公司所辦的工會的人數估計增加了一百萬至三百萬。

因此，隨着新政的法規的發展，越來越明顯地可以看出，儘管政府的自由主義辭藻，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在無組織的基本工業中，造成了公司工會的發展，令人飢餓的最低工資和長工時的。雖然還沒有完全了解到這一情勢的含義，然而大批工人羣衆已經開始感覺到一項基本真理：如果他們要取得新政所規定的組織工會和減輕痛苦的權利，他們就必須像工會團結同盟所敦促他們的那樣：在糾察綫上寫他們自己的法規。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大罷工越來越帶有反對全國復興法，反對該法所規定的十二—十五美元最低工資標準，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和反對公司工會，反對

羅斯福政府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機構幫助之下建立起來的各個全國復興與法機構的有大害的延宕行為，作弊的選舉和模稜兩可的諾言。

一九三四—三六年的罷工具有美國歷史上空前尖銳的政治性質。在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的激烈反對之下，長久以來即為共產黨鼓動工作之樞紐的政治性羣衆罷工，已成爲美國工人階級的一個確定的武器了。面對着一個善於籠絡人心的政府、陰險的工會領袖和出動了從所未有的衆多的軍隊、警察、槍手和流氓，工人們却以輝煌的英雄主義和團結一致來作戰。托列多、密爾窩基、明尼阿波利斯、舊金山、特列哈特（一九三五）和貝京（一九三六）的偉大戰鬥，一九三四年的紡織工人全國性大罷工，一九三五年的煤礦工人全國性罷工以及這一時期的許多其它的罷工構成了我們工人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工會團結同盟在一九三三年的罷工中

工會團結同盟並不把自己局限於發佈宣言，號召工人們罷工。相反地，從一九三三年起，它就發動了它的一切工會、同盟和少數派小組來參加這個洶湧的戰鬥。他的鬥爭綱領在英勇的、心懷不平的羣衆中間得到了響應。因此，儘管相對地薄弱，工會團結同盟仍能在鼓舞巨大的鬥爭和指導戰鬥的羣衆沿着勝利的道路前進方面起着相當大的作用。

在這整個多事的時期，工會團結同盟都爲史塔徹所幹練地領導着（他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被

選爲副書記)。在一九三二年競選運動中(當時我是共產黨的總統候選人)，我在五個月的演說旅行進行一半的時候，突然得了很嚴重的心臟病，就在九月八日在伊利諾斯州摩蘭城病倒了。許多年來，我都是工作過度的。除了進行許多罷工活動和其他緊張的活動以外，我作了十二次全國演說旅行(有幾次是偷乘火車的)，每一次要召集一百次到一百五十次集會，此外還有無數次較短的旅行。在這些旅行中，我國的每一個州和重要城市，我都不止一次地到過了。但是，在一九三二年競選運動中，操勞過度。結果是，垮了下來，得了狹心症，接着就是神經完全失常，這使我臥病五個月，並使我的生活日夜痛苦達二年之久。只有在現在，我才恢復過來，開始慢慢恢復工作。我最擅長的工作一貫是在大罷工和其他鬥爭期間作一個羣衆組織者，但我的運氣壞到極點的是：在新政時期的所有這些戰鬥激烈的羣衆罷工中，我都只能無能爲力地在床上呻吟。

工會團結同盟對於一九三三—三五年罷工的影響事實上是這時期以前就有了的。當新政年代的這些巨大戰鬥進行時，工會團結同盟多年來爲了發展工人的戰鬥精神而進行的長期鼓動和鬥爭開花結果了。這是意義重大的：恰恰是在工會團結同盟最活躍的領域中(礦業、紡織業、縫紉業、農業、汽車業和鋼業)，後兩種差一些，工人們在新政時期開展了最強有力的罷工運動。特別重要的是：前一章所描述的，工會團結同盟一九三〇—三二三年間在這些工業中所進行的英勇罷工。它們是一九三三—三五年罷工浪潮的前驅。嚴格地說，點燃起一九三三年大罷工的星星之火是工會團結同盟在全國復興法實施前進行的三個重要的罷工運動，那就是：汽車工人工

會在一月到二月間在底特律舉行的一萬六千人罷工，全國礦工聯合會在四月於賓夕凡尼亞西部舉行的三千人罷工，以及獨立的新英格蘭製鞋工人舉行的二月罷工，在這些罷工中，工會團結同盟的力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接着「全國復興法」實施以後，一九三三年的大罷工浪潮一開始，工會團結同盟就在自己的旗幟之下進行了許多次罷工，其中多數得到了勝利。在鋼鐵業中，鋼與五金工人產業工會發動了一九一九年以來的第一批重要的罷工，包括麥基斯洛克斯、布法羅、格林斯堡、拉特羅勃、哈蒙以及安布利治的五千五百工人的戰鬥激烈的罷工；除此之外，工會團結同盟還舉行了多次罷工，捲進來的有紐約及其附近的幾千名輕金屬工人。除了新墨西哥州的蓋洛普的三千礦工的激烈鬥爭和匹茲堡煤礦公司的二千名礦工所舉行的罷工以外，全國礦工聯合會還領導了幾次小的煤礦罷工。汽車工人工會在一九三三年初領導了共有一萬工人參加的底特律地區的罷工。紡織工人工會在薩勒姆發動了一千八百人的罷工，並發動了一萬五千工人參加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勞聯發動的七萬五千人全國性絲業罷工。製鞋與皮革工人產業工會在九月間舉行了有一萬二千人參加的罷工。縫紉業工人產業工會在一九三三年秋季於紐約舉行了一萬五千人的罷工。全國傢具工人產業工會從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三十七個城市中實現了二萬工人的罷工。海運工人產業工會在許多港口和航運公司（包括曼森公司）舉行了若干次小罷工。罐頭業和農業工人產業工會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和十月，在加利福尼亞州舉行幾次重要的罷工，包括地羅的六千採葡萄工人的罷工以

及南加利福尼亞州和伊利桑那州的一萬八千採棉花工人的罷工。菸草工人產業工會在一九三三年八月發動了二千紐約菸草工人的罷工。食品和屠宰工人產業工會十一月在匹茲堡舉行二千七百名屠宰工人的罷工，並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在聖路易斯發動二千名食品工人舉行罷工。洗衣工人產業工會在同年六月於布朗克斯舉行了一千工人的罷工。工會團結同盟還舉行了許多次其他的罷工。『筆和鎚』所作的統計顯示，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和十一月，工會團結同盟僅在紐約一地就舉行了第一百三十二次罷工，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各組織則僅有二十五次。除了少數的例外，工會團結同盟的罷工都爲工人們贏得了廠方的讓步。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迅速地生長起來，至一九三三年年底，共有十二萬五千會員了。

不直接屬於工會團結同盟的各獨立工會，在一九三三年舉行的多次罷工中，工會團結同盟的力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工會團結同盟在這些獨立工會的組織和活動中的這種影響，可以從後者使用爲工會團結同盟所特有的名字上得到證明；例如無線電與金屬工人產業工會、造船所和海上工人產業工會、工具和製殼工人產業工會等等。

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於一九三三年舉行的多次罷工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煙煤產區，全國礦工聯合會和失業委員會一起非常活躍，並且在許多次罷工和反飢餓示威中間，以一個獨立工會姿態而在礦工中起了很大的影響。但是當美國聯合礦工工會所領導的大罷工在那一年開始舉行時，工會團結同盟和共產黨全部的力量都來支持他們，使他們的所有成員都去參

加美國聯合礦工工會，鼓舞在一切戰線上英勇戰鬥，並在重建美國聯合礦工工會方面成爲一個真正的因素。在鋼鐵業方面，鋼與金屬工人產業工會當時約有一萬四千名會員，但是當大批工人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鋼鐵工人工會時，鋼與金屬工人產業工會的會員們就以個人身份參加鋼鐵工人工會，就像全國礦工聯合會參加美國聯合礦工工會那樣，並以一切力量和影響來建設鋼鐵工人工會。在汽車業方面，也是一樣。雖然在底特律及其附近，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在許多活動的過程中（從一九三零年三月六日十萬失業者的示威，福特工廠的反飢餓遊行等等中間可以看出），在工人中有了很大的影響，汽車工人工會總是迅速地和正在擴充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地方工會攜手，並支持他們的罷工。全國紡織工人工會同樣地支持勞聯在紡織等工業中舉行的罷工。在所有這些美國勞工聯合會舉行的罷工中，工會團結同盟的力量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雖然最近忽視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中工作的傾向，妨礙這種力量的發揮。

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在克里夫蘭舉行），以下列數字指明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在一九三三年罷工所起的作用：

	會 員	領導罷工人數	新會員
美國勞工聯合會	11,400,000	540,000	400,000
獨立工會	11,400,000	140,000	143,000
工會團結同盟	11,400,000	120,000	100,000

無組織的

100,000

總計

半八千零二百

一,000,000

七千零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雖然工會團結同盟的會員人數尚不及工會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五，却直接領導了全部罷工的百分之二十，並得到全部新會員的百分之二十。佔工會會員總數百分之十強的各獨立工會領導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罷工。佔工會會員總數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領導了百分之四十五的罷工。

這些統計數字清楚地顯示了，工會團結同盟在一九三三年的罷工活動和組織活動是比美國勞工聯合會為強的。以會員的人數作比例來說，工會團結同盟領導的罷工比美國勞工聯合會多八倍，組織的工人多四倍。這些數字證明，工會團結同盟在整個鬥爭中是至為重要的因素。但是，這些統計數字還沒有能指出工會團結同盟另外一個非常巨大的任務，那就是，直接鼓舞和加強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自身的罷工，正如我們在煤礦、紡織、縫紉業、汽車業、鋼鐵業、運輸業的罷工以及紐約出租汽車工人的罷工中所看到的一樣。

工會團結同盟在一九三四年的罷工中

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一樣，一九三四年的罷工不僅規模更大，更為劇烈，而且更具有政治性質，這一年標誌着大罷工浪潮的頂點。它的特色是強大的總罷工運動的增長。工人們表現

了很大的戰鬥性。並且了解到他們要在新政之下取得任何東西就必須戰鬥，他們以輝煌的團結一致的精神舉行罷工；而另一方面，爲正在生長的罷工浪潮和工人階級的激進傾向所震恐的僱主們以空前的暴力手段來對付這些罷工，毫不留情地使用着民警、警察和武裝惡棍。在一九三四年的全國紡織業罷工中，有十一個州動用了軍隊，羅德島的州長召集議會，宣佈『叛亂狀態』，並要求聯邦方面派遣軍隊，喬治亞州則設立了集中營，把幾千名舉行罷工的紡織工人驅入營中。約有二十名工人在這一鬥爭中被殺死了。同年，爲了粉碎舊金山的總罷工，共動員了三萬軍隊、警察和武裝特務。在工人們開展真正鬥爭的任何地方，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同樣地使用武力。

一九三四年最重要的罷工是托列多、密爾窩基、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罷工，太平洋岸的海員罷工、舊金山總罷工和全國紡織業罷工。這些罷工幾乎全是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旗幟下舉行的。工會團結同盟參加這些罷工都是採取了山它的各工會積極支持的方式，或者是通過美國勞工聯合會裏面的組織來工作。但是，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都起了至爲重要的作用。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戰鬥得很激烈的托列多罷工中，發佈號召，要求舉行羣衆性的同情糾察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失業委員會。這次糾察參加者有一萬人，多數是失業者，目的是支援當時規模還很小的汽車裝備工人的罷工。州的部隊攻擊這一糾察線，打死了一個工人，並施放瓦斯，逮捕了幾百人。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九十一個地方工會中有八十三個，被這一殘酷的攻擊所激起，表決通過舉行總罷工。然而，資方趕忙求得解決，使得這一總罷工令未付諸實施。在不久以後的激烈的

密爾高基電車罷工中（這次罷工也因為地方總罷工的威脅而突然解決了），工會團結同盟的力量同樣地也積極參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車司機的英勇戰鬥中所產生出來的地方總罷工運動，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全國紡織工人工會把全體會員、全部精力和影響都投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舉行的全國紡織工人大罷工（約有四十萬人參加）中。但是，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在這一時期中所作的最重要的罷工作，是太平洋岸海員大罷工和舊金山總罷工。事實上，在這一鬥爭中，他們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性的。總罷工舉行的時候，我恰好在舊金山，雖然因病不能積極參加這一罷工。置身於這樣一個光榮的鬥爭中，而自己又無能為助，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痛苦。

這裏，我的篇幅只允許我簡單地敘述一下這個有歷史重要性的鬥爭。一九三二年當時大部份無組織的舊金山碼頭，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循着兩個主要方向緊張地工作着：海員被組織到工會團結同盟的海運工人產業工會裏面；碼頭工人則被組織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裏面。遵循着這一政策，在一九三三年，就在太平洋岸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海運工人產業工會組織。工會團結同盟的力量又和其他英勇的工人一起，在漫無組織的舊金山碼頭工人中間組織了一個大的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地方工會。碼頭工人的領袖是布利治，地方海運工人產業工會的負責人是傑克遜；兩個人都是左翼的戰鬥分子。共產黨加利福尼亞區的書記是達希。

一九三四年初，碼頭工人中間開始了一個罷工運動。舊金山地方工會率先把薄弱的國際碼頭

工人聯合會海岸各地方工會糾合起來，向僱主提出要求。僱主們，在腐敗的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的上層領袖幫助之下，試用慣常的詭計、拖延、調停、仲裁，以圖打破正在迅速展開的戰鬥性運動。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各地方工會不理會這些詭計，在五月九日宣佈舉行罷工，在兩天之內，使整個太平洋岸陷於癱瘓。布利治被選為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罷工委員會的主席，當地的共產黨機關報『西方工人』被批准為正式的罷工刊物。

實行自由僱用制的僱主們決心不惜一切犧牲來打敗碼頭工人，工人所提要求的中心是組織工人的權利。這激起了一般海員們的戰鬥精神。工會團結同盟的工會海運工人產業工會，迅速號召它的海員們來支援一萬二千名罷工的碼頭工人，並使每一艘進入舊金山的船隻停駛。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其他海員工會也追隨其後，很快地，太平洋岸的整個航運業就陷於癱瘓了。現在已有十個工會，三萬工人舉行罷工了。罷工的各工會締訂了一個團結公約，並組織了五十人組成的聯合罷工委員會，以布利治為主席。

現在，僱主們的確為罷工的蔓延所震驚了。他們加倍努力，以打破工人們的團結一致。數百名罷工破壞者被動員起來；州長麥瑞姆把很多軍隊調到海灣區；一羣勞工部的『調解人』跑來大灌其『調停』的迷湯；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的全國負責人里安、麥格拉第和其他工會官僚，無恥地和僱主們一起，謀劃破壞罷工的陰謀，而這些陰謀都被工人們逐一地打破了。一再失敗的里安不得不離開舊金山，辱罵罷工是共產黨搞的鬼。

由於這個激烈的鬥爭進行了幾個星期，太平洋岸的一般的有組織工人都深深激動了。工會工作者們可以看到，如果海運工人們失敗，那將使自由僱用制取得一個危險的勝利，其它的工會就都不安全了。同時，共產黨經由其報紙，號召沿海各城市的所有工人舉行總罷工，以迫使獲得解決。這個號召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工人們因破壞罷工者的暴力手段而感到憤怒，總罷工的情緒在他們中間迅速地生長着，雖然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瘋狂地力圖撲滅這種情緒。在這個運動期間，波特蘭舉行了一次總罷工表決，在西雅圖、塔科瑪和其他沿海城市中，強有力的總罷工鼓動在迅速地展開。然而，在舊金山工人們着手行動，舉行了自從一九一九年具有歷史意義的西雅圖罷工以來的第一次總罷工。

舊金山的總罷工實際上是在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有四千會員）以一千二百二十票對二百一十七票擊敗了它的反動負責人，並於七月十二日舉行罷工以聲援罷工的海運工人時開始的。這一個光榮的行動立即使勞工運動沸騰起來了。不願反動領導人的反對，擁有一百一十五個工會和六萬五千會員的舊金山勞工委員會表決通過於七月十六日舉行罷工，擁有四萬工人的奧克蘭中央勞工委員會表決通過於七月十七日舉行罷工。至七月十八日，已有十五萬工人在舊金山灣地區舉行罷工。整個區域都癱瘓了。這是顯示勞工團結一致和力量的一個輝煌例子。

然後，讓我們看看資產階級反動派如何狂叫吧，赫斯特系的報紙把這一罷工叫作叛亂，並且說，舊金山已在共產黨控制之下。業主們的協會要求利用暴徒來進行恐怖活動。恰好行經該市的

「全國復興局」負責人瓊遜將軍辱罵共產黨人是必須逐出該國的『小醜』。『自由主義』的勞工部長伯金斯在回答州長麥瑞姆的來電時宣佈，勞工部將與之合作，把一切外國的『鼓動者』們驅逐出境。當然，格林是不會不參加這個反動大合唱的，他說：『美國勞工聯合會從沒有下令罷工，也沒有授權舉行罷工。』同時，州政府把大批軍警調來該區，僱主們也組織了流氓和暴徒。據估計，在舊金山灣區域，至少有三萬軍警和武裝警佐。

當地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樊德勒爾、基德威爾等人知道自己無力制止這個總罷工運動，就出頭來領導這個運動，以便從內部來毀掉它。由於它們的官方地位，以及由於在舊金山的多數工會中左派力量薄弱，他們取得了對總罷工委員會的控制權，並使『可靠』的代表們佈滿了這個委員會。接着，他們就着手以多種方式來破壞罷工。他們拒絕下令讓報紙、電力廠和其他公共事業機關的工人們舉行罷工；在罷工的第二天，他們就叫市場大街的汽車夫回去工作；他們不分皂白地濫發販賣許可證；他們允許許多餐館繼續營業；他們拒絕組織工人自衛隊來警衛該市等等。所有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罷工。

爲了便利於這些人們的破壞罷工的叛賣活動，美國總統郵船公司的碼頭管理局加倍努力用各種各樣的所謂調解辦法來瓦解罷工者；該市的警察和暴徒則在市長羅錫的命令之下，對共產黨、海運工人產業工會、退休工人同盟、工人學校和許多其他激進組織的辦公地點實行了一連串的突然襲擊，搗毀房屋，並逮捕了成百的工人。這種恐怖手段很快就蔓延到整個加利福尼亞中部。受

害的人是强有力的工會團結同盟的罐頭業和農業工人工會的領袖戴克、張柏斯等人。他們在薩克拉
孟托被捕，現仍在聖昆田和其它監獄裏服長期徒刑，罪名是所謂違反州「犯罪的工團主義法」。

工人領袖、資產階級報紙、政府官員、警察等人對罷工進行的這些攻擊都是幹得很迅速的，
在罷工開始後的四十八小時以內就全都幹起來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行動使工人羣衆陷於混
亂，雖然罷工當時還在蔓延。反動的地方工人領袖們在七月十九日（罷工的第四天）和政府及僱主
們協同動作，匆忙地舉行了一次表決，在把海運工人的糾紛提交仲裁的基礎上復工。但是，這一
點他們作起來並不是沒有困難的，縱使在他們一手挑選的總罷工委員會中，票數還是一百九十一
票主張復工，一百七十四票主張繼續罷工。除了碼頭工人工會以外，所有都復工了。這樣，摧毀
了這一偉大鬥爭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機構又在它的悠久的但臭聲四溢的紀錄上加上一個破壞罷
工的事件。

三萬名海運工人繼續他們的全海岸罷工，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才同意仲裁。憑藉着他們的團結
一致和戰鬥精神的力量，他們設法取得了一個有利的決定。後來，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重新選舉
了它的戰鬥性的領袖布利治；各個海員工會積聚力量，合併成爲海運工人聯合會，並爭取到美國
一切海岸上的最好的工資、工時和勞動條件。

在這一偉大的罷工中，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方面犯了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包括：有時在揭
露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的叛賣行爲上有些猶豫，沒有能够把鬥爭擴展到大西洋岸和墨西哥灣海岸

，左翼工人在奪取總罷工委員會的控制權上面進行的活動不够等等。但是，基本上，這是一場光輝的、勝利的鬥爭，並使共產黨和英勇領導這個鬥爭的其他果敢的戰士們博得完全應得的敬仰。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機構：羣衆的障礙物

在一九三三—三五年的罷工中，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高級領袖們，對於有覺悟的工人的組織和鬥爭，顯然是一個障礙。他們的始終反對必要的罷工，他們在組織工作上的無所作為，以及阻礙渴望組織起來的羣衆參加工會的愚蠢的行會政策，在在都證明了這一點。讓我們簡略地談一談這三點中的每一點。

首先，談一談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罷工政策。當羅斯福就職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一個罷工浪潮正開始發動起來。新政府立刻對這個正在發展的鬥爭宣戰了，特別是因爲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在這一個鬥爭中起着如此顯著的作用。羅斯福威脅說，『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一樣，必須把不服駕馭的劣馬關在馬廄中。』瓊遜將軍也對罷工大吼大叫。八月二十三日，組織了全國勞工局來絞殺正在迅速展開的罷工運動。所有這些反罷工政策都博得格林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官僚機構的竭誠擁護。他們說，工人們可以放心地依靠『仁慈』的羅斯福政府。

格林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其他高級領袖們不僅鼓勵去反對當時的許多戰鬥性的罷工，並且在

他們有機會時，採取明確的反對罷工的行動。我們剛才已看到他們在偉大的舊金山總罷工中間所幹的破壞罷工的活動。另一個發生重大不良後果的干涉例子，是一九三三年的汽車業罷工。當時，正在進行一個輝煌的罷工運動。顯然，工人們的利益要求使汽車業在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停工。這樣一種力量的顯示會掃清渾濁的空氣，並對那些汽車大王們發生有益的影響。它不會不勝利。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把整個運動交給羅斯福的汽車業管理局，不可避免地結果是害處極大：汽車工人的要求被否決了，工會被削弱了，公司工會更爲加強了。

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新政時期破壞罷工的最壞的事還是在鋼鐵工業裏。鋼鐵工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在屬於工會團結同盟的戰鬥性工會鋼、金屬工人產業工會的影響之下，他們在一九三三年開展了一個強有力的罷工運動，正式領導這個運動的是鋼鐵錫工人協會。鼓動的結果，一九三三年九月在威爾頓有一萬三千人舉行罷工。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匆忙下令結束這個罷工，把整個事件交給政府，工人們的要求很快就絕望地陷入泥沼，並且失敗了。儘管被打敗了，在鋼鐵錫工人協會的下層『十人委員會』和鋼、金屬工人產業工會的鼓舞之下，鋼鐵工人的運動仍然繼續進行下去，終於有十萬會員參加了鋼鐵錫工人協會，並且在整個汽車業中，大批羣衆都準備罷工了。形勢是極好的。工人們情緒昂揚，鋼鐵公司的資方則處於守勢。全國性的罷工是十分可能的，而且一定會得到勝利。這是鋼鐵工人們的空前好的機會：使整個汽車業停工，爭得他們的經濟要求，並建立他們的工會。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執委會一概不要這些。它的負責人們，

在鋼鐵工人協會的領導機構和微弱的「十人委員會」的協助之下，完全毀掉了整個運動，把爭端提交羅斯福設立起來的鋼管理局，而這件就和通常一樣，慢慢地被壓下去了。這樣，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就罪惡地拋棄了另一個組織鋼鐵工業的機會。

現在，來談談第二點，美國勞工聯合會在組織工作上的無所作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首腦部從來沒有組織過一個產業部門，雖然它曾經發動過幾次紙上談兵的「組織運動」。兩個明顯的例外，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的屠宰業和鋼鐵業的組織工作，實際上是由進步的地方力量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漠不關心和公然破壞的情形下進行的。因此，在一九三三—三五年的情況下，美國勞工聯合會再次表現出同樣的無能和不願組織羣衆，這並不是出人意外的。不錯，美國勞工聯合會在這一時期中得到了一百萬新會員，然而，這是由於地方上的戰鬥分子和各別的工會，例如：礦業、縫紉業和紡織工人工會（雖然後者在徒勞無益地解決他們的總罷工時喪失了他們的多數成就）的工作。至於美國勞工聯合會自身，它就沒有開展過任何認真的組織運動。

一九三三—三五年時期，對於一切產業部門中的組織工作都是特別有利的。羣衆非常具有戰鬥性；僱主們（因為深深的危機和失業大軍而威望掃地）陷於混亂並處於守勢，而政府方面則至少不得不溫和地肯定工人們組織工會的權利，因為這是使它的資本主義的新政投合羣衆胃口的一個必要措施。如果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在這些條件所構成的非常有利的環境之下，進行有力的組織運動，原是很容易把幾百萬工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却没有能夠作到這一點，這重複了戰時

的經驗：一個組織工會的絕佳機會被無益地消耗掉了。就因為他們的這種反工人階級的行動，格林及其一夥得到一萬五千美元的額外加薪，並神氣十足地週遊全國，以『工人政治家』的姿態出現。

第三、關於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在組織羣衆方面所施的行會障礙。除了反動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幹部以外，任何人都不會看不到組織上的行會制度已經陳舊過時，工業的專門化、機械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已經使得產業工會制度成爲必需的了。成千的蒙受失敗的罷工和無效的組織運動都有力地說明了這個基本教訓。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頑固地堅持他們的十九世紀的行會制度，雖然這種制度對於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且，從任何觀點來看，都是工人階級的一個災難性的負擔。作者執筆時，他們正表示寧願分裂美國勞工聯合會，開除了屬於『產業組織委員會』的十幾個工會，却不願對產業工會制度作任何讓步。

美國勞工聯合會這種古老的行會制度，對於在一九三三—三五年時期組織工人是一個真正的障礙（而且永遠如此）。把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工業中的工人們分成十個到二十五個行會，並且需要繳納昂貴的會費和其他費用，這是犯罪的愚蠢。然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方針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更糟的是，當工人們組織成爲單一的工會時，美國勞工聯合會就着手把它們分成行會，結果根本失去了大批工人。

在一九三三—三五年期間，湧現了許多獨立工會，特別是在托辣斯化的大規模生產的產業部門中。除了獨立的鐵路工人兄弟會和聯合成衣工人工會的四十萬會員以及革命的工會團結同盟各

工會中的十二萬五千名會員不計以外，這一時期的新的獨立工會總共有約二十五萬會員。整個獨立工會運動的存在，就標誌着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機構所採取的反動政策。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這些麻痺性的政策也應該對羣衆中間贊成公司工會情緒的發展負責。許多對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老朽的行會制度沒有信心的工人，不得不傾向於公司工會制度，以圖改善他們的境遇。鋼鐵工業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傾向。鋼鐵業的工人們被鋼鐵錫工人協會的極端反動的鐵格領導集團一再出賣，開展了一個利用公司工會作爲他們的工人組織的强有力的運動。鋼鐵錫工人協會落得受人鄙視，半死不活，直到「產業組織委員會」的力量掌握了它。

工會團結同盟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合併

共產黨和工會團結同盟始終是爭取工會統一的最前綫的戰士，不僅是在讓所有的工人參加一個工會中心的形式的意思上是如此，而且尤其是在一個行業與另一個行業、熟練的與不熟練的工人、在職者與失業者、本國出生者與外國出生者、白種與黑人、成年工人與青工、男工與女工之間的思想的與組織的團結一致的更深刻的政治意義上，也是如此。他們堅決地反對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爲僱主所授意的、使這些團體互相對立的政策。在追求他們的最後目的（使成百萬的工人階級在基本上達到思想上的與組織上的統一）上，共產黨與工會團結同盟在使政策作必要的改變方面始終是靈活的。在新政時期羣衆紛紛起來的時候，工人階級統一的當前的道路就表現爲讓

大批的工人參加舊的工會，給這些工會新的血液。因為這種情形，工會團結同盟就相應地改變了自己的方針，而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起來，取消了自己的獨立存在。

但這完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一九三三—三五年期間，工會團結同盟內部，同時發展了一個求統一的兩重過程；一種是比較次要的趨向，主張建立獨立工會聯合會，一種是主要的趨向，主張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讓我們首先來談一談那個次要的趨向——建立一個獨立工會聯合會的趨向。

正如我已經說明過的，在新政時期的危機和羣衆運動的頭幾年中，除了那些與工會團結同盟合併的工會以外，獨立的工會也大量地生長了。這些工會中最重要的是有美國進步礦工工會（在伊利諾斯州）、機械工人教育協會（汽車工會）、無煙煤礦工工會以及聯合製鞋與皮革工人工會。此外，在五金業、造船業、紡織業、無綫電業、飛機工業、食品業、運輸業以及許多其他產業部門中，還有幾十個類似的組織。這個獨立工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公教人員（包括教員、工程師、郵政工作者、報紙作者等等）中間組成了許多新的工會。加上工會團結同盟，這些獨立工會共有會員約四十萬人。其中多數是以產業工會原則爲基礎的。許多工會都有階級鬥爭的綱領，社會黨人、共產黨人以及其它革命工作者在他們的組織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由於這些新的獨立工會，雖然在外表上很激進，但仍不够革命化而不能與工會團結同盟合併，由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行政政策阻礙了這些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這些工會有完全垮

台的嚴重危險，而且其中有許多的確據了。因此，工會團結同盟在一九三四年春天發出了爭取建立獨立工會聯合會的口號。這個獨立的聯合會應該按照產業的原則組成，並且以一個廣泛的階級鬥爭綱領為基礎。工會團結同盟將在全國範圍內與這個新的聯合會合併，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將奉行與各產業部門中其他獨立工會合併的政策，這個新的全國性中心將對美國勞工聯合會採取聯合陣綫的合作政策，而不是採取在細小方面鬧分裂的政策。『……獨立的勞工聯合會對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關係將不是一個反對的關係，而是一個試圖與它的工作人員團結起來以進行共同鬥爭，反對資本家及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的助手的進攻的一種關係。』

但是，統一的真正道路不在於一個獨立的聯合會。儘管工人的反動份子給予他們以各種障礙，羣衆仍然的確衝進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各個工會；因為這些工會乃是傳統的工人運動組織，這些工會獲得了僱主和政府的承認，並且提供當前即可得到結果的前途。工人們還感到了在美國反動派和世界反動派的越來越兇的攻勢面前，有團結起來的迫切需要。因此，工會團結同盟沒有力促人們接受獨立聯合會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轉到已在工會團結同盟內部迅速發展的決定性的進程——在幾個產業部門中讓它的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各組織合併的趨向。在新政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大批工人羣衆的湧入美國勞工聯合會，大大地改變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的性質。工會團結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在工人日報上刊載的決議說：

「這些新工人羣衆的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及他們不顧它的官僚機構的反對而抱有的爲爭取權利而鬥爭的決心，使得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這些羣衆工會在性質上更具有戰鬥性了。這就創造了達成工會運動的統一和擊敗僱主的攻勢的可能性；創造了動員和領導工人及其工會來保衛工人的利益及貫徹階級鬥爭政策的可能性。」

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情況改善的最顯著標誌之一，就是在一部份最高級工會領導機構中的進步精神的發展。在證明這一點的許多跡象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產業組織委員會的成立（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主席路易斯爲首）。這個委員會是由擁有一百二十五萬會員或佔美國勞工聯合會全體會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的十二個全國性工會組成的。這些領袖雖然不公然支持類似成立農工黨這樣的起碼步驟，却看清了國內反動勢力的抬頭，看清了除非把無組織的千百萬人組織起來，否則就連保持他們自己的工會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也了解到，只有在產業工會制度的基礎上才能做到這一點。

簡言之，一九三三—三五年期間，一百萬工人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至少部份地消除了許多曾經是工會團結同盟的獨立工會政策的基本成因的顯著弊害。這些新的戰鬥性的羣衆已經大體上粉碎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造成大害的不罷工政策；他們削弱了這些領袖們的專制管制並減少了動輒開除會籍的惡弊；他們至少確立了一點工會民主，甚至向領導機構中吹了一陣進步的風。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有的革命工人都應該到美國勞工聯合會裏去領導這些正在覺醒起來的羣衆。在鬥

爭的初期，由於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限制，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曾經以它們的獨立身份，起了積極的、革命的作用。但是，現在由於這些條件基本上已發生了變化，這種獨立的身份已經不再是必需的了。正是由於了解到這一事實，工會團結同盟才着手把它的各工會併入美國勞工聯合會。

從一開始，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就一貫在它們的產業部門中，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的工會遠表現一些生命或活動的任何地方，執行與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工會縮成聯合陣線的政策。這一政策由提出聯合要求、組織聯合糾察線和聯合罷工委員會等等建議的發展（這些建議時常付諸實施），而表現出來。因此，正是按照這一起碼的統一綱領，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才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的力量經過羣衆的壓力當後者在新政下認真地組織和舉行罷工的時候，真正地聯合起來。

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的過程是以多種方式進行的。例如，我們已經看到，在礦業和鋼鐵業中，全國礦工、工會和鋼、金屬工人產業工會的會員們如何解散他們自己的組織而以個人身份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情形。在海上運輸業、汽車業及少數其他產業部門中，也發展了同樣的過程。然而，在縫紉業、紡織業、傢具製造業、五金業、食品業、製鞋業、木材業、農業等產業部門中，正式合併運動是在地方的規模上或全面規模上實施的。

工會團結同盟這個爭取工會統一的運動，是在一九三三年中期在礦工中開始的，並在整個一九三四年都繼續進行。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工會團結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致函將召開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第五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提議在階級鬥爭綱領的基礎上統一。這些建議是與赤色工

會國際的世界工實統一政策一致的，後一政策會使法國兩個對立的勞工聯合會——法國總工會和法國統一總工會——合併，並使法國的工人運動達到統一。但是，工會團結同盟對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人貴族們是否響應這一建議，並無幻想，而着手進行從下層進行合併的政策。它的各個組織逐一地加入了美國勞工聯合會。此外，工會團結同盟運用它在其他獨立工會中相當大的影響，促使它們採取類似的政策方針。這些工會有許多參加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其中包括混合食品工人工會這個組織已成立了差不多十八年。目前，共產黨人正在敦促美國進步礦工工會、美國技師教育協會等組織，與在它們產業部門中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會合併。

當然，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最高級領導機構，是不歡迎這一合併運動的。相反地，在赫斯特系報紙的大事捧場之下，格林寄給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所有地方工會和全國性工會一封信，要求開除共產黨人；他還威脅着要解散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毛皮工人工會，如果這個工會和全國紡織工人產業工會的會員們實行合併的話。但格林這兩個行動都失敗了：他所發的通告幾乎到處都被拒絕、擱置或丟入廢紙簍中；儘管有他的恫嚇，毛皮工人的合併還是完成了，哥爾德當選為紐約聯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但是，格林的開除政策和分裂政策當然不是這樣容易打敗的。他和他的反動的密友們把每一個具有戰鬥性和進步的人叫做共產黨員，並且，他們寧願分裂工人運動來趕掉這種人。鋼鐵錫工人協會的鐵格領導機構把一半以上的鋼鐵工人會員逐出工會，經過訴訟，由法庭下令才恢復彼爾

除的工會的會籍。國際海員工會的富祿塞思——奧蘭德反動集團不承認太平洋岸的戰鬥海員的組織，從而把曾經參加偉大的舊金山總罷工的幾千名工人開除出工會。此外，當英勇的魏英斯托以壓倒的多數票當選為紐約油漆匠區委員會的書記時，這個全國性工會的頭子們曾經妄圖不承認該委員會。

然而，到一九三四年年底，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各組織的合併，已經進行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工會團結同盟是否作為一個全國性機構繼續存在的問題自然就發生了。我就提議解散它。因此，工會團結同盟就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到十七日在紐約召集了一次代表大會，來考慮這個問題。我代表全國執行委員會向大會檢討了工會團結同盟所起的作用，史塔徹提出了政策建議案，這個議案被通過了。在概述工會團結同盟的爭取工會統一的鬥爭之後，政策建議案宣稱：

「按照目前的政策，所屬各工會將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因此作為所屬各工會的中央組織而行使職權的工會團結同盟已經沒有必要繼續其現行組織形式，因此應該讓位給一個符合目前客觀形勢及工會團結同盟和各獨立工會的任務的新形式。……」

這些仍然存在的工會要想最好地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從它們自身中間產生一個領導委員會——統一委員會。除了把它們的共同活動加以統一以外，這個委員會還應該進行一個不息的鬥爭和宣傳鼓動，以便使仍然存在的工會得以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

大會爲了把仍存在的各工會併入美國勞工聯合會，同時解散工會團結同盟起見，便成立了工會統一委員會，以奈辛爲書記。這一機構繼續存在了四個月，直到只剩下少數幾個工會團結同盟所屬的工會還沒有合併時，才正式解散。這樣，繼承舊日的北美工國主義同盟，國際工會教育同盟，工會教育聯盟的工會團結同盟就結束了工作，我充當這個左翼的、打入內部的運動的全國書記，凡二十三年。

共產黨的現行工會政策

工會團結同盟宣告解散，共產黨的工會力量差不多完全放在美國勞工聯合會裏面以後，共產黨工會政策的主要重點又成了：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使這個組織革命化。化了很大的力量，來把無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不僅是通過吸收行業工會，而且特別是通過在大規模生產的產業部門中重建產業工會——沒有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或者是未提議這樣合併的工會。在這方面，共產黨人支持路易斯的產業組織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他們在當前綱領上却要前進得多，他們提議通過聯合與合併的過程而在產業工會的基礎上改組整個美國勞工聯合會，還提倡發展階級鬥爭的綱領，真正的工會民主、戰鬥性的領導、建立農工黨，以及最後建立社會主義。

其它方面，共產黨現行工會政策的政治內容和舊日的工會團結同盟基本相同。和以前在改良

主義的工會中做工作的主要不同處在於工作方法。這種方法改變的主要特點是，共產黨現在不把在各工會中建立工會教育聯盟和工會團結同盟式的左翼團體作為一般的政策——這種團體已經在有些產業部門（縫紉業、印刷業等）中成為既定的先例者則除外。除了自己的黨的綱領以外，它主要的僅限於建立一般工會運動中所習慣的那種組織形式。

這一重要策略改變的基本原因是：在一定的情勢之下，當工人正迅速地傾向激進時，在最廣泛的聯合陣線的基礎上，發展和聯繫工會會員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工會自身的通常的機構和慣例。因為，共產黨要在工會中進行的教育工作，我們比以前更着重於選舉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到執行機構中去，加強和鼓舞地方工會及工會委員會；建立參加中央勞工委員會和國際工會年會以及美國勞工聯合年會的左翼的和進步的代表團；把工會正式吸收到各個工會之間的委員會中來，以促進各項工作，把無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爭取建立農工黨、保護政治犯、爭取黑人的權利、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等等。

因此，比在工會教育聯盟和工會團結同盟時代更要使這些激進的政策成為工人運動主體的綱領，或者至少成為其最前進步部份的綱領，而不是使它們僅僅成為一些特殊團體的綱領。共產黨的工會綱領需要有更正式的性質。

在這一有利的情勢下，以舊日的形成正式左翼集團的制度作為主要政策，就會妨碍和工會羣衆間聯繫的發展。因此就廢除了這種制度。伴隨着這種制度的廢除，認為革命力量僅僅構成一個

『反對派』或『少數派』運動的這一通常概念也被打破了。因此，這個新政策較前更加培植一種在進行工會事務上的責任感，並加強了爭取實際的羣衆領導權的要求。它也擴大了戰鬥性的工人和工會領導機構的進步派之間的聯合線。總的來說，它使共產黨人及其綱領有最大可能和工會運動發生血肉關係。

運用着這些方法，健康的和正在生長的共產黨正在有組織的羣衆當中迅速擴大其影響。共產黨人正逐漸在工會運動中起着更大的領導作用，雖然規模還很小。他們的影響現在已是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可以斷定，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以及工人的更加激進——這個過程是迅速的和肯定的——共產黨人將在必然會變得強大的工會組織中以及不久將來的戰鬥中，起着迅速擴大的領導作用。

工會團結同盟的成就和缺點

從上面對於工會團結同盟在其六年戰鬥性的生存期間所作罷工和其他活動的簡短檢討中，可以明白看出，革命的工會開展了對於僱主的減低工資和讓工人挨餓的攻勢的一個相當有力的抵抗，在早期胡佛當政的困難的危機時代，當美國勞工聯合會不加抵抗地聽任工人的工資被削減並允許工人們被迫淪於赤貧的時候，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在共產黨的英勇的支持下，高舉着鬥爭的旗幟。他們組織和領導了無組織的工人進行鬥爭，這種組織和領導在爲瀕於餓殍的失業者獲得一些

救濟上面，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而他們的英勇的罷工則不僅嚴重地阻礙了那些企圖減低工資的人們，並且還有力地促成了不久即將在新政時期發生的工人大鬥爭。當一九三三至三四年期間，巨大的罷工鬥爭展開時，工會團結同盟成爲發展工人的組織和戰鬥性方面的一個真正的因素。

然而，工會團結同盟各工會沒有能够建立在數量上巨大的組織。這大部是由於他們的極端困難的工作條件——黑名單、警察襲擊、法庭禁令、放逐領導人等等。在許多情形下，組織工作的薄弱也是一個因素。工會的會員們是組織得鬆弛的，而且時有劇烈的變動，因此難以估計他們的數目。然而，他們的羣衆影響遠遠超過了這些組織的具體局限。一九三四年中期，工會團結同盟在工會的組織方面達到最高點，差不多有十二萬五千會員，這還不把全國失業委員會書記班甲明在一九三三年所報告的該會所有的十五萬人計算在內。

在其工作初期，工會團結同盟造成了一些宗派主義的弱點，這損害了它的一般效率。第一個弱點是，在許多敵人的猛烈攻擊下，傾向於在太前進的革命的基礎上發展其工會綱領，並且使其組織和共產黨的關係過於密切。這當然會產生阻礙其組織發展的影響，因爲這使得它難以和較爲保守的工人發生聯繫，並縮小了工會團結同盟和左翼進步分子之間的聯合陣線。這是離開了獨立工會的原先計劃的，後者要求綱領不要具有那樣鮮明的革命性，而是帶有一種廣泛的聯合陣線的性质。

工會團結同盟在這一時期的第二個嚴重弱點乃是開始有一種向着雙重工會制度發展的傾向。

美國左翼的傳統弱點。這個弱點的基礎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令人惋惜的情況——美國勞工聯合會在僱主的攻擊面前所表現的怠惰及其力量與影響的迅速衰落。這勢必使工會團結同盟忽視在舊工會的工作，而集中力量來搞新工會，以及在有些情況下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工作更合乎實際時，反而來建立新的工會。現在批評工會團結同盟這個弱點的左翼社會黨人、繆斯特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和洛夫斯頓份子，當時也積極地從事組織伊利諾斯州礦工的美國進步礦工工會和其他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外的獨立工會。

在一九二九—三二期間，美國勞工聯合會實際上是處於危急關頭，並表現了許多瓦解的跡象。它正在充分受到反動領袖們長期錯誤領導的惡果。在戰時，這些領袖們愚笨地丟棄了組織千百萬工人的空前良機；隨後在一九一九—二二年僱主的戰後大攻勢中，他們又以陰謀詭計，從中破壞和退却的政策，使工人遭到從未有最大的失敗；他們接着又在柯立芝的『繁榮』年代中（在這個時期本是可以成功地把工人組織起來的），採取了可恥的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階級合作計劃，而使整個工人運動失去活力和陷於癱瘓；最後，當危機降臨到他們身上時，行會的領袖們又跑去接受胡佛的減低工資及使失業者挨餓的兇狠政策。總的結果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各工會完全陷於停滯，其會員人數從一九二〇年的四百〇七萬八千七百四十人減少到一九三三年的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並且人們普遍地越來越相信，美國勞工聯合會在確定地衰落下去。

當赤色工會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和工會團結同盟的克利夫蘭大會規定了關於獨立工會的政策

時，它們提議：一、在可以保證戰鬥性的政策和領導的條件下，新的工會可以併入美國勞工聯合會；二、應該繼續並加強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內部的工作。但是，在鬥爭的壓力之下，鑒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動和陷於崩潰的情況，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不罷工政策、它的薄弱的工會之慢慢瀕於崩垮以及會員的沮喪和意志消沉，工會團結同盟有了離開它的組織政策中作為重要本質的原來正確的方針的偏差。它開始有些過份地強調獨立工會制度了。另一方面，它放棄了使新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有條件地合併的政策，而傾向於發展工會團結同盟作為敵對的全國性工會中心，並確定地放鬆了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工會內部的工作，雖然工會團結同盟的每一個一般政策的聲明都強調有進行這種活動的必要。

關於後一點：工會團結同盟這一時期在舊的工會中所作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通過以前我會講到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失業保險委員會。除此之外，在鐵路、縫紉業、礦業、建築業、印刷業、五金和製鞋的行業工會中僅作了比較散漫的活動。其後果是，工會團結同盟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工會中的影響大大地削弱了。證明這一點的一個跡象是，傳統上為左翼所領導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產業工會運動的領導權在路易斯開始進行爭取產業工會運動的鼓動時，就自然而然地落到路易斯的手裏了。工會團結同盟忽視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各工會內部工作的另一個結果是，刺激了進步勞工行動會議的發展。這個組織主要是由工會的下層工作人員和知識份子的業餘活動家組成——領導人是卜魯克伍德勞動學院的穆斯特。它企圖佔據舊日的工會教育同盟曾經一度在行業

工會中佔有的位置。但是，這個機會主義的組織失敗了，最後併入托洛茨基分子的工人黨。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了，在新的情勢之下，工會團結同盟奉行真正的統一方針，完全恢復了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的工作。

工會團結同盟的一生顯示了它的獨立工會運動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在一定的條件下，在歷史上是合理的。這是事實，儘管有着上面已經說過的、在某些情形下把這種政策歪曲為雙重工會主義不正確傾向。工會團結同盟的階級鬥爭綱領、產業工會運動、組織尚未被組織的工人、工會民主、失業保險、黑人平等、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等的綱領，也是基本上正確的，並符合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的。工會團結同盟所屬工會和失業者的團體是胡佛時期的階級鬥爭中的真正力量，並積極參加了一九三三—三五年的大罷工。可是，上述的宗派主義弱點相當大地削弱了工會團結同盟的潛在影響，在工會內部和在獨立工會中的潛在影響。但是，正如我們所已談到的，羅斯福新政中的罷工時期中工人們爭的尖銳化，很快就使工會團結同盟的政策徹底改變了。因此，它又一次着重在改良主義的工會內部進行工作。我們從一切因素來考慮的話，那麼，就可知道工會團結同盟代表美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中的一個必需的和正確的階段。

第十六章 共產黨

在這一章中，我只能概略地敘述美國共產黨發展的主要過程。同樣的，我在本章中也只能極簡短的提一提我在建黨中的作用。在這方面，讓我只說一下：我自從一九二二年參加黨以來，便担任中央委員，兩度充當中央委員會主席，我並是一九二四、二八和三二年黨的總統候選人，一九三〇年是黨的紐約州長候選人，而且從一九二一年起，即投身於黨的工作，毫未間斷。我並在過去許多年來，即担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赤色工會國際執行委員。

社會黨的失敗

社會黨在共產國際建立的那一年——一九一九年九月分裂，共產黨就是從社會黨的黨員中誕生的。美國共產黨的發端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說明社會黨和它的母體第二國際一樣，已不成其為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了。

美國的社會黨之失敗是顯而易見的。該黨在三十五年以前組織成立。一世代多以來，真誠和忠實的鬥士化了很大氣力才把它建立起來；可是，黨却依然是人數很少，力量薄弱和死氣沉沉的。在一九〇三年，社會黨有黨員一五、九七五人；在一九三五年却只有一九、二二人，或者實際上只

有它開始創立時那麼多黨員，而且，它在全國大分裂中正在喪失許多黨員。社會黨在一九三二年所得選票是八八三、三四二張，比它在一九二二年所得的八九七、〇一一張還要少。廿五年以前，黨在工會中的影響比它現在的大好多倍，而它現在在一切戰線上都是停滯不前和江河日下。

社會黨這許多年來的可悲現象原因何在呢？難道這就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能完成的最大的成就？這是一個當前很適時的問題。自我批評是忠誠的列寧主義者的優良品德，而社會黨目前極需實行自我批評。自然，在美國工人階級中發展階級自覺和一個羣衆性的黨，是困難重重的。其中的某些困難，我已在上述各章中指出過，這些困難包括美國工資水平較高、經濟機會較大、形式上的民主權利較多、種族及民族複雜等等的限制作用。但是，儘管有這些客觀困難，却仍有建立一個強大的革命政黨的堅實基礎，如果社會黨在這個目標上已遭失敗，其真實的原因應是它的總政策路線的錯誤，而不是困難的客觀條件。

我們對這一問題稍加研究，就可瞭然。美國工人階級久已遭受殘酷兇狠的剝削。資本家的大發橫財，實際上是從工人的血淚中得來的。工人長期堅決鬥爭的歷史，充分表明他們對這種有組織的掠奪，是深惡痛絕的。世界大戰前，除了沙皇俄國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像美國這樣猛烈的罷工鬥爭。工人階級的這種戰鬥精神，就是能够製造出強大革命政黨的原料。但是，社會黨顯然地證明無力進行這一工作。

爲了把自己建成立成一個羣衆性的大黨，社會黨必須大胆地解決擺在它面前的羣衆教育、組織

與鬥爭問題。工人階級是被資本主義的幻想所欺騙的，工會是被很反動的騰柏斯集團操縱的，廣大羣衆仍被兩大資產階級政黨所束縛。在這種情況中（這是比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大國的社會黨所面臨的更爲困難的情勢），美國社會黨爲了壯大起來和領導這些被無情的資產階級敵人所控制的落後羣衆，首先就必須成爲一個戰鬥的黨，階級鬥爭的黨。那就是，（一）在工人爲爭取當前的與迫切的經濟與政治要求的日常鬥爭中，它必須給工人以積極的政治領導，而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能成爲工人階級的真正先鋒隊；（二）它必須本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原則有系統地教育它的黨員和羣衆，從而建立革命戰士的堅強組織，黨的核心。

美國工人運動的整個歷史表明階級鬥爭政策的生命力。工會始終是在它的最富戰鬥性時期最發展壯大（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三—三四年），而在最富階級合作精神時期中最是停滯不前（例如一九二三—二九年）。共產黨黨員影響的迅速的和健康的增長（它現在的黨員四倍於歷史更久得多的社會黨），直接原因是勇敢的和不疲倦的階級鬥爭政策。而且，很有意義的事實是：社會黨自己發展壯大的最好時期也正是它由於左派壓力而採取大部分有階級鬥爭性政策的時期。

因此，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找出社會黨失敗的原因了。那原因就在：除了稀有的場合，社會黨並未執行一個階級鬥爭的政策。相反的，它的傳統路線會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階級合作的和宗派主義的路線，而這就走上了停滯不前與腐朽退化的道路。

社會黨自創立以來，即被具有澈底機會主義性質的中等階級知識分子——傳教師、醫生、律師、

教授、政論家之流——所控制，他們已被修正主義的理論所滲透，這種理論主張用和平滲入政府及收購工業的辦法，逐漸把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始終把黨認為頗像是小資產階級風箏的一條尾巴。他們要把它變為一個自由主義的或進步的黨。爭取選票和小的政治改革就是他們全部行動路線。他們把黨看成是改良主義者的宣傳團體。因此，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戰鬥精神的每一種表現都不加重視。他們反對黨成為戰鬥性的罷工領袖和成為未組織起來的工人的組織者；由於他們的中立理論，他們拒絕去反對奧柏斯分子，以爭奪工會控制權，反而與他們締結腐化的同盟；他們在產業工會問題上顧慮很多；他們對一個勞工黨的創建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而勞工黨本可以成為喚起工人反對奧柏斯統治的有力武器。他們與戰爭妥協；他們譴責俄國革命；他們醉心於柯立芝時期為害不淺的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的趕快制度，他們支持拉福萊特；他們歡呼羅斯福為准社會主義者等等。在社會黨的整個歷史中，這些中等階級知識份子一貫不向黨員講授馬克思主義，並利用他們的全部權力來阻礙、壓制和大批開除黨的左派，而沒有這些分子，黨是不能建立起來的。

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總結果是：社會黨未能成為一個強大的革命政黨。它躲閃、規避工人基本上感覺興趣的每一鬥爭與爭論，並且對這些鬥爭和爭論採取妥協態度。由於它的軟弱政策，它不能打敗它的強大資產階級敵人和他們在工人中的僕從，從而，它不能取得羣衆的領導權並成為他們所公認的黨。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和斷送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長期歷史，除了造成黨的顯

明失敗和極需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黨之外，不能產生其他結果。

共產黨的淵源

共產黨並不是在一九一九年社會黨分裂時突然興起和壯大起來的。相反的，它曾經有過漫長的孕育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它在反對那控制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苦鬥中，鍛鍊它的思想，集積它的力量。

當社會黨在一九〇一年剛成立（這是由於脫離社會勞工黨的死硬宗派主義的結果，而這是歷史所已證明為正確的），改良主義的醫生、律師等便致命的控制了它。同樣的，作為對這些有害分子的糾正，黨的革命左派也慢慢開始形成，並提出它的綱領。隨着歲月的推移，黨內的右派和左派的分野也變得愈來愈明顯了，一直發展到一九一九年終於發生了無可避免的分裂。

在整個時期中，左派堅決地進行鬥爭，藉使社會黨成爲一個革命的組織，而且，黨在階級鬥爭中所起的有效的作用，主要都應歸功於左派。誠然，左派綱領因『左傾』宗派主義而失勢，而且這些錯誤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社會黨的進步。不過，它的主要路線却實在是好的。它的整個目的和趨向是要把黨的基礎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原則上，使它真正成爲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社會黨的歷史性失敗的原因，恰好就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左派的這些努力，都因為機會主義的領導而陷於失敗。

在論社會黨的那章，我已經討論過社會黨中這一發展着的鬥爭的一個方面，即一九〇九年在俄勒岡與華盛頓州的分裂。自然，這一分裂僅是要使社會黨成爲革命的黨這種正在發展着的全國鬥爭中的一種情勢。在這裏追述下一九〇九年的分裂對太平洋黨組織所產生的惡果，是重要的。那裏的社會黨因喪失它許多最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而遭受損害，而且正在生長中的左派，黨的心臟，不僅在組織上被粉碎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瓦解了，大部分變爲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工團主義者。

但是，在『國際社會主義評論』派（以霍烏德和馬西克爾爲首）領導下，這種不可避免的鬥爭在全國展開並加緊了。羣衆的日益激進和黨急需一個戰鬥性的領導，又使鬥爭加深，德布斯在這些日子裏是左派的發言人，不過，他從未給左派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任何實際支持。在霍烏德和波恩的小冊子『產業社會主義』中，說明了左派這一階段的綱領。這個小冊子是對社會黨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控制和他們的全然的機會主義政策的抗議，而且它規定要有一個戰鬥的無產階級綱領。這本小冊子中有許多特殊的半工團主義的錯誤——如像對黨的作用估計過低、對組織變重產業工會的幻想之類。但是，它的實質却是左派傳統的正確目標——要給社會黨以階級鬥爭的政策。

日益加深的內部鬥爭，把社會黨一部分都捲入漩渦，但是，在西部最熾烈。這種鬥爭在一九一二年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到達全國的頂點。代表大會中充斥着律師、醫生和傳教師，左派遭

受失敗。不久以後，偉大的戰士——霍烏德正式被用複決投票的辦法開除出全國執行委員會。

這次鬥爭的結局對社會黨是真正的災難。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致命的扼制加強了，而且他們的機會主義政策更深固了。黨員人數由一九一二年的一一八、〇四五人（這是它在全部歷史中所達到的最高數目）降低到一九一五年的七九、三七四人。黨從前在工會中的進展也停止了，所獲選票也由一九一二年的一八九七、〇一一人跌到一九一六年的五八五、一一三人。成千上萬最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真正的黨的建立者，包括霍烏德在內，憤然脫黨，一去不復返了。黨把它最好的血液弄乾涸了。而最壞的是，像在一九〇九年一樣，左派因失敗而灰心喪氣，大量鬥士直接投向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工團主義陣營。

可是，一九一二年分裂不可能是社會黨中左右派間的決戰。第二國際那時還沒有因它擁護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反對隨之而來的革命鬥爭而聲名狼藉，它仍具有工人階級革命組織和馬克思、恩格斯的黨的威望，因而，它的極端機會主義的美國支部也就仍然保有吸引革命工人的力量。此外，左派仍然充滿宗派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傾向，在思想上還沒有充分地發展到足以建立一個分立的革命政黨。但是，情勢不久就使右派與左派發生基本的決裂，並要求共產黨成立起來。這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情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戰後的革命鬥爭。

在第十一章中，我已經表明第二國際對這些偉大事件所採取的反革命態度，怎樣使每一國家

的社會主義運動陷於分裂，並因而使共產國際在世界規模上形成起來。美國感到了這一整個情勢的力量，提出了有關馬克思理論、戰略與策略的每一個基本爭論問題，而且，左派與右派間長期發展着的鬥爭也就達到了爆裂點。

在戰爭這個重大問題上，美國社會黨的左派猛烈反對第二國際的整個方針，譴責它的各個黨支持戰爭的行動，而且強烈反對美國參戰及戰爭的繼續進行。但是，黨的右派在激進辭句掩蓋下，以典型的改良主義方式與戰爭情勢妥協。這使兩派之間的鬥爭達到嚴重階段。

關於俄國革命的論爭是火上加油。迅速發展中的左派衷心擁護革命，並接受革命的偉大教訓，以及列寧所奠定的革命原則。但是，右派却憎恨俄國革命及其一切革命工作，希爾奎特表達了世界改良主義者的觀點，他後來會說：「蘇聯政府是對社會黨前所未有的最大災難和禍害。」社會黨公開出賣了戰爭結束時德國的革命，破壞了初生的德意志蘇維埃，從而挽救了中歐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切叛賣行爲，都得到美國社會黨右派領導方面的默契和公開支持，這就更使得黨內的裂痕進一步加深。

這樣一來，社會黨便被它的小資產階級的國內與國際領袖的反動方針造成思想上絕望的分裂，黨內多年的鬥爭現在已達到高峯。這是黨內互相衝突的各個傾向之間的分歧點：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政策之間；要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家與要保存資本主義的改良派之間的分歧點。

不可避免的，思想分歧必然要採取組織形式；而且，在邏輯上說來，右派既然長期進行消滅

左傾的鬥爭，也就主動地在破壞黨。因此，事情的發展就是：革命派（首先組織在社會主義宣傳同盟中——一九一五年在波士頓，後來又組織在社會黨左派中——一九一九年在紐約）獲得大多數黨員的擁護，並於一九一九年在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十五位委員中當選了十二位。但是，右派否認這次選舉，而且，爲了控制行將舉行的全國代表緊急大會，做了很像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在一九三六年對產業組織委員會所做的事情，右派開除了七個語言聯合會（美國的外國移民很多，美共爲了便於領導，把同一語言的人組織在一起，成立聯合會——譯者）以及整個密執安州黨組織。就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右派利用警察的幫助驅逐了一切知名的左派代表。黨遂完全分裂。

一九一九年的分裂給予社會黨的害處比一九二二年的分裂還要大。右派終於驅逐了戰鬥性的左派——黨的生命的血液，而對黨的許多毀滅性的惡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在一年之中，黨員數目即由一〇四、八二二降到二六、七六六，而且在一九二七年時，更降到七、四二五。黨在工會中的影響迅速地低落了，而且，黨在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中所得的選票（二六二、八〇五）幾乎等於它在一九二〇年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五。黨並一般地陷入政治上的沒落。由於左派不再限制他們，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們完全放棄了反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動分子的一切鬥爭，而且在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趕快制度、勞工銀行、開除共產黨員、反蘇誹謗等綱領上，與他們同流合污。因此，左黨員、影響和革命原則上已經化爲烏有的社黨，遂由其它的改良主義政策及小

資產階級領導的必然的致命的苦果。

共產黨的創立

在過去的分裂——一九〇九和一九一九年——中，由於思想上的不成熟，左派不是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工團主義陣營，便是個別地逐漸返回社會黨了。但在一九一九年就不是這樣了。在過去幾年激動人心的世界事件過程中，左派在理論上正在迅速地成熟着。左派反對派在國際上的增長（如齊默爾瓦爾德和基恩塞爾等），特別是俄國革命的勝利，使美國的左派勢力懂得了列寧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到一九一九年，左派已經肅清了（或正在迅速地這樣做）它的傳統的錯誤，像在國家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黨和工會的作用等基本問題上的錯誤。一言以蔽之，正像畢特爾曼所說的，左派已經『從模糊的左傾社會主義和一般的無產階級戰鬥性前進到列寧主義的明確與堅實的基礎上』（見『共產黨的十五年』）。現在，左派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足夠的強大了，便從事於組織自己的黨——共產黨。事實上，被開除的左派建立了兩個黨，共產主義勞工黨（八月三十一日）和共產黨（九月一日）。然而，使這兩個黨分立的，只是很小的原則分歧，所以，他們在十四個月以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合併爲一了。由魯騰堡任書記。

在這些日子裏的一切重大事件中——社會黨反戰和共產黨的創立等等——左派中心人物是魯

騰堡。魯騰堡一八八二年七月九日生於克里夫蘭，是一個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而且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堅決戰士。他的名字將作為美國工人階級最有才能的領袖之一永垂史冊。他在共產黨於一九一九年組織成立起，即擔任黨的總書記，除了他因革命活動而被拘在新新反省院時期以外，一直担任到他逝世為止。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逝世，現在與許多英勇的革命家一同葬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

這兩個共產黨的創立，遭遇政府方面的殘酷迫害。它們誕生的一年（一九一九）所發生的罷工，比美國歷史上任何同一時期中所發生的都要多。在兩個黨建立以後的兩星期，偉大的鋼鐵工人罷工開始了。整個國家處於動亂中，而所謂自由主義的威爾遜政府，由巴爾墨（司法部長——譯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發動野蠻的『搜捕赤黨』來對付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進展。許多大廳和工人住宅被搜查；革命的報紙被沒收和封閉；新黨的組織被無情地破壞，它們的黨員被毒打和逮捕。據官方的數字，在一九一九—二〇年的搜捕中，有四、一三八名工人被投入牢獄，五〇五名工人被驅逐出境。這是對共產黨的一個真正的火的洗禮。它的結果是驅使兩個年輕的黨轉入地下，並把它們從前模糊的和大大估計過高的黨員實際上減少到僅僅是堅決的和自覺的共產黨員。在巴爾墨的恐怖結束時，共產黨員已經保持在一萬人左右。

除了社會黨左派以外，其他革命派別也給新成立的共產黨補充黨員。在一九一九—二〇年間，一個重要的補充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霍烏德——哈第——喬治——史密斯少數派。同時，社

會主義勞工黨的若干戰士也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在一九二一年中期，又來了工會教育聯盟派，以及像約翰斯東、曼雷和漢默斯馬克（並有前無政府主義派的福克斯）的卓越人物。在一九二一年夏天，社會黨又遭遇另一個左派分裂，喪失了工人委員會派（恩達爾、特拉赫坦堡、洛爾、芬蘭聯合會等），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加入共產黨。這個日期可以認為是在實際上結束了共產黨的創立時期。

羣衆工作的開始

這時，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個革命宣傳團體了。但是，爲了使它自己成爲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黨和工人階級的領袖，那麼，黨除了實行革命教育工作以外，必須成爲工人爭取他們當前經濟與政治要求的日常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因爲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是對羣衆一切革命教育與組織工作的基礎和出發點。

爲了有效地實行這種不可缺少的工作，新的共產黨必須克服一系列的錯誤傾向，這些傾向都是它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黨的基本革命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它實現這一路線的辦法是很不實事求是的。其中的基本弱點是美國左派傳統的宗派主義傾向。這種『左傾』宗派主義，大體上是具有工團主義性質的，德·雷翁是它的主要理論家。它主要是由於左派在實際的羣衆領導中沒有經驗，它在理論上的不成熟和一般地在美國革命運動發展所遭遇的困難客觀條件中產生出來的。社

會勞工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社會黨左派等等都曾經濃厚地染有這種宗派主義，而且它們大部分把它傳給新的共產黨。

這種『左傾』宗派主義的本質就是對革命宣傳本身的威力的一種誇大的信任，這是由於不能了解這一基本事實所致，即革命的宣傳只有在它與工人的日常鬥爭聯繫起來並適應這種鬥爭時，才能教育與組織羣衆。『左傾』宗派主義表現在對接近羣衆採取不實事求是的方法；提出與工人的當前需要無關的先進的革命口號（而且常常是被竄改和歪曲了的）。不能使革命口號適應特殊的情況，結果大都使革命家脫離羣衆，並使他們在多年處於無所作爲的、教條的、和宗派的孤立中。

美國『左傾』宗派主義的傳統類型有下列各種：（一）在原則上拒絕爲當前的政治要求而鬥爭；（二）反對國會政治鬥爭，或拒絕參加政府選舉及政治活動；（三）雙重產業工會主義，或主張組織理想的獨立工會，而不參加現存的羣衆工會；（四）反對統一戰綫的傾向，即不能及拒絕與天然的同盟者（進步分子、黑人、貧農等）團結一致，並在原則上反對勞工黨；（五）不顧不同情況，機械應用其他國家工人革命經驗於美國；（六）非法主義及其他形式的浪漫的革命冒險主義；（七）『消滅上帝』，或過分強調及曲解宗教問題；（八）反美國主義，或忽視及嘲弄美國的傳統與文化。從它創立的時候起，共產黨就必須與這些左的傾向作鬥爭。

在發展它的實事求是的羣衆政策時，共產黨也時常必須反對右傾偏向、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與資本主義勢力妥協的傾向。但是，在主要方面，它的鬥爭是反對傳統的美國式左

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在『左傾』辭句掩蓋下的機會主義。美國共產黨的發展，可用它在羣衆工作中消滅這種左傾宗派主義的進展情形來衡量。

甚至黨在一九一九年組成之前，反宗派主義的鬥爭即已在進行中。列寧領導這一鬥爭。列寧具有雙重的偉大，他不但是個屹然矗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且是一切實際的革命領袖中的最偉大的一位。他從理論上分析資本帝國主義時，也詳細地草擬出在反對它的鬥爭中應用的戰略與策略。然後又勝利地把它們應用於鬥爭中。列寧在發展羣衆反資本主義的最大鬥爭中，猛烈攻擊右傾機會主義傾向——革命的最大危險，但是，他也無情地攻擊表現在各種各樣形式中的危險的『左傾』宗派主義，他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對宗派主義傾向的毀滅性打擊。

因此，在列寧的理論指導下，萌芽中的美國左派在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黨、工會、當前要求等重要問題上，使自己加強了，黨也開始擺脫它的宗派的雙重工會主義、反國會政治鬥爭、關門主義、烏托邦主義等等；而且以更實事求是的方法、在廣泛的統一戰線基礎上去處理羣衆工作。而且，在共產國際成立以來，並在它的幹練領導下，反對頑固的『左傾』宗派傾向的鬥爭便已無情地順利地進行了，雖然不是沒有偶發的暫時挫折。

共產黨反宗派主義及走向羣衆工作的第一個重要步驟，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組織工人黨——它的合法的形式。可是，共產黨本身仍舊是秘密黨，它普遍被叫做『第一號』，而工人黨則是

『第二號』。一直到秘密黨在一九二三年底最後解散爲止。自此以後，黨在各處都活躍地進行競選鬥爭，並在一九二四年推出了它的第一個全國候選人，共產黨贊助勞工黨，並嚴肅認真地把注意力轉向黑人與農民問題上。一九二五年八月，工人黨採用工人（共產）黨的名稱，並在一九二九年三月改名共產黨。

由於工會教育聯盟派的參加黨，黨立刻開始積極參加那一時期的許多工會鬥爭。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我會詳細評述了這些巨大鬥爭：一九二一—二三年的大罷工，爭取合併，成立勞工黨，及承認蘇聯的鬥爭等。在美國左派的歷史中，列寧主義的統一戰線政策第一次被應用了，而且立刻得到巨大成功。這一成功是一個顯著的、實際的證明，說明了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綱領可以應用於美國。雖然黨員少，共產黨迅速地變成美國階級鬥爭的真實因素；而進行改良主義路線的社會黨則日益陷於無能。

但是，黨對『左傾』宗派主義的迅速擺脫和向羣衆領導的前進，因各種互相關聯的情勢而遭受巨大挫折。第一個情勢是一九二三年開始的柯立芝『繁榮』時期，這一時期以及它的許多資本主義的幻想、巴爾的摩—俄亥俄計劃、階級合作等，使工人鬥爭情勢消沉，因而使共產黨的羣衆工作領域縮小了。第二個是一九二三年七月芝加哥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爲害很大的分裂，這一分裂破壞了共產黨人與進步分子的統一戰線，因而使共產黨與羣衆脫離了。第三個是一九二三年起往後幾年中黨內的小組織鬥爭，這進一步削弱了共產黨的羣衆工作。頭兩個情勢我已在前

費章中論及，因此，我在此僅僅討論第三個——小組織鬥爭。

黨內小組織鬥爭

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九年，共產黨被小組織鬥爭弄得四分五裂。黨分成兩個互相爭鬥的陣營：魯騰堡——潑貝爾——章英斯通——洛夫斯頓集團和畢特爾曼——白勞德——杜恩——福斯特——加農集團。鬥爭激烈，每個黨組織中都有小組織存在；兩個秘密的全國委員會在活動；黨紀律被小組織的紀律所代替，而且黨的利益服從小組織的要求。有時候，小組織中的人員有些變動；第三個組織，章英斯通——加農集團活動了一時期，但是，鬥爭始終在進行，只有少數時期不大緊張。

這個長期的小組織鬥爭是圍繞許多爭論進行的：對整個經濟與政治情勢的估計、統一戰線策略、對社會黨及其他改良主義的黨的態度、共產黨組織形式、勞工黨、黑人及農民問題、蘇聯的情勢等。但是，在全部鬥爭過程中，工會工作問題是激烈爭論的中心。

黨幾年來都處於分裂的邊緣上。它的羣衆工作大受妨礙，而且大爲減少了，它的團結經常被破壞。黨員人數慢慢地減到一九二九年的七千人。可是，儘管有這種有害的小組織活動，一種建設性的進程却在靜悄悄地進行。在這些艱苦年代，共產黨歷史上最困難的年代中所發生的基本情勢，是黨的逐漸布爾什維克化，逐漸由革命的宣傳團體變爲羣衆性階級鬥爭的黨。但是，這種進展被若干有力因素所阻礙與延緩，這種因素是小組織鬥爭的基礎，而下述三個因素又是主要的：

(一)羣衆的普遍消極：共產黨像其他一切工人階級的組織一樣，是在羣衆處於活動情況的時候才發展得最好的；但是，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繁榮』時期，是整個工人史上羣衆鬥爭最少的時期。這就使黨與羣衆脫離，而這種脫離又因最近農民勞工黨的分裂而加深。結果，黨不能像它在尖銳的階級鬥爭時期那樣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無止境的小組織爭論和鬥爭中才能慢慢進展。黨內小組織鬥爭幾乎恰恰在羣衆鬥爭最少的柯立芝繁榮時期繼續進行，並不是偶然的。

(二)缺乏黨內的團結一致。加強黨內鬥爭的另一事實是黨內兩個主導派別間缺乏政治上的團結一致。魯騰堡派（它主要是淵源於社會黨左派）的特殊弱點是缺乏羣衆工作經驗，黨的有經驗的工會領袖中，大部分（但決非全部）都是畢特爾曼—福斯特派的成員。另一方面，畢特爾曼—福斯特派（它的許多領袖出身於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最大弱點是它更加混有工團主義傾向。

(三)黨內的非共產主義者。結果顯示：許多非共產主義者在黨的早期被吸收入黨。這些異己勢力也加強和加深了小組織鬥爭的每一階段。

年復一年，鬥爭繼續着。共產國際再三作出關於個別政治及組織問題的決定，也並未解決黨內長期的鬥爭。在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畢特爾曼—福斯特派在黨中央委員會取得了多數，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魯騰堡派在共產國際贊同下，在中央委員會取得多數。共產國際一

再作出決定認可了畢特爾曼—福斯特派在工會羣衆工作中的領導地位。但是，黨內鬥爭仍在繼續進行。共產黨是兩個黨，而不是一個黨；而且有好幾次幾乎公開決裂。儘管有這種小組織的爭論和鬥爭，基本的醫療工作却在不斷進行着，而且最終還是產生了黨的統一和健康。這是在下述情勢中發展的：

第一、在小組織鬥爭期間，兩個主要派別的思想水平在共產國際不疲倦的指示下大大提高了。因而，黨在那些年參加的羣衆鬥爭過程中，以及隨之而來的廣泛討論中，這兩個主要派別逐漸失去它們的特點，而日益接近一個共產黨統一的立場，特別是對於爭論久久未決的工會工作問題。

第二、黨員的這種基本的布爾什維克化和思想上的統一遂暴露、孤立並消除了黨內有害的非共產主義分子。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中，中間分子沙拉茲基、洛爾、阿斯克里等人被開除出黨了（註一）。一九二八年，加農及畢特爾曼—福斯特派的少數其他成員已經變成公開的托洛茨基分子，並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洛夫斯頓（黨的書記）和潑貝爾、魯騰堡派的領袖們（魯騰堡在兩年前已經逝世），依照國際布蘭德勒派路線發展了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具有半社會民主黨性質）。他們遭受共產國際（它已正式解散了一切小組織）的譴責之後，違反它的決定，企圖

（註一）在黨的歷史的初期，這種清洗工作也已進行。因此，已經被開除的有克拉徹無產階級黨派（抽象的宣傳家）和統一勞動者派（地下的浪漫主義者）等。

分裂黨。但是，史塔徹、韋英斯通、邁諾、比達赫特、勃魯爾和他們那一派的其他卓越成員，拒絕追隨於這種罪惡的胆妄爲，並與畢特爾曼、福斯特派合力反對洛夫斯頓分裂分子——他們之中約有二百五十人不是被開除了便是脫離了黨。緊接在開除加農後而來的反洛夫斯頓鬥爭，實際上一下子就打破了小組組織的牆壁。幾乎像魔術一樣，小組鬥爭消逝了，黨迅速地沿着走向團結統一的道路邁步向前。

第三、一九二九年十月工業大暴跌後的長期危機中工人的覺醒和已形增長的階級鬥爭的發展，鞏固並加強了新創立的黨的團結。黨現在享有歷史上最堅固的團結。整個共產國際打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小組組織幫助了這一統一進程。

健康的、壯大着的、戰鬥的黨

在經濟危機的七年中，共產黨在思想及組織的發展上，以更快速的步調前進。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它在使自身由一個革命的宣傳團體變爲羣衆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方面，有了真正的大步向前邁進。總的說來，這一進步，是脫離共產黨中殘存的『左傾』宗派主義的，以及向着廣泛的統一戰綫政策的一個發展。共產黨現在是階級鬥爭每一階段上的統一戰綫的戰鬥領袖。

除了黨消滅反國會政治鬥爭、雙重產業工會主義、反統一戰綫態度等以外，黨在統一戰綫上的重要進展之一，是最近根據列寧久已奠定的基礎更實事求是地解決宗教問題。結果，反宗教的

共產黨現在是與好幾十個宗教及其他宗教團體在勞動大眾的當前經濟與政治利益問題上有統一戰綫的密切合作。

共產黨正在迅速地使自己美國化，方法是爭取大量土生土長的工人黨員，而在這全部進程中很重要的就是黨逐漸擺脫那舊日對民族傳統的宗派主義，和在這一重要問題上採取了列寧、斯大林的態度。共產黨大阻地向法西斯及其他反動派歷史傳統代表美國人民說話的權利挑戰，黨正確地提出它自己的革命綱領，以美國勞苦大眾的革命傳統及百年來民主鬥爭的繼承者及現今的代表的身份提出這綱領。黨在這一個問題上的立場可以總結為這一口號：「共產主義是廿世紀的美國主義。」這種態度打開了通向統一戰綫的另一扇門。

黨並正在加倍努力進行爭取合法存在的鬥爭。它根據一七七六和一八六一年美國的革命傳統出發，要求作爲一個羣衆革命政黨而自由活動的權利。黨駁斥了主張暴力的誣控，並還擊資本家有組織的恐怖匪幫、罷工破壞者和三K黨等。

在上面兩章中，我會概括地敘述了共產黨在危機時期所領導與支持的某些羣衆大門爭，其中包括一九三〇—三三年失業工人的大運動、退伍軍人及農民運動、一九三〇年工會團結同盟的罷工以及一九三三—三五年間無組織的工人及工會的許多罷工鬥爭。這些巨大的羣衆運動——它在工人運動中產生巨大的激烈反響（其中社會黨的向左轉以及巨大的產業組織委員會運動的發展是顯著的例子），曾經便利了共產黨統一戰綫綱領的擴大。

現在，共產黨在廣泛的統一戰綫基礎上，担負起在階級鬥爭中比從前更大的積極作用。我在這裏只能提一提它在現時的主要活動：它已經動員了至少五百萬工人及其他各界人民來支持失業保險法案（即國會紀錄第二八二七號法案）。它正在『美國青年大會』中起着重要作用，青年大會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克里夫蘭全國代表大會時，有一千四百代表出席，代表一百七十萬會員。共產黨在『美國反戰與反法西斯同盟』中也是重大因素，這一運動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曾在克里夫蘭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有二千零七十位代表出席，他們代表一千八百四十個團體，共有會員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九百〇六人。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芝加哥舉行的偉大的統一戰綫的『全國黑人大會』的組織中，共產黨的作用也是具有中心重要性的，這次大會出席代表計八百一十七人，代表一百二十萬組織在工會、教會、青年俱樂部中的成員。在所有這些統一戰綫的運動中，共產黨都是正式參加了的。

在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組織鋼鐵、汽車、橡皮、和其他工業的工人的重要運動中，共產黨起着巨大作用，它動員了它的一切力量來進行積極的組織工作。在發展農民勞工黨的運動中，共產黨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這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該黨在芝加哥的會議上被承認了，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明尼蘇達州的農民勞工黨、聯合成衣工人工會、勞工黨許多地方黨等的卓越領袖們，共產黨的代表正式地出席了會議。

共產黨的另一最重要的活動是它堅決反對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對產業組織委員會的取締行

爲。在我執筆時已有二十個州的分會、七十個市分會、好幾個國際工會及成百的地方分會抗議這一行動，這大部分必須歸功於共產黨，因爲產業組織委員會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活動，而且社會黨和平常一樣也是完全無所動作的。

除了這些廣泛的運動外，共產黨也正在對社會黨、公司工會、美國退伍軍人團分團和陶森俱樂部等等，進行許多其他統一戰綫活動。在巨大的喚起知識分子的工作中，黨起着重要的而且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們越來越多地逐漸參加黨的統一戰綫活動。特別是，經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共產黨也正在青年的重要階層中獲得工作成績。一言以蔽之，共產黨正在變成美國階級鬥爭中的巨大因素。

什麼地方鬥爭最熾烈，什麼地方就有共產黨把勞動者組成統一戰綫，來對抗剝削者。由於它的正確政策，黨享有健康的團結和逐漸地壯大起來。它最近繳納黨費的黨員數目如下：一九三〇年——七千五百人；一九三一年——九千人；一九三二年——一萬四千人；一九三三年——一萬八千人；一九三四年——二萬六千人；一九三五年——三萬人；一九三六年——四萬一千人，外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一萬三千人，共計五萬四千人。

這些成就與面前的偉大革命任務比較起來，自然是很小的。此外，共產黨還有許多顯明的弱點與不夠的地方，仍待糾正。但是重要的事情是，黨走上正確的軌道，它的階級鬥爭的基本綱領是正確的，它的廣泛統一戰綫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它正在學會有效地去應用它們。革命的共產黨

的壯大和進步的紀錄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而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則只有歷史性的失敗。一切都顯示：在美國革命運動中右派與左派的長年鬥爭中，左派是正確的。工人不沿着改良主義道路，而沿着階級鬥爭的道路前進，就必定贏得勝利。

共產黨與社會黨

共產黨力圖與社會黨建立統一戰綫行動；但是，只獲得很小的成就，儘管這一爭論問題在社會黨一九三六年的分裂中起了顯著的作用。雖然社會黨領袖們在若干問題（例如勞動保護，街頭示威等）上會與共產黨合作，並協助使社會黨與共產黨領導的兩個失業工人組織合併爲一，可是，他們却斷然拒絕了共產黨在全國大選中提出社共兩黨聯合候選人的建議，而且他們對與共產黨擬定總的統一戰綫政策，採取毫不妥協的反對。此外，他們還妨礙甚至破壞過共產黨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統一戰綫鬥爭，其中包括農民勞工黨、青年、黑人和反法西斯運動。

同時，社會黨使自己陷入危機和頹喪中。過去幾年，在覺醒的羣衆壓力下，社會黨員已經在進行一個左傾運動。這一運動本身說明它是黨組織中革命情緒增長的表現，而且使社會黨「老朽」們在一九三六年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遭受部分失敗。但是，儘管有向左轉的新運動，社會黨決沒有從使它遭受歷史性失敗的機會主義中解放出來。這種機會主義的大部分仍然存在，而且，事實上，由於採取具有激烈辭句的宗派外衣，已經具有新的和危險的形式。

改良主義受資本主義危機和法西斯主義的打擊而破產後，第二國際的各黨派並非向着同一方向運動。有三種明顯的傾向：第一、有一些社會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等）和一些社會黨內的少數派，正在發展階級鬥爭綱領（它表現為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行動）和建立人民陣綫等。第二、另有一些黨（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德國等）和其他一些黨中的少數派，却什麼也沒有學到，而且仍然死抱着第二國際傳統的、聲名狼藉的階級合作政策不放。第三、在一切社會黨中也還有這樣一種少數派，這是一種以具有激烈辭句或極端左傾主義的宗派機會主義政策代替舊的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美國社會黨正在顯示有落入這第三種宗派範疇的危險象

徵。

由於它最近吸收托洛茨基派，美國社會黨中宗派危險大大增長了。這些分子在世人面前證明是反革命的恐怖分子時，社會黨竟認為它應該把他們擁入自己的懷抱。托洛茨基分子勢將嚴重地使社會黨退化成反共產主義的、反蘇聯的半蟲，它將把最優秀的工人分子驅逐出黨，並削弱它與羣衆的聯繫。幾年以前，法國社會黨也犯過收容有害的托洛茨基派的錯誤；但是，它很快就必須使自己除掉這有毒的、不能消化的東西，而且，如果美國社會黨要想成爲一個健康的羣衆性的黨，也要做同樣的事情才行。

社會黨現在處於理論混亂中，一般地向着宗派主義前進。湯瑪斯——它的卓越領袖——的觀點是『左傾』的自由主義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的混合，而且染有深厚的托洛茨基主義，而他却

把這種不調和的混合稱爲社會主義。湯瑪斯甚而還沒有社會黨的舊式右傾機會主義領袖希爾奎特那麼馬克思主義化。他積極地向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基本原則挑戰，而對於列寧與斯大林的基本著作，他連看都不看一下。他的綱領陷於一種右傾與『左傾』的宗派主義的奇特的混合。由於理論混亂的結果，社會黨也沒有組織上的統一：它包含着一些『戰鬥者』、『老朽』、托洛茨基分子、洛夫斯頓分子等互相衝突的集團，它們日益加深着的小組織鬥爭，正在毀壞着黨的生命力。

社會黨今天正在增長着的宗派主義的中心問題，是出於湯瑪斯的理論，認爲當資本主義正在崩潰的時候，部分的經濟與政治要求比較上是無關重要的，而當前的爭論問題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問題。『社會主義者當前的要求』，他說：『是社會主義』。這是僅在三年以前還贊美羅斯福政綱的湯瑪斯所說的很革命的辭句。但是，這畢竟不過是激烈辭句的販賣而已。實際上，部分要求問題從未有像現在這樣重要，工人現在所遭遇的是日益增長的反動派對他們的生活水平與民主權利的猛烈進攻。正如共產黨所正確地強調指出的，英勇保衛工人當前利益是一切革命工作的起點；通向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要道。舉一個例：由於戰鬥地保衛他們的民主權利，西班牙工人同時正迅速地促進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後因德國及意大利法西斯援助佛朗哥而失敗——譯者）。但是，湯瑪斯放鬆當前的經濟與政治要求並把整個鬥爭集中在抽象的爭取社會主義上面，這樣，他就削弱工人的總的鬥爭，使社會黨脫離羣衆，並直接被赫斯特玩弄於

股掌之上，而赫斯特極力把工人爭取民主權利或增加工資的每一鬥爭都描寫成一種氣勢洶洶的革命，來恐嚇動搖分子的。而且，這也爲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所利用，他們想設法來控制社會黨。

社會黨內的宗派傾向也使它目前與右傾『老朽』的分裂中喪失更多的黨員。用『左傾』的宗派主義去與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不行的。湯瑪斯這樣做的惡果，便是使大批優秀分子投入『老朽』的懷抱，或經由其他道路而脫離黨。

湯瑪斯的宗派主義理論實際上走到什麼地方，在一九三六年的全國大選中就可以看出來。體現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真正威脅的大資本家利益集團，幾乎全都堅定地團結在藍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譯者）背後，以擊敗羅斯福，因爲羅斯福雖然動搖不定並對他們讓步，但是他們仍然感覺不滿意。顯然，正如共產黨已經指出的，任務是警告羣衆要擊敗藍敦，另一方面又譴責羅斯福的政策。共產黨一面有它自己的總統候選人——白勞德和福斯特，一面攻擊藍敦是未成熟的法西斯主義的主要代理人。但是，新生之轍，超革命的湯瑪斯却不這樣做。他抽象地談論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但是，美國的主要法西斯分子赫斯特，已經成爲共和黨的領袖，並已親自挑選了它的總統與副總統這件事情，對於湯瑪斯却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湯瑪斯因爲未指明藍敦是法西斯危險的主要代表而給了赫斯特以客觀的幫助。關於如何對付赫斯特的危險的法西斯陰謀，湯瑪斯向工人所提的唯一意見，就是投票選舉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以爭取社會主義。從而，社會黨使它的反法西斯鬥爭化爲烏有，使該黨陷入與工人大衆的利益和活動直接衝突，並更向着走往宗派主

義的改良主義泥潭的道路上邁進。

社會黨對勢將爆發的戰爭的政策也是它過去改良主義的一種殘餘，雖然這種殘餘是在激進主義的宗派外觀的掩飾下的。簡單說來，戰爭情勢是：（一）法西斯的德、意、日正在發展一個國家大集團，以便發動一個反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戰爭，同時，它們也計劃最後進攻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法、英、捷、西班牙（指西班牙共和國——譯者註）、美以及各殖民地國家；（二）如果成功，這種進攻將會是對各國工人的粉碎打擊；它將使歐洲民主權利的最後一點痕跡消滅無遺，使資本主義各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殖民地苦力的水平，並把蘇聯拖進歷史上最大的血浴中；（三）因此，蘇聯的和平政策正確地企求發展社會主義及世界民主力量的聯合防禦，以抵抗威脅着的法西斯進攻，保持和平，因而不僅保存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生活水平及民主權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而且同樣極大地加速各地社會主義運動。

但是，湯瑪斯以虛偽的激進姿態，排除這種顯然正確的革命戰略。他響應考茨基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誹謗和希特勒關於蘇聯是戰爭源泉的謊言，竟把共產黨人斥為進行『聖戰』的十字軍。他把蘇聯正在領導的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說為僅是資本主義各國間終將發生的一場『惡』戰的準備而已（註一）。而且信口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中立』政策鼓吹。湯瑪斯所支持的羅斯福『中立』政策，並不能使美國避免戰爭，而且，他的『睦鄰』政策也是同樣無濟於事的：因為人們要能和瘋狗做朋友，才可與法西斯侵略者做『善鄰』。美國只有援助那些努力使世界避免戰爭

的致力於和平的各國，才能避免戰爭。湯瑪斯對戰爭危險的反動態度是無恥投降希特勒，是拋棄準備進行戰鬥的歐洲工人，是犧牲社會主義事業。這種態度只能在美國勞動大眾眼目中有損社會黨的信譽，並削弱它的總的影響。

湯瑪斯碰到法西斯在歐洲的戰爭進攻就實行退却，這是他整個見解的典型例子。他是一個已經證實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的預言家。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每一階段，他總是設法尋求消極和投降的道路。所幸他的道路不就是羣衆的道路。對於羣衆，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哲學理論問題：他們的生活和自由處在危險中，他們要進行鬥爭。湯瑪斯的不鬥爭政策的例子舉不勝舉，例如，當羅斯福宣佈他的『全國復興法』時，湯瑪斯要求工人不要罷工。可喜的是工人並不尊重他這種消極的意見，並勝利地實現了美國歷史上最火罷工浪潮中的一次罷工。湯瑪斯在他的著作『我的看法』中，憂愁地說：由於飛機和其他現代軍事武器的發展，工人的武裝行動已成為不可能了。但是，遭受大量有訓練的軍隊進攻的西班牙工人，對湯瑪斯的投降宣傳正給以光輝的否定。而現在在他的『新政以後是什麼？』一書中，湯瑪斯不但認為在下次嚴重經濟危機後，法西斯主義在美國是必不可免的，而且認為在行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以後，法西斯主義多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工人們也將使湯瑪斯這種大悲觀主義碰釘子的。工人們在法西斯主義能够在美國成功以前，

（註一）見『新政以後是什麼？』第二一八頁。

就會出來作重大的發言，而且，難道現實主義者能够懷疑，下次世界大戰後不會是法西斯主義的擴展，而是產生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浪潮，這個浪潮可能粉碎全歐洲資本主義制度麼？湯瑪斯的新宗派主義的根源存在於他的基本的悲觀主義，他的顯然不信任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戰鬥能力。這是逃避殘酷的現實和階級鬥爭的任務而遁入以漂亮的激進的空洞詞句來陶醉自己的王國中。工人階級不會依照他的消極和投降的宗派主義道路前進，正如他們沒有依照他曾經指出的同樣有致命害處的道路前進一樣。

在湯瑪斯統治下的社會黨中，過去遺留下來的許多改良主義的傳統之一，就是社會黨領導機關的反對統一戰綫。只有他們的黨員強迫他們的時候，他們才在這一問題上讓步。儘管湯瑪斯蓄意用花言巧語來掩蓋他們反對與共產黨採取共同行動的真實意義，他們的這種作法實際上是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左派的多年鬥爭的繼續，這種有致命害處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使社會黨陷於目前的低下地位。美國社會黨的反統一戰綫政策，是與第二國際的反動支部的政策一致的。這就是德國機會主義者的政策，他們反對共產黨的反希特勒統一戰綫，而且仍然拒絕接受最近工人階級分裂的痛苦教訓。對於西班牙和法蘭西的各黨各派的工人，目前社會黨的反統一戰綫政策的邏輯就是取消他們的人民陣綫（註一）和回復到社會黨改良主義的孤立行動的老政策，而這種政策在德國和各國都造成了很大的災難的。

社會黨的另一可惱的事是：黨對蘇聯及其和平政策的一般反動政策。這是希爾奎特『老朽』

的激烈反蘇主義一脈相傳下來的。『社會主義的呼號』簡直是柴姆、托洛茨基派分子和其他職業的反蘇誹謗家大肆猖獗的地盤，他們的謊言是和赫斯特及格林的謊言一鼻孔出氣的。而且，湯瑪斯本人對蘇聯或他之所謂『俄國』的態度，是百分之一的勉強的贊同和百分之九十九的無恥的攻擊。這種對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動立場，不僅損害蘇聯，而且特別危害社會黨自己，因為它使黨的純潔忠貞受到損害，而且使工人階級中最革命的分發生反感。

今日的社會黨仍然沒有與它那一世代以來的禍害——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控制——斷絕關係。黨仍然是被律師、傳教師、醫生等所操縱。儘管『老朽』已告失敗。在十一個全國執行委員中，只有一個工人，而且他是一個工會的高級幹部。與此相反，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會的十一位委員却全是工人。

上面我已經說明：社會黨的宗派主義的反勞工黨政策，多年來都是它的極其致命的改良主義的錯誤。這種對於勞工黨在原則上的反對態度，一般地說，是對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及組織性提高的真正障礙，而具體地說，是對社會黨黨員及其影響增長的真正障礙。現時社會黨的領導機關對這一有害的政策僅作很小的修改，主要地，是用激進辭句來掩飾它。社會黨對農民勞工黨的支持大部分是口惠。它在這一重要問題上並未給羣衆以真正的領導，而是到處潑冷水。社會黨並未

(註一) 湯瑪斯支持社會黨人與大資產階級同盟的麥克唐納與奧登堡政府，却拒絕給人民陣綫所支持的法蘭西和西班牙政府以真誠的贊助。

實際地幫助建立各地方的及州的農民勞工黨，却會是建黨的明顯阻碍。社會黨人甚至以超革命純潔性爲藉口而拒絕出席農民勞工黨黨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是明尼蘇達州農民勞工黨召集，五月三十日在芝加哥舉行的。社會黨依舊死死保持着下述改良主義幻想，農民勞工黨是個敵手，而且在社會黨最近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六十四個代表投票贊成（一百一十九個代表反對）在原則上反對勞工黨。

在工會工作中，社會黨的新領導機關已經放棄了改良主義的對工會『守中立』的舊政策——這在一世代以來對社會黨有害的政策。但是，黨對於工人的實際問題（勞工黨、法西斯主義、蘇聯、統一戰線等）的總的方針，是很狹隘和宗派性的，而且，它對工會的新政策也就無補於事。事實上，社會黨最近在它對工會影響中遭受了慘重的下降，以致它甚至於幾乎完全喪失了對傳統的社會黨工會——縫紉業工會的領導權。

現在把社會黨的情況作一個簡單的綜述。在本章開頭，我指出了社會黨在它的長久的歷史中不能使自已成爲強大的革命政黨，其原因可以歸納爲兩點：一、它未能在工人階級日常經濟與政治要求的鬥爭中，逐步成爲工人階級的羣衆領袖；二、它未能教育和發展一個有訓練的革命家的堅實整體，作爲黨的靈魂與骨幹。因此，可不可以說，社會黨，特別是在最近向左轉以來，已經消除了這兩個致命弱點——機會主義的毒藥呢？對於這一問題的答復必須是說，絕對沒有！第一、我們已經知道，社會黨雖然已經與改良主義舊政策部分地決裂了，這種舊政策把黨僅僅認爲是宣傳

的競選的機器，但它仍然未能在工人階級日常鬥爭中以工人階級的戰鬥政治領袖姿態出而行動，而且，它最近的宗派傾向愈益使之離開鬥爭，退處旁觀地位。第二、社會黨領導本身既陷入絕望的理論的混亂中，就不能夠教育一批革命家作為該黨的基礎。社會黨的機會主義依然存在，不過改頭換面而已。因此，必須說，由於目前的政策，社會黨既不能團結一致，也不能成爲一個羣衆性的組織，除非得到矯正，社會黨勢將趨於沒落和殞化，而這就是宗派主義的社會主義勞工黨和世界產業工人工會的命運；或者要更壞些，以至陷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泥潭中。

然而，社會黨的情況並不是完全無望的。相反地，現在社會黨的黨員及下層領導中，正發展着一種新的真正左傾的精神。可是，這種傾向，雖然是發展遲緩的，却極力向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正確路線前進，它將完全消滅多年來毀滅社會黨的改良主義政策和目前的改良主義的宗派傾向。這是社會黨中基本上健康的傾向，而且現實的痛苦教訓將日益加強它的力量。

共產黨歡迎並支持社會黨這種向左轉，理由很明顯：革命情緒與組織的每一增長都是基本上有利的。共產黨主張與社會黨立即採取統一戰線行動，而且更進一步爲兩黨在階級鬥爭綱領的基礎上最後合併而努力。這種統一的行動與組織將會大大增加美國革命運動的威力。

第十七章 前進的道路

世界今天呈現一幅資本主義制度沒落的圖畫。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大批的失業、羣衆性的飢饉、大規模的罷工、革命的人民陣線運動、廣泛的殖民地革命、日益增長的法西斯主義和文化上的反動、勢將到來的戰爭危險；一切這些發展速度不斷增長的現象，都是資本主義這個社會秩序崩潰的明顯象徵，資本主義是早已應該壽終正寢了的。這些現象也是正在出生的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制度的陣痛。而資本主義制度崩潰和社會主義出生的一切象徵中最大的象徵就是蘇維埃政府的建立和壯大。

在到了它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就其作爲世界經濟—政治制度來講，現在已面臨它的毀滅，這是因爲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它再也不能發展社會生產力了：當一種社會制度處於這種情況時，它便命定要死亡了。資本主義社會是在工業與天然富源的私有基礎上建築起來、和在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下組織起來的，它不能進一步提供必不可少的經濟發展的方法。它的順利發展和擴大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它現在經濟上停滯不前，甚至向後倒退，並迫使千千萬萬的工人、小農、中等階級分子陷入日益加深的飢饉中。它產生一種經濟力的可怕的壓力，不利於日益受限制着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形成尖銳的政治形式；它具有爆炸性，而且

它不可避免地將把資本主義整個政治結構打得粉碎，從而用革命的方法掃清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和羣衆幸福自由發展的道路。我們在資本主義世界各處所見到的動亂、鬥爭、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爆炸或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期階段。

資本主義的致命的弱點

資本主義的不能進一步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具體地主要表現在資本主義下的根本的和不可救藥的矛盾——一方面工人與農民生產商品的生產力不斷擴大，一方面有限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吸收這些商品。它是勞動者生產力和他們的購買力間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家掠奪（通過工資、物價、稅收等）工人與農民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他們不能買回他們所生產出的東西，因此，資本家發覺他們握有這許多的財富，他們既無法消費、浪費，又找不到吸收這些財富的市場。隨着工業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一方面），以及工業化擴大到許多新國家（另一方面），這個生產過剩問題——即生產超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銳起來。

資本主義制度具有許多基本缺點，經濟的與政治的矛盾，這些都不斷地趨向於把它撕得粉碎，不過，生產力與購買力間的矛盾是這一切缺點中最基本的和最富爆炸性的。這個矛盾是資本家與工人間長遠的、日益加劇的鬥爭的主要原因，這一鬥爭爲的是爭奪更多的工人生產品。它使某些國家的資本家集團間的鬥爭緊張起來（因爲非爭奪市場不可）；它是日益增長的新世界大戰的

核心原因；它正在產出將要毀滅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力量。

馬克思在九十年前就已指出並分析資本主義的這一致命矛盾及其所含的革命因素。但是，資本主義那時具有自由發展的廣寬的餘地，如使手工業工業化，發展整個新工業，征服殖民地市場等；因此，生產力與市場要求間的不祥矛盾便未顯現出來。因而，各國資本主義的（以及修正派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譏笑馬克思。但是現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地正接近末日，這些經濟學者被迫承認羣衆的生產力與購買力間的巨大矛盾。縱使他們拒絕接受馬克思對於這種矛盾所含的革命因素的冷酷分析，他們却全都談論着它的禍害了。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過程趨向於使這種矛盾尖銳化。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得無厭，加強對勞動羣衆的剝削，這就更加擴大羣衆所能生產的能力與他們所能買回他們所生產的產品間的能力的鴻溝。這一事實再加上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其他瓦解性的趨勢——無計劃的生產、尖銳的競爭、帝國主義的侵略等——迫使資本主義制度更深地陷入它所正在陷入的經濟危機中。

這一全部過程在美國顯得非常清楚。胡佛和羅斯福都放胆向我們說：經濟恢復的關鍵是增加羣衆的購買力。但是，盡人皆知，在胡佛統治下，由於失業、工資減低、農產品價格跌落等，工農的購買力慘跌。在羅斯福當政時，整個說來，由於政府的公共工程所造成的就業——和對農民及失業者的救濟，羣衆購買力確有某些增大，而且工業生產逐漸上升。然而，基本上，生產力與購買力間的致命鴻溝是繼續在擴大。這在數百萬產業工人的情況中看得特別明顯。由於工業水平

不斷下降、生活費用不斷上漲，整個就業工人的實際工資，與羅斯福就職時仍是一樣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製造業中每一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這一切的意思就是生產力與購買力間的鴻溝正在擴大。

『新政』使大資本家的利潤大為增加，但是，它未能在基本上改進勞動羣衆的情況。它並未消滅失業——仍舊有一千萬人沒有工作，而且總共有一千八百萬人靠救濟維持生活；它便利了對就業工人更加緊剝削；它並未使中小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進。充其量，它不過使羣衆在危機最厲害的時候倖免於真正餓死而已。總而言之，新政並沒有縮小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鴻溝，而是擴大了這鴻溝。因此，新政並沒有削弱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而是相當加強了這種原因。

雖然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經濟危機後鬆了一口氣，但這却不過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加深的總危機範圍內的周期性危機的上升階段而已。已經發生的這種恢復大部分是人為的、冷熱病似的、不健康的。它大大有賴於破爛的資本財的重行裝置、大量戰爭定貨和政府的救濟工作。並沒有什麼由於新的資本的必要投資而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真正擴充（一九三六年三月美國新資本投資僅及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八），而沒有這種資本投資以消納它積存的過剩生產品，那麼，資本主義就必定窒息在它的大量無法消費的商品上。現時在美國及其他各國的經濟好轉僅是暫時的，而且不過是新的崩潰的序幕，新的崩潰在工業與政治惡果上將遠較一九二九年的更具毀滅性。

解脫危機的革命方法

致命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解決辦法是用革命的方法消除它。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它的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同盟者必須打破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並使銀行、大工業及土地社會化。爲了私人利潤的生產將從此消滅，爲使用而生產，將從此確立。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將從此停止。隨着整個勞動者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生產品（除了必須用來經營公共事務及擴大工業者外），資本主義對於他們的購買力的限制就取消了，同時，現在桎梏着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的枷鎖也就打破了。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互相矛盾的情況相反，生產力與消費力將自動地平衡，而且一同增大起來。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概要，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過渡階段。

由於資本主義基本經濟矛盾（日益擴大的生產力與日益縮小的市場間的矛盾）的解決，資本家的階級統治的擊破，資本主義的其他無數辛酸與痛苦、矛盾與衝突，也就會消失了。社會主義生產將有計劃，並將依照穩步迅速的上升方向進行，而不致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禍害深重的週期危機。因爲生產的數量增加和價格減低，工廠與農場的勞動羣衆的幸福也將自動地增長。失業不再發生。社會階級將消失，階級鬥爭也將隨之而消失。罷工將成爲過去的事情。各個民族沒有了彼此剝削與壓迫的原因，將共同生活在持久和平與合作中。種族和宗教的仇恨將消逝。科學、文學

及藝術最後將擺脫統治階級的長期的束縛，並將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將第一次有真正的民主與自由。

蘇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三世代以前所作出的正確的分析與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活生生的證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羅斯的工農在共產黨領導下驅逐了地主、資本家及其他剝削者，把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的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並使工業與土地社會化。現在，他們正逐步向幸福前進着。蘇聯沒有失業和危機，雖然世界其餘地區在經濟上虛脫，千千萬萬工人流落街頭。當世界上資本主義工業停滯時，蘇聯的工業却在繁榮發展；一九三五年蘇聯工業增產百分之二三。從一九二八年以來，工業增產百分之二七五。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這樣迅速的工業發展。由於食利寄生蟲的消滅，市場問題也沒有了，而有的只是在這個從前是落後國家內發展大眾生產力的暫時的問題。由於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蘇聯各民族人民和平與和諧地共同生活着，蘇聯沒有反猶太人及其他一切對少數民族的迫害。由於同樣原因，蘇聯是世界上建立在和平綱領上的唯一國家，因為它的整個組織體系基本上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完全排斥爭奪殖民地市場、勢力範圍等的鬥爭的。而這些却是現代戰爭的主要原因。當資本主義各國日益轉向法西斯恐怖時，蘇聯却發展一個包含更廣泛的民主（以蘇聯新憲法為典型例子）和廣大羣衆的科學與藝術文化的高潮。一言以蔽之，蘇聯已經和年代淵久的奴役制度絕了緣，這一制度曾使羣衆長久地處於痛苦、窮困和奴役中；蘇聯已經找到人類巨大經濟與政治問題的基本的解決方法，而且現正為全人類打開通往那種

合理與幸福的社會制度，這才是與人類相稱的制度，人類最優秀的心靈曾經在整個歷史中夢想着它並爲它而鬥爭。

蘇聯唯有經歷了最不可想像的鬥爭和苦難後，才能給世人以社會主義的生命力的這種實際表現。沒有任何人曾經受過像俄羅斯工人與農民所受的嚴酷考驗。他們真是曾經有千千萬萬的困難要克服。他們的任務是，要在一個工業很少和農業尙處在木犁階段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所謂『不可能的』任務。不但如此，俄國被七年的帝國主義的及國內的戰爭所蹂躪和毀滅，而且它仍被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資本主義世界渴望以拚死的方法攫取、妨害或摧毀這個新成長的社會主義社會。蘇聯勞動者還必須自行解決在這種困難情況中的社會主義組織與建設的巨大無匹的技術問題，因爲這在社會經驗中是無先例可循的。他們勇敢地對付戰爭、飢饉、疫病、經濟崩潰、文化落後、敵人對他們的工業的有組織的破壞和暗殺他們的領袖，而他們戰勝了一切障礙。由於他們有偉大共產黨（它首先由列寧，後來由斯大林領導），他們已經克服了這一切困難，而資本主義世界曾經宣稱這是萬萬不可能克服的。

許多年來，當蘇聯勞動者勇敢地與橫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巨大障礙作鬥爭時，世界上的資本家和他們在工人組織中的改良主義代理人是能够曲解正在繼續進行着的革命進程，因爲這一進程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說來是全新的，而且是不容易理解的。蘇聯的每一個進展——從布列斯特和約、新經濟政策、第一個五年計劃到蘇聯加入國際聯盟、法蘇軍事同盟條約和斯達哈諾夫運

動的增長等——都被它的敵人歪曲和譏謗。反蘇勢力不顧事實地信口開河，把俄羅斯的窮困說成是社會主義行不通的證據。有許多落後的勞動者會相信這些謊言。但是現在，當蘇聯這樣迅速地走向繁榮和幸福的時候，反蘇謠言便煙消雲散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是這樣顯明，以致最落後的人也只得承認了。蘇聯已經成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被剝削羣衆的希望與指路的明燈，而且它對他們的革命影響是非常深遠，並日益增大。

法西斯主義在全世界滋長

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銀行、工業和土地的社會化、利潤制度的廢除等，因此，俄羅斯勞動羣衆所發揚的社會主義制度，除了對於國情的必要的適應外，是可以應用於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僅如此，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巨入政治與經濟危機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它是人類逃出資本主義殺人淵藪和進入和平發展、幸福、文化時期的唯一道路。

但是，社會主義只有在資產階級已被推翻以後才能建立起來；因爲資本家和他們的僕從，這一切靠掠奪勞動大衆爲生的寄生蟲，對於用革命方法解決社會苦難，他們必然是瘋狂抵抗。這些反社會的分子心目中只有一件事：保持他們自己的特權、財富與權力，不願人民大衆的死活。不特要化多大代價，他們必須擁有巨大的莊園、宮殿、遊艇和專制權力。甚至雖則千百萬工人因失業餓

死、貧民窟中的小孩像蒼蠅一樣死亡、工業停頓、農業衰退、大多數人類因社會條件惡劣而退化、文化倒退到中世紀的情況、民主被廢除了，世界因屠殺千千萬萬人的內戰及國際衝突而分崩離析，以及雖則無數其他的災難早已大聲疾呼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就是資本主義已經變成進步的障礙，大量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延長它的老朽壽命勢將危及文明的生存本身，然而他們的懶惰和奢糜的生活却必須保持下去。

在資本主義初期，這個制度那時還能緩和它的政治與經濟的內在矛盾的毀滅性力量，它還能夠利用向新工業及新國家的擴張來找到新市場，所以，資本家能够在有限民主範圍內保持他們的權力。他們給勞動羣衆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權利及經濟自由——選舉及担任公職、組織工會及罷工等；他們也向工人階級的上層及熟練工人作工資上的讓步。勞動羣衆由於頭腦中充滿資本家精心培植的資本主義幻想和不准確的意識，大部分是安於這種情況的，而且他們的革命組織進展得很慢。

可是，現在情況很快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加深了，特別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制度窒息了、瓦解了。勞動羣衆被投入飢饉中，革命情緒在他們中間迅速地增長。他們更多地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制度進攻。統治階級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繼續進行對羣衆的剝削，他們日益認識到：他們必須放棄他們老的一套統治方法。他們對一切問題的答復是無情地使用暴力。他們廢除議會政治、粉碎工會，宣佈工人的政黨非法，擊破一切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反對，減低工農大眾的生活水平，並津貼、培育和加強資本家的壟斷。簡言之，他們廢除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並建

立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建築在軍事恐怖、極端的欺騙宣傳和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

資產階級統治者一面企圖用對勞動大眾加緊鎮壓與掠奪的方法來消除他們的內部矛盾，同時也力圖以武力解決他們的外在或國外矛盾。他們培養一種瘋狂的民族主義並無情地把人民加以嚴格的編制，使他們充當炮灰從而開始進行對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侵略運動，以奪取領土與市場。這樣一來，他們便把永遠存在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加深了。法西斯政府始終是顯然野蠻、好戰和嗜殺的。日本的強佔中國；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德國的公開準備奪取烏克蘭是侵略性的法西斯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表現。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使人類遭遇可怕的前途，即不僅羣衆大大退化和被奴役，而且比上次戰爭的災難大多倍的新世界大屠殺的威脅日益逼近。

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沒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腐朽的果實。各國的資產階級中的有決定意義的分子——大銀行家、大工業家和有土地的利益集團等——當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日益尖銳的時候，正向這種法西斯目標前進。它們的發展速率以各該國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度和緊張程度為轉移。法西斯主義是財政資本的絕望的掙扎，它已經誘騙了許多小資本家、大部分受了騙的中產階級和許多落後工人，幫它擊退前進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和保持過了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而資本主義制度是被歷史無可挽回地判決了要毀滅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

美國的法西斯危險

美國財政資本也是依照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總方向前進的。像其他各國的財政寡頭一樣，而且由於同一的基本原因，它也正在向法西斯道路行進。如果它的發展速度沒有像德、意、奧地利那樣快，那只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在美國還沒有那麼尖銳；如果法西斯主義在美國採取不同的型式，決定性的原因就是我們有特殊的國情。但是，如果誰因為美國法西斯這些特點而看不見法西斯的危險，那真是瞎了眼。

初生的美國法西斯的老家就是華爾街。大銀行家、工業家、地主——美國的真正統治者正日益決心在美國採用法西斯的方法和政策。所有這許多法西斯與半法西斯團體，它們今天的活動和人員都圍繞着這一有決定意義的中心事實，而且從它那裏得到支持與扶育。像赫斯特、考林、史密特、烏爾、塔爾瑪德基、麥克法登這一派日益增長的欺騙宣傳集團，以及美國退伍軍人團、鐵血團、三K黨、黑色軍團、十字軍人等只不過是下述基本現實情況的一些表現，那就是始終很反動的大實業家最有勢力的階層現正逐漸變為法西斯。那些看到小資產階級在法西斯運動中的積極作用，因而得出法西斯主義是中產階級的統治而不是壟斷資本的公開獨裁的人，就犯了很大的錯誤。

在資本主義日益深刻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中，兩個密切互相關聯的主要打算正在把美國財政資

本推向法西斯方向。第一個是各國資本家所共有的深刻恐懼，即對於日益逼近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懼；美國大資本家認識到現在美國發生的羣衆騷動的最後的革命意義，儘管這種騷動現在還是具有一種穩健的性質，而且他們將會利用時機，以欺騙宣傳與暴力的法西斯方法，來預先防阻這種革命威脅。大資本家的第二個打算具有更直接的性質：他們熱望以減少工資、減少救濟費、趕快生產等犧牲工人的方法來增加他們的利潤。德國、意大利資本家在擊破工人政黨、工會、合作社和大大減低生活水平上輕易獲勝，使主張無情地不理工會而自由僱用工人的美國剝削者從而得出結論：利用同樣的法西斯恐怖方法在美國也將會是立刻和大大有利和順利的。

法西斯危險的中心問題在於：有好幾百萬貧困的、不滿意的和思想糊塗的工人、農民及自由職業者等等，大部分都沒有組織起來，而且也沒有領袖。財政資本以虛偽的諾言、騙人的政綱和公開的恐怖手段，力圖使它的走狗成爲這些反叛的羣衆的領袖，從而把羣衆那種不滿情緒和改善情況的要求變成爲反動派及法西斯主義服務的最有力的武器。法西斯的戰略的實際就是從那些本應成爲它的死敵的階層中吸取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選中，我們親眼看到了初生的美國法西斯主義勢力的第一次真正動員。大部分財政資本，法西斯趨向的根本源泉的直接代表是共和黨及自由同盟，並團結在藍教周圍。它決心不惜任何犧牲以擊敗羅斯福，而且藍教的自由主義的宣傳運動，是要模糊資本家真正反動的政綱的，因而接近於法西斯的欺騙宣傳。在奸雄考林、史密斯、陶森、勒姆克等所支持的聯合黨的

領袖們中，充滿了日益增長的法西斯精神。而且該黨的成立，恰合法西斯思想的大實業家企圖從羅斯福那裏爭取羣衆支持的戰略。

大資本家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最反動的南方，在民主黨控制的紐約，在芝加哥、印第安那等地放肆地支持民主黨，因為民主黨在這些地方是合乎他們的地方的需要的；但是，就全國範圍來說，他們反對羅斯福，因為羅斯福對他們說來，代表傳統的美國自由主義，而這正是他們所要消滅，並代之以對羣衆的無情統治的。是的，當羅斯福一九三三年就任時，他們是支持他的（而且，無疑他們企圖再和他和解）；不過，早先對他的支持主要因為他們的胡佛政府已明確地未能消除危機和阻止羣衆起來。大財政寡頭害怕：爲了使他們脫離困難情勢，絕對地必須暫時接受羅斯福所建議的某些綱領。但是，資產階級寡頭始終看不慣羅斯福對工會的容忍態度，對失業業者、農民、小額銀行存戶、小房東等的部分救濟辦法。因此，當經濟危機已經度過最壞階段，工業又開始慢慢地活動起來時，大資本家便又鼓起勇氣，堅決要求羅斯福立刻拋棄他的一切救濟和保險措施，重新把羣衆置於『倔強的個人主義』的自由僱用和飢餓的統治下。他們支持這種專斷的要求的方法，是轉而以大舉支持共和黨，並以全力攻擊羅斯福。他們甚至把他稱爲共產黨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

在這種密集砲火攻擊下，羅斯福只得逐漸向右退却。他曾經一再向華爾街讓步：減少失業救濟金、准許成立公司工會、禁止罷工等。但是羣衆反對他這樣做的壓力已經很大，羅斯福向右轉

得並不那麼快，或那麼堅決，以適合大財政寡頭的利益。他們決心消滅民主權利和壓低羣衆生活水平。在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日子裏，他們預見急需有激烈的鎮壓措施，以控制叛亂的羣衆，而藍敦却是他們選擇來担任羣衆貧困和飢餓的勾當的現有的領袖。羅斯福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的眞正障礙，而藍敦則是反動派在一九三六年大選中的主要政治旗手，反動派正在更加向法西斯主義方向行進。藍敦獲勝雖然不致立刻實行法西斯主義，但却會大大刺激和便利它的發展。

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政黨共和黨不得不放棄它的傳統政策——不以公開的反動分子，而挑出一個以自由主義偽裝的人物藍敦做它的總統候選人，是一個陰險的舉動。這樣一種鬼蜮伎倆本身就是極其奸詐而且充滿法西斯通常使用的戰略的氣味。法西斯主義者經常提出能籠絡人心的人物和欺騙的口號，以籠絡沒有政治頭腦的羣衆，並使這類口號的性質適應羣衆的政治覺悟程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在革命危機的情勢中，以虛偽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口號僭奪政權的。可是，在美國，情勢却尚未如此嚴重，民主傳統強烈，羣衆仍舊追隨兩個老大政黨，並深受資本主義的幻想之害，日益傾向於使用法西斯手段的財政資本，發覺它祇要把它的反動綱領一般地用自由主義的騙人的假面具和爭取民主的假鬥爭隱藏起來就可以了。要不是有想要脫離舊政黨的比較激進的分子，考林、史密斯之流專門爲財政資本羅致不滿羣衆的、較爲公開的法西斯分子就已儼然以激烈的叛逆自居，並提出了一些虛偽的革命口號了。在藍敦的和愛的微笑，他的『進步主義』背後，和在考林的『激進主義』背後，都同樣隱藏着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獐獍面孔，反動派堅持趨向

窮兇極惡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反猶太人、反黑人、排外政策、摧毀工會、壓制民權，和文化反動、羣衆挨餓與戰爭的政策。

世界反對法西斯、反對戰爭的鬥爭

法西斯主義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反而使這些矛盾大大加深。它加強了對勞動羣衆的剝削，擴大勞動羣衆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鴻溝，因而加深了經濟危機。它鎮壓工會和工人、貧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其他鬥爭的組織，這樣雖然暫時壓制了階級鬥爭，但並不能消滅階級鬥爭，而只是把階級鬥爭像堵水似的堵起來，終於使階級鬥爭勢頭更加猛烈。它的狂暴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的急迫的國內問題，反而有摧毀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勢。因此，隨着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它也就與廣大人民羣衆相矛盾，普遍地大大促進資本主義世界勞動者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共產黨是正在覺醒的千百萬羣衆反對當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危險的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爲此目的，共產黨人首先實行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政策：這是各國無產階級與其他被壓迫階級的堅固的團結，也是受到進攻的殖民地國家、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合作，共同保衛民主制度，英勇反抗法西斯生番的戰爭屠殺。這個列寧主義的政策，已經成功地廣泛運用。人民陣綫的基本陣容——工人、貧農、中間階級的下層——實質上和實現俄國革命的陣容相同，建

立人民陣綫成了現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的戰略，它的最傑出的理論家和組織者就是英明的斯大林。

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領導者英勇的季米特洛夫的世界規模的領導下，在好些國家組織人民陣綫的工作上起了決定的作用。最明顯的是在西班牙和法國，統一戰綫政策已經有了真正的成就，已經在選舉中產生了人民陣綫的反法西斯政府。在國際範圍內，蘇聯也已本着同樣的總原則，與法國和其他受威脅的民主國家結成聯盟，並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

要了解共產黨今天這種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戰爭的革命的統一戰綫戰略，就必須首先明白認識法西斯的國內外政策是以好戰的、侵略的原則為基礎的。在法西斯還沒有當政的許多國家，法西斯逼迫資產階級民主力量處於守勢，而且力圖剝奪這些國家的工人、貧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最基本的公民權，摧毀他們的組織，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範圍內，德、意、日等法西斯集團，在各國反動階級的日益增大的支持之下，進行狂暴的帝國主義侵略，威脅許多國家的民族生存與政治獨立，受威脅的不僅是蘇聯，而且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法國、西班牙、捷克斯拉夫，還有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法西斯進攻所提出的世界當前的問題，就是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義二者必取其一的問題。

現在這些國家的人民羣衆，雖然還不願接受階級鬥爭的全部邏輯，立即進行推翻資本主義，

建立社會主義的鬥爭，然而他們已準備進行英勇的戰鬥去反對法西斯分子，保衛自己的已受威脅的民主權利和生活水平。他們極力反對鎮壓他們的工會，摧殘他們的政黨，減低他們的工資，抑制他們的一般的公民權；他們害怕他們的國家喪失政治獨立而為法西斯帝國主義者所奴役；他們恐懼新的世界戰爭，這次戰爭的破壞和殘酷，要比上次大戰大很多倍。受到攻擊的羣衆，爲了保衛自己的因爲法西斯主義的發展而受威脅的生命和自由，儘管在組織上和終極目的上各不相同，但是願意而且能够組織起來共同進行鬥爭。與整個列寧主義原則符合，有關當前迫切重要的問題的這種防禦鬥爭，是人民陣綫的出發點。

但是，反法西斯的羣衆鬥爭，不可能只限於防禦。它必然而且的確迅速發展爲攻勢的反擊。資本主義危機和法西斯進攻的整個邏輯必然使得這一反擊步步前進，而終必連資本主義本身的生存也成了問題。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民主制度與法西斯主義的問題，但是，在鬥爭當中必然會提高到解決根本的革命的的問題——要社會主義還是要資本主義。

試問由單純的保衛民主制度擴展爲革命的反擊，在實際生活中是如何發展的呢？例如法國工人，只是成立勃魯姆政府使他們的民主權利暫時得到保障，他們是不滿意的，他們還進行了大規模的罷工，提高了工資，實行了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制，他們還組織了四百萬新的工會會員，除了要求軍火工業和銀行國有化之外，他們還用別的辦法去進攻資本主義的堡壘，而且將來會更向前進。在西班牙，團結在人民陣綫的勞動羣衆，在反攻方面的進展更大；他們已經拿起武器與地主、

大資本家、軍閥、貴族進行鬥爭，如果勝利的話，無疑地會進一步向社會主義邁進。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起點是人民陣綫反對目前法西斯對羣衆生活與自由的進攻的防禦性的鬥爭，而其終點則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資本主義。

全世界維護和平的鬥爭具有與各國人民陣綫運動相同的革命意義。目前的戰爭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形不同，當時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兩大集團在互相爭奪。今天是蘇聯在與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與目前還不願戰爭的民主國家結成同盟的情況下，領導進行防禦性的戰鬥以保衛和平而防禦德、日、意侵略性法西斯戰爭計劃。因此，蘇聯不僅是行將到來的世界共產主義制度的前衛和榜樣，而且也是人類現在防禦法西斯野蠻行爲和新的可怖的大屠殺的主力軍。但是，如果法西斯兇犯竟放縱他們的惡狗，那麼整個情況就必然立即改變。反對戰爭的力量就必然不可避免會立即由防禦轉入反攻。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本身也就必然會岌岌可危。法西斯在國際上的失敗就會在其他國家產生社會主義革命，就會在所有其他國家大大促進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維護和平的鬥爭，根本上是一個最重大的革命問題。

反饑餓、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偉大人民陣綫運動，在各國和國際上的發展具有深刻的革命意義，因爲它團結並且鼓舞了以前所沒有組織起來的、精神渙散的羣衆，並把他們引上了勝利的道路。首先，它提出了能把社會黨、共產黨、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各不相謀的工人集團團結起來，成爲有決定作用的羣衆，共同與法西斯進行鬥爭的實際綱領和組織方法，從而爲無產階

級的團結奠定基礎。其次，人民陣綫在無產階級與城鄉小資產階級下層廣大羣衆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使這些羣衆走上與大資本家的勢力進行鬥爭的壁壘。這件事十分重要，因為法西斯始終是在這些中間的社會階層中間招募他們主要的戰鬥部隊的。人民陣綫也給羣衆以新的希望和勇氣。

第二國際（許久以來就是整個歐洲無產階級的基本組織）改良主義政策的破產（這是法西斯主義在意、德、奧三國輕易取勝的原因），已使西歐羣衆陷於精神頹喪與悲觀的狀態。他們都在害怕，以爲法西斯主義的推進是無可抗拒的。可是人民陣綫的勝利和蘇聯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鬥爭，掃清了羣衆的這種消極的心情。人民陣綫給了勞動羣衆新的團結，強有力的組織和有效的戰略，因此也就給了他們以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和新的革命的遠景。

斯大林的「人民陣綫」政策，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戰綫政策在今天鬥爭情況下的運用。共產國際自成立以來就號召社會民主黨人實行共同行動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而且有時也得到了暫時的成功。例如，在一九二三年，曾與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合作，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的大家知道的英俄工會委員會，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中國統一戰綫等等。我們也已經看到，美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曾經在罷工、保衛工人、勞工黨、工會選舉等等當中進行了不少統一戰綫的活動。可是，一般說來，全世界的改良主義分子，一心指望資本主義有一個長期和平發展的前途，總是拒絕共產黨的統一戰綫階級鬥爭政策而事以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爲依據。因此，在德國、英國、中國、美國等等開始發生的局部的統一戰綫終於因爲階級合作（社會黨）和

階級鬥爭（共產黨）兩種政策的衝突無可調和而破裂，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一九二九年世界巨大經濟危機的發展，使法西斯危險急速增長，而希特勒上台又使這種情勢特別明顯。從此之後，形勢已根本變化，工人們英勇地反對法西斯主義。社會黨領袖原希望和發展『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逐漸成長為社會主義，現在這種希望破滅了。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官僚們，看到在德國和中歐其他國家，他們過去的友人竟狂暴地一變而反對他們並扶植法西斯主義分子來動員羣衆，他們大為震驚而且沮喪。他們開始認識到，祇是遷就行將到來的法西斯統治，在它來到之後加以批准（德國社會黨會這樣嘗試過）是不行的；認識到法西斯上台也就是他們的組織將被摧殘，他們自己將被監禁。他們必須起來鬥爭，否則就被人一舉消滅。

由於他們的政治綱領破產，他們與大資產階級的聯盟破裂，許多社會黨領袖們，在羣衆反法西斯的壓力下，現在才來傾聽共產國際結成統一戰線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建議。於是，在意大利、奧國、西班牙、法國等等這種聯合的運動形成起來了，雖然右翼分子曾作頑強的抵抗。第二國際，作爲一個團體，依然拒絕與共產國際結成總的統一戰線。這是因爲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社會黨起了保守的決定性的影響，它們仍然死抱着第二國際的老政策不放，因爲在這些國家法西斯的危險還沒有那麼緊迫，資產階級仍然與機會主義的社會黨領袖相勾結並依賴他們來防止工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就是在這些國家，人民陣線的思想也是在迅速發展中。美國

社會黨拒絕與共產黨成立整個的統一戰線運動，是第二國際右傾因素的反映。

一些社會黨逐漸拋棄第二國際的反對統一戰線的老方針，而與共產黨、人民陣線的核心合作，這就是默認伯恩施坦改良主義的破產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階級鬥爭綱領的正確。但是，有許多社會改良主義分子，雖然放棄了第二國際公開機會主義的老路線，却沾染上別的腐朽的東西——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思想。

托洛茨基分子污蔑整個人民陣線的發展爲束縛革命的枷鎖。他們責難人民陣線的維護民主制度的鬥爭，說這種鬥爭毫無用處而主張集中全力立即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他們反對人民陣線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說這是原來第二國際階級合作的繼續而主張立即取消。然而所有這些僅僅暴露出有害的反革命托洛茨基集團那種罪惡的愚蠢而已。托洛茨基以往把俄國的中農奉送給富農，現在又打算把中間階級的下層和農民奉送給法西斯主義。假如革命的西班牙的和法國的工人竟會愚蠢到放棄維護民主制度的鬥爭而脫離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者和落後的工人，那末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最高興不過的了。像托洛茨基分子所主張的取消法蘇條約這樣一種方針，只有使這些羣衆向法西斯主義投降而保證法西斯主義必然勝利；這樣一來，不啻是天賜良機，讓法西斯分子去實行以反共「聖戰」來取消一切自由和奴役羣衆的陰謀。

人民陣線的路線不是伯恩施坦的階級合作的路線，而是列寧的階級鬥爭的路線。第二國際改良主義的政策和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的政策之間有着根本的區別，現實生活中一些決定性的事實就

說明了這一點。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總是與大資本家聯盟而終於投票擁護希特勒政府；而西班牙工人，却和貧農與城市中階級下層結成英勇的人民陣線，共同進行鬥爭反對大資本家、大地主、貴族、軍閥等等的法西斯勢力。西班牙羣衆所走的是一條革命的道路，最後將走到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

要使人民陣線成功，必須解決內部的許多問題。其中主要的是：（一）消除工人中間那種公開的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幻想，而逐漸建立勞動階級的統一。（二）發揮無產階級在人民陣線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三）有系統地說服貧苦農民和城市中等階級下層，告訴他們，他們的真正的利益在於和工人一致去反對壟斷資本，在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與勞動階級之間成立堅定的綱領上的聯盟。

要完成這些任務，在克服有害的改良主義的影響上，在法西斯國家裏面進行工作的極端困難上，在有被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反動派所控制的軍隊打敗的危險上，在中等階級分子不願堅決行動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上，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壞上，在統一戰線暫時的分裂上，在組織形式和策略問題上等等，將遭遇到嚴重的障礙。但是，人民陣線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英明地努力去實行，就是一條康莊大道，使無產階級可以有最堅定的團結和最多數的同盟者一直進到最後的革命鬥爭。

美國的人民陣線

在美國，最基本的社會力量是在努力發展廣泛的人民陣線。長期的工業危機，龐大的失業軍，工資大大削減，食不飽的救濟制度，當政的勢力的殘暴和羣衆的普遍貧窮，所有這些已經造成了廣泛而深沉的不滿情緒。羣衆既無社會保險，生活水平又那樣悲慘，對於這種情況已經深深覺，而逐漸喪失對資本主義的幻想。由於羣衆對法西斯主義的恐懼日益加深，對迫在眼前的新的世界戰爭的普遍害怕，他們的不滿情緒因此也就大大加深了。

幾年來，這種發展着的羣衆的激進化，越來越多表現爲有組織的羣衆鬥爭。在以前幾年我們會談到這個廣泛的運動的許多方面——一九三三—三六年失業工人大鬥爭，一九三三—三六年偉大的罷工浪潮，工會會員大大增多，共產黨迅速發展，退伍軍人要求津貼的鬥爭，農民多次罷耕和進行其他英勇的運動，青年運動不斷發展，黑人羣衆逐漸覺醒，反法西斯和反戰運動大大增長，辛克萊的加州消滅貧窮聯盟和陶森的養老金計劃的突然出現。除此之外，我們還看見朗格、考林、史密特之流的法律欺騙宣傳，他們利用羣衆的不滿情緒，建立了像『財富共享運動』和『全國社會正義同盟』之類的大規模的組織。

九月十二日，有農民、工人和各種政治團體的自由派的代表一百一十八人在芝加哥舉行會議，這是羣衆不滿情緒的進一步的表現，自一九二四年以來，還是第一次發生這種運動，而且帶有很強烈的農民勞工黨的傾向。

在美國勞動人民的深深的激動當中，最重要的羣衆行動倒是『產業組織委員會』的成立。這

個委員會是由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十五個工會組成的，共有會員一百五十萬人，首領是聯合礦工工會主席約翰·路易斯。產業組織委員會按照左派（社會主義勞工黨、社會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北美工團主義同盟、共產黨、工會教育聯盟、工會團結同盟）三十年來的努力，着手來按照產業工會的原則，在鋼鐵、汽車、橡膠、無線電和其他大量生產的工業中進行組織幾百萬無組織的工人。產業組織委員會的領導人們，在羣衆的壓力下放棄了傳統的行業工會運動——由於工業的機械化、專業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這種工會運動早就不合時宜了——而採取了產業工會的制度，其實美國勞工聯合會早在三十五年之前就應該採用這種制度的。

可是，產業組織委員會的意義遠超過組織無組織工人的問題，儘管這個問題是一個基本問題。這個運動有可能深刻地改變工會運動的整個結構、領導、政策和社會觀點。五十年來，一個腐化反動的勞工官僚小集團，致命地把持着工會而且左派努力要使工會成爲廣泛的能够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每一次都給他們破壞了。這個小集團裏面有許多人越來越表現出法西斯的傾向。產業組織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給了這反動的組織當頭一棒。它有着使勞工在今後一個時期在各個戰線上——思想方面、產業方面、政治方面——大大前進一步的可能性。經過它可以把目前工人、農民、中等階級、黑人、青年等等分散的鬥爭統一起來，成爲強大的進步的羣衆運動，成爲偉大的美國反法西斯反戰爭人民陣線。不過，它的領導人是剛開始擺脫過去多年的極端保守主義的，他們是否能理解和主動地去了解歷史所賦予產業組織委員會的目標，還待以後再看。

操縱着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反動分子如格林、烏爾、霍奇遜、華爾頓之流想要殺害這樣重要的產業組織委員會運動，因此把它的工會開除會籍並普遍攻擊這個運動，這是不足為奇的。在法西斯反動勢力日益成長的時候來罪惡地破壞勞工運動，是和他們這些人多年來出賣工人階級一切利益的作法是一脈相傳的。可是，這些勞工騙棍這一次是不會成功的。有組織的工人羣衆，包括行業工會的工人在內，都擁護產業組織委員會，如果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人在舊的工會裏面進行堅決的鬥爭，他們能够很容易就打破格林反動派的把持，而開闢有組織勞工的新紀元。

一九三五年，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到美國的人民陣線問題，他說：『一個工農黨或許是一個適合的形式。』這是正確的。在美國成立一個偉大的、能够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黑人等等勞動羣衆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農民勞工黨的條件正在迅速成熟。向着美國人民陣線這個方向的許多演變都是以這個農民勞工黨運動爲主要的中心。

在本書第五章中，我已指出迄今妨害美國工人階級覺悟和有組織政治行動的發展的主要原因。這些歷史因素包括：有大片的無主土地存在；工資和生活水平比較起來高一些；在長期的工業發展中間經濟的前途相當大，有大批非公民的外來移民；沒有那麼需要作爭取形式民主權利的鬥爭，這種權利工人們早已爭取到了；大勞工貴族處於特權地位；聯邦政府具有地方分權的形式等等。幾世代以來，工人就在努力反對資產階級剝削者，但是由於上述種種容易在羣衆中製造幻想的有害因素，他們的鬥爭始終只限於經濟範圍，而沒有採取有組織的政治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

勞動羣衆沒有形成一個廣大的羣衆性的黨和自己的政治綱領，而只是信從兩大資產階級政黨。

然而，現在客觀情況基本上改變了，工人的觀點也就不同了。美國妨害廣大工人羣衆的統一政治活動的發展的歷史因素，已經大部失去作用。在危機的打擊下，工人身受大規模失業、減少工資、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經濟上完全沒有前途等等的痛苦，他們正迅速失去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和對兩大政黨的信任。工人階級，因為外來移民停止入境，熟練工人在工業中的作用已經降低，所以變得比較純淨、比較一致了，而且工人在各方面看到越來越高度集權的國家機構成了被資本家用來反對他們的東西。他們感覺到了正在發展起來的巨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感覺到舊的行業工會和不偏不黨的政治行動已經不足以應付這個反動勢力了。

因為這些原故，勞動羣衆的鬥爭不僅擴大了，更加英勇了，而且特別變得更有政治的性質。所有上面說過的那些工會的羣衆運動、陶森的主張、加州消滅貧窮聯盟、考林的活動等等，都是高度政治性的。歷史上第一次，在美國有千百萬工人和其他勞動羣衆提出了一連串的政治要求，要求失業救濟、失業保險、养老金、農業救濟、聯邦工資工時法、減稅、舉辦公共工程、維護黑人權利、實現青年的要求、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等等。這是有根本重要性的事情。這些要求都是十分重要，具有全國規模和在羣衆意識中根深蒂固的要求，可以成爲一個偉大的獨立的全國性勞動者政黨的綱領的堅固基礎的。

羣衆很明顯地脫離兩個老政黨而趨向於成立自己的政黨。在許多地方已形成了地方的和州的

農民勞工黨。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頭，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就是去領導其他階級、農民、自由職業者等等正在擺脫資本主義窠臼的不滿現狀的分子。這就是說，工會運動有責任去領導成立偉大的全國農民勞工黨，去把羣衆團結在人民陣線裏面爲反對迫在眼前的飢餓、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危險。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自然是完全沒有去實現這種基本任務。這些反動分子，充當資產階級的走狗已經有二個世代之久，他們自然是落在羣衆的整個政治進展後面。他們罪惡地出賣勞動羣衆的利益，反對成立農民勞工黨，設法使工人信從兩個資產階級政黨。格林的官僚分子（他們是魏柏斯主義的必然的繼承者）在長久把持工會的期間，給美國工人不少致命的害處。他們反對讓行業工會隨着工業中大批生產的發展而改爲產業工會；他們固執地拒絕去組織千百萬無組織的工人，現在他們又企圖分裂勞工運動來阻撓這種工作；他們在戰時讓工人去當砲灰送死；他們使用種種資產階級的手法來妨害工人們階級意識的發展。但是，他們所有叛賣行爲中最危險的一種就是拒絕去組織農民勞工黨，來領導不滿現狀的羣衆。因此，他們就很可能成爲農民勞工黨的力量，去當受考林、史密斯之流的赫斯特的法西斯欺騙宣傳的影響，受聯合黨的勒姆克、陶森等大機會主義者的影響。聯合黨的成立對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是一個直接的幫助，而這種惡劣情況的造成，則應由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勞工騙棍們負完全責任。

羣衆正深深不滿兩個資產階級政黨，要防止這些正在覺醒的羣衆落入法西斯欺騙宣傳的圈套，

唯一的辦法就是有組織的勞工首先發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農民勞工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動領導人拒絕作這種行動，因此就把這個重大責任完全放在路易士所領導的產業組織委員會身上了。產業組織委員會看起來是正在負起這個責任來，經過「勞工無黨派聯盟」的活動，無疑是趨向於成立全國農民勞工黨。這個委員會積極參加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和紐約美國勞工黨的成立，都是良好的徵象。不過，產業組織委員會的進度依然太慢，猶豫不決。組織農民勞工黨作為反法西斯的堡壘，是緊急的必須做的事情。這件事必須迅即進行，因為法西斯分子正在盜竊對廣大勞動羣衆的領導權。共產黨完全擁護建立農民勞工黨，並以一切可能有的力量去求其實現。共產黨（與社會黨不同）並不認為農民勞工黨是一個敵對組織。恰好相反，共產黨認為農民勞工黨是我國勞動羣衆獨立行動的第一步。他們目前還不準備接受先進的共產主義的綱領。在建立偉大的農民勞工黨當中，羣衆的政治活動水平就會提高，隨着這水平的提高，願意加入共產黨的富有戰鬥性的分子就會增多，這樣一來共產黨就可以擴大它在羣衆中的政治領導作用。共產黨的利益和農民勞工黨的利益是密切一致的，共產黨的利益與促進勞動羣衆利益的工會和其他組織的利益也是密切一致的。

雖然農民勞工黨的綱領起初是比較溫和的，但是，共產黨也並不怕農民勞工黨會發展成爲像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或英國的工黨那種改良主義的組織。恰好相反，農民勞工黨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不同，它將是在資本主義衰落而階級鬥爭迅速尖銳化的時期，在日益發展中的共產黨的鼓勵下成立起來的，它必然走向階級鬥爭的政策。它將成爲勞動羣衆進而成立美國人民陣

繞與法西斯和戰爭相搏鬥的一條大道。危機的加深，羣衆的覺醒，終必走到作最後的鬥爭，在那個時候，羣衆將在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永遠掃除猙獰醜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這制度所造成的貧困和殘酷，建立一個自由繁榮幸福的蘇維埃美國。

戰爭與革命

資本主義是注定了要滅亡的。但不是聽天由命，由於與人無關的經濟政治法則的自動作用就自行滅亡，而是因爲千百萬被陳腐的資本主義制度打入貧窮奴役的地獄的工人、農民和城市中等階級下層分子，現在正在思想上組織上逐漸準備打倒現在已經行不通的社會制度，代之以科學的崇高的社會制度。俄國的工人農民已經把資本主義的結構打破了第一個大缺口。他們是新社會制度的帶路人，而法國和西班牙的運動，確鑿證明，其他許多國家的勞動羣衆已在準備開始走上同一條革命的道路。

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大壟斷資本家清楚了解資本主義危機的邏輯和正在發展的革命羣衆運動的意義。他們已經看到他們不能再用的民主制度去鎮壓勞動羣衆了。因此他們就着手取消民主自由，而採用法西斯的欺騙宣傳和恐怖手段。可是，他們也知道，即使他們能够建立起法西斯獨裁，他們也還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基本矛盾，而只會使這些矛盾更加尖銳、勢頭更加兇猛。因此，他們爲了保持自己的統治，正在準備使用一個更加殘酷的武器，摧毀一切的現代

戰爭。法西斯主義沒有能力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壓制想反抗的羣衆，從這個事實就看得很清楚，事實是首先動手組織新的世界戰爭的正是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國家。

人類現在正站在大戰的懸崖的邊緣，這場戰爭將比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殘酷得多，激烈得多，它的破壞也要大得多。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大批屠殺俘虜，濫炸馬德里和其他城市，說明將來的戰爭是多麼殘酷。直截了當地說，統治的資產階級正在處心積慮毫無人性地準備屠殺幾千萬人，爲的是拼命想原封不動地保持已經過了時的，歷史發展已經確定必然要拋進垃圾堆去的資本主義制度。不過事情的演變將會說明他們的這種殺人的陰謀是要失敗的。即使他們能够打破羣衆的反抗而發動戰爭，法西斯分子所正在組織，想要用來摧毀歐洲的民主制度，鎮壓革命而挽救資本主義的戰爭本身，也祇有加速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使這革命的結果更加具有根本的性質，更加廣泛。

悲觀的湯瑪斯認爲行將爆發的戰爭會帶來法西斯主義，但是墨索里尼却比較現實，他很明顯表白了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恐懼，他說，下次大戰之後，跟着來的一般是共產主義。儘管有這種恐懼，但是法西斯獨裁者還是選擇了戰爭的一條路。他們不能不想辦法用奪取別國的領土、殖民地和市场的手段去解決他們的必須解決的經濟的政治的問題，這就是戰爭。他們知道戰爭會帶來革命；但是法西斯分子自以爲當革命來到的時候，他們至少可以突然取勝並以鐵腕軍事獨裁來多少逃避革命的威力。可是這是一個空想。我敢大胆地說，在法西斯分子開始他們蓄謀的大屠殺的時

候，他們也就是簽署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絕命書。

資產階級在上次戰爭中屠殺了一千萬人，傷殘了二千餘萬人，毀滅了數萬億的財富，並且還避免了備俄國除外的革命。這誠然是事實。但是今天的情勢大大不同了，今天比那時要革命得多。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工人階級牢牢地掌握在第二國際手中，各個社會黨與各自的資產階級相勾結。社會改良主義分子曾引導羣衆走向戰爭，但是戰爭一結束，勞動者們就在德國、匈牙利、意大利等國向資本主義作猛烈的革命的進攻。使這些進攻挫敗的就是各國的社會黨，它與資產階級協力打了這些進攻。第二國際保存了歐洲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法西斯主義的滋長和行將爆發的大屠殺，首先要由他們負責。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够阻止俄國革命，是因爲俄國的社會黨太弱，工農羣衆都信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

但是，今天如果爆發戰爭的話，資本主義是找不到像第一次大戰當中的那種現成的救主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人再也不能把羣衆鎖起來了。他們的改良主義政策，雖然還很有害，但已經沒有過去那種欺騙羣衆的力量了。改良主義分子危害工人階級的罪惡，已經實際上摧毀了德國、奧國和意大利的社會黨。在法國、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社會黨正把它們的眼光轉向新的，與共產黨人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戰鬥的政策。幾乎所有的國家，現在都有了堅強的共產黨，它們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準備着實行列寧的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戰爭這個決定性的革命口號。它的後盾有偉大的社會主義堡壘蘇聯及其強大的革命紅軍。

法西斯獨裁者或有可能發動戰爭，甚或可能動員本國的一些羣衆。但是他們的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戰爭不可能進行多久。法西斯恐怖、國家主義的欺騙、反蘇宣傳（社會黨也參加）只能暫時壓制他們的勞動人民的起義。但是，在羣衆中間，已經幾乎普遍存在着一種強烈的反戰爭、反資本主義的情緒，比一九一四—一八年要大得多。一旦羣衆經受到戰爭的可怖的痛苦，這種精神就必然會燃燒起來成爲不可遏止的革命的烈焰。在共產黨和其他反法西斯集團的領導下，勞動羣衆的統一戰綫將終於把法西斯的恐怖統治打得粉碎。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敢於發動他們所策劃的戰爭，羣衆將宣告他們國內可詛咒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滅亡來回答他們。

過去兩代，每一次大戰都會造成革命，將來的戰爭也不會例外。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中，產生了英雄的巴黎公社；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引起了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儘管有第二國際）以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府——蘇聯而結束。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它現在正在迅速製造中）將激起羣衆大反叛，以致使許多歐洲國家推翻資本主義，並使社會主義大大擴大。

勞動者要和平。……他們厭惡和害怕戰爭，戰爭有使千百萬人遭受屠殺，整個人民被毀滅，城市被摧殘和工業遭破壞的恐懼。他們知道首當戰爭之衝的正是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在蘇聯的範例激勵之下，他們正在拚命反對法西斯正在組織的非人道的戰爭。……他們不能用戰爭來挽救資本主義，歷史將無情地處罰他們所犯的野蠻罪行。

譯者後記

『福斯特自傳』原名『從布利安到斯大林』。福斯特所以採取這樣的名稱，是在說明他本人怎樣從幼年（一八九六年，當他十五歲的時候）的布利安運動的同情者，成爲後來的共產主義者——他的思想與行動、理論與實踐整個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前後共歷四十年，上起十九世紀末，下迄本書完成的一九三六年。這一年也正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從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快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使蘇聯的國民經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經濟危機深淵而歷久不拔下，向前突飛猛晉的年代。所以福斯特把斯大林來代表這一個新時代，而取了這樣一個書名。

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三六年這短短的四十年，是一個不平凡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爆發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大火併——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了改變人類歷史面貌的俄國十月大革命；發生了自美國開始而泛濫全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慢性的經濟總危機；開始了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些重要事件的橫斷面，都貫穿在福斯特自傳中。因此，我們讀他的這本自傳，不獨使我們對他的早期在美國工人運動中的艱苦奮鬥的歷史，有了清楚認識，並且對這四十年中的全部歷史的面貌，也由於他書中的烘托渲染，印象深刻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在這本書裏面，我們見到美國壟斷資本的興起。我們見到美國壟斷資本家，爲了加強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怎樣以『自由僱用』來做藉口，貫澈他們多方榨取無工會組織或參加御用的公司工會的工人的血汗的目的。我們見到美國工人在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危機下所遭遇失業饑餓痛苦的陰慘畫面。我們見到在覺醒中的美國工人要求組織起來，對資本家進行罷工鬥爭的英勇故事。我們見到美國社會黨的右翼分子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上層領導分子，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右翼分子和歐洲的黃色職工會頭子們一樣，爲了迎合他們的主子資本家，不惜無耻地歪曲與放棄了階級鬥爭而主張所謂『階級合作』的理論，來欺騙工人，來反對工人罷工，來打擊工人組織產業工會。

經過了幾十年工會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經過了俄國十月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福斯特深切認識到和光輝地證明了『工人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革命中及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組織者、領導者和先鋒隊。』這就是福斯特所得到的結論。美國共產黨也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呱呱墮地，來領導美國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走向革命、走向推翻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

福斯特自傳，對於美國工人運動過去的歷史有了精確的分析，對於一九三六年以後的美國勞動人民在美國革命中以及在全世界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所應走的道路，作了一個正確扼要的指示。因此，他的自傳，即使到了今天，也還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本書所以在今天譯翻出來，供諸讀者，其理由就在此。



2 035 6523 0

此外尚得附帶說明一下的，就是本書中有若干腳註，因與正文無何關係，譯時曾加以略去。最後，我們以沉痛的心情，告訴讀者的是：本書譯者之一丁明同志，在譯完本書後不久，即赴朝鮮前綫工作。丁明同志身體向不十分健康。在繁重艱苦的工作中，積勞成疾，不幸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病逝在他堅持的工作崗位上，這是我們非常悲痛的事。因此，我們見到這本書的出版，就要想到我們這位親密的戰友，也就想到他的死，是間接由於美帝國主義者加以殺害的。為悼念這位可敬的文化戰士，我們要加强抗美援朝運動，為死者復仇，並把這本書的出版，作為他的永久的紀念。

盧吉茵

邵新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三日